古典学译丛



THE SPARTANS

AN EPIC HISTORY

by Paul Cartledge

斯巴达人

一部英雄的史诗

[英] 保罗·卡特利奇 著 梁建东 章颜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古典学译丛

THE SPARTANS
AN EPIC HISTORY
by Paul Cartledge

上架建议：古典学、历史



定价：38.00元

古典学译丛

丛书主编 阮炜 曹亚军

THE SPARTANS

AN EPIC HISTORY

by Paul Cartledge

斯巴达人

一部英雄的史诗

[英] 保罗·卡特利奇 著 梁建东 章颜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英)卡特利奇著;梁建东,章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8
ISBN 978-7-5426-3256-2

Ⅰ.①斯…　Ⅱ.①卡…②梁…③章…　Ⅲ.①斯巴达—历史
Ⅳ.①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7892 号

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

著　　者 / [英]保罗·卡特利奇
译　　者 / 梁建东　章　颜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21
书　　号 / ISBN 978-7-5426-3256-2/C·354
定　　价 / 38.00 元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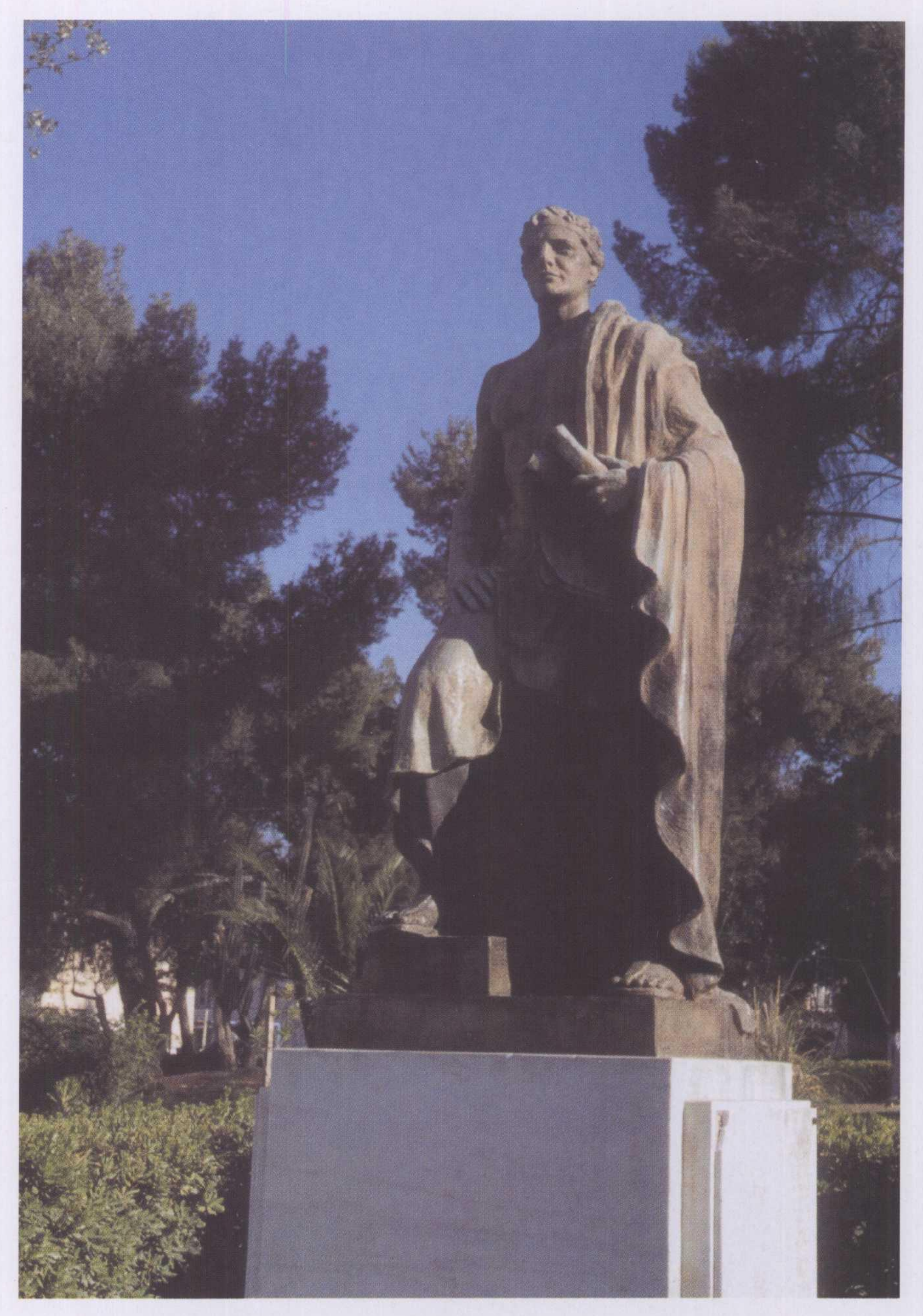
保罗·卡特利奇 著名古典学家。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并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自1979年起执教于剑桥大学，是该校古典文学院(Faculty of Classics)希腊历史专业的教授，同时在剑桥大学卡莱尔学院（Clare College）担任教职。著述等身，近期的著作包括：《插图本剑桥古希腊史》(*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希腊人：文明的熔炉》(*The Greeks: Crucible of Civilization*)；《斯巴达和拉科尼亚：从公元前1300至前362年的区域史》(*Sparta and Lakonia: A Regional History c.1300-362 BC*)；《希腊人：自我与他者的肖像》(*The Greeks: a Portrait of Self and Others*)；《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The Spartans: An Epic History*)；《亚历山大大帝：寻找新的历史》(*Alexander the Great: the Hunt for a New Past*)；《温泉关：改变世界的战役》(*Thermopylae: The Battle that Changed the World*)。曾主编两套丛书并兼任三种学术刊物的编辑；达克沃斯出版社（Duckworth publishers）的古代历史顾问。伦敦古物专家学会(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会员。曾荣获希腊共和国颁发的“金十字”荣誉勋章（Gold Cross of the Order of Honour)。2004年，他被斯巴达授予荣誉市民称号，以表彰他在斯巴达历史研究领域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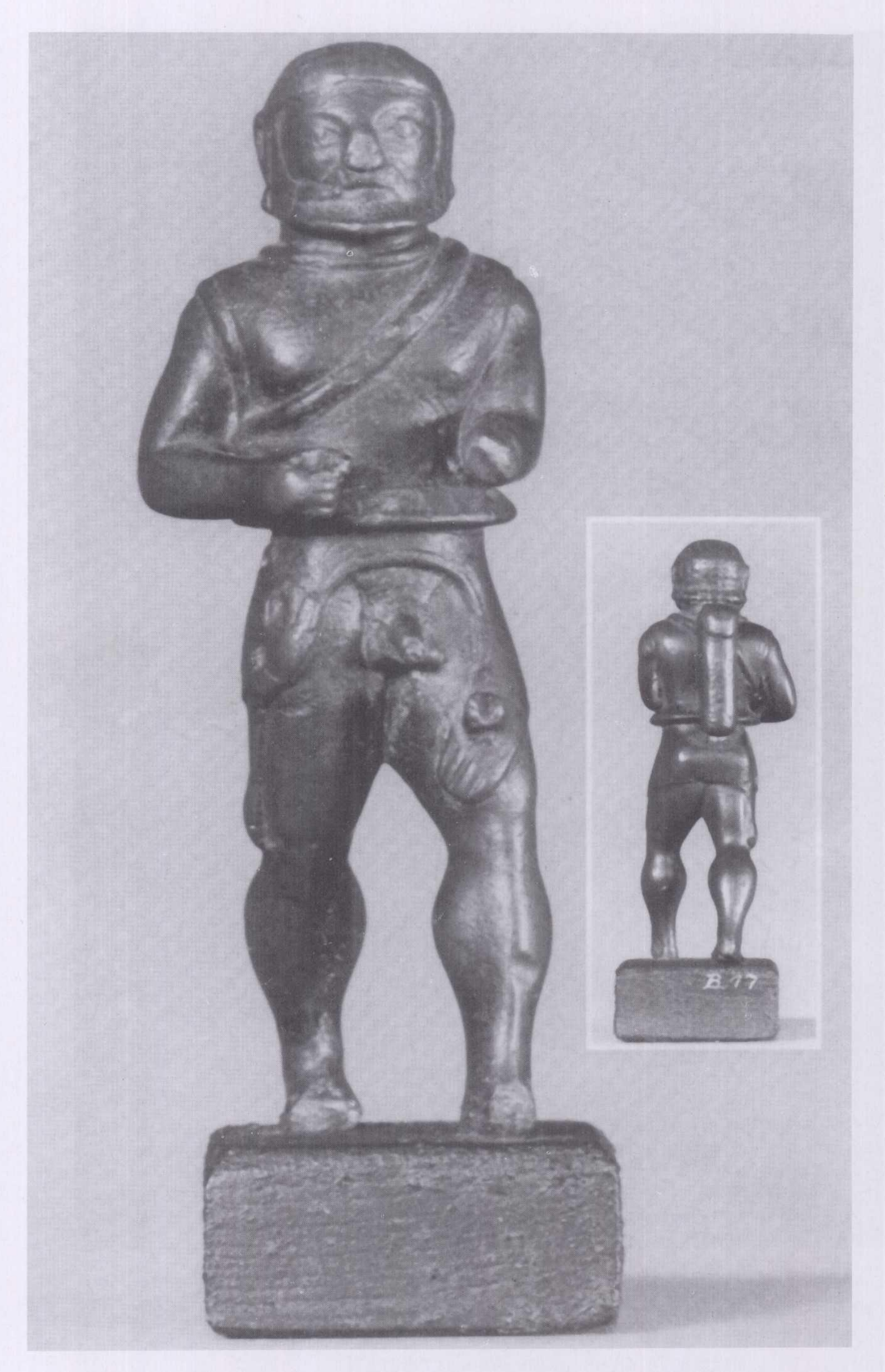
1.从古代的铁拉普涅（墨涅拉俄斯和海伦神殿）向西望，越过现在的斯巴达（1834年发现），可以看到海拔2404米的泰格特斯山脉。右边背景中还可以看到拜占庭米斯特拉河。



2.这是斯巴达当地的女神欧西亚的神庙的房基遗址，这位女神类似于泛希腊地区的阿耳忒弥斯。第一座神殿建于公元前700年，以石为基，规模狭小，大致是由泥土和木材建造的；公元前570年，在欧罗达河爆发了一次毁灭性的洪水之后，一座更加宏伟、壮观、全部由石灰石建造的神殿庙取而代之。读者在图中所看到的是在后来即罗马时期得到过翻修的神庙的遗迹，其所处位置在当时是一个圆形剧场，是特意为来自罗马的、酷爱观看血腥表演的游客们所建，在那里他们可以欣赏年轻的斯巴达人在欧西亚的祭坛旁被野蛮鞭笞，打得奄奄一息（甚或死亡）。在斯巴达的全盛时期，按规定这一圣域本是“够格者”的训练场所，在这里举行的很多竞争激烈的仪式标志着斯巴达男孩们通过各种考验，度过了他们的童年以及青少年时期。



3.古代并未传下任何一座真正的吕库古——这位极具远见的法律制定者（传统上认为他活跃的时间是在公元前8世纪，甚至更早的时期）——的个人雕像；实际上，我们也无法确定他是否真的曾经存在过。这尊现代雕像是20世纪50年中期由一些祖籍斯巴达的希腊裔美国人出资塑造的。塑像所表现的这位立法者显得相当有书卷气，可能意在反驳斯巴达人全都是未开化的文盲的谣言。



4.因其丰功伟绩，赫拉克勒斯成为了希腊神话中少有的几位被尊奉为神灵的英雄中的一位。同时他也被认作斯巴达的两个王族的共同祖先。这尊公元前6世纪的铜像充满了力量，将赫拉克勒斯当作了斯巴达重甲步兵的极为贴切的模范。



5.斯巴达人最初是在公元前8世纪晚期征服了美塞尼亚的中央平原，公元前7世纪早期的时候，美塞尼亚人爆发了起义，但最终被斯巴达重甲步兵镇压。图中现代画家Richard Hook对重甲步兵的想象性重构看起来还是与当时的有些相像的。斯巴达诗人提尔泰奥斯生活在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爆发的时期，他的一些诗句记录了步兵方阵面对面厮杀时令人生畏的恐怖情景。



6&7.这座用斯巴达当地的石灰石制成的四棱锥形的雕像中的人物，通常被解释是墨涅拉俄斯和海伦：在上图中，这位斯巴达未来的国王可能正在向海伦求婚（他的兄弟阿伽门农是迈锡尼的国王，娶了海伦的姐姐克吕泰墨斯特为妻）；在右图中，作为一个被伤害的丈夫和国王，他可能在希腊军队劫掠特洛伊城的时候再次与海伦相遇。

8.从荷马开始，墨涅拉俄斯与他那沉鱼落雁般美丽但又不忠的妻子海伦的故事，对希腊那些喜欢说故事的人来说具有一种永恒的魅力。一位生活在波斯战争期间的瓶饰画家为我们描绘了墨涅拉俄斯在经历了十年漫长的征战之后，再次抓住了他那位对特洛伊仍旧依依不舍的妻子的手的情景，从而让我们重新回想起原初这场爆发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冲突。特洛伊的海伦，廷达瑞俄斯（或者宙斯）和丽达的女儿，论出身她其实是斯巴达的海伦。根据《奥德赛》的记载，她后来与墨涅拉俄斯返回了故乡并成为了一位威严的王后。



9.这个基里克斯陶杯（kylix）或葡萄酒樽上的图案，是由一位“边民”工匠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所画，他们这类艺人特别擅长于此类“舷窗式”的构图。对于斯巴达人来说，狩猎可以成为他不必参加主要的夜间公餐的两个合法理由中的一个，斯巴达猎人最想猎取的对象是凶猛的野猪——带上网和矛，然后步行去狩猎，这样的情景在公元前四世纪的色诺芬（他曾经在斯巴达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笔下有着非常详细的记述。



10.古风时期的晚期，制造铜器的拉科尼亚工匠们专门制作了一系列小型的重甲步兵塑像，比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尊就是在美塞尼亚西南部的一座阿波罗神殿遗址中发现的。它可能由“边民”制造的，也是由他们奉献给神殿的，因此，这也就可能暗示着由“边民”组成的重甲步兵正日益成长为斯巴达的战斗方阵中一支必不可少的组成力量。这个重甲士兵穿戴着精心制作的盔甲，同时还带上了他忠诚的猎狗(这条狗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



11.这个按模具生产的、饰有浮雕的大型赤陶花瓶是在古代斯巴达的中央某处丧葬丘中发现的。这块墓地可能属于某个斯巴达公民的家族，刻绘在这个双耳长颈罐上的大获丰收的狩猎场景是为了让墓主感到欢喜和满意。（参见插图9）



12.这尊摆着田径运动姿势的年轻女性的小塑像显得生气勃勃，本是用来给一个大型青铜花瓶作镶边的（有点像插图15）。它是在阿尔巴尼亚的普里斯伦德发现的，由此可以证明在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用青铜或其他材料制造的艺术品已经行销到了多么广泛的地域。这个田径运动员穿着的露肩裙是一种斯巴达人特有的服装，适合于田径训练，我们知道，这种训练是斯巴达的女孩们所接受的公共教育的一部分。每四年，在奥林匹亚，希腊妇女包括斯巴达的，都会为荣耀赫拉（Hera）而参加比赛。另一种可能，这尊小塑像只是在展示一个舞蹈动作，某种许多斯巴达的女孩和妇女参加的宗教仪式。

13.众所周知，斯巴达人在陆地上天下无敌，但在海上却不堪一击，因此，刻画在这块象牙铭牌(可能最初是随附在某种家具或器具上的，发现于欧西亚神殿）上的战船也许是在展现一个神话场景，比如帕里斯诱拐了海伦，或者海伦被墨涅拉俄斯重新带回了希腊（参见插图8）。蹲坐在船右侧撞锤上的水手似乎优哉游哉，而处于他上方的水手则抓住机会在钓鱼。这块铭牌的材料并非希腊原产，可以肯定是从其他地方输入到希腊世界来的，比如叙利亚，甚至更远的东方或南方。





14.在这块公元前5世纪的墓碑上可以看到一个“边民”重甲武士。这块石头是在位于马尼的阿里欧波利斯发现的，但它可能最初来自“边民”城市欧铁路斯。只有阵亡的斯巴达公民才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墓碑上。



15.这个巨大的青铜调酒罐是从一座属于一位铁器时代初期的凯尔特人公主的坟墓中发掘出来的，发掘地点在塞纳河和罗讷河的交汇之处。这个调酒罐高1.64米，容量超过了300升。其形制风格（包括盖上饰有一个四肢舒展的女性作为把手）以及辅助性装饰的风格，均显示它来自拉科尼亚地区。它也许是由客户定制的，这个罐子充分证明了凯尔特人嗜酒且好炫耀，也说明希腊和非希腊文化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相互影响，此间的中介地是港口城市马萨利亚（即现在的马赛）。同时也显示了拉科尼亚的工匠们并没有孤立于当时（约公元前525年）的商业主流之外。



16.斯巴达人的红色外套是当地的重甲战士制服的一个鲜明特色。这个由拉科尼亚人制作的武士用外套紧紧地包裹着自己的身体，好像他正在一个寒冷的夜晚里执行警戒任务。事实上，可能如同他头上那顶不同寻常的横向羽冠所暗示的，他多半是将军，甚至还可能是国王。请留意他那具有斯巴达人特色的长发，斯巴达人在温泉关大战甫临之际梳理自己的长发的举动，让来自波斯的敌人们感到非常震惊。



18.1925年，当一个工人将这尊雕像从斯巴达的卫城发掘出来的时候，立马就把它称作“列奥尼达”，这件精美的真人大小的大理石塑像，实际上是用来表现某位天神或英雄的，而且还可能是某座神殿的三角墙上的某组塑像中的一部分（参见本书边页码第255—256页）。请留意头盔掩颊部分上饰有的雄赳赳的公羊图案，以及没有胡须的上唇，这是典型的斯巴达人的面容。一起出土的还有一面刻有铭文的盾牌的残片。



17.与插图16截然相反，这个面无笑容甚至显得粗鲁的塑像则象征着普通的斯巴达士兵们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请留意他身上钟状的胸甲以及突起的胫甲，两者都是斯巴达人注重战争细节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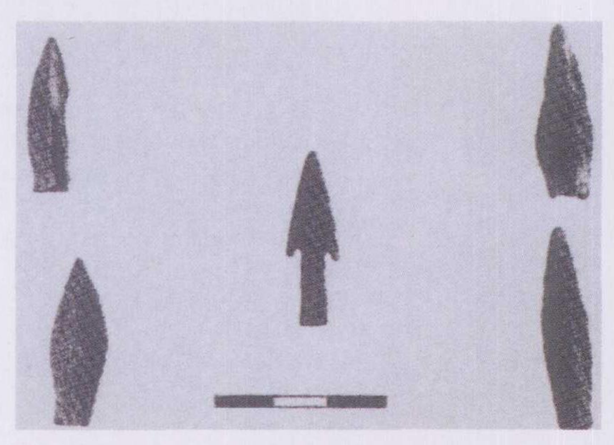
19.这个瓶子是在意大利的南部制作的，上面的场景似乎在描绘一个斯巴达战士（长发，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与一个骑着马手持长矛的人狭路相逢。请留意其新式的头盔，比先前那种完全包裹的式样紧凑了不少。这幅画风格表明的历史背景应该是雅典战争的第一阶段。普利亚的塔拉斯（即现在意大利的塔兰托）是斯巴达在海外建立的唯一一个殖民地（建立在约公元前700年）。

20.公元前425年，雅典人接受了292名拉西代梦人的投降，其中有120人是斯巴达人，地点是在一个叫斯法克特利亚的小岛上，位置靠近美塞尼亚的派鲁斯，雅典人随后把这些人掳为人质并关押在雅典，直到公元前421年才释放他们(参见本书边页码第232页)。雅典人还拿走了他们随身的武器和盔甲，其中的一面青铜盾牌在雅典的“城市广场”（即城市的中心）被发掘了出来，此地与关押上述俘虏的牢房相距不远。这面盾牌上还可以找到这样一些文字：“雅典人从派鲁斯的拉西代梦人的手中把这面盾牌[夺来并奉献给神灵]。”





21.在欧西亚神殿中，除了奉献给欧西亚本人的祭器之外，还发现了奉献给斯巴达“本地版”的艾莉西雅——即希腊人的生育之神——的祭品。有可能她就是此图所展示的样子，身体下蹲呈生育的姿势，伴随其左右的是两个代表繁育的精灵。她的左手指向她的产道。对于斯巴达的妇女们来说，生育后代是一项义务，绝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同时，她们所接受的教育和训练也是为配合她们的优生优育而进行设置的。



23.一个重甲步兵的武器是长矛和剑，他们瞧不起弓箭，这种武器被他们嘲笑为“纺锤”，也就是说只有胆小如女人的人才会使用（参见本书边页码第232页）。但在事实上，弓箭手也是斯巴达常规部队的组成部分，主要执行支援、掩护但不是进攻的任务。图中这些箭头是在斯巴达附近的一座神殿的遗址中发现的，它们可能是由“边民”或其他地位较低的斯巴达弓箭手供献给神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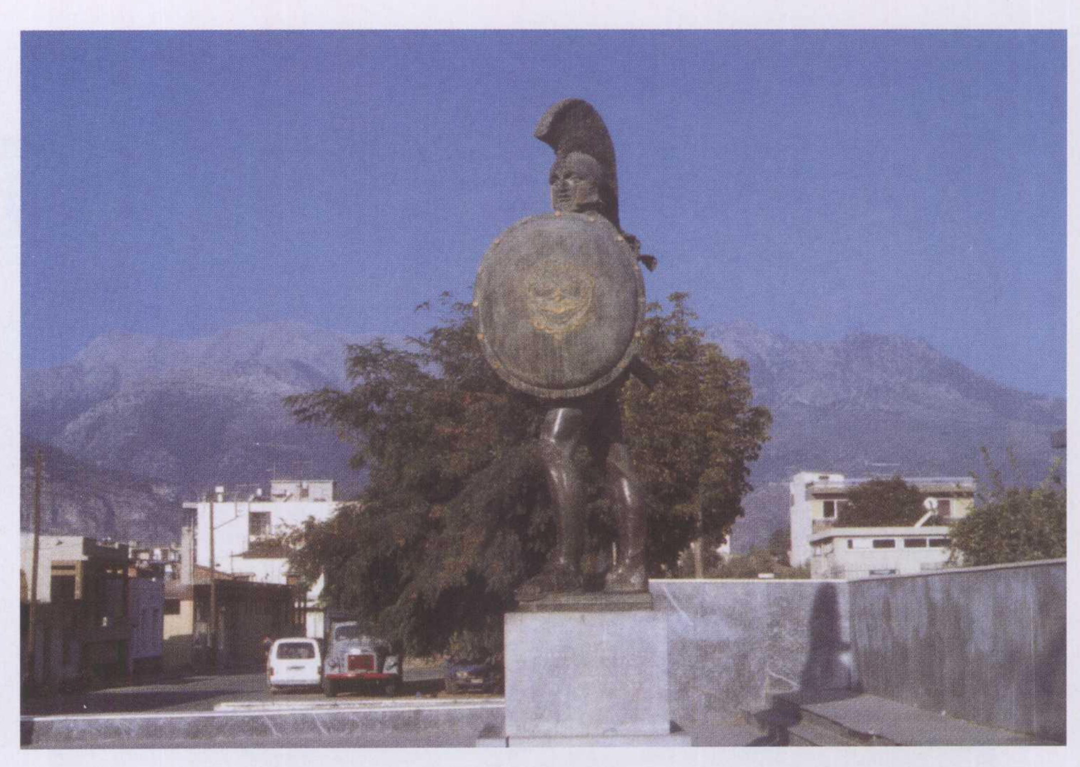
22.斯巴达妇女们得费很大功夫才能达到由海伦设定的可怕的人体美标准。拉科尼亚地区内外发现的公元前6世纪的由拉科尼亚人制作的一系列精美铜镜表明，斯巴达妇女对自己的长相是相当关注的。这些镜子常常被用于装饰女神的神殿。这一系列镜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中一些妇女的形象是完全赤裸的，现实生活中的斯巴达女性出现在公共场合时就是如此，而与之相反，在同一时期希腊其他地区，体面的妇女必须穿得密不透风（并尽量少地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



24.虽则吕山德（死于公元前395年）正处于有希腊真人塑像的时期，但并没有他的塑像流传至今，尽管在公元前404年或稍后的某个时间里，他曾过于自负地把自己的一尊青铜像放置在德尔斐的一座大型神殿的奥林匹亚众神雕像当中，而立于这些神像中央的是波塞冬。因此，这幅由J.查普曼为J.威尔克斯的某本于1807年在伦敦出版的书所绘制的卷首插画，完全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从盔甲就可以看出明显的时代错误，即使是他头盔上没加上那头长了个稀奇古怪的尾巴的狮子也是如此。



25.1955年，在离公元前480年斯巴达人浴血奋战的温泉关的最后一块阵地不远的国道旁（战斗大概发生在国道附近的某处山顶以及周边，这里的一块石碑上刻有西摩尼得斯那天下皆知的警句——“去，告诉斯巴达人……”），希腊政府竖立了这座纪念碑。当然，这尊雕像是以那座斯巴达出土的“列奥尼达”（参见插图18）为母本的。



26.这座列奥尼达的现代雕像也是以不远处出土的最初那尊“列奥尼达”为母本的。它坐落于现在的斯巴达的交通主干道的中心位置，被命名为君士坦丁·帕雷奥罗古斯（拜占庭的最后一位国王）。其背后曾是古代斯巴达的卫城所在地。



27.《列奥尼达》，由J–L.戴维绘于1814年(藏于卢浮宫)。关于这幅名画请参见本书边页码第252–253页。

“古典学译丛”出版说明

我国接触西方古典文明，始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为了吸引儒生士大夫入基督教，也向他们推销一些希腊、罗马学问。但这种学问并没有真正打动中国读书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觉得“泰西之学”比中土的学问高明。及至清末，中国的读书人才开始认真看待“西学”，这当然包括有关希腊、罗马的学问。及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才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一切，激情澎湃地引进一切西方思想。在此过程中，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有了初步认识。

回头看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西方古典学的引进是热情有余，思考不足，且主要集中在希腊神话和文学（以周作人为代表），后来虽扩展到哲学，再后来又扩大到希腊、罗马历史，但对古代西方宗教、政治、社会、经济、艺术、体育、战争等方方面面的关注却滞后，对作为整体的古代西方文明的认知同样滞后。1937 年至 1949 年，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的认知几乎完全陷于停滞。但从 1950 年代起，商务印书馆按统一制定的选题计划，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其中有希罗多德的《历史》（王以铸译）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等。1990 年代以来，该丛书继续推出西方古典学名著。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十卷本，苗力田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柏拉图全集》（四卷本，王晓朝译）。至此，我们对古代西方的认识似乎进

入了快车道。但很显然，这离形成中国视角的古典学仍十分遥远。

近年来，华夏出版社和华东师大出版社又推出了“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其中有不少首次进入汉语世界的希腊原典，如色诺芬《远征记》、《斯巴达政制》和《希腊志》等。这套丛书很有规模，很有影响。但也有这样一个特点：有意识地使用带注疏的源语文本，重点翻译有“解经学”特色和保守主义倾向的古典学著作。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革命和运动的国情下，这种翻译介绍工作自然有其价值，但对于包括古希腊、罗马（以及埃及、西亚、拜占廷）宗教、神话、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在内的主流古典学来说，毕竟只是一部分。几百年来，古典学在西方已然演变为一个庞大的学科领域，稍稍像样一点的西方大学一定有一个古典学系，但有“解经学”特色和保守主义倾向的古典学仅仅只是其一个分支。

当然，国内其他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一些古典学著作，但总的说来，迄今为止的引进并非系统深入，对西方各国近二三十年较有影响的古典学成果的引介更是十分有限。与此同时，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华大地每天都发生着令人目炫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终将导致全球既有权力格局的深刻变动。事实上，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上，中国已经是一个大玩家。据多个权威机构预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超越美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对全体中国人乃至全人类都不可逃避的态势必将到来，但中国在学术上有什么建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天翻地覆，但学术建设却相对滞后，未能取得相应的进步。未来中国不仅应当是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强国，还应当是首屈一指的、掌握了话语权的学术强国。因此一如晚清和五四时代那样，融汇古今中外的学术建设，开启一种中国视角的古典学、一种中国视角的西方研究，仍然是摆在人文学者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对古代西方作深入研究，把西方古典学的最新成果系统地介绍到中文世界，应当是这一课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学界目前所做的工

作还远远不够。因学术积累有限，更因市场经济和学术体制官僚化条件下的人心浮躁，如今潜心做学问的人极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希腊、罗马文明的认识仍缺乏深度和广度，久久停留在肤浅的介绍层次。近年来，我们对西方古典学表现出不小的兴趣，但仍未摆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浅尝辄止、不能深入的尴尬。甚至一些学术名人对希腊、罗马了解也很不准确，犯下一些不可原谅的常识性错误。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国家早已站立起来了，却一直不能形成中国视角的西方研究，中国视角的希腊、罗马研究。

目前西方古典学每年都有大量成果问世，而且有日益细化的趋势。比如说，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妇女服饰；比如说，西元前 4 世纪中叶以降的希腊雇佣兵；再比如说，练身馆、情公-情伴（lover-the loved）结对关系对教育的影响。相比之下，我国学界对希腊罗马文明细节的认知仍处在令人遗憾的初级阶段。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拟推出“古典学译丛”，系统引入西方古典学成果，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较有影响的成果。本译丛将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希腊文明的东方渊源；希腊、罗马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近几十年来我国学界对希腊、罗马哲学的译介可谓不遗余力，成果丰硕，所以宜选择专题性更强的新近研究成果）、习俗、体育、教育、雄辩术、城市、艺术、建筑、战争，以及妇女、儿童、医学和“蛮族”等。

只有系统地引入西方古典学成果，尤其是新近出版的有较大影响的成果，才有可能带着问题意识去消化这些成果。只有在带着问题意识消化西方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开启一种真正中国视角的西方古代研究。

“古典学译丛”编者、译者
2010 年 3 月

献给　安顿·鲍威尔(Anton Powell)
和巴里·施特劳斯(Barry Strauss)

致　谢

古代的斯巴达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同时，我们为什么应该关心他们？“9.11”事件所带来的巨大震动促使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去重新思考，什么是西方文明、价值和文化中令人钦佩，至少是值得辩护的特色之所在？我们中的一些人因此而感到非常疑惑：是否任何对西方文明以及它的文化价值的定义，都将是为我们对它们的守护或破坏而进行的辩护。我们中那些研究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们特别强烈地想要弄清这些问题，因为古代的希腊是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源头之一。正如J. S. 穆勒(J. S. Mill)所认为的，公元前5世纪90年代发生在雅典人(得到了普拉提亚人的援助)与入侵的波斯人之间的马拉松战役，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英国历史上的黑斯廷斯(Hastings)战役[1]。　9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这之后十年发生的温泉关战役，其重要性同样毋庸置疑。这一次，一支由斯巴达人领导的人数较少的希腊军队击败了数量更为庞大的波斯人和其他人组成的侵略军，从而给后来的胜利带来了希望，而且这场战役在文化上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计的。实际上，一

[1] 1066年10月14日，哈罗德二世国王(Harold II)的盎格鲁-撒克逊军队和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William of Normandy)的军队在黑斯廷斯(英国东萨塞克斯郡濒临加来海峡的城市)地域进行的一场交战。这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役，来自法国的诺曼底人最终战胜英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人，让英国历史彻底改观。黑斯廷斯战役也是“外族”入侵而在英国本土打的最后一场重要战役，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成功征服英国。——译注

些人会说温泉关战役是斯巴达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

因此,为何我们今天还应该关心古代的斯巴达人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并非微不足道的原因是斯巴达人曾经保护了希腊,也就是捍卫了构成我们西方文明的最主要的一种来源的文化或文明免遭外来者的征服和破坏,斯巴达人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有人可能会说是最为重要的角色。

正如我将在本书中要说的,学术界和大众对古代斯巴达人的社会和文明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关注。两套电视系列片与斯巴达有关——除了(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之外,迪士尼的历史频道(History Channel)也制作了一部四集的节目在四十多个国家同步播出;一部关于斯巴达的好莱坞电影是根据史蒂文·普雷斯菲尔德(Steven Pressfield)的小说《火之门》改编拍摄的;举办过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不少于三次,一次是在苏格兰,其他两次实际上是在现代的斯巴达举行的:其中一次由希腊学者组织筹备,希腊考古协会(Greek Archaeological Service)的一些会员也为此会的召开做了不少工作,多年来他们所提供的帮助是非常宝贵的,另外一次会议是由雅典的英国学校(British School at Athens)举办的,这个组织自1906年开始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或开展了对斯巴达的研究,同时他们正努力筹集资金在该城建立一个研究中心。是什么东西至今还在被人们反复讨论,并使得所有这些媒体以及其他方面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古代的斯巴达上来呢?本书试图去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这是我所撰写的第一本关于斯巴达的总论性的著作(我的其他书籍可从本书附录的"延伸阅读"书目中找到);同时,借此机会我必须首先向贝特尼·休斯(Bettany Hughes)表示感谢,她是我的合作者且与我志同道合。我恰好在一份周末的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文章,从而知道了斯巴达正是她现在的兴趣之所在。我因此发现,广泛的大众和我们一样,不但对斯巴达人的历史,而且对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的媒介化都有着一种热情洋溢的兴趣。

我同样也要感谢我专业的并且与我意气相投的代理人——尤利安·

亚历山大(Julian Alexander),以及两份刊物的编辑们,这两份刊物为我提供了一个绝对至关重要的渠道,从而使我正努力实践的一种大众的或流行的历史写作得以能够与读者们见面,他们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历史》杂志(*History Magazine*)的格瑞格·尼尔(Greg Neale)和他的助手保罗·雷(Paul Lay),以及《今日历史》(*History Today*)的彼得·弗塔多(Peter Furtado)。我(和贝特尼·休斯)所撰写的与现在这个主题相关的文章能够有机会与读者见面,对此,我应该对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我还要感谢埃德蒙·基利(Edmund Keeley)允许我引用他的以及由已故的菲利普·谢拉德(Philip Sherrard)所翻译的卡瓦菲(Cavafy)的《温泉关》一诗的部分内容。

11

这本书的初版是献给我的朋友及同行安顿·鲍威尔博士(Dr Anton Powell)的。借此次重版的机会,我也把它献给我的另一位朋友及同行——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巴里·施特劳斯教授(Professor Barry Strauss)。他发现他很难与我共享对斯巴达人的历史的热情,更别提对古代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表示同情了,但是多年以来,作为一位为通常意义上的专业读者撰写著作和文章的历史学家,他也始终关注与广大公众的沟通,出于这种动机,他与其他的一些人合作编写了大量以北美的本科生为对象的历史课程读物。当然,他的声誉不会因为书中任何遗留的错误和不恰当的内容而受到折损,但我希望当他看到这本书是献给他的时候不会因此而感到太过于失望。

斯巴达大事年表

（以下大事以斯巴达为主，希腊地区其他大事仅作简要提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同一时间发生的重要事件用“*”加以标示；年份如未作特殊说明，皆为公元前；公元前525之前的年份为近似值）

早期历史

年份	事件
40000	希腊大陆出现最早的人，以狩猎和采集食物为生
6500—3000	第一批居民在克里特岛定居，希腊人和克里特人开始制作陶器
5200—2000	农业扩展至欧洲北部和西部

青铜时代（2900—1000）

年份	事件
2900	希腊人口增加，城市获得发展，金属得到广泛使用
2686—2181	*埃及建造金字塔
2500	特洛伊城建立
2500	*印度河谷文明开始，出现城市、文字
2000	第一批说希腊语的民族可能来到希腊
1900	米诺斯文明在克里特兴起
1600	迈锡尼文明在希腊兴起

13

1600	* 中国出现了城镇与城市
1550	* 多利安人在印度北部定居并建立印度宗教
1500	* 文字在中国使用
1450	迈锡尼人势力日渐强大
1200	迈锡尼和其他城邦建造了主要的城垒。特洛伊战争开始。
1200	青铜时代的迈锡尼势力，即拉西代梦王朝(kingdom of Lacedaemon)衰落

黑暗时代(1100—800)

1100	* 腓尼基人发展出字母文字
1010—926	* 以色列王国统治时期
1000	多利安人(Dorians)定居斯巴达和拉科尼亚
850—750	诗人荷马可能生活在这一时期

古风时期(800—500)

800	斯巴达的城镇开始扩张，合并了阿密克利(Amyclae)
776	(传统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办
735	侵犯美塞尼亚人: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爆发
720	铁欧彭波斯(Theopompus)登基
706	建立了殖民地塔拉斯(Taras)
700	第一座欧西亚(Orthia)神庙墨涅拉俄斯圣殿(Menelaion sanctuary)建立，波律多洛司(Polydorus)登基
680	阿尔哥斯国王菲顿(Pheidon)登基
676	(传统的)卡尔涅亚祭(Carneia)设立
675	铁欧彭波斯去世

670	美塞尼亚希洛人起义: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开始;斯巴达诗人提尔泰奥斯(Tyrtaeus)活跃于此时代
669	(传统的)叙喜阿伊(Hysiae)战役爆发
665	波律多洛司去世
650	吕库古(Lycurgus)改革
650	* 中国开始使用铁器
594	梭伦在雅典担任执政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560	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登基
556	奇隆担任(传统的)监察官
550	与铁该亚(Tegea)联盟;吉提亚德斯(Gitiadas)装饰纪念雅典娜的"黄铜屋"(Brazen House);巴绪克勒(Bathycles)在阿密克利建造阿波罗——叙阿琴提斯(Apollo-Hyacinthus)王座
550	居鲁士二世(Cyrus II)建立波斯帝国
546	萨迪斯(Sardis)陷落,克洛伊索斯王国向波斯投降
545	查恩皮昂(Champions)战役在杜列亚(Thyreatis)爆发
525	驱逐萨摩司(Samos)僭主波律克拉铁斯(Polycrates)
520	克列欧美涅斯(Cleomenes)一世登基
519	克列欧美涅斯在彼奥提亚(Boeotia)
515	戴玛拉托斯登基;萨摩司的大使迈安多里欧斯(Maeandrius)来到斯巴达
512	安启莫里欧司(Anchimolus)领导的针对雅典的远征失败
510	克列欧美涅斯驱逐雅典的僭主希庇亚斯(Hippias)
510	* 罗马共和国建立
508	克列欧美涅斯向雅典进行第二次干涉
507	克莱斯铁涅斯(Cleisthenes)的改革奠定了雅典的民

14

	主制
506	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盟军侵入雅典所在的阿提卡(Attica)地区
499	米利都(Miletus)的大使阿里司塔哥拉斯(Aristagoras)因爱奥尼亚人的起义向斯巴达求助
494	赛披亚(Sepeia)战役爆发,爱奥尼亚人的起义结束
491	戴玛拉托斯被废黜;列乌杜奇戴斯二世(Leotychidas II)登基
490	马拉松战役爆发,波斯被击败
490	克列欧美涅斯去世;列奥尼达一世登基
486	* 佛教创立者释迦牟尼逝世
480	温泉关战役爆发,波斯被击败
479	普拉提亚(Plataea)战役爆发,波斯被击败,并被赶出了希腊

古典时期(500—323)

470S 早期	建造波斯人拱廊(Persian Stoa)
478	召回摄政王波塞尼亚斯(Pausanias),从反波斯人联盟中退出,雅典建立反波斯人的得洛斯海军联盟(Delian League)
478	列乌杜奇戴斯二世被放逐
469	摄政王波塞尼亚斯和列乌杜奇戴斯二世去世,阿基达马斯二世(Archidamus II)登基
464	大地震爆发
464—460?	希洛人发动暴乱(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爆发)
461	伯里克利(Pericles)在雅典崭露头角
457	塔那格拉(Tanagra)战役爆发

15

445	与雅典签订“三十年和平协议”
431	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
430	雅典爆发瘟疫
427	阿基达马斯二世去世，阿吉斯二世(Agis II)登基
425	一支斯巴达军队在斯法克特利亚(Sphacteria)向雅典人投降
421	签订“尼西阿斯和平协议”(Peace of Nicias)
418	第一次门丁尼亚(Mantinea)战役爆发
413	占领狄西里亚(Decelea)
412	与波斯结盟
409	波塞尼亚斯(Pausanias)登基
404	斯巴达获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
401	组建“万人”希腊雇佣兵去支持小居鲁士夺取波斯的王位
400	阿吉西劳斯二世(King Agesilaus II)登基
399	“万人”雇佣军的剩余士兵被吸纳进斯巴达在亚洲的反波斯人军队中
395	波塞尼亚斯被废黜并遭放逐；阿吉西波里斯一世(Agesipolis I)登基；柯林斯战争(Corinthian War)开始
386	签订“波斯国王和约”(King's Peace)或“安塔西达斯和约”(Peace of Antalcidas)，希腊在爱奥尼亚的殖民地重新落入波斯人的控制之下；柯林斯战争结束。
382	占领底比斯(Thebes)
380	阿吉西波里斯一世去世；克列欧姆布洛托斯一世(Cleombrotus I)登基
379/8	底比斯获得解放

378	第二雅典联盟建立；第二彼奥提亚人联邦建立；底比斯的“神圣军”创建
16 371	留克特拉(Leuctra)战役爆发，斯巴达人被底比斯人击败；克列欧姆布洛托斯一世(Cleombrotus I)去世
370/69	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侵入拉科尼亚，美塞尼亚的希洛人获得解放，美塞尼城(Messene)建立
368	“大都会”(Megalopolis)建立
366	绝大多数伯罗奔尼撒盟国不再履行义务
362	第二次门丁尼亚战役爆发，伊巴密浓达去世
360	阿吉西劳斯二世去世，阿基达马斯三世登基
359	菲利二世成为马其顿的国王
338	阿基达马斯三世去世
331	“老鼠的战斗”(Battle of mice)爆发，阿吉斯三世去世
327	亚历山大征服波斯
323	亚历山大病逝

希腊化时期(323—30)

323—281	亚历山大的部将为争夺帝国的遗产而进行战争
294	阿基达马斯四世在门丁尼亚被狄米特里·波立尔塞特司(Demetrius Poliorcetes)击败
254	列奥尼达二世登基
244	阿吉斯四世登基；开始尝试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
241	阿吉斯四世去世
236	克列欧美涅斯三世登基
227	克列欧美涅斯实施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改革
227	阿基亚德王族的埃乌克里达斯(Euclidas)担任欧里庞提德王族的国王，他是克列欧美涅斯三世的兄弟，斯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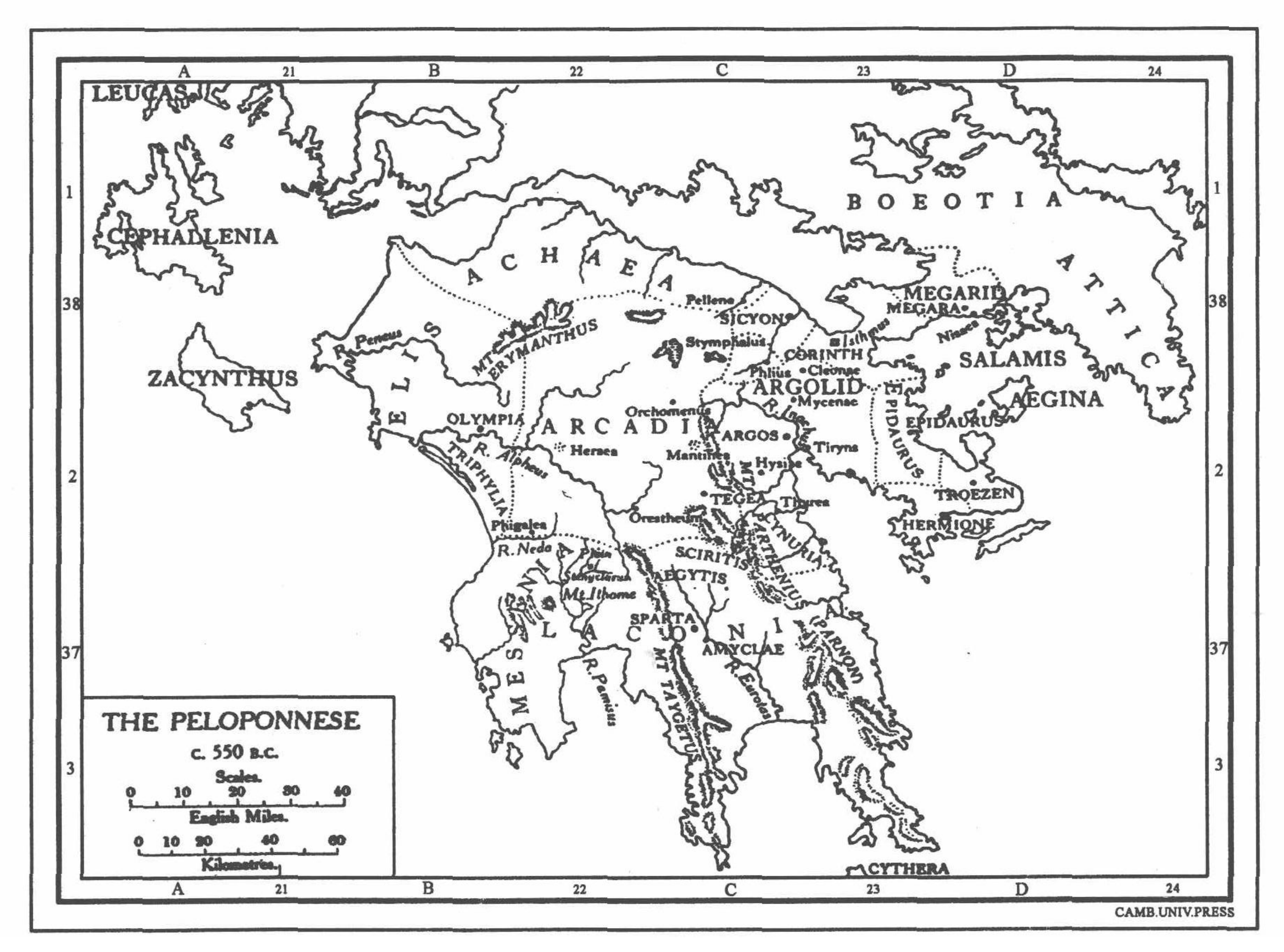
	达传统的双王制结束
222	塞拉西亚(Sellasia)战役爆发;斯巴达历史上第一次被人占领,占领者是马其顿的安提柯三世(Antigonus III)多善(Doson)
221—206	* 中国的秦王朝时期
219	克列欧美涅斯三世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去世
207	在门丁尼亚被击败,4000 名斯巴达人被杀;纳比斯(Nabis)篡夺权力
195	被罗马强制安置;斯巴达失去了剩余的拉科尼亚"边民"
192	纳比斯去世;斯巴达处于亚加亚联盟(Achaean League)的统治之下
188	菲洛佩门(Philopoemen)再一次干涉斯巴达　17
146	罗马击败亚加亚联盟并在希腊建立保护国(protectorate),实行直接统治;柯林斯被毁
79—7	西塞罗访问斯巴达
42	2000 名斯巴达人在腓利比(Philippi)的战役中战死
40	利维娅(Livia,奥古斯都未来的妻子)在斯巴达受到庇护
32	斯巴达站在屋大维(Octavian,即后来的奥古斯都)一边反对安东尼(Antony)
31	亚克兴(Actium)海战,屋大维击败安东尼及埃及的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七世

罗马帝国时期(27—公元 4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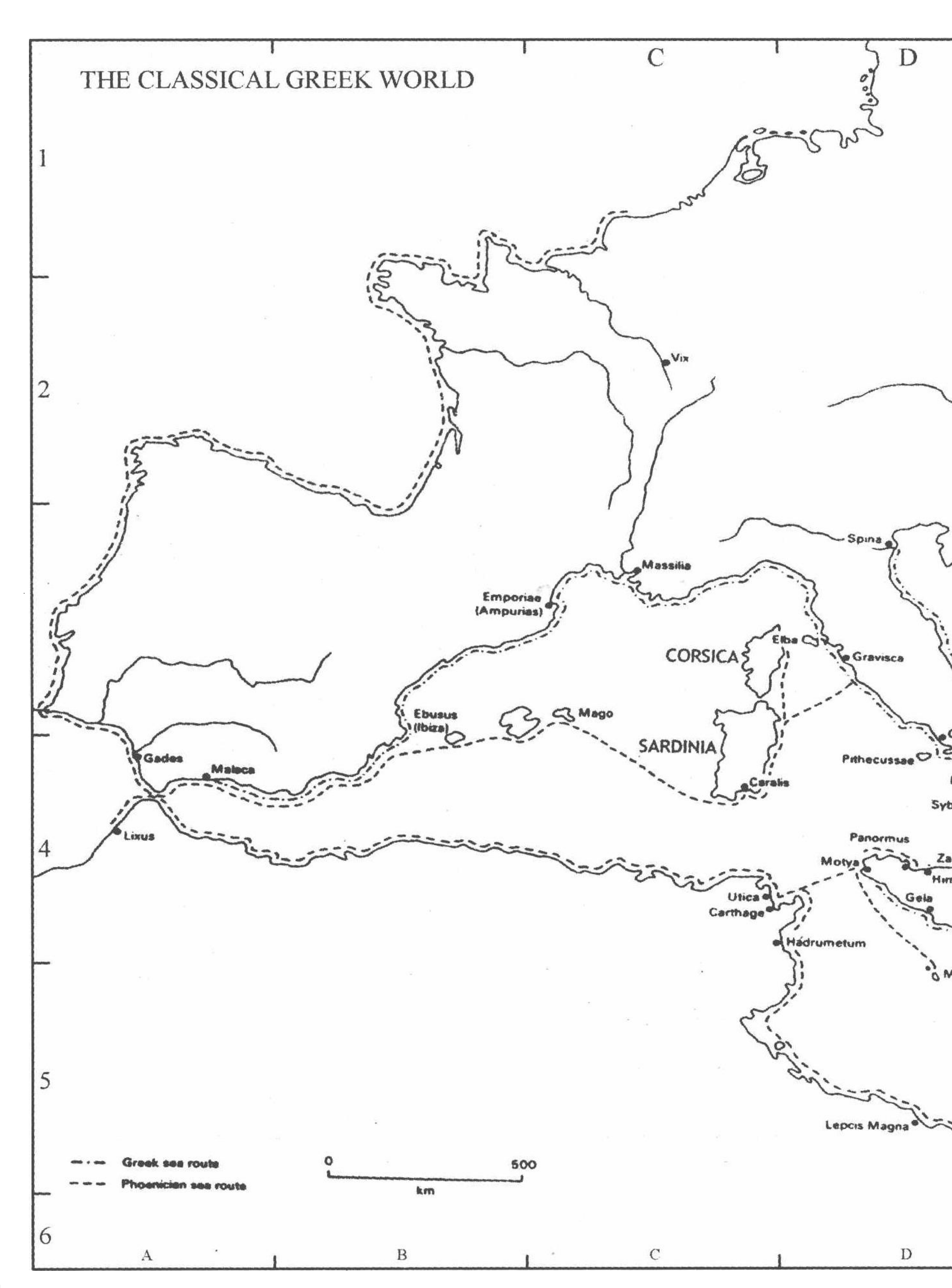
27	奥古斯都成为了罗马帝国事实上的皇帝

21	奥古斯都访问斯巴达，当地的元首盖乌斯·尤利乌斯·欧里克莱斯(G. Julius Eurycles)接待了他
2	此时，由之前的“边民”加入的埃琉西斯—拉科尼亚联盟开始成形
公元 14	奥古斯都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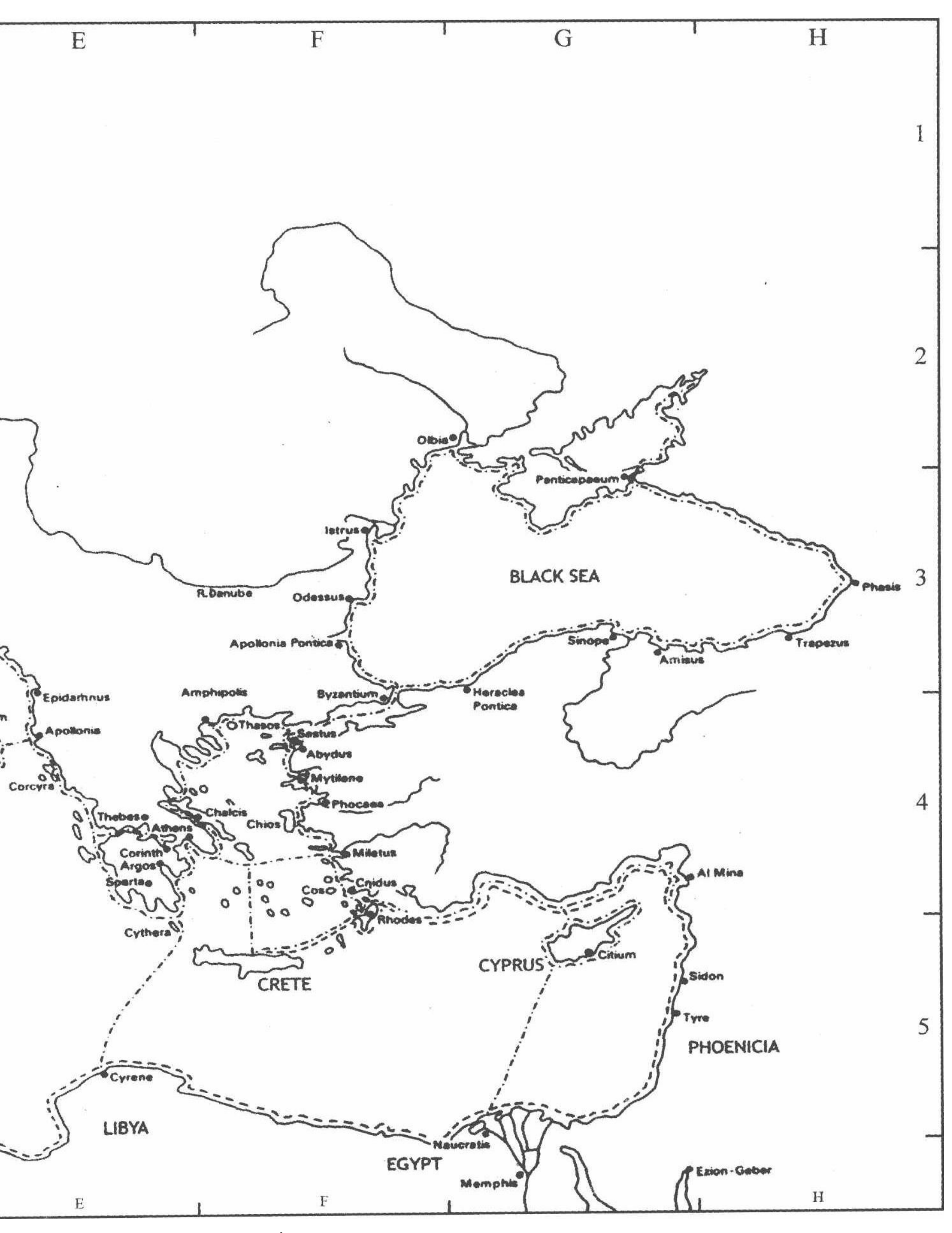
……


THE PELOPONNESE
c. 550 B.C.
Scales.
English Miles.
Kilometres.
CAMB.UNIV.PRESS
BOEOTIA
ATTICA
MEGARID
MEGARA
Nisaea
SALAMIS
AEGINA
EPIDAURUS
TROEZEN
HERMIONE
Isthmus
CORINTH
Phlius
Cleonae
ARGOLID
Mycenae
ARGOS
Tiryns
Hysiae
Thyrea
SICYON
Pellene
Stymphalus
ACHAEA
ELIS
R. Peneus
ERYMANTHUS
OLYMPIA
R. Alpheus
TRIPHYLIA
Phigalea
R. Neda
ARCADIA
Orchomenus
Heraea
Mantinea
TEGEA
Orestheum
SCIRITIS
AEGYTIS
CYNURIA
PARTHENIUS
PARNON
LACONIA
SPARTA
AMYCLAE
MT TAYGETUS
R. Eurotas
R. Pamisus
MESSENIA
Mt Ithome
CYTHERA
ZACYNTHUS
CEPHALLENIA
LEUCAS

地图:伯罗奔尼撒


THE CLASSICAL GREEK WORLD
C
D
1
2
4
5
6
A
B
C
D
Vix
Spina
Massilia
Emporiae
(Ampurias)
CORSICA
Elba
Gravisca
Ebusus
(Ibiza)
Mago
SARDINIA
Pithecussae
Gades
Malaca
Caralis
Lixus
Panormus
Motya
Utica
Carthage
Gela
Hadrumetum
Lepcis Magna
Greek sea route
Phoenician sea route
0
500
km

地图:古代希腊世界


E
F
G
H
1
2
3
4
5
Olbia
Panticapaeum
Istrus
BLACK SEA
Phasis
R.Danube
Odessus
Apollonia Pontica
Sinope
Amisus
Trapezus
Epidarhnus
Amphipolis
Byzantium
Heraclea Pontica
Apollonia
Thasos
Sestus
Abydus
Mytilene
Corcyra
Phocaea
Thebese
Chalcis
Chios
Athens
Corinth
Argos
Miletus
Spartae
Cnidus
Cos
Al Mina
Rhodes
Cythera
Citium
CYPRUS
CRETE
Sidon
Tyre
PHOENICIA
Cyrene
LIBYA
Naucratis
EGYPT
Memphis
Ezion-Geber

目　　录

导　言

《斯巴达人》这本书所跨越的年代主要是从公元前 480 年至公元前 360 年这段时间，换句话说，所涉及的时间不会超过希腊的古典时期。这一时段是从斯巴达成为新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领袖，然后领导着忠诚的希腊人民在国土上抵御强大的波斯军队开始的，斯巴达在此后逐渐发展成为希腊世界中最强大的城邦之一，然而就在三、四代人的时间里，斯巴达社会开始萌发各种危机并在最后轰然崩溃。在这段时间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一些主要的事件：斯巴达克服重重困难建立起以它为中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地震引发了巨大的灾难；国内的奴隶阶级希洛人(Helots)[1]在地震之后立即发动了一次长时间的并对斯巴达社会产生了潜在的致命性伤害的叛乱；斯巴达人与雅典人的分歧愈演愈烈，最初的争吵到后来演变成了严重的军事对抗；斯巴达取代雅典成为整个爱琴海希腊世界的第一强国；接下来就是这个帝国向外发动的极其恶劣的然而又是最后的领土扩张。

在叙述这段历史的过程中，作者还会在上述基本的文本线索之外穿插一些简短的人物传记，作为故事，它们既可以生动地重现已经逝去的古代生活，同时也可以用来探讨和阐明历史的内在主题和隐秘的进程。为

〔1〕 另译为希洛士或黑劳士，即俘虏。——译注

了把公元前480年至前360年这段时间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首先我们要说说在希腊历史的早期，尤其是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这段时间里，斯巴达这个国家是如何形成的；同时，我们还要回顾一下拉科尼亚地区（Laconia）的史前史，这样，斯巴达人的历史就能得到清晰的定位了；然后，要对斯巴达从强大、荣耀的光环下跌入最后的困境中的过程作一详细的论述；接下来要说说由斯巴达人所领导的军队对亚历山大大帝所作的徒劳无功的抵抗；以及，他们后来为何更加乐意站在未来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阵营当中。

22

除了这些按时间顺序所讲述的故事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同样显得有趣而且意义重大，简而言之，就是所谓的"斯巴达的神话"（Spartan myth）。无论是作为一个稳定的社会还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斯巴达人所取得的巨大成功都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自然而然地会吸引着外界对它的关注，这些关注的目光常常是钦佩的，有时也会是深刻的批评。尽管斯巴达最终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并且就实际力量而言土崩瓦解了，但斯巴达人依然在希腊的其他地区以及各种异质文化的想象世界中产生着持续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今天仍在继续蔓延，在未来的某一段时期里甚至还可能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劲和复杂。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到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对斯巴达的关注和想象就已经开始在苏格拉底的学生克里提亚和柏拉图（他是克里提亚的亲戚）的思想中萌芽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即使是罗马人的崛起也没有打断过它，实际上罗马人还喜欢把自己与斯巴达扯上点关系，一些文艺复兴时期以及早期的现代思想家，如莫尔、马基雅维利和卢梭都曾称颂过斯巴达，认为它在政治上表现出了惊人的稳定性和秩序性。直到20世纪，纳粹分子以及同时代的那些自诩的效仿者们都还在继续着对斯巴达的想象。斯巴达人一直以来对外人特别排斥，这反而激发了外界对它的浓厚兴趣。在古代，斯巴达人在外人眼中既令人困惑又散发着异乎寻常的魅力，甚至有点另类，今天的我们看待他们也是同样如此。

斯巴达是最初的乌托邦[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创造了"乌托邦"(Utopia)这个词语,在他的思想中斯巴达占据着非常核心的位置]。但是,那是一个独裁、等级森严且让人备感压抑的乌托邦,而不是一个可以让人民自由创造、自由表达的理想社会。斯巴达作为共同体的主要任务是为了自卫和统治他人,为此它不惜发动战争。斯巴达不像希腊的其他城邦那样为了土地而拼命地向非希腊地区输出人口并建立新的"殖民"城市,反而是在伯罗奔尼撒的南部攻击、征服或奴役自己的希腊同胞。

23 因此,人们以前关于斯巴达的各种看法或想象,要么是自相矛盾,要么就需要我们从一个更加全面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从正面意义来看,斯巴达人身上具有一种只有理想的战士才可能具有的、让人振奋的、为集体可以牺牲自我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温泉关战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与这一形象形成对比的,首先是他们缺乏高度的文化成就,其次,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们都最大限度地抵制开放式的民主政府;此外,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还一直用残暴而有效的方式奴役着成千上万的希腊同胞们。

本书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去,告诉斯巴达人!"这个标题同样也是一部越战电影的名字,它取自同时代的诗人西摩尼得斯(Simonides)为在温泉关战役中殉难的死者们所作的著名的墓志铭。作为一个最令现代人感到好奇并向往的古代文明——希腊,波斯战争是对它之前在文化上所取得的成就的一次检验,同时,这场战争也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当我们认为视觉艺术、建筑、戏剧、哲学和民主政治制度等这些非凡成就都理所应当地属于雅典的时候,它最伟大的对手——斯巴达人——所追求的理想和坚持的传统同样对后世产生了强有力的持久影响:责任、纪律,在战斗中为了目标而不惜牺牲自己的高贵品质,为了共同体的更大利益而甘愿牺牲个人,以及为战胜看似无法克服的困难而激发出来的决胜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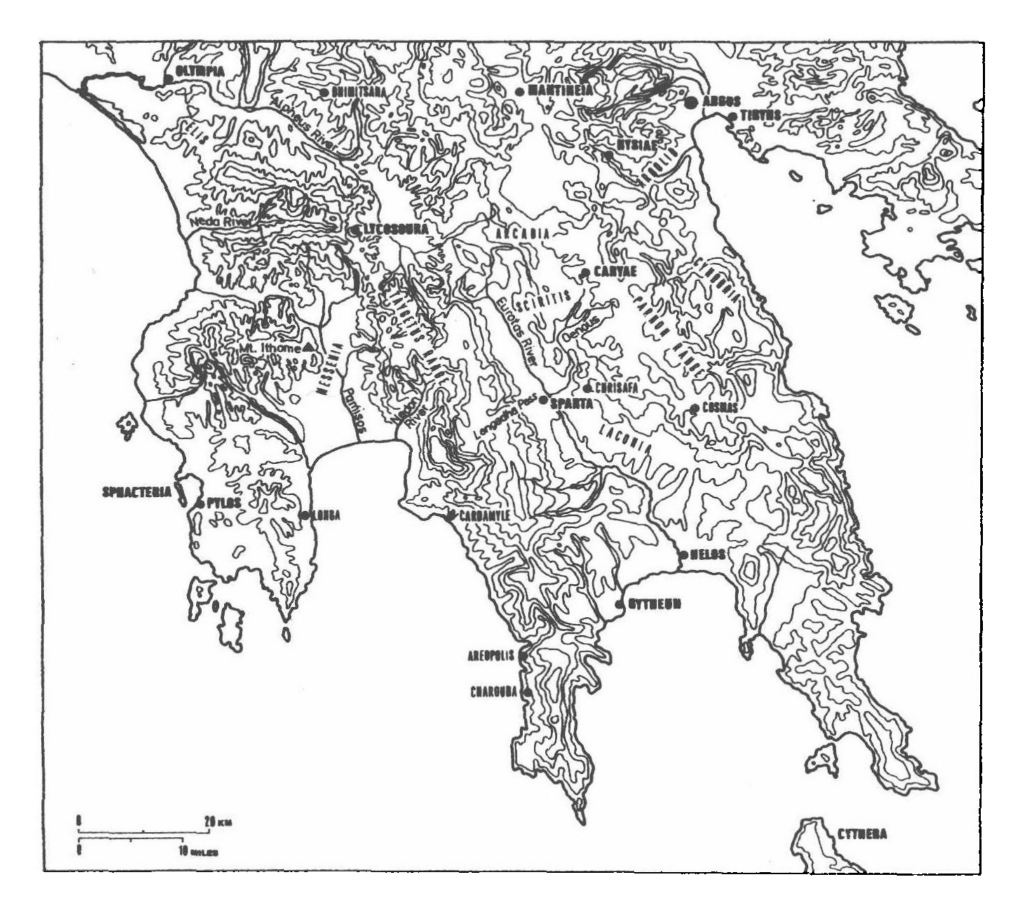
本书第一部分将解释斯巴达是如何在尚未完全超越或抹去其最初状态——伯罗奔尼撒南部欧罗达河(Eurotas)河岸的几个村庄的集合体——的情况下,便成为了古代希腊世界中最为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斯巴达最初是通过征服或奴役居住在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Messenia)等邻近地区的居民而逐渐崛起的,这些人分别被斯巴达人称作"希洛人"(Helots,即俘虏)和"边民"(Perioeci)[1]。斯巴达成功地控制了整个希腊世界中最大的城邦,其8000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是希腊第二大城邦——叙拉古(Syracuse)的两倍,是位于阿提卡(Attica)的雅典的面积(其领土大概有2500平方公里)三倍多。

可以说,斯巴达的领土最初是以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为基础的。这片土地后来之所以被称作拉西代梦(Lacedaemon)[2],让世人感到惊讶并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注意,不仅仅因为它巨大的土地面积,同时还因为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农业条件、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封闭的地理环境给人带来的安全感。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希腊最高的一座山脉在这里分割出了两个巨大的河岸平原,同时,这里还蕴藏着丰富的优质铁矿石。据考证,人类在拉科尼亚南部的定居从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玛尼地区的帕格斯-迪罗(Pirgos Dirou)洞穴,如今因为其多姿多彩的石笋和钟乳石而成为了著名的旅游胜地,吸引着无数的观光客,游客们可以乘坐导游船近距离地观赏这些奇观异景。洞中大量堆积的骨骸默默地向我们证明:早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的时候,一个小型的人类定居点就已经在这里兴盛起来了。在伯罗奔尼撒南部的其他区域,时间不早于公元前的第三个千年;另一种说法是在青铜器时代早期,实质性的定居点已经在广阔的区域上建立起来了。一些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相信,在这一千年或这个文化

24 25

〔1〕 一般译为"珀里俄基人"或"皮里阿西人",即指居住在斯巴达市民和希洛人外围的居民。——译注

〔2〕 古代斯巴达的别称,一译为"拉希代梦"。——译注



地图:拉科尼亚与美塞尼亚

阶段中,谷物、橄榄和葡萄已经开始成为地中海居民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物了。这个地区在青铜器时代中后期获得的发展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其背后其实正是一种简单但又快速的融合,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1100年间。

在这个阶段比较靠后的时间里,定居点的数目增长到数百个,居民的人口数量可能达到了几千。这些定居点主要集中在由欧罗达河长期冲积而成的河谷平原上,尤其是它下游的希洛(Helos)平原和上游的斯巴达平原。荷马的《伊利亚特》这部伟大而不朽的作品可能是在公元前700年左右的时候用某种方式收集整理出来的,但要追溯它的起源则至少要到公

元前 1100 年，也就是青铜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这部史诗的第二卷中包含了一份著名的舰船目录。该目录上列出的舰船是为响应迈锡尼富有的阿伽门农国王（King Agamemnon）的号召而集结在一起的，目的是协助他去赫勒斯庞特海峡（Hellespont）[1]的特洛伊寻回海伦。海伦是他的弟弟——墨涅拉俄斯（Menelaus）[2]的妻子，据说，那个给特洛伊带去灾祸的王子——帕里斯偷偷地拐走了她。希腊传说基本上都是如此描述的。这个故事的真伪，甚至连它基本的情节都不可能得到证实，《伊利亚特》的故事之所以能永恒不朽，准确地说得归功于它本质上的虚构性。不管怎样，墨涅拉俄斯的王国，正如那个目录中所列出的那样，在其管辖的领域中有一个靠近大海的地区叫“希洛”，同时这个国家还统治着一个在今天被称作阿吉欧史芬尼[Ayios Stephanos，即圣史提芬（St. Stephen）]的地方，现在在那里挖掘出了大量的青铜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人们期待在拉科尼亚什么地方发现一些物化遗存能与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宫殿相符合，但是，至今还没有这样的发现，也可能与荷马的想象相反，拉科尼亚地区在青铜时代晚期的时候，事实上已经被分割成了许多的小王国，它们当中还没有一个王国获得了统一这一整个区域的宗主权。

公元前 1100 年至前 700 年间，拉科尼亚地区和在伯罗奔尼撒其他地方一样都发生了一些相当剧烈的变化，实际上，这些变化波及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认为的整个迈锡尼世界。大约在公元前 1200 年的时候，迈锡尼的宫殿和阿尔哥斯地区（Argolid）的提林斯（Tiryns）、美塞尼亚的派娄斯（Pylos），以及希腊中部和南部其他地区的宫殿一样，都被焚毁或夷为平地，曾经存在过的文明中心逐渐消失了，接下来的一个时代在文化上就显得相对贫乏，因而常常被称为黑暗时代（Dark Age）。当然，在整个后迈锡尼时代的希腊，这种黑暗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一致的，只有少数地区才像拉科尼亚一样经历

26

[1] 赫勒斯庞特，现在的达达尼尔海峡的古希腊名，在土耳其欧亚两部分之间，连接马尔马拉海与爱琴海。——译注

[2] 特洛伊战争期间的斯巴达王；海伦之夫及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之弟。——译注

过长期的黑暗。上述地区的一些居民点仍然存在，尽管人口已经分散到各地，规模也缩小了，最后他们似乎是被一群或数群从遥远的北方和西北方跑来的侵入者给征服了，这些人自称多利安人，说一口希腊的多利安方言。一般而论，这些外来的侵入者就是历史上的斯巴达人的祖先。他们在文化上的新颖之处是建造大型的居住点，这样的定居点在之前的迈锡尼时代是不占重要地位的。因此，这些居住点与更为光辉灿烂的过去没有直接的联系，更准确地说，这样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东南部的铁拉普涅(Therapne)，以及距离正南方大约几公里的阿密克利(Amyclae)地区。

到了公元前8世纪中期，新斯巴达人开始自信可以把他们的影响和控制扩大到更远的拉科尼亚南部去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最初四个村庄(居诺苏拉、美索亚、里姆奈和皮塔纳)[1]的基础上合并了阿密克利，使之成为组成斯巴达的第五个村庄并且还把铁拉普涅改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把它奉献给墨涅拉俄斯和他那位引起争端的妻子——海伦，以及她天神般的兄弟们——狄俄斯库里(Dioscuri)，他们也被称作卡斯特(Castor)和波吕刻斯(Pollux)。到了公元前大约735年，对于富于侵略性和热衷于领土扩张的斯巴达人来说，无论是从政治或者经济的角度来考虑，仅仅控制整个欧罗达河谷以及它的周围地区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要求了。环顾四周，他们把贪婪的眼光投向了西边的美塞尼亚，可坐落在它们之间的高达2400米(8000英尺)的泰格特斯山脉(Taygetus)成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大概是在进行了一系列袭击和边境小冲突之后，斯巴达人最终打败了美塞尼亚人，而不像后来的文献资料所推测的那样，他们对美塞尼亚发动了一场预先计划好了的入侵。斯巴达人迫使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南部帕米索斯河(Pamisus)河谷上的原住民成了类似奴隶的农民，这些农民在曾经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被迫为不受欢迎的斯巴达新主人们辛苦劳作。正如三个世纪后的修昔底德指出的那样，这些美塞尼亚人是受斯巴

27

[1] 它们分别是居诺苏拉(Cynosura)、美索亚(Mesoa)、里姆奈(Limnae)、皮塔纳(Pitana)。——译注

达统治的希腊人群体——希洛人——的最大组成部分。但是，希洛人奴隶制的观念可能最先或类似地在拉科尼亚、欧罗达河最南的河谷上产生过。无论如何，一些后来的历史资料从词源的意义上错误地认为希洛人(Helots)这个词来自一个叫做希洛(Helos)的城镇或地区，可能因为那里是人们发现的主要的同时也是最初的希洛人聚集地。

对于古代斯巴达来说，管理这些希洛人是唯一最重要的事情。希洛人被分成两个部分——泰格特斯山脉西部的美塞尼亚人以及东部的拉科尼亚人。希洛人是建构斯巴达人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的经济基础。他们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斯巴达公民的人数。这些时时提防别人袭击自己的公民们自称为平等者(Homoioi)或者“相似者”(“Similars”，不是“相等的”，即“equals”的意思，这是它常常遭到错误翻译的地方；英语中的“同侪、同等的人”，即“peers”这个词在意思上与之相近，就像法语中的“成对”，即“pair”一词，尽管它是来自拉丁语 *par*，即“equal”)。这是因为他们只在一个方面，即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军人征服者阶层的成员时他们是平等和相似的。斯巴达人是极成功的征服者，他们支配了希洛人超过三个世纪。但是，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希洛人，尤其是来自美塞尼亚的希洛人几乎时时都有叛乱的可能，为了应对这种危险，斯巴达人的措施就是把自己的世界转变成某种永久性的武装兵营，即斯巴达要塞。男性的斯巴达公民被禁止从事任何其他的职业或商业贸易，只能从事战争，因而他们获得了希腊世界“陆战队”的声誉。这是一支独一无二的、专业的、目的明确的战斗部队。无论是有敌人还是没有敌人，斯巴达人都必须始终保持警戒，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就像其他地区的希腊人那样，斯巴达人把他们这个非同寻常的国家和社会的开创归功于某一个人。为斯巴达创下伟大功业的英雄就是吕库古(Lycurgus)，他的名字可粗略地翻译成“狼工”(Wolf-Worker)。他大概是一个乔治·华盛顿和波尔布特的混合式人物。但也非常有可能他完全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邱吉尔曾经说苏维埃俄国就像一个谜中之谜。

28

他的这种说法同样可用于吕库古。当面对着众多与这个奇迹制造者有关但又自相矛盾的证据时，历史和传记作家普卢塔克（其写作时间在公元100年）感到非常困惑，他得出了一个看似非常有道理的结论——在斯巴达历史上肯定出现过多个吕库古。但普卢塔克还是只选择了其中的一个作为依据去编写吕库古的传记，并充满敬意地把他与罗马的开国之父——国王努玛(King Numa)——进行比较。亚里士多德在其公元前4世纪的著作中并没有给这个立法者所创下的功绩予以太多的赞誉，说实话，卢梭对他的称颂反而远甚于普卢塔克。

吕库古的传奇之处是因为他在一个危机重重的时刻提出了一个不平常的"零岁"方案(Year Zero)[1]，并且他还说服他的人民接受并采纳了一套带有强制性的、综合性的、系统的教育体系——"够格者"(Agoge，*agôgê*，照词义是"养育"，就像养育一头牛一样)训练[2]。这种包括教育、训练和社会生活的体系可以把孩子培养成战士，他们会把纪律、勇气和技巧带来的名誉视作是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比拟的。人们也相信他彻底地改革了斯巴达的政治体系，并且可能最早在希腊世界中采取了公民自治的政府形式。在我们看来，吕库古也许已经成了一个神话。但是，为了这些据说是他设计的法律，那些牺牲在温泉关的斯巴达战士们心甘情愿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除去教育和政治体系，人们还认为吕库古彻底地改变了斯巴达公民们的心理结构。尽管这个"吕库古"体系在很多外邦人看来有不少古怪的地方，但斯巴达人自己对这一思想体系是绝对信仰的。在整个历史中，很

---

[1] 应该指的是斯巴达人特殊的优生方案，婴儿在出生后就得接受检查，不合格的会被残忍地抛弃。——译注

[2] "Agoge"(Ἀγωγή，agôgê)，暂无固定的中文译名。指的是斯巴达社会特有的一种严格的教育和训练制度，除了统治者家族的孩子外，所有的斯巴达公民都要参加。这种训练包括学习如何偷窃、锻炼对群体的忠诚、军事训练、狩猎、跳舞以及为进入社会而作的各项必要准备。"Agoge"这个词在英文中照词义可以翻译成"raising"，即"养育"，但能够传递的信息非常有限，因此，译者在此处以"够格者"试译之，其发音和意义都较接近"Agoge"。——译注

少有斯巴达人成为叛徒或抱怨者。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忠诚并严守秘密，在斯巴达人所处的特殊环境下这是完全合理的。他们以其重甲步兵战术而闻名，战士们在战场上排列成八（人）乘八的矩阵，每一边有如由八面盾牌构成的墙，整个队伍就像推土机一样可以把敌人推出战场或者让敌人感到恐惧而放弃抵抗，不得不落荒而逃，斯巴达人还同样热衷于从事间谍活动和情报收集。他们开创了很多进行秘密联络的方法。邪恶的是，他们中那些即将步入成年的最优秀的青少年会被招募进一支秘密的"特别行动队"(Crypteia)[1]当中，这支部队的首要目的就是去猎杀希洛人中那些可能制造麻烦的人，然后在其余的希洛人当中传播这种恐惧。

29

这只是斯巴达体系的很多特别的方面中的一个，现代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容忍，或者是不可信的。但是，吕库古真的创造了这样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个人要把忠诚献给自己所属的群体，首先是国家，其次才是家庭或朋友，吕库古还引导斯巴达人对"公民"(*politês*)的身份有了全新的理解。可能在开始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但是这种观念在后来改变了西方文明的进程。本书的第一部分以公元前 480 年至前 479 年爆发的波斯战争为结束，一些力量弱小但忠诚的希腊城邦联合起来与庞大而专制的波斯帝国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这些城邦不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也是为了保卫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受侵犯。为此他们不计成败，在温泉关、萨拉米(Salamis)[2]、普拉提亚(Plataea)[3]和密卡尔(Mycale)[4]，忠诚的希腊人民把他们之前的分歧、不和放在一旁，带着一个自由的理想团结在一起并肩战斗。在希腊文明和历史的"古典时

---

[1] 一般译为"克里普提"，英文翻译为"Special Ops Brigade"。——译注

[2] 萨拉米(Salamis)，位于希腊东南海岸岛；公元前 480 年希腊海军在该地大败波斯军。——译注

[3] 普拉提亚(Plataea)，属于希腊彼奥提亚境内城邦；公元前 479 年，希腊联军大败波斯侵略者于此。——译注

[4] 密卡尔(Mycale)，位于小亚细亚海滨，萨拉米海战之后不久，希腊舰队追击波斯舰队至此，将波斯战舰全部焚毁。——译注

期”，希腊人不但击退了波斯人的入侵，也为希腊的力量和文化后来在东西方产生的非凡影响奠定了基础。

希腊人之所以能成功地抵御外敌，从头到尾都有赖于斯巴达人的领导，并且斯巴达人在战斗中还会身先士卒。在温泉关一役中，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Leonidas)指挥着一小队希腊重甲步兵对抗强敌，其中包括300名精选出来的斯巴达战士，他们拦截了波斯人的进攻，为整场战役赢得了关键的几天时间，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次抵抗失败了，但从道德层面上讲，这次战败在精神上以及士气上都是一场伟大的胜利。正如拿破仑所评论的，在战争中斗志的重要性是其他所有战争因素的总和的三倍。这场发生在温泉关并载入史册的抵抗将会成为本书第一部分一个当之无愧的高潮，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这场战役是这个混合、复杂、持久的“斯巴达神话”中最具有可塑性的元素。

第二部分的标题就是“斯巴达神话”，将主要叙述斯巴达与雅典以及它们各自的联盟之间爆发的长时间的军事冲突、对抗，即所谓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但是，我想把它称作“雅典战争”(公元前431—前400年)，因为我将从斯巴达人的立场来描述这场战争，把它当作一场斯巴达人抗击雅典人的战争。本部分也将考察斯巴达社会内部那些既相互矛盾又令人惊奇的地方，并把这种考察和斯巴达与雅典及其各自联盟之间的灾难性冲突联系起来，这场冲突几乎在希腊军队联合起来抗击波斯之后就马上露出了端倪。雅典和斯巴达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选择，以及越来越难以兼容的生活方式。雅典以海为生，它代表着民主、个人主义、激进和商业化；斯巴达人则靠地吃饭，等级分明、寡头意志，尤其是思想保守，极为重视传统的陈规，从而在铸造钱币和围城作战等诸多方面都疏于技术创新。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冷战在波斯战争结束之后就开始了，而且很快就令人不安地发展到了水火难容的地步。

30

公元前479年，在希腊人民齐心协力击败波斯军队之后，斯巴达就从雅典领导的海军中撤出了自己的人马，最初组建这支海军的主要目的是

要从波斯人手中解放剩余的爱琴海希腊地区。此后的大约 15 年里，在这两个城邦之间发生过两次大的争端。大约在公元前 464 年，斯巴达遭受了一次强烈的地震，紧接着，希洛人就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其他的城邦都派遣了军队来协助斯巴达镇压叛乱，雅典也派出了自己的援军，甚至由亲斯巴达的将军奇蒙来领导这支军队，这个雅典人还把自己的一个儿子叫作拉西达梦纽斯(Lacedaemonius)，也就是“斯巴达人”的意思，可是这支雅典部队后来却被斯巴达人无礼地打发了回去，雅典人热脸贴了个冷屁股。斯巴达人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几千个满脑子民主思想的雅典公民士兵在斯巴达统治的领土上，在斯巴达人控制的希腊奴隶中间随意游荡。在公元前 458 年或是前 457 年的时候，这两个城邦在彼奥提亚(Boeotia)的塔那格拉(Tanagra)爆发了一场激战。公元前 445 年双方平息了纷争，实现了一定的和平，但当全面的战争最终在公元前 431 年爆发后，没有人对此会感到惊讶。

希腊城邦自古以来就相互攻击。以弗所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称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然而，这场战争不但表现得前所未有的野蛮，而且还造成了无可比拟的破坏。古代的行旅作家帕萨尼亚斯(Pausanias)后来如此写道：在此之前，希腊一直是用双脚平稳地行走着，可是这场战争却像一场地震一样掀翻了它。没有什么比在公元前 425 年发生的一起事件更能说明这场战争的混乱不堪的性质了。在斯法克特利亚(Sphacteria)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它让所有外邦的人听起来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事情是这样的，斯法克特利亚这个小岛离美塞尼亚的西南海岸不远，处于斯巴达的版图之内，一支由斯巴达人和“边民”重甲步兵组成的、共 400 人的部队驻扎在那里，其中包括 120 名斯巴达“平等者”精英战士，这本是一支强大的陆地战斗力量。雅典军队得到了以前是美塞尼亚的希洛人的后代们的帮助，封锁了这个岛屿，12 个星期后，岛上的斯巴达人竟然投降了。这一事件震动了整个希腊世界，在之前，人们认为这样的事情是完全不可能会发生的，因为它绝对是与那

31

个“斯巴达神话”——斯巴达人永不投降——相抵触的，温泉关战役是这个神话最有名的佐证同时也放大了这个神话。

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在这场持续时间、规模和残暴程度都前所未有的雅典战争中，围攻斯法克特利亚只是其中一起不太重要的事件，然而从心理上讲，它却具有毁灭性的效果。即使是公元前 430 年在雅典爆发的大瘟疫（可能是一种斑疹伤寒）致使近百分之三十的雅典士兵死亡这件事，与斯巴达人在斯法克特利亚的投降相比都显得非常平常。身为雅典的将军同时也是记录这场战争的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此有过如下评论：

> 这一事件比这场战争中发生的其他任何事情都让赫楞人[Hellenes，即希腊人]感到惊讶！[1]

斯巴达人也为斯法克特利亚岛上所发生的事情而感到震惊，于是他们向雅典人求和，尽管是他们自己挑起了这场战争，而且此时也没有达到他们之前宣称的要解放受雅典压迫的希腊人民这个目标。确切地说，斯巴达人这一次在遭到了伤害之后又蒙受了侮辱，因为雅典人不但公然地拒绝了他们的和平建议，并且还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十年的其他时间里，一直把那 120 个斯巴达战俘当作人质，紧抓不放。

对于整个希腊，特别是对于斯巴达来说，120 名由“够格者”系统培养出来的精英战士，只在缺乏物资而不得不忍受饥渴的八天之后就弃械投降是不可思议的。当被问及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时，一个被扣押在雅典的斯巴达战俘据说给出了他们之所以投降的理由，他说他们当时无法与敌人进行真正公平的决斗，也就是说他们无法像在常规的战斗中那样，用男人才用的武器与雅典人进行真正的厮杀。实际上，敌人用一种

32

[1] Thucydides Book IV, chapter 40. See also Strassler ed. 1996.

"纺锤"样的武器打败了他们,从而使他们遭受屈辱。他声称凭借这样的玩意作战不能区分一个真正的战士和天生的懦夫。据修昔底德解释,这里提到的"纺锤"状武器就是箭,斯巴达人一向认为使用这种远距离进攻武器是不光彩的和怯懦的行为,只有胆小怕事像女人一样的男人才会使用它们。可是,这个斯巴达战俘的妻子和其他的斯巴达妇女们又将会如何理解他的这番辩辞呢?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斯巴达神话"被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奥里耶(François Ollier)描述为"海市蜃楼"(mirage),这种说法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有时很难去察觉神话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到底有没有受到过歪曲或误述。这种情况在今天依然存在。或许所有与斯巴达有关的事情当中,最有趣也最有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是斯巴达妇女的社会地位。照旧,雅典在这里可以作为一个用来与之进行比较的参照物。雅典的女孩们如果要成为一位好妻子和好母亲的话,就得学习纺织、做饭、照顾小孩并持家理财,除了接受与家庭事务相关的培训外,她们不能接受任何正式的教育。通常情况下,父母给予一个女儿的食物的分量要少于她的兄弟们。在青春期,她会被她的父亲或男性监护人关在家里,与外界隔离起来,直至她嫁给某个可以养得起她的男人,这个男人同样会尽可能地让她远离公共场合,如果她谈论与她没有什么关系的男人的话,会被认为是不光彩的。她也不被允许以她的名义拥有任何数额较大的财产,在雅典人自我标榜的民主政治中,她们同样没有正式的发言权。意味深长的是,我们听说过的那些最有名的雅典女性根本就不是享有公民权的妇女,而是一些雅典人的小妾[1]或街头的妓女,她们很有影响力,但却得不到男性的接受,从而被绝对地排除在社交圈之外。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斯巴达的妇女,据说她们拥有令人羡慕的独立意识,行事积极主动、能力突出、对社会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而且还绝对

[1] 雅典人娶的妾常为受过教育的奴隶。——译注

地爱说闲话、管闲事。女孩和男孩一样可以接受内容相似的教育，尽管是分开进行的。她们中很多人能读会写。少女们从头到脚会涂上油，参加赛跑，然后在夜里的敬神仪式上表演舞蹈。在白天，她们练习投掷标枪和铁饼，还要学习格斗，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吸引求爱者。有时，当然还是据说，她们会赤身裸体和男孩们一起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体操，从而常常把别的城邦的来访者们惊得目瞪口呆。她们同样热衷于赛马。有这样一个养马人，名叫赛尼斯卡（Cynisca），她是国王阿吉西劳斯二世（King Agesilaus II）的妹妹，也是第一位在这种迅猛且充满男性力量的奥林匹克比赛中折得桂冠的女性，这种比赛要求驭手们驾着驷马战车全速奔驰。"我的驷马车队赢得过比赛"，在她多少有点自夸的铭文上刻着这样一句话。确实，赛尼斯卡的战车像旋风一样快，可平心而论，她多少也应该提一提驾驭战车的那些无名的男性驭手吧！斯巴达女性因为突出的人体美而闻名天下，这渊源可以直接追溯至特洛伊的海伦，即斯巴达的海伦，她无疑是最早享有"美人"盛誉的斯巴达女性。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斯巴达人制造的青铜小雕像经常会表现年轻的女性参与运动时的体态（露出大腿），以凸显她们的矫健、优雅与活力，有人甚至杜撰出"露腿癖"这样一个带点贬抑性的词语来称呼她们。

33

斯巴达的妇女可以拥有财产，其中就包括土地，尽管她们不能在斯巴达的战士集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无疑她们发现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来让公众知道和了解她们的想法。普卢塔克甚至还为此编撰了一部名叫《斯巴达妇女格言》（*Sayings of Spartan Women*）的书，其中很多事情在雅典的妇女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此外，斯巴达妇女不必去干乏味的日常家务，而从事这些工作却是她们的雅典姐妹们的生活常态。希洛人的妇女和男人们为她们操劳家务，如做饭、织布、照看孩子，诸如此类的工作。斯巴达妇女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成为一位好母亲，这是社会对她们的要求，事实上她们也会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在两性关系上，她们看来好像也是独立的，据说斯巴达的传统风俗尊重换妻行为，这既不太可信也

无法让人轻易理解。当然,女人们的丈夫经常要外出打仗或为打仗而参加军事训练,她们常常就会到其他女人那里寻求情感的满足。一些强有力的女人必然就会获得某种权威的地位,这样的话,她们或许会被看作是一种政治力量,或许就会成为一种威胁而受到提防。

34

但斯巴达并不是一个什么男女平等的乌托邦,例如,妇女们参加的大部分严格的身体训练其实都是以优生优育为目的的。用非斯巴达人的眼光来看,这明显是对妇女的一种解放。亚里士多德实际上对她们有所批评,在他看来斯巴达人最终盛极而衰的原因说到底,就是因为妇女们从未完全屈就自己去满足吕库古制定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对个人的各种严格要求,这种制度是在男人们接受之后试图再强加给她们的。普通的希腊男性公民中的那些性别歧视者,针对斯巴达妇女所作的带有偏见的判断,其实也是对这群希腊世界中最为卓越的女性的一种稍事挖苦的恭维话。

斯巴达最后在雅典战争中非常艰难地取得了胜利,但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场战争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野蛮,以致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希腊人坚守不移的文明和人性都产生了怀疑。残忍的围攻、妇女儿童被无情地屠杀、大规模地掠夺、整个整个的居民区被摧毁、成千上万的希腊人被当成奴隶贩卖,同样严重的是,这场战争还导致了社会的停滞和内战的爆发。修昔底德所记载的内战发生在公元前 427 年的科西拉(Corcyra),它简直就是一个用来印证这种政治分析的经典案例,尽管令人感到无比心寒。

雅典战争刚一开始就陷入了僵持,雅典人在海上占据着优势而斯巴达的陆军无人能敌,双方都没有棋高一着、一击制胜的能力。但是到了公元前 415 年,雅典人明显地高估了自己,企图插手他们能力之外的事务,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受到了亚西比德(Alcibiades)的鼓动。亚西比德,这个邪恶的天才,他就像是伯里克利(伯里克利曾是此人在其父亲战死之后的监护人)的一个反面镜像。雅典人最后派遣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去讨伐西西里,名义上打着保护"族人"的旗号,实际上却另有所图:占领整个西西里岛,或者至少可以确保他们在将来与斯巴达人重燃战火之后得到更多

的资源，因为双方在公元前 421 年之后一直处于休战的状态。亚西比德是说服雅典人发动此次高风险的远征的最初倡议者，他奢华外向的生活作风，在雅典大众中赢得了广泛的喜爱，也同样招致了一些嫉妒他的政客们的仇视。在公元前 416 年举行奥林匹克竞赛上，他为参加比赛所派出的驷马战车多达七组，毫无疑问，他最终用其中的一组夺得了冠军，他委托不止一位诗人来为他的胜利创作颂诗，其中就包括欧里庇得斯。 35

然而，就在赴西西里岛的舰队出发之后不久，雅典城内出现了最不吉利的凶兆，赫耳墨斯，这位旅行之神的大量神像遭到了损毁。亚西比德涉嫌与这起渎神事件有牵连，并被人指控是此案的主谋，于是雅典决定立即把他从已经出发的远征军中召回，当面接受法庭的讯问，但他却在返回雅典的途中，在意大利南部跳船逃跑，继而叛变投敌。据说，斯巴达人后来听从了他的提议，在雅典的领土上建造了一个永久性的军事要塞，切断了雅典的银矿供给，他还怂恿成千上万的雅典奴隶跑到沙漠里去，并派遣一名骁勇善战的斯巴达将军去协助西西里尤其是叙拉古进行防御，他所做的这些都是导致雅典最终遭受惨败的关键因素。

因此，西西里战役就以这样一种最糟糕的方式拉开了序幕，再加上雅典海军的高级指挥官们的愚昧无能和优柔寡断以及内部意见的不统一，从而使得战局变得更加混乱不堪。此外，他们在西西里岛上的最大敌人——叙拉古，在雅典海军到来之前，就已经在物质和精神上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雅典军队先是围攻叙拉古，以失败告终；公元前 413 年，海军又在大港(Great Harbour)遭遇重创，战败的雅典士兵都成了俘虏。没有被当即杀死的雅典战俘则被关押了起来，忍受屈辱并最终在叙拉古的采石场里被慢慢饿死。修昔底德用悲痛的心情记载了这段历史，他说在公元前 415 年离开雅典出发远征的人们当中，最终回来的人数非常非常少。

回顾这段历史，西西里岛这场惨烈的战争可以说是整个雅典战争的转折点，但是整场战争在之后还继续打了十年，以海战为主，战场就在爱琴海东部以及赫勒斯庞特海峡周围的地方。同这场战争荒谬的性质一样，在这

十年间，斯巴达曾经为了金钱而向波斯人卑躬屈膝，为的是要筹集足够的资金来组建一支足以抵御雅典海军的舰队。这样一种向东方野蛮人叩头的政策，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保守的斯巴达指挥官们的抵制，但是，一个叫吕山德(Lysander)的人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而且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成为了一个可以左右全局的重要人物。他与波斯国王的一个儿子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从而确保了斯巴达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可以得到稳定的资金援助，在公元前 407 年到前 405 年间，吕山德的个人能力是致使雅典最终遭受失败的重要原因。公元前 405 年，赫勒斯庞特海峡的伊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雅典的最后一支舰队在此地被彻底地击溃了。吕山德对待战俘的手段非常野蛮，他砍掉了这些人的右手之后再把他们送回雅典城，以警告城里的雅典人，如果他们继续抵抗的话也即将遭受同样的厄运。从公元前 405 年到前 404 年，在被斯巴达人整整包围了一个冬季之后，无数雅典人饿死在街头，吕山德轻而易举地就迫使雅典人接受了无条件投降。

36

雅典帝国，它曾经拥有的大胆的民主政体、自由贸易和理性进步，现在已经变得黯淡无光了，再也无法像昔日那般明亮照人，或以同样的方式发出光芒了。斯巴达，如今看来，倒有机会建立一个与雅典完全不同的帝国并取而代之。可是在公元前 400 年，在阿吉西劳斯二世的继任问题出现争议的时候，一则神谕开始在斯巴达四处流传：

> 自大的斯巴达啊，
> 小心不要让那跛足之王出现……
> 意外的纷争就要降临到你们头上……[1]

斯巴达人对宗教的信仰是出了名的虔诚，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他们非常迷信，他们总是很容易就相信各种预言，特别是那些不祥的预言。

---

[1] Plutarch, *Life of Agesilaus*, ch. 6. See Shipley 1997 in the Further Reading.

本书的第三章，名为“跛足之王”将揭示这个预示着死亡和毁灭的神谕是如何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事实的。

雅典战争之后的三十年内，也就是在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里，斯巴达人就遭受到了耻辱的战争失利——他们的领土被人入侵，而对斯巴达体系造成最大冲击的，莫过于大部分希洛人奴隶掀起的叛乱和解放运动，这些希洛人是斯巴达实力和生活方式的基本保障。这场巨变的关键人物就是前面的神谕中所提及的跛足国王，或许这也只是人们的事后之见而已吧！阿吉西劳斯，这个“真正的斯巴达人”，在他的身上同时体现了斯巴达人——这些特别的人的所有缺点和优点，但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隐喻的意义上，他都是一个跛足的人。 37

吕山德并非国王而只是一个贵族，斯巴达人一直以来都严格地坚持着他们古怪的双王制。如果要追溯这种制度的起源，按照传说它与这个城邦的建立密切相关，两个国王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王族，斯巴达人坚信他们是半神式的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后代。双王执政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宫廷内的敌对、王位继承权的争夺和派系斗争，从而导致诸多决策上的分歧。但是，这种制度是世代传袭的，同时，斯巴达人还相信它是由神制定的，那么，它就是一种适合斯巴达的好制度，是不可变更的。这样，吕山德无法获得一个合法的王位，而他想在双王制之外再造一种君主政体的想法也受到了阻止，于是，他决定转身做一个可以左右国王候选人的掌权者。

在公元前400年发生的关于王位继承权的争执中，吕山德挑选的候选人正是他以前的爱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跛足的阿吉西劳斯，他是已故的阿吉斯二世(Agis II)同父异母的兄弟。自从大家认为阿吉西劳斯不可能担任国王之后，他差不多就被当作普通的斯巴达人对待，比方说，他曾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够格者”训练。但是，对他不利的因素是他是一个残疾人，正是因为这个情况，阿吉斯认为他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Leotychidas)才是合法的继承人，同时还是因为那个关于“跛足之王”的神谕。然而，在吕山德的强势介入后，之前平静的局面被打破了。吕山德把神谕中的“跛足之王”解释

成一个隐喻,即一个非法的人占据了王权。他声称列乌杜奇戴斯就是这个非法的人,因为他并不是阿吉斯的亲生儿子,而是一个“第三者”——雅典人亚西比德的儿子!(日期也正好吻合。)最后,吕山德指出决不能因为阿吉西劳斯的残疾就贬损他在通过“够格者”训练时所取得的优异成绩,而且,在一个正在发生巨大变革且动荡不安的时期里,阿吉西劳斯将会始终坚持并捍卫斯巴达人的古老传统。这一番争辩最终说服了斯巴达人的长老会(Gerousia),阿吉西劳斯于是被拥立为国王。

如果吕山德希望通过控制阿吉西劳斯来统治斯巴达的话,那么他可能很快就发现自己是错的,并会为此而感到深深的失望。阿吉西劳斯有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尽管他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与吕山德膨胀的野心是相一致的,吕山德想要建立一个囊括整个爱琴海在内的帝国,一个统治希腊大陆的帝国。然而,斯巴达人真是不幸,后来的事实证明阿吉西劳斯是一个固执得有点过分的领导人,他不能适应一个时刻处于变化中的世界。因此,在斯巴达取得雅典战争的胜利之后的三四十年里,他既积极又消极地掌握着权力,但又无可奈何地目睹着斯巴达在他的统治下迅速地衰落下去。

38

雅典战争的突然爆发,不但广泛地改变了希腊世界的形态,也同样改变了斯巴达。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格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得到了非常有力的证明。在过去,斯巴达人崇尚简朴的生活方式,也不进行过分的、盲目的消费,长期以来至少在表面上那些自封的“平等者”们之间是平等的,尽管在实际上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并不相等;此时,这样的观念已经被吕山德的那种更加个人主义的、自私的想法所取代,尽管他自己在物质生活上也很简朴,这是他的法宝,很多时候可以用来保护他自己。斯巴达公民的数量当时已经下降到非常危险的地步了,同时,人们对土地和其他个人财富的贪婪加剧了这种情况。例如,到了公元前 371 年,斯巴达只剩大约 1500 名成年的公民战士了,而与之相对峙的雅典却拥有 25000 名士兵。斯巴达公民与希洛人在数量上的悬殊对比也在不断地增长,甚至变得可怕起来,权宜之计就是释放部分看来可

靠的希洛人并把他们武装起来，这样的策略当然是一把双刃剑。

事实证明，在阿吉西劳斯的手中，斯巴达的对外政策不但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反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雅典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里，斯巴达发现自己要对付的敌人不只是波斯，而且还包括一个由大部分希腊本土国家组成的联盟，其中竟然还有柯林斯和彼奥提亚人联盟，它们曾经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盟友，现在，竟然与斯巴达的宿敌阿尔戈斯，以及多少恢复了些元气的雅典联合起来对抗它。此外，斯巴达想要建立帝国，但却没有像以前的雅典那样提出成体系的思想主张来，雅典在之前宣称要协助希腊世界的各个城邦摆脱波斯人的统治，并支持这些城邦建立民主的自治政府。斯巴达却常常不得不通过暴力来支持一小部分有钱人去统治那些屈服于它的城邦，总的来说，这样的统治方式是得不到普通民众的支持的。斯巴达人常常宣称他们从雅典人的暴政下解放了希腊人民，但当普鲁塔克把斯巴达帝国的真实状况与雅典进行对比的时候，他作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那就是甜酒里倒进了酸醋，变了味。

39

最终，斯巴达人自食苦果，彼奥提亚的底比斯(Thebes)在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此人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一位杰出的将军)[1]和佩洛皮达斯(Pelopidas)[2]的领导下，建立了联邦制的国家。仅仅在几年之后，即公元前371年，斯巴达的重甲步兵在留克特拉的激烈战斗中遭受了第一次重大失败，并且在公元前370年到前369年的那个冬季，他们的国土也受到了不怀好意的军队从陆地上发动的入侵。在经受了三个世纪的奴役之后，美塞尼亚的希洛人终于获得了解放，这得感谢伊巴密浓达，同时，他们还重建了他们在美塞尼亚的城邦和城市，那些巨大的要塞至今还让人感到惊奇。

在美塞尼亚的希洛人获得解放后，斯巴达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国家，与其他城邦相比没有多少差别，但是作为一个强国，它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此之后，斯巴达人还仍然死死地控制着拉科尼亚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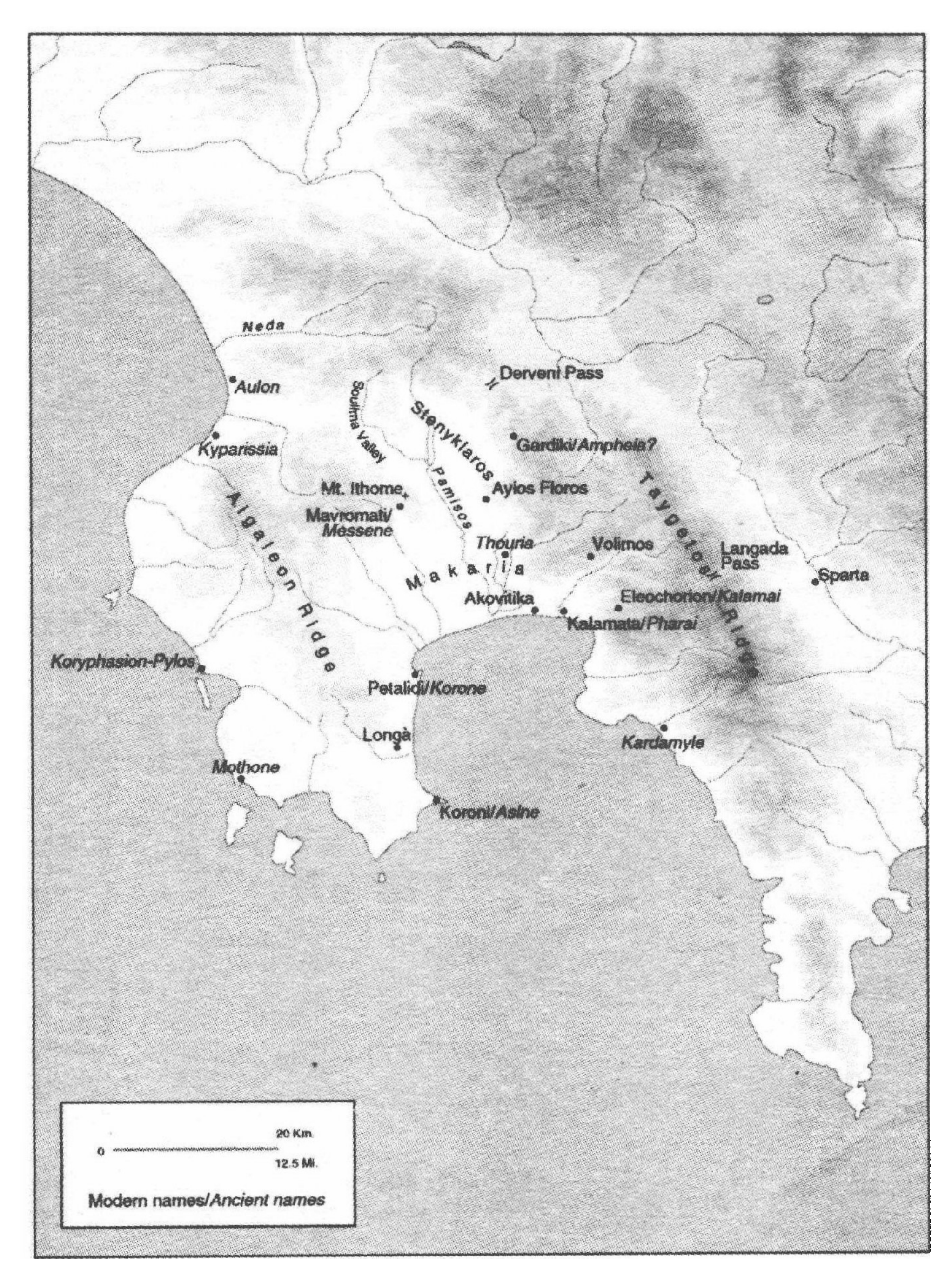
[1] 伊巴密浓达(公元前418？—前362)，希腊底比斯政治家、将军。——译注

[2] 佩洛皮达斯(公元前410—前364)，底比斯将军。——译注

希洛人达一个半世纪之久，这些希洛人现在成为了斯巴达的业已剧烈萎缩的经济的基础。没有了美塞尼亚，斯巴达人即使继承了全部的传统，但其分量却只剩不到原有的一半了。阿吉西劳斯，直至其漫长生命的尽头还仍然活跃着，成了一支海外雇佣军的指挥官为别人卖命，目的是要募集资金来重新充实斯巴达的国库。84 岁的时候，他在北非去世，尸体被涂以香料送回斯巴达。斯巴达人为他举行了一场气势非凡的葬礼，这是他作为斯巴达国王所应得的待遇和礼仪。但是，在公元前 360 年，这样的仪式已经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了！

自此以后，斯巴达再也没有恢复过它之前在陆地上曾经拥有过的地位，但是，关于斯巴达的神话和传说却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本书的最后一章将概略地叙述斯巴达在后来是如何逐渐演变为不真实的“海市蜃楼”景象的，这些事情显得更为有趣也更加重要，我们尤其要注意列奥尼达这个“人物”在斯巴达“被神话”的过程中被给予的特殊地位和角色。比如说，耶路撒冷的犹太主教在公元前 3 世纪早期认为，如果宣称摩西与斯巴达有血缘关系的话，在政治上将对自己是有利的。罗马人对斯巴达也是无限神往，他们在斯巴达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所珍视的一些美德和价值观，于是，他们也声称在这两个不同的人群之间存在着某种血缘的联系，这显然是捏造的。

40 斯巴达给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代的旅游者们带来了更加实实在在的好处，当时的旅游者常常游览斯巴达，因为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展示“过去”的主题公园或博物馆，而这个“过去”显然是后人通过虚构和想象构造出来的。比方说，在公元 3 世纪，斯巴达地区的人们在古老的阿耳忒弥斯-欧西亚（Artemis Orthia）神殿里建造了一个半圆形剧场，这个神殿曾经是进行“够格者”训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场所，而此时修建剧场的目的却是要给那些狂热的旅游者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以方便他们观赏一种托古伪造的鞭刑仪式（*diasmastigôsis*），在这种仪式中斯巴达青年在阿耳忒弥斯的祭坛前接受鞭挞，如果被打死就最好，即使不能这样，被鞭打的人也要表现得坚强不屈，被打得伤痕累累也要绝不低头。



地图：斯巴达在西部的领土——美塞尼亚

强大的帝国就这样衰落了！但是，那些爱好希腊并渴望希腊能从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人，或那些在19世纪创办英国公学体系的人仍然会认定，斯巴达的一些传统美德是值得去效仿并灌输给孩子们的，这些都不会令人感到太过于出人意料。或者，“斯巴达人”(Spartan)和“简洁”(laconic)，这些与古代的斯巴达人有关的形容词在融入主流的英语词汇之前，多少就已经不再拥有它们昔日的荣耀了。不管怎么说，两个伟大的帝国——罗马和英国——事实上都把很多东西归功于斯巴达，进一步说，我们作为斯巴达在西方的文化继承者，在今天始终都愿意去承认——我们从斯巴达人那里继承的遗产，至少与那些我们直接归功于雅典人的一样多。简而言之，斯巴达从未真正消亡过！

第一部

“去，告诉斯巴达人!”

第一章　在吕库古的光环下

45

当游客们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他们很难将展现在面前的宜人景色与斯巴达冷峻、严酷的兵营形象联系起来，北面与之接壤的阿卡狄亚(Arcadia)高地就像是突然从地平线上冒出来似的，然后俯冲至欧罗达河河谷并进入到了斯巴达平原。伸展在斯巴达面前的是两条平行的山脉，西边的泰格特斯山脉，其主峰高达2404米，东边的帕尔农(Parnon)山脉，其主峰高达1935米。这个冲积平原在南部一直延伸到欧罗达河河谷，然后从拉科尼亚海湾冲入大海，这片区域是整个希腊南部最肥沃和最令人向往的土地之一。土地、气候、人三者完美结合，有时一年之内能够生产和收获两季谷物。橄榄和葡萄酒是地中海人的餐桌上的另外两种主要的食物，它们在此生长繁茂；当然，柑橘树也长得不错，不过它们是在古典时代之后才引进的品种。这也提醒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的地貌和植被(作物)与2500年以前的居民眼中的并不一定是一样的。

这个区域在历史中长期被称作拉西代梦，据说它本是古希腊英雄时代的一个伟大王国的所在之处，学者们对这个时代有一个更为平淡的叫法——迈锡尼或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1500年至前1100年)。就在最近，还有人到斯巴达、佩拉纳(Pellana)甚至更远的拉科尼亚去寻找荷马笔下的墨涅拉俄斯国王(*参看下面有关海伦的传记*)的宫殿。但是，这样的做法不但无视古老的传说和宗教的崇拜，而且，也完全违背了地缘政治上的常识。

46

在真正的青铜时代晚期，墨涅拉俄斯的宫殿一定位于或靠近历史上的斯巴达所在的位置，它可能实际上只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定居点，其中包括一座被认为是“官邸”(mansion)的建筑物，雅典的英国考古学校已经小心翼翼地把它发掘出来了。然而，在拉科尼亚并没有找到什么宫殿在规模和年代上接近如今已经在迈锡尼(荷马笔下的阿伽门农居住的地方，他是墨涅拉俄斯的哥哥)和派娄斯(它是喋喋不休的内斯特所居住的首府)挖掘出来的建筑，它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将《荷马史诗》当成严谨的历史教科书来阅读，考古学的发现将证明其中的谬误是多么的毋庸置疑。

海伦

海伦究竟是特洛伊人，还是斯巴达人？其实，这两个说法都对，她是斯巴达当地的一个女孩，廷达瑞俄斯(Tyndareus)的女儿。这是诸多关于她的传说中的一种。然而，另一种说法是：她是伟大的宙斯的女儿，非常不可思议地从一个蛋中出生，因为宙斯在与她的母亲莉达(Leda)相会的时候化身成了一只天鹅。她无与伦比的美貌使她成为了奖赏野心勃勃的墨涅拉俄斯——迈锡尼的阿特柔斯的儿子——的礼物。墨涅拉俄斯的长兄阿伽门农则娶了海伦的姐姐(或妹妹)克吕泰墨斯特拉(Clytemnestra)为妻。海伦的美艳也吸引了一位不受斯巴达人欢迎的访客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帕里斯(Paris)，来自亚细亚的特洛伊王子，他当时负责督察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在得到了塞浦路斯的爱神阿弗洛狄忒(Aphrodite)的至关重要的帮助后，他违背了宾主之谊的神圣规约，抢走了墨涅拉俄斯的合法妻子。

47 最近，一位希腊考古学家的言论引起了一点小波澜，他声称找到了海伦(和墨涅拉俄斯)的宫殿，但位置不是在斯巴达而是在佩拉纳往北约 15 公里处的一个地方。这个说法也许会让古代的斯巴达人大吃一惊，他们在斯巴达为海伦修建了一座神殿，确切地说是在位于东南方向的古老城

镇铁拉普涅。正是在那里，海伦和她的丈夫墨涅拉俄斯，以及她那非凡的兄弟们狄俄斯库里——卡斯特和波吕刻斯——一起得到了人们的崇拜。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 8 世纪后期，可以这么说，这个时期正是斯巴达人努力去重寻他们民族之根的时候，他们声称斯巴达是墨涅拉俄斯王国的合法继承者，就像荷马在史诗《伊利亚特》中所说的那样，以此来为他们不久前在伯罗奔尼撒东西部的领土扩张寻找合理化的依据。事实上，在铁拉普涅受到崇拜的海伦可能是两个海伦的合体：一个是掌管植物和繁殖的女神（她也在别处受到崇拜，比如罗得岛），另一个才是荷马史诗中的海伦。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讨论的是后一个海伦。

更特别的是，当海伦后来被当作斯巴达女性和美丽的代名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到底是帕里斯“抢走”（鉴于我们习惯用这个说法）了海伦，还是她出于本心自愿跟他出走？希罗多德，这位“历史学之父”（西塞罗语），用了三段内容不同但很有意思的文字来描写海伦。第一段是在他对公元前 5 世纪早期的波希战争的爆发原因作深入探析的时候，他试图穿越时间与传说的层层迷雾，去追溯希腊与东方相互敌对的现状在历史或神话中留下的踪迹。希罗多德饶有趣味地记下了一系列关于这场战争为何爆发的不同版本的说法，尽管这些说法相互之间往往是矛盾的，而他这样做可能仅仅只是为了复述他从博学的腓尼基人和波斯人那里听来的各种故事。从他们叙述的故事当中，照旧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帕里斯——如果过去发生的事情真是如此的话——劫走了海伦。而希罗多德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则有点低俗但又不能说是大男子主义：

> 很明显，如果不是妇女们自己愿意的话，她们是决不会被劫走的。[1]

---

[1] Herodotus Book I, ch. 4 (see also ch. 3). See also Marincola ed. 1996；可参见中文译本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 1 版，2005 年 4 月第 9 次印刷，第 2 页。本书中相关中文译文都以王以铸译《历史》为主要参考，以下不再另作说明。——译注

斯巴达人

48 然而，关于海伦被劫走这件事，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流传着另一个并不含糊的说法，这是希罗多德的记载中没有的，故事发生的时候海伦只是一个女孩还没有成为人妻，这是一个与以前不同的故事，它的情节显然受到过雅典的英雄忒修斯（Theseus）的故事的影响。不久前，伊利莎白·库克（Elizabeth Cook）对阿喀琉斯的故事所作的富于想象力的阐述，以及约翰·巴顿（John Barton）的那部很有影响力的戏剧组诗《坦塔洛斯》（*Tantalos*）都在提醒我们，正是这个更早的也更为阴暗的传说，揭示了海伦多舛的一生。

接下来我们将引用希罗多德关于海伦的说法，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它只会令读者感到更加困惑。他在《历史》的第二章中总结关于埃及人的各项重要事项时把海伦也扯了进来，根据他的叙述，海伦在特洛伊战争的十年间一直呆在埃及袖手旁观，根本就没有去过特洛伊：

> 这就是埃及祭司们告诉我的关于海伦的故事，至于我本人，我是相信他们的说法的。我的理由是这样：如果海伦真是在特洛伊的话，无论帕里斯愿意不愿意，她都要被送回到希腊人那里的。……那么，这也是我自己对此事的解释。[1]

在传说中，墨涅拉俄斯和阿伽门农以及全体希腊人为了美丽的海伦而驾驶着成千上万的战船扬帆出征，而对于希罗多德而言，他在这里只不过是重新揭开了掩盖在这个传说之上的假象和虚构。

这种非正统的说法，荷马有其弃之不用的明显理由，但也并非希罗多德的原创，因为我们知道，来自西西里西部希米拉（Himera）的希腊抒情诗人施台斯科留斯（Stesichorus），早在公元前 6 世纪中期就开始宣扬这

---

〔1〕 Herodotus II. 120 (see chs 113—120)；可参见《历史》中译本，第 161 页。

种观点了。希罗多德之后，在伟大的雅典戏剧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戏剧残本《海伦》中同样可以发现这种说法；但是，对于大多数古代人同样也对于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来说，海伦就是那个被劫往特洛伊的海伦。

希罗多德第三次提起海伦的时候，则把我们从埃及带回到了斯巴达，更确切地说是位于铁拉普涅的海伦神殿，这是一个典型的民间传说，希罗多德为公元前 5 世纪的听众们再一次讲述了一个美妙的故事。很久以前，在我们看来应该是公元前 6 世纪下半叶在斯巴达的某个地方，一对富有的夫妇生下了一个女孩，但是，唉，他们心爱的女儿却长得非常丑陋。于是，这个孩子的乳母——可能是个希洛人，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49

> 既然她长得丑陋，同时她富有的双亲又为自己女儿的容貌如此担心，于是，她的乳母就每天把这个孩子带到海伦的神殿去，这座神殿就在铁拉普涅的阿波罗神殿的上方。乳母把孩子带到这里来，把她放在海伦的神像前，祈求女神改变这个孩子的丑陋容貌。[1]

一天，一个幻影——显然就是海伦——出现在了乳母的面前，她在跟乳母打了招呼之后，又拍了拍孩子的头，从此这个孩子就越长越美丽，等她长大成年的时候，已经出落成所有适婚的斯巴达女孩中最为美丽动人的姑娘了。最初成为她的丈夫的人是幸运的，可是，这位斯巴达人却交了一个坏朋友，这个朋友本来与他交往密切，可惜自己婚后一直没有生育，现在，这个朋友竟然狂热地爱上了那位斯巴达人的妻子，一心想着要这个美人为自己生育一个完美的男性继承人，这真是不幸！而更加不幸的是，这位好朋友偏偏又是当时的斯巴达国王。对于一位斯巴达的国王来说，生育一个嫡出的男性继承人不仅是他自己的心愿，对国家而言也是桩大事。这位有着强烈愿望要生养一个儿子的国王之前已经结过两次婚了，如今，他为朋友的妻

〔1〕 Herodotus VI. 61；可参见《历史》中译本，第 426 页。

子昏了头，便在后来用低级的伎俩夺走了朋友的妻子，对他的朋友来说，这既是伤害又是侮辱。

这位国王就是阿里斯通（Ariston），他在与这位不知名的美女结婚后，生下了戴玛拉托斯（Demaratus）——日后的斯巴达国王，我们在后文还将提到他，他被人认为是私生子并且最后还成了叛徒——在斯巴达当王，每天都充满着艰辛（更多与他相关的内容可以在本书第二章关于他的传记中看到）。但是，在我们离开海伦这个话题之前，有必要再提一提三处与她有关的文献记载，并讨论她对后世所产生的完全不同的影响。首先，早在公元前7世纪，位于德尔斐——古希腊人称此地为“地球的肚脐”——的阿波罗神殿的女祭司代表她的主人——阿波罗发布过一则预言，男祭司们解释了这则预言，认为它与斯巴达的妇女有关，称颂她们是整个希腊世界中最美丽的妇女。因为荷马，海伦得以名扬四海，我们这些后人无不折服于海伦的美艳，这巨大的声誉其实也给现实中的斯巴达女孩和她们的父母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她们不得生活在海伦令人敬畏的声誉之下。

50

随后，也就是在公元前7世纪，古代希腊最伟大的女诗人——莱斯博斯岛（Lesbos）的萨福（Sappho）——也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海伦。萨福的诗中也有写得中规中矩的，这里以她的一首残存的诗歌为例，它是写给一些美貌而又情窦初开的女孩和年轻女性的：

无论何时见到您，
在我看来，即使是赫尔迈厄尼[1]
都不能与您相比，
不，把您与有着金色头发的海伦相比
要好得多。[2]

---

〔1〕赫尔迈厄尼（Hermione），海伦与墨涅拉俄斯的女儿，俄瑞斯忒斯（Orestes）的妻子。——译注

〔2〕Sappho fragment 23. See also West 1993.

另一方面，萨福也能深刻地、令人不安地打破成规。她的写作超越了世俗的规范，即那种男性的价值判断，她所创作的诗篇在历经了好几个世纪之后，仍然幸运地保存在了纸草上，埋于埃及奥斯莱卡(Oxyrhynchi)的干燥沙土之中，直到距今一个多世纪之前才被发掘出来：

有人说骑兵，有人说陆军，有人说舰队
是这块黑暗大地上
最美的风景；
但是，在我看来，最美之物当属
你心中之所爱。

……
这个妇人，海伦，
美倾天下，
抛弃了所有男人中最优秀的夫君，
头也不回，渡海去了特洛伊，
全然忘却了孩儿[赫尔迈厄尼]与爹娘；
是爱把她引向了歧路
……[1]

51

萨福在这里既否定了男性的军人价值观，也不认为海伦追求爱情和欲望是因为神的不可抗拒的力量(*force majeure*)。这可不是普通的希腊丈夫们所乐意听到的。

这里，我们还要说一说最后的那个关于海伦的说法及其影响，总而言之，它更加让人感到心情愉快，实际上它最后还被改编成了真正的喜剧。

---

[1] Sappho fragment 16.

斯巴达人

公元前411年，雅典的阿里斯托芬在一年一度的两个大型的纪念狄俄尼索斯的戏剧节上演出了他的两部喜剧作品。其中一部就是《吕西斯特拉忒》(*Lysistrata*)，这部人们所知的最早的喜剧是用剧中的女主角吕西斯特拉忒的名字命名的。阿里斯托芬把她塑造成了一位可敬的雅典已婚妇女。她千方百计地寻找办法来结束雅典与斯巴达及其各自同盟之间的战争，它已经断断续续地打了二十多年了(时间相当于特洛伊战争的两倍)，于是，她把希腊各个城邦中的妇女，确切地说是妻子们召集到一起共谋大计，她们提出的最了不起也最有创意的策略是：撤销她们的配偶的同居权力，不再与丈夫们同房。于是，她们在稍后就开展了性罢工，这迫使那些好斗但又渴望房事的丈夫们走上了谈判桌，并不得不在最后签订了和约(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够重新与妻子们做爱)。代表斯巴达的姐妹们参加这次会议的女人叫拉姆披多(Lampito)，这是个不错的名字，实际上也正好是一位离这个时代并不久远的斯巴达国王的妻子的名字。

下面就是阿里斯托芬如何介绍拉姆披多的(当然是由男扮女装的演员来扮演)：

欢迎，拉姆披多，我亲爱的斯巴达朋友！

[**吕西斯特拉忒说**]

宝贝，你看起来多么美丽！你的皮肤看起来多么白皙，你的体格是多么健壮！你能让公牛都屏住呼吸！

52

拉姆披多用斯巴达的方言答道：

没错，我想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实际上是受到两位天神[1]的护佑，我还练习体操和弹跳。

另一位来参加这次集会的雅典人也加入了这场愉快的讨论：

瞧，你有一对多么曼妙的乳房啊！

[1] 即孪生子卡斯特(Castor)和波吕刻斯(Pollux)。

拉姆披多佯装被激怒了：

说实在的，你们让我觉得自己像是用来献祭的动物。[1]

大部分的雅典观众在哄笑之余，肯定还会因此想到斯巴达妇女和自己的妻子或姐妹们是不同的。斯巴达妇女们会在公众场合参加体操训练和田径运动，如果不是完全裸体至少也是露出部分身体。斯巴达妇女与雅典的妇女不同，她们可能正是通过这些锻炼使得乳房保持坚挺，甚至在哺育完孩子之后也是如此，当然，除此之外，她们通常会让希洛人的奶妈们去哺乳。

《吕西斯特拉忒》的结尾也完全是斯巴达的曲调，先是一个斯巴达男人独自登场，然后是一对对的斯巴达人伴着他们特有的歌曲进行载歌载舞的表演（希腊语“chorus”，最初的意思是舞蹈，后来才演变为合唱的意思）。特别要留意一下她们在最后对海伦，这个“莉达的女儿”所作的赞美：

再次离开美丽的泰格特斯山，
拉科尼亚人的缪斯来了，
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赞美阿密克利的神[2]，
还有那黄铜屋中的雅典娜，
以及在欧罗达河之畔游玩的廷达瑞俄斯的高贵的儿子们吧[3]！
欢呼吧！
快乐地跳起来吧！
我们还要赞美斯巴达，
跳起快乐的颂神的舞蹈，

53

[1] Aristophanes, *Lysistrata*, lines 78—84.
[2] 即阿波罗。——译注
[3] 即卡斯特和波吕刻斯，海伦的兄弟们。——译注

斯巴达人

脚下踩着节拍，
在那里，少女们像可爱的小马那样，
在欧罗达河之畔蹦蹦跳跳，
脚下扬起了灰尘，
摇甩着头发，
就像是酒神的女祭司正手握着神杖在跳舞，头发飘舞着。

莉达的女儿引导着她们，
她是这场纯洁而优美的合唱的领唱。[1]

大约是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位于铁拉普涅的迈锡尼人的王宫等建筑被烧毁和破坏殆尽，这片区域作为整体而言已经彻底地衰落了，因此，到了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拉科尼亚地区可以说是进入了“黑暗时代”。在公元前10世纪和9世纪，斯巴达终于出现了朦胧的文明曙光，比如欧罗达河旁边的欧西亚圣地，这个地方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斯巴达人举办“够格者”训练或进行教育的重要场所。无论如何，在进入公元前8世纪晚期以前，这复兴的曙光就开始变得更加明亮起来，复苏的地方也更加普遍，考古上的发现可以证明这一点。到了那时，人们已经给庇护女神雅典娜建造了一座神殿，它位于现在被人们认为是斯巴达卫城的地方，在公元前6世纪，这座雅典娜神殿被人们称为“黄铜宫”(Brazen House)，阿里斯托芬在《吕西斯特拉忒》一剧的结尾部分(参见前文)还提及过它。在位于斯巴达以南几公里的地方阿密克利，还有一座重要的神殿——阿波罗神殿，它也在《吕西斯特拉忒》中被提及过，应该说正是在这里而不是在斯巴达，神话、宗教和政治相互融合，在历史上留下了斯巴达人的城邦或国家在起源时期的最初迹象。

[1] Aristophanes, *Lysistrata*, lines 1296—1315.

一个希腊的城邦并不仅仅是一个真实的物理空间，它事实上是一种空间上的联合，一个行政中心把乡村地区结合了起来。它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即拥有处于中心位置的复杂的管理机构（如行政部门、立法机关、司法部、武装力量等），并与作为整体的人民分离开来，以便于管理人民。正相反，城邦是公民的国家，一个城邦叫"斯巴达"，那么它就是斯巴达公民的城邦。的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斯巴达人在整体上都拥有一种特殊的、平等的公民身份，这在希腊世界可能是开先河的；另一方面，在空间利用或建筑设计上，斯巴达人远远落后于希腊其他城邦，即便是与公元前第 8、7、6 世纪的希腊南部较为先进的地区相比，情况也是如此。最为显著的是，他们从未对城邦的中心区域进行过适当的城市化，正如修昔底德在他的《波希战争历史》（即《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的开篇所评述的，斯巴达人以村庄的形式保存了一种更加古老的定居点模式，而且他当时就准确地预见到这些定居点到最后会变成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且平淡无奇的残迹，后代的参观者们在看到它们后一定很难相信斯巴达在这里曾经拥有过支配世界的力量。在公元前 2 世纪之前，斯巴达人始终都没有修筑过任何形式的城墙。 54

他们不修筑城墙的一个原因是觉得无论是来自外部敌人的袭击，还是国内奴隶的叛乱，他们都有能力确保自身的安全。此外，他们将修筑城墙看作是没有男子气概的表现，认为只须凭借自己强健的身体就足以自卫，他们对此感到非常自豪，这种说法显然有点装腔作势。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斯巴达特殊的城市构成方式，这种状况在开始的时候是杂乱无章的。从政治上讲，除了阿密克利之外，斯巴达的另外四个村庄（居诺苏拉、美索亚、里姆奈和皮塔纳）都是彼此分开的。所以，如果要建立环绕斯巴达的城墙的话，就会因此而疏远阿密克利。阿密克利究竟是何时何种原因又是如何合并进斯巴达的版图的，确切地说，我们都不清楚。可以这么说，一方面，在斯巴达人具备了条件准备跨越泰格特斯山脉 55 去征服南边的拉科尼亚的剩余地区以及西部的美塞尼亚之前，他们实际

上就已经合并了阿密克利;另一方面,合并也从未完全湮灭和消除阿密克利的独特身份。

阿密克利是祭拜阿波罗和叙阿琴提斯(Hyacinthus)的神殿所在之地,这是它的特殊地位的一个标志,在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阿密克利的神殿装饰得特别辉煌,简直是美轮美奂,当时的斯巴达人委托一个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来自曼安德河(Meander)旁的麦格尼西亚(Megnesia)的巴绪克勒(Bathycles)——设计并建造了饰有很多图像的石制"王座",接受祭拜的神像也是用珍贵的材料制成的。在这里举办的祭拜活动是斯巴达宗教历法中主要的年度节日之一,即历时三天的叙阿琴提亚(Hyacinthia)节,依照特别的法规,阿密克利的士兵们都要参加这个节日,即使是他们在国外作战的时候也要遵守这个规定。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人们把对阿波罗的崇拜与对叙阿琴提斯的崇拜结合到了一块。在神话中,叙阿琴提斯是个俊美的少年,阿波罗爱上了他(这中间显然包含了性爱的成分),但是,这个少年却不幸地被一枚铁饼误杀。因此,这种结合在一起的崇拜仪式其实象征和代表了斯巴达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娈童倾向,年轻的成年战士与一些正在参加训练的青少年之间会存在这种同性恋关系。然而,这种崇拜对于斯巴达的妇女和少女而言同样重要,因此,不能把这种崇拜活动简单地视为一种特殊的或奇特的男性同性恋之间的聚会。

也许叙阿琴提亚节对于"国家"的政治之所以很重要的一个主要原因,更在于它代表了两个不同民族的人民,即外来的多利安人和原住民亚加亚人(Achaeans)[1]之间的融合的开始。无论如何,在其最广泛的意义

[1] 或译为阿凯亚人;亚加亚人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对希腊军队的集体称谓。荷马还用"亚加亚"指称阿伽门农的国土,阿伽门农是希腊部队的领袖。这片国土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北部,大致对应于现代希腊的阿哈利亚州和柯林斯州。荷马时代的亚加亚人可能是迈锡尼文明的一支,后者从约公元前1600年统治希腊,其历史可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史前希腊人的迁入。——译注

上说，历史上的斯巴达人总被人认为是多利安人[1]，因为他们说的是带有多利斯[2]方言的希腊语，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制度上的设计也是基于传统的三个多利安人部落，即希莱人（Hylleis）、潘菲利人（Pamphyloi）和迪曼人（Dymanes）部落，并且他们崇拜奥林匹亚众神中与多利安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阿波罗。事实上，几乎所有主要的斯巴达宗教节日都是为了祭拜这个或那个阿波罗，而非城市的护佑者雅典娜。如卡尔涅亚祭（Carneia）就是用来祭拜代表着公羊属性的阿波罗，这是一个特别的多利安节日。节日的庆典在每年的卡尔涅亚月举行，这段时间在所有多利安人看来都是神圣的。可是，尽管这个节日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它也并不必定能够阻止斯巴达和它在多利安人中的敌人——阿尔戈斯（Argos）——之间反复无常的争斗。斯巴达人声称，在公元前480年，当温泉关的战斗打响的时候，他们正在举行卡尔涅亚节日，而庆祝这个节日又是他们优于其他一切的义务，因此他们无法派遣足够的援兵去作战。

56

在斯巴达，另一个祭祀阿波罗的主要节日是“少年欢舞节”（the Gymnopaediae），由此也带出一个有趣的词源学故事。按照传统的说法，这个节日按字面应该被翻译成“赤裸的年轻人的节日”，其意义来源于“*gumnos*”和“*paide*”这两个词根。可是，这个节日的主要活动却是一场在三个年龄段的歌队或合唱队之间进行的比赛，它们分别是超出作战年龄的老年组、正当年的战士组和未到战士年龄的少年组，因此，它并不是一个仅仅由年轻人参加的节日。那为何只用这三个年龄段中的一个来命名这个节日呢？另一个较为可信的词源学上的解释是：“*gumnos*”的意思并不是“赤裸”而是“不携带武器”，而“*paidiai*”则有可能源自希腊语中关于“跳舞”的一个词（前文所引述的喜剧《吕西斯特拉忒》的一段就使用过

---

〔1〕 多利安人从传统上被认为是伯罗奔尼撒的征服者（公元前1100年至前1000年）。在希腊传说中，认为多利安人以中部希腊的一个小地区多利斯（Doris）而得名。实际上，多利安人的起源不明，但是看来他们来自希腊北部和西北部的马其顿（Macedonia）及伊庇鲁斯（Epirus）。斯巴达、柯林斯、阿尔哥斯都是多利安人建造的最重要城市。——译注

〔2〕 是位于希腊中部的一个小地方。——译注

这个词)，因此，“Gymnopaediae”这个节日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为“不携带武器的舞会”，这样的集会形式在公元前 7 世纪上半叶可能就已经存在了。

斯巴达人喜欢舞蹈，尤其是一种叫“皮瑞可”(Pyrrhic，为的是纪念皮洛斯或涅俄普托勒摩斯，即阿喀琉斯的儿子[1])的特殊战舞——更是闻名天下，总之，这种独特的舞蹈文化同样也有其宗教祭仪上的意义和实用性。此外，斯巴达的所有神明，无论是女性神还是男性神，他们的雕像都会被斯巴达人披挂上武器和盔甲，一个不携带武器的舞会为的是祭祀佩戴着武器的阿波罗，这其中一定隐含着某些特别的意义。“少年欢舞节”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社会地位高的斯巴达人喜欢邀请他们尊贵的外国客人们来参加这个节日，招待他们观看那些不愿结婚的单身汉们是如何遭到大家的公开羞辱的，这是斯巴达人的宗教仪式上的一个保留节目。曾经有一位早期的诗人，他并不是斯巴达人，但却在他的诗中把斯巴达人比作蝉，因为他们只要聚在一起就会大声合唱(包括集体舞和合唱)。“少年欢舞节”是在一年当中天气最热的时候，在一个气温最高的地方(大约是海拔 200 米)举行的，为了配合这个节日的快乐主题，斯巴达人会表演一种需要不停地旋转身体的健身操，这是一大特色。

57

在古希腊，宗教和政治是分不开的，因此，当斯巴达人虔诚地认为他们的法律是由德尔斐的阿波罗赐予的时候，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色诺芬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记载了公元前 4 世纪前期的斯巴达人的法规和生活方式，称这两者是由“德尔斐的神谕规定的”。求助于神明的许可当然是确保子民遵行法规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就是通过严格的教育和社会-心理上的强化训练来向青年们灌输对法律的信仰，使他们能够自觉地把遵守法律当成一种习惯。斯巴达人认为，那个既为他们制定了法律又设计了一套教育体系的人就是深谋远虑的吕库古。

---

〔1〕 皮洛斯(Pyrrhos)；涅俄普托勒摩斯(Neoptolemus)。——译注

吕库古

普鲁塔克曾设想着要编写一部宏大的人物传记，以记录并比较那些生活在过去的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人物，这样的一部传记不可能没有吕库古的一席之地。事实上也是如此，普鲁塔克给予了吕库古极高的荣誉并把他与罗马建国初期伟大的立法者努玛并列在了一起。然而，正如普鲁塔克在“吕库古”这一部分的序言中所坦承的，撰写吕库古的传记并非易事，因为记载他的各种文献资料相互之间往往是矛盾的。普鲁塔克，这位不屈不挠的研究者，在吕库古的传记中引用了不少于50位前辈作者的资料，我们因此而可以很好地体会到他内心的那种巨大的挫折感。要是一位现代的历史学家遇到这种情况，想必早就已经放弃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普鲁塔克，他是一位从道德角度编撰历史传记的作家，而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在他关于“吕库古”的传记里，几乎囊括了与吕库古在斯巴达的与改革有关的所有历史细节，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细节上，在其他地方我们都找不到比这里更详细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很矛盾的，当我们尝试着去勾勒吕库古的一生的时候，这些资料并不会起到多大的帮助。 58

换句话说，如果历史上真的有过这样一个人的话，那该多好啊！我已经在前面说过，有可能他只是人们对天神阿波罗的一种人格化的想象，斯巴达人相信“他制定的”律法是在得到阿波罗的神圣担保之后才得以实施的。（严格地直译他的名字——Lykourgos，大概的意思就是“wolf-worker”，而“像狼一样”正是阿波罗的诸多属性中的一种。）事实上，斯巴达人自己也不清楚他的出身，尽管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为纪念他做了很多努力，但这无疑也使吕库古的真实性变得愈发令人怀疑了。

我仅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人们的这种半信半疑的态度。第一个例子来自希罗多德的《历史》的第一卷，他设置了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来说明斯巴

达和雅典作为希腊世界的两股主要力量在公元前5世纪的波希战争早期的时候，究竟该由谁来担任领导。他记录了吕库古曾亲自前往德尔斐请求神谕的情况。吕库古一走进神殿，就有声音向他打招呼：

> 你来了吗？哦，吕库古，你到我富有的神殿来了，
> 宙斯和奥林波斯诸神都加爱于你，
> 我不知道是否要称你为神，或者只是一个人，
> 但我更愿意相信你，吕库古，是一个神！[1]

希罗多德的这个故事与当时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如出一辙，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应当看到，实际上是斯巴达政府对吕库古应该受到何种崇拜而去问神的，也就是说，斯巴达人想知道吕库古究竟该享有英雄（半神）的还是神的荣誉。真正的事实是，斯巴达人希望德尔斐能够澄清和认可吕库古的地位，但得到的神谕却并不那么肯定，这说明即便是在早期斯巴达人的公共记忆中，他的形象也已经变得可疑或模糊了。

我们知道，斯巴达人会非常轻易地把死去的斯巴达人英雄化。举个例子，在公元前6世纪的一座石制浮雕里有一个英雄的图像，碑文只有一个词：奇隆（Chilon）。这是斯巴达的一个领导人的名字，他之所以如此著名是因为他曾位列公元前6世纪全希腊的七贤名录当中，这七位贤人在当时都是能干的政治家。奇隆被英雄化是在古代的时候，并且是只对他一个人而言的，但斯巴达的所有国王在死后都会被奉为英雄，他们之所以能得到英雄的荣誉，只是因为他们生前都曾经是国王。因此，我们至少可以确信吕库古从未做过国王，并且我们不接受普鲁塔克的一种说法，他说吕库古曾经统治过斯巴达八个月。另外还有资料暗示，吕库古可能是被虚构出来的，尽管这份资料是想要把他说成是国王或至少是两个王族中

59

[1] Herodotus I.65；可参见中文译本《历史》第一卷（65），第31页，此处译文依照英文原文有修改。——译注

的某一族的成员,但却无法确定究竟是属于哪一个家族,于是,吕库古就在阿基亚德(Agiads)和欧里庞提德(Eurypontids)两个家族的族谱中令人不安地变换着。

普鲁塔克的传记里还记述了吕库古的其他一些有趣的生平事迹。据推测,吕库古曾经游历过克里特(Crete)和亚细亚,为的是去收集资料以便与斯巴达进行比较,从而为将来的法律和社会改革作准备。在他彻底贯彻并实施了根本性的土地改革方案之后,他曾经评论整个拉科尼亚就像一大笔刚刚被很多兄弟平分了的遗产,一点争执也没有!据说在一次别人的街头寻衅中,吕库古的一只眼球被人打了出来。他在口才上应该说特别具有天赋,拥有斯巴达人才有的那种机敏应答的能力。据说一位来自其他城邦的民主派人士跑到斯巴达来,不合时宜地向吕库古推销民主政制,吕库古如此反驳道:"你还是先在你家里实行民主政治吧!"有一尊奉献给他的小雕像表现的正是他开怀大笑时的样子,这是一种象征,为的是说明即使是在严肃的军营生活中也需要有轻松的时刻。最后,在他所创建的法律已为人们接受并开始发挥作用之后,他永远地离开了斯巴达,并前往德尔斐作了最后一次访问,他向神灵祈求神谕询问他的改革在将来是否会获得成功。在得到了神谕的肯定答复后,他决定绝食而终[1]。哎,可惜所有这些感人的细节都是虚构的,而且虚构得十分巧妙!因此,我们最好还是采用一点儿斯巴达人的苛刻态度,无限期地把对吕库古的看法和判断悬置起来吧!

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在斯巴达进行全面改革的一揽子方案的精髓和重点都应归功于吕库古,它们都浓缩在一个看起来非常像是真正的古代文献那样的"大瑞特拉"(Great Rhetra,之所以称"大瑞特拉"是要把它与　60

---

[1] 他这样做为的是使他的同胞永远不能解除曾经向他立下过的誓约,即如果他不回国,斯巴达人就不能改变已建立的政体并奉行不渝。——译注

若干小的“瑞特拉”区别开来，后者也同样出自吕库古）上[1]。一个“瑞特拉”可以表示任何格言或公告——来自一个协议或契约，通过一个神谕变成法律。普鲁塔克记载了这个“大瑞特拉”，他大概相信这个“大瑞特拉”是根据一则德尔斐的神谕制订的，因此它既是神谕也是法律。事实上它是散文而不是六步格的诗文，但这并没有阻碍他相信它的真实性，当然，我们也应该相信它。有很多诗化的只言片语，它们的真实性是确定无疑的，相反可以证实他的想法，即这个大瑞特拉起源于一则神谕，但它是在什么时候从德尔斐颁布出来，又是在怎样的情形之下传给哪一位斯巴达人的呢？

吕库古在希罗多德的记载中所处的时代，并不比曾经共同统治过斯巴达的两位国王列欧（Leon）和阿伽西克列斯（Agasicles）的年代要更加准确，希罗多德把吕库古放在了公元前 6 世纪的前五十年。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吕库古与最初制定奥林匹克大赛期间的休战协议有联系，将他放置在了更早的年代，即公元前 776 年。但公元前 7 世纪中叶的斯巴达人提尔泰奥斯（Tyrtaeus），他是一位战争诗人，完全没有提及过吕库古，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沉默，尤其是当他的诗作证实了普鲁塔克记载的“大瑞特拉”确实存在的时候。同样也是在提尔泰奥斯的诗句里提到了一位地位非常高的斯巴达官员曾经前往德尔斐去祈求过神谕，但这位官员不是吕库古，而是斯巴达当时的国王之一铁欧彭波斯（Theopompus，他大约在公元前 710 年的时候领导斯巴达人征服了美塞尼亚人），他和波律多洛司（Polydorus）曾经在公元前 7 世纪早期一块儿统治着斯巴达。无论提尔泰奥斯的说法是否确凿，现在是介绍一下这套被归功于吕库古全面改革方案的内容的时候了。

事实上，普鲁塔克首先想要搞清楚的是吕库古对长老会（Gerosia）即斯巴达议会所作的改革，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创新，同时他还将这一改革

---

[1] 瑞特拉指的就是一些政治性的宣言或法律法规。——译注

与他援引的“大瑞特拉”联系在了一起：

> 在为宙斯和雅典娜建起了一座神庙，并把人们分成“费位伊”(*tribing*)和“奥巴伊”(*obing*)，再建立起包括国王[被诗化地称为“亚卡格塔伊”或“创始人——领袖”]在内的三十人长老会之后，一年到头，你们要经常在巴彼卡(*Babyca*)和克那基翁(*Cnaciôn*)之间举办‘阿佩拉’[一个祭拜阿波罗的节日，以此来召集民众]；长老会可提出也可以废除各种方案，人民在公民集会(*damos*)中必须有权力为提案作出表决[这是普鲁塔克对用多利安方言写成的原文所作的曲解]，但如果人民意欲采纳一个不正当的方案时，长老和国王有权休会。[1]

61

首先，通过对照提尔泰奥斯的诗歌，我们可以发现国王的相对地位是最值得关注的。在提尔泰奥斯的诗中，他们的地位最重要，可谓风光无限，这在一个决定保留世袭的王位，更确切地说是保留双王制的传统社会里可以料想到的。但是在“大瑞特拉”里，一方面国王的地位已经降级到仅仅只是长老会的成员之一了；另一方面，为了确保这个掌握着国家最大权力的组织的地位和影响能够恒久不变，长老会成员的数目在这里可能第一次被明确规定为 30 人。除两位国王外的另外 28 人，年龄至少要达到 60 岁，这些人中总有一些是两位国王的亲戚，并且可能实际上已经限定只有贵族才可担任长老会的成员，但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些人是在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大会中被民众选举出来并终生担任这个职务。

如同底比斯的(Theban)的抒情诗人品达(Pindar)在公元前 5 世纪早

---

[1] Plutarch, *Life of Lycurgus*, ch. 6. See Talbert ed. 1988；可参见中文译本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黄宏煦主编，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年第 1 版，第六章，第 93 页，此处译文依照英文原文有修改。——译注

期所创作的诗歌(被引用在普鲁塔克的著作中的一个段落中)那样:

> 长老们的议会,
> 那里的作用最突出……[1]

“大瑞特拉”在实际上蕴含着两重十分重要的意思:首先,长老会议拥有事先协商的权力,也就是说所有事务在交给公民会议进行表决之前,它可以先对这些事务进行讨论,公民会议在“大瑞特拉”中被称为“*damos*”,即“People”;其次,长老会的功能就像是斯巴达的最高法庭,作为最终审判处,它甚至有资格审判国王的所作所为是否合法。长老议会的权力如此之大,如同“大瑞特拉”的最后条款所说的,如果它不喜欢公民大会表达决议的方式或想要达到的目标,它甚至可以推翻这项决议,然后再重新进行讨论。

62

公民大会是什么?在古典时期,它由斯巴达的全体成年男性公民战士组成,他们是在斯巴达合法出生的公民,然后按照规定由国家抚育成人,再经过选拔加入到一种军队化的公餐食堂当中,而且他们还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他们必须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从而可以按照最低份额标准向食堂交纳自己的一部分农作物收成;二是他们不能有触犯法律或其他触犯公众的罪行以及不端的行为,也不能在战场上有怯懦的表现。极有可能的是,在斯巴达发展出成功的、由重甲步兵组成的战斗方阵之前,这样一个战士会议要么不太可能会产生,要么也不太可能拥有“大瑞特拉”所规定的那些权力或特权,即便这些权力还是受限制的。战士会议最早也是到了公元前 675 年之后才出现,在这之前就不太可能了。传说在公元前 669 年的时候,斯巴达与阿尔戈斯在杜列亚(Thyreatis)的边界叙喜阿伊(Hysiae)爆发的冲突中被击败,随之国内就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

---

[1] Pindar, *Lyric Fragment*, quoted in Plutarch, *Lycurgus*, ch. 21;可参考中文译文在《希腊罗马名人传》第 113 页,此处译文依照英文原文有修改。——译注

揭竿而起的正是斯巴达人才战胜不久的美塞尼亚人，如果这个记录属实的话，那么战士会议在这之后可能仍然还没有建立起来。从普鲁塔克在"吕库古"的传记中所引用的另一首外国诗歌来看，在公元前 7 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的时候，斯巴达很有可能出现了一些革新，这首诗特别提及了吕库古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政治改革，与之齐头并进的是公民重甲步兵在军事上也取得了一些胜利：

> 勇士们的长矛在那里簇拥着……
> 伴随着缪斯的清音，
> 正义走上了宽阔的大道。[1]

这几行诗文的作者是莱斯博斯(Lesbos)的特潘德(Terpander)，他可能在斯巴达国势正处于繁荣昌盛的时候到访过那里，原因大概与卡尔涅亚节上举行的诗乐比赛有关。

重甲步兵的战斗异常激烈，它要求敌我士兵之间进行面对面的贴身厮杀，要不是这些斯巴达战士在国内已经接受过严格的身体和意志方面的训练的话，否则就真是太恐怖了！斯巴达人的作战方阵通常是八排，队列的宽度由纵列的数目决定；公元前 479 年，斯巴达人在普拉提亚战役中组建了一支 5000 人的重甲步兵大军，战斗方阵的厚度达到了 600 列。重甲步兵很可能得名于他们所装备的主要武器，双把手的盾牌非常稳固地系在战士的左臂上，而没有得到盾牌保护的右边身体就需要紧靠在他右边的其他战士来提供保护了。希腊单词"*hopla*"包含有盾牌的意思，实际上是武器和甲胄的总称。一套"*panoplia*"就是指一整套重甲步兵装备，它包括了一个大型的头盔，由一块铜片打制而成可以为战士的头部提供良好的保护，但缺点就是头盔戴在头上后会非常妨碍战士的视线；胸前的

63

[1] Terpander, *Lyric Fragment*, quoted in Plutarch, *Lycurgus*, ch. 21.

护甲也是铜制的，后来也有皮革或亚麻质地的；一面圆形的木制盾牌，它的正面全部蒙着铜片；另外，还有铜制的腹部防护、护胫，可能还有铜制的护踝和护臂；一把花狗木（山茱萸）制成的用来刺杀的长矛，其中一端套着铁制的矛头；一把备用的铁剑，尺寸非常短小，对于斯巴达人来说更像是一把匕首。在斯巴达战士的统一装束中，还有两项是他们所特有的：长发和鲜红的披风（这件披风非常重要，伴随着他们出生入死）。实施有效的军事行动不能仅仅依靠人数，同时还需要战士之间紧密的协作、严厉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斯巴达战士通过长期的军事操练确保了他们具备这些素质，从而使他们可以有资格和能力去组建一支希腊世界里唯一的、也是真正的职业军队。

重甲步兵在作战中所需要的这种勇敢，在希腊语中被称为"*andreia*"，其字面的意思就是雄劲，即富于男子气概。而妇女们，即使是斯巴达的妇女，在战争中都是没有位置的，但我们将会看到斯巴达的女孩与希腊其他地区的女孩是不同的，因为她们在斯巴达可以接受正规的教育，并且还可以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本书第五章对此有详述），为的是把她们培养为斯巴达男人的好伴侣以及未来的斯巴达勇士们的合格母亲。培养一位真正的斯巴达男人其实从出生起就正式开始了，孩子生下来之后，不是由他的父亲而是由家族的男性长者们聚集在一起来决定这个婴儿的存留，斯巴达男孩就像希腊其他地区的男孩一样，7 岁之前也是在家里生活，但是到了 7 岁生日之后就必须离开家，永远地离开，开始去接受强制性的、集体性的系统训练，这种训练被称为"够格者"（agoge），即"提高性培养"。从 7 岁到 18 岁，这些男孩或少年被编成"组"和"群"，然后交给一些年轻的成年斯巴达人进行监管。社会鼓励他们冲破家庭的束缚并把斯巴达人中所有与自己的父亲同龄的人当成父亲。

64

这种替代性的父子关系其实是一种带有仪式化色彩的娈童关系，并且在斯巴达已经成了惯例，这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点。斯巴达人认为一个男孩到了 12 岁后，就得接受另一个年轻的成年战士作为他的情

人——用斯巴达人自己的话说，这些年龄稍长的战士被称为“鼓舞者”(inspirer)，而年少的男孩则被称为“倾听者”(hearer)。他们的关系中可能通常还会存在性的成分，但性绝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不是建立这种关系的主要目的。传说有一个斯巴达少年在一次常规的残酷的身体训练中犯了一个错误，他忍受不了疼痛，哭喊了起来，最后被要求退出“够格者”训练。这是对这个少年的惩罚，因为他没有能力在训练中表现得坚忍不拔，从而违反了斯巴达人的规定，即再大的疼痛也要保持沉默，同时这也是对这位少年的成年情人的惩罚，因为他没有教育好他所监管的孩子，这一事例可以充分说明这种教育方式的特点。“够格者”训练一直要持续到18岁，接下来就是接受挑选，看哪些人最早能够登上一个斯巴达人一生中的最高位置——首先是成为精英的王家卫队中的一员，然后再担任最高的军事职务，最后被选入长老会。这些被挑选出来的精英将组成一支秘密的行动队，即著名的克里普提；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去控制希洛人，同时通过行动来证明他有能力有资格去承担一名成年战士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这个选拔的过程是整个“够格者”训练的一部分，而这种选拔权大概是掌握在“监督者”(Paidonomos)手中，“监督者”的字面的意思是“管理男孩的人”，他的职务由监察官们(Ephors)进行委派。监察官委员会由每一年选举出来的五位监察官组成，它拥有最高的行政权力，其地位与两位国王并列甚至有时还超过国王。然而，这种职务的起源并不清楚。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这种职务应该是在公元前8世纪晚期由征服了美塞尼亚的斯巴达国王——铁欧彭波斯——创制的，但是“大瑞特拉”里却从来没有提及过这些监察官，因而就有一种令人吃惊的说法，即这个委员会只是在“大瑞特拉”被颁布之后才拥有了它在古典时期所具有的权力。到了色诺芬的时代，监察官和国王们每月都要举行例行的誓言交换仪式，后者要宣誓遵守和维护法律，而前者则要宣誓支持两位国王，但却是有条件的，即两位国王须在实际上遵守并维护了法律。这显然表明了监察官委

65

员会甚至可以阻止国王变得过于富有领袖魅力或拥有过度的权力。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当一位国王行使他世袭的君权在国外指挥斯巴达人或同盟的军队时，五位长官中的两位就会与他同行，他们的任务是向国内报告国王的指挥情况并在必要的时候启动合法的程序来反对国王。

一个斯巴达人在完成"够格者"训练之后，斯巴达就会用一种公餐食堂(*pheiditia*，*sussitia*)的制度来巩固军事化的生活方式，用餐的地方也被称作"公共帐篷"(*suskania*)。青年人到了大约20岁的时候，就有资格去接受这些公餐食堂的选拔，选拔的过程是充满竞争的：只要有一票表示反对就足以拒绝一个候选者。一些公餐食堂显然比其他的公餐食堂更具排外性，也更为人们所向往，其中首屈一指的当然要数王家食堂了。当两位国王都在斯巴达国内的时候，他们就会和挑选出来的副官们一起到食堂就餐。如果一个人在所有食堂选拔中都失败了的话，那他就相当于被排除在了整个斯巴达社会之外，他可能也会因此进不了军队。

一天当中的大型的集体用餐是在晚上举行。去公餐食堂的往返路上是不允许拿火把照明的，据说这是为了让斯巴达人养成在夜间进行隐秘行动的习惯(斯巴达的军队也确实精通此道)。参加日常公餐的出勤率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两个原因可以获得允许而不必参加公餐：举行宗教献祭或者是因为要去狩猎。在斯巴达，狩猎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男人去猎杀可怕的雄性野猪可被视为一种勇气的表现，除此之外它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实际效用，因为狩猎不仅可以提升与军事相关的技能，同时，那些平常都很节俭的公餐食堂在其定量配给之外，还可以因此得到各种各样的猎物作为补充。斯巴达人的公餐食堂并不像克里特岛人(Cretan)那样，由一个储备中心来进行食品的定量配给，而是由每个公餐食堂的成员个人向食堂提供食物。实际上，一个斯巴达人的公民身份也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维持这种公餐会员的资格，一旦他获准进入公餐食堂，就要按已规定好了的最小份额向食堂交纳农产品。(可参见本文的附录部分)

66

斯巴达人上交公餐食堂的农产品中主要是谷物、橄榄油和酒，这些农

产品几乎都是由希洛人在“份地”(*klaroi*)上种植的,“*klaroi*”指的是分配给每一个斯巴达公民的土地。事实上希洛人不仅是公餐食堂系统的基础,也是整个斯巴达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大厦的地基。大约是到了公元前 8 世纪中期或这个时间之后不久,就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希洛人生活在拉科尼亚,特别是在欧罗达河河谷的希洛平原一带。不然,就很难解释斯巴达人想要获得新的土地和奴隶的时候,为何不是先翻越高高的泰格特斯山脉到西边去寻找希洛人和“*klaroi*”了。人们也认为是吕库古最先决定对美塞尼亚和拉科尼亚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他将这些土地均分成 9000 份给全国的 9000 个斯巴达公民,但事实上对土地进行如此严格的重新分配,只是在公元前 7 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的时候,即在美塞尼亚的希洛人发动暴动之后,斯巴达的政治精英们才不得不这样去做的。在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期间,提尔泰奥斯创作了规劝战争的诗篇,而且相当鼓舞人心。到了公元前 650 年左右,随着美塞尼亚希洛人的暴动被完全镇压之后,斯巴达人发现他们的国力已经居于整个希腊的前列了,这个国家拥有了希腊世界最广袤的土地(大约 8000 平方公里),同时还有一支由奴隶组成的劳动大军正为他们耕耘着欧罗达河和帕米索斯河河谷上最肥沃的土地。

“希洛人”意思就是“俘虏”,希洛人相当于是被斯巴达人征服并加以剥削的战争俘虏。到了每年的秋季,新一届的监察官委员会在上任以前向所有斯巴达人发出公告,“刮掉胡须并服从法律”。他们紧接着还会向希洛人正式宣战。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后者置于军法管制的范围之内,从而使斯巴达人在认为有必要或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意地杀害希洛人,而不必在内心有任何罪恶感(这就像前文提及的“秘密行动队”定期所做的那样,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的)。然而,在希腊世界中,希洛人并不是唯一用于劳动的奴隶,其他还有被帖萨利人(Thessalian)变为奴隶的潘尼斯特人(Penestae),他们原来也是平等的希腊民族,后来才全体性地成了为某个自由的希腊统治阶层服务的奴隶。而希洛人是其中最有争议的一群

67

人，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也是希腊人，他们与自己的主人有同样的文化和语言，这与那些从海外贩运到希腊来的异邦人或“野蛮人”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希洛人不只一次地策划过起义，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奴隶绝不可能会做的，而且在公元前 370 年或前 369 年，希洛人最终通过起义得到了政治上和人身上的完全自由。

67

除了斯巴达人和希洛人之外，或者说是在这两群人之间还有第三群人，这些人生活在斯巴达领土的边境，被称为“边民”，即“居住在周围的人”或“外面的居民”，因为他们住在拉科尼亚及美塞尼亚的贫瘠山区或沿海地区，也就是希洛人的外围，这样他们就成为了斯巴达的早期预警系统以及御敌的第一道防线。据说大约有上百个边民社区，每一个都被名不副实地称为城邦(*polis*)，但实际上也就是八十来个小镇或村落而已，而且一个边民城邦只被给予了地方性的政治权力，至于决定斯巴达国内政治事务的权力，就说不上了。因此，边民在形式上拥有自由但又是斯巴达的臣服者，为了军事和经济的目的，他们首先就要放弃处理这两项事务的权力。

在公元前 370 年或前 369 年的那场大灾难到来之前，边民发动起义来对抗斯巴达的事件我们所知道的只发生过一次，那还是在所谓的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期间，这场主要由美塞尼亚的希洛人发动的起义，大约发生在公元前 464 年的大地震之后。另一方面，边民其实为斯巴达的重甲步兵提供了稳定的兵源，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也是不断增长的价值。开始的时候，他们是被组建成单独的小分队，担任斯巴达人的预备部队，但到了公元前 464 年，这些小分队就被斯巴达人收编进了重甲步兵部队中去了。于是，这些参加过战斗的边民们就像斯巴达人一样被称为“拉西代梦人”(Lacedaemonians)，因此，他们也还可以像斯巴达人那样将字母“Λ”(*lambda*，希腊字母表中第十一个字母，形状像英文字母“V”的倒写)铸在自己的盾牌上。

68

在古典时期，斯巴达的法律明文禁止斯巴达人从事任何手工业或商

业活动，这实际上包括了除了武器制造之外的所有经济生产活动。于是，边民担任了手工业者和买卖人来填补这些行业空白，这主要是得益于他们居住在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的沿岸地区的缘故（他们在拉科尼亚的城市基赛阿姆是斯巴达的主要港口和海军造船厂），同时从他们居住的位置还可进入马里阿半岛（Malea pehinshla）的波俄伊（Boeae），那里有几个希腊陆地上产量最为丰富的铁矿。可能正是斯巴达的边民或奴隶挖掘了大量的青紫色石灰岩，用于在斯巴达及周围地方的房屋建造或雕像制作之中。他们同样也生产陶工用的粘土并在陶器上描涂美丽的图纹，到了公元前 6 世纪的时候，这些陶器销售的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甚至还到了黑海。他们还制作非常受欢迎的青铜小雕像用于出口，在公元前 8 世纪的晚期的时候，他们开始制作马像，到公元前 6 世纪，制作的对象就成了重甲步兵和运动员，而且这些雕像的制作水准都非常高。毋庸置疑，这些能工巧匠同样也担任军械师和武器制造者，他们是斯巴达的军事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68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记述斯巴达的历史文献很容易将边民遗忘，尤其是他们在种族和政治上被视为是与斯巴达公民一样的人的时候，但本书将尽力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严重错误。

69

第二章　公元前500年的斯巴达

在上一章里，我们试着给出了从公元前480年到前360年间所发生的一些关键性的历史事件的场景或背景。这些场景或背景可以一言以蔽之——“吕库古的斯巴达”；大概是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的某个时候，斯巴达人“无中生有”地杜撰出了这一有着杰出才能的立法者——吕库古。事实上，任何一位真实的吕库古应该曾经保护或重塑过历史传统，同样也凭空捏造过一些东西，这也将是本节的内容将要传达的主要信息。现在，我们要把目光从伯罗奔尼撒南部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希腊世界中去。我们将对斯巴达与雅典的关系作更为广泛、深入的考察，特别是斯巴达的军事扩张和外交活动。大约到了公元前500年，斯巴达组建了一个多国军事联盟，我们称之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结盟的部分原因是它当时与雅典的敌对关系，大约是在公元前508年或前507年的时候，雅典摆脱了之前相当温和的、族长式的僭主政治或独裁统治，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制的自治政府。在这个时期里，希腊与波斯帝国也开始发生了接触，后者是由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创立的，从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开始对爱琴海的希腊世界构成威胁并妄图吞并整个希腊。

70　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的开篇记叙的是富庶的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的故事，这位国王想弄明白究竟哪一个国家才是希腊大陆上最强大的。他对希腊了解甚多，因为位于小亚细亚沿海的一些希腊

城邦其实是他的属国，而且他对希腊文化并不是完全敌意的，他更担忧的是居鲁士二世统治下的正在崛起的波斯帝国，后者大约从公元前 560 年开始到公元前 540 年代早期的时候，对克洛伊索斯的王国的独立造成了威胁。在确定了斯巴达和雅典是希腊当时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以及德尔斐的神谕在希腊世界又是最令人信服的事实之后，他遵照德尔斐的神谕对波斯帝国开始了军事行动，神谕说一旦他渡过了哈利斯河（Halys），他将摧毁整个帝国。但不幸的是，他在渡河之后摧毁的竟是他自己的帝国。居鲁士二世于是就接管了吕底亚的帝国统治，然后，他还派出大将军哈帕苏斯（Harpagus）去强迫或规劝位于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和平地加入他的帝国版图。

希腊人一向把波斯人和他们的近亲米底人（Medes）弄混淆，例如，悲剧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墓志铭记载了他在公元前 490 年的马拉松战役中获得的功绩，碑文称甚至连"长发的米底人"也知道他的那些了不起的事迹。实际上，米底人和波斯人是相当不同的，他们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习俗，而且，由居鲁士所建立的阿凯门尼德波斯帝国（the Achaemenid Persian）也完全改变了它们两者之间的传统的政治关系。现在，伊朗南部的波斯人成了指挥台上的指挥者，而北部的米底人只能演奏第二提琴了。公元前 612 年，米底在尼尼微击败了巴比伦人之后，也曾经一度成为了帝国。居鲁士的波斯从米底的帝国体系那里继承的一项遗产，如果用希腊语翻译的话，就是"satrap"，意为总督或帝国的管理者。波斯帝国共设置了二十来个总督管辖区，其中一个就是克洛伊索斯的吕底亚王国，首府设在萨迪斯（Sardis）。波斯帝国得到的另外的遗产是位于爱奥尼亚（Ionia）的希腊地区及以西的地方，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城市如以弗所（Ephesus）和米利都（Miletus）。这些还并非波斯人从米底人那里拿来的所有东西。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身负特别任务的最高长官可能是一位米底人，比如哈帕苏斯；在公元前 490 年的马拉松战役中，由居鲁士的继承人大流士所委任的米底人达提斯（Datis）接任了这个人的职位。 71

斯巴达人

赫卡泰奥斯(Hecataeus)是希罗多德在知识上的最直接的前辈，他就出生在爱奥尼亚的米利都，而希罗多德则来自南部的多利安人城市——哈利卡尔那索斯(Halicarnassus)。赫卡泰奥斯了解由米利都人泰勒斯在公元前 6 世纪早期创造的最新的科学思想。泰勒斯可能将他对宇宙的本质的研究称为"*historia*"，意为"询问/调查"(enquiry)；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赫卡泰奥斯也使用了这个词来指称自己的"询问/调查"工作，但他研究的并不是非人的宇宙而是人类世界。也有让他感到受挫的时候，"希腊人所讲述的传说"，他指责道，"有很多〔是自相矛盾的〕，而且荒谬可笑"。在某种程度上，希罗多德不可避免地，有时候是按部就班地效法了赫卡泰奥斯的做法，但他常常又不会直接拿出确定性的意见来，而是采取了一种明显更为宽容的态度：

> 我的任务是记录他们所说的故事，
> 但我并没有必要去相信它们。[1]

希罗多德最感兴趣的是记录下了关于东西方之间或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那场巨大的冲突，亦即公元前 5 世纪初的希波战争的爆发缘由的各种传说，它们大概也会让公元前 5 世纪的听众或读者们觉得很有意思。下面是希罗多德在《历史》的开篇中发表的对历史学家的职责的看法：

>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记载下来。[2]

---

〔1〕 Herodotus VII. 152.

〔2〕 Herodotus I, Preface.

希罗多德想要记载下“为何希腊人与异邦人之间会发生战争……”的原由，如同我们所见，他记叙的故事是从公元前550年左右开始的，这大概是在他出生的七十年之前发生的事。他应该不太可能听过那些真正经历过这场战争且又能记得那么清楚的人的讲述，但是那些亲历者的儿子特别是孙子应该有可能向他说过这些故事。当然，这些故事是用他们的方式讲的，其中不免掺杂着他们自己特有的倾向甚至曲解。但它们仍然在大体上是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文献资料，因此，希罗多德的《历史》这部著作的地位就特别重要了，它让我们不得不，确切地说是能够循着他的指引进入历史，让他告诉我们在公元前550年到前479年这段时间里，东部地中海、近东、中东这些地区在地理和政治上究竟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每件发生于公元前479年之后的事，都被他称为“米底人事件之后的事”，也就是波希战争之后的事，这些事都与他要论述的主题没有多大关系。他的这种做法影响了后人，他的伟大的继承者修昔底德是接续着公元前478年开始讲述历史的。 72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斯巴达人早就注意到了居鲁士试图把波斯帝国的势力推进到爱琴海沿岸来。据传说他们还曾派遣了一名使者去劝说居鲁士，希望他不要太过于目中无人地侵扰爱琴海东岸的希腊兄弟们。居鲁士冷漠地拒绝了这样的要求，他问道：“斯巴达人是谁？”两代人之后，他的继任者先是在温泉关尤其是在后来的普拉提亚的战场上明白了斯巴达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斯巴达人似乎比较了解波斯而且对它的崛起很在意，这和居鲁士对斯巴达的明显无知一样有趣。此时的斯巴达人还未像希罗多德经常描绘的那样与世隔绝或像鸵鸟式地对外界不闻不问，而这种印象也在后来成为了“斯巴达神话”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按照惯例，斯巴达人甚至会驱逐外邦人，无论是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一视同仁地都会被拒之门外，这和希腊其他城邦的人对待异邦人的态度很不一样。希腊其他城邦的人会在口头上对非希腊的“野蛮人”(barbarians)和希腊别国的“陌生人”(strangers，*xenoi*)作出区别。考古学上的发现恰好证实了这

样一个事实，即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的时候，斯巴达相对来说还是外向和开放的，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讲过，那时候的斯巴达人还邀请了来自曼安德的巴绪克勒在阿密克利设计并建造了一座阿波罗神殿，曼安德就位于小亚细亚。

73

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是作为一个希腊人的定居地区而为人所知的，其范围从西边的直布罗陀海峡向东最远到达了黑海。按照现代历史学家的简单说法，之所以这样划分说是因为殖民运动或者说是殖民时代的结果。举个例子，叙拉古是由柯林斯人在公元前738年发现的，或者说塔拉斯（Taras, Tarentum）是斯巴达人大约在公元前706年发现的，但它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殖民地，而是完全独立地从一块新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城市，这一点很重要，也是我们要记住的。斯巴达之所以只有塔拉斯这一块殖民地，原因之一就是斯巴达在当时仍然有能力解决土地短缺的问题，而这正是整个希腊殖民运动背后的潜在原因，斯巴达在将国土面积扩展到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之后，土地短缺问题已经得到了缓解。确实，就某种意义而言拉西代梦的斯巴达城邦并非仅仅是一个征服国，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殖民国。然而，一个半世纪或者说在塔拉斯建立之后，土地的短缺或者我们宁愿说是重新燃烧起来的帝国野心再一次开始折磨着斯巴达人。

经历了第一次向南、向西的扩张之后，在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的晚期，斯巴达决定向北扩张他们的领土，这意味着他们将侵入位于伯罗奔尼撒中部的内陆地区阿卡狄亚（Arcadia）。阿卡狄亚现在给我们的印象仿佛就是快乐、祥和的田园风景，但古代阿卡狄亚的真实景象却是一个道路崎岖、贫穷落后的高原。由于地处偏远，当地方言才得以保存下来，这种方言与一种在迈锡尼青铜时代晚期占主导地位的方言——“Linear B tablets”[1]非常接近。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贫穷而又饥饿的阿卡

[1] 指古希腊的B类线形文字，是希腊古体方言的一种，该方言写在线性文字文本上。——译注

狄亚人就被迫到国外充当雇佣兵，成了海外雇佣兵的稳定兵源。斯巴达人无疑会为他们入侵阿卡狄亚制造出一个神圣的理由，他们编纂了一条德尔斐神谕，以此来预先避免人们可能会指责他们发动了赤裸裸的侵略。然而，阿波罗的支持要转变为成功得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到了最后，斯巴达人不得不像当初征服美塞尼亚那样，反反复复折腾了多次才获得成功。

我们可以从希罗多德的记叙中得知在这个时期里斯巴达人真是臭名远扬。他们带着测量土地的工具向阿卡狄亚出发了，他们以为很快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土地，并且还带上了链条和枷锁，打算用它们来拴阿卡狄亚的新希洛人去为他们耕作，但是，斯巴达人这次吃了败仗并且成了囚犯，戴上了他们自己带去的枷锁。这场战役因此也就被称为"枷锁之战"，一个世纪之后，希罗多德在铁该亚(Tegea)的阿列亚·雅典娜神殿中看到了这些据说是斯巴达人戴过的枷锁；600年之后，正是在这个传说的感召之下，严谨的希腊旅行家帕萨尼亚斯据说也见到了这些枷锁和链条。斯巴达人认识到，既然武力不能达到目的，那么就只好采取和平的宣传和外交策略了。 74

首先，斯巴达人声称他们从铁该亚找回了"俄瑞斯忒斯"(Orestes)的遗骨。俄瑞斯忒斯根据母亲的血统是一个斯巴达人，他是阿伽门农和斯巴达的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儿子，也就是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侄子。斯巴达人声称他们发现的一些骨头是俄瑞斯忒斯的，为的是证明他们对铁该亚拥有"世袭的"统治权(就严肃的科学观点来看，那些被挖出的大得异乎寻常的骨头更像是史前恐龙的)。这些遗骨被斯巴达人带回了斯巴达后进行安葬，并还为此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大约是与此同时，俄瑞斯忒斯的儿子提萨美诺斯(Tisamenus)的遗骨据说也被从伯罗奔尼撒南部的亚加亚带回了斯巴达。斯巴达人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其实是想强调他们拥有统治整个伯罗奔尼撒的世袭权。换句话说，他们声称从铁该亚重新发现俄瑞斯忒斯的遗骨，和在亚加亚重新找到提萨美诺斯的遗骨并加以安葬，都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其实都是为他们正在进行的外交行动进

行宣传和造势,斯巴达真正的目的是想要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上担任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支配者。

通过建立一个现代学者所称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斯巴达在事实上实现了这个目标。实际上,如同伏尔泰的"神圣罗马帝国"(其实既不神圣也不是罗马人,亦非帝国),伯罗奔尼撒同盟并不是完全由伯罗奔尼撒人组成的,它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同盟。这个同盟并未囊括伯罗奔尼撒的所有城邦,阿尔戈斯是最明确拒绝参加的一个城邦。此外,它还包括一些在地理位置上并不处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国家,如麦加拉(Megara)、埃吉纳(Aegina),最后还有由底比斯统领的彼奥提亚人(Boeotians)。因此,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同盟,因为斯巴达的盟国之间并不互相都是同盟国(尽管有些是的),所有的同盟国都是单独与斯巴达结盟的。再者,他们与斯巴达的盟友关系都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在它们结盟的誓言里,它们都是以一些神的名义(例如奥林匹亚之神宙斯)起誓与斯巴达订立攻守同盟。誓约的内容包括当希洛人发生叛乱的时候,它们无论如何都要去帮助斯巴达人,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服从斯巴达人的领导,但斯巴达人并不受此类义务的束缚。

后面两种情况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但斯巴达不与它的盟友订立攻守同盟的原因却不是立马就能看出来的。事实上,解释起来就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斯巴达人不想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接受一项在他们看来只会对一个盟友有利而对自己没有好处的政策。但是这些盟国得到了一项集体性的权力,即当他们去执行斯巴达人想要实施的政策或行动之前,斯巴达人须先咨询他们的意见,我们将来还会再说说这种情况。同样,还有一条免责的条款,如果某个城邦认为受到了更为优先的宗教义务的约束的话,它可以提出相应的理由来请求免责,从而不必执行联盟作为整体制定的政策或实施的行动。这样,斯巴达和盟国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得到了平衡,另一方面,它们相互之间的权限也就清楚了。因此,从技术上讲,伯罗奔尼撒同盟——用古代的说法是"斯

巴达人和他们的同盟”或“伯罗奔尼撒人”——是一种不平等的霸权，斯巴达是霸主(*hêgemôn*)或领导者，而其他盟国只是附属国(summachoi)，他们在霸主的命令下共同去参与进攻和防守，为的却是保护霸主的利益。 76

斯巴达与铁该亚的联盟有可能是在“遗骨”事件发生的那段时间里缔结的，这是整个联盟最终得以形成的前奏。也有可能斯巴达是最先与埃利斯(Elis)缔结了同盟，因为埃利斯控制了奥林匹克，埃利斯对于斯巴达来说，其地位仅次于德尔斐，因为它拥有泛希腊地区的另一个伟大的神殿。“希腊人”作为一种身份，尤其是联系到公元前480年到前479年间发生的事情，正如我们之后将会看到的，它在希腊城邦与城邦之间的关系中从来都不是一种强有力的、更不用说是决定性的认同性因素了；在更多情况下，希腊城邦之间往往更易于相互争斗而不是和平共处，但是，属于整个希腊的那些伟大的神殿为希腊人在文化上实现大体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至少在四年一届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交战双方就会停战，之所以如此设计是为了迫使或力促整个希腊地区变得更加友好而不是仇恨。由埃利斯派遣的官员组成了委员会来监督赛事的管理工作，这些有着重大影响力的官员们被称为“Hellanodikai”，差不多就是“希腊的法官”的意思，出于利益的考虑，希腊的所有城邦都会尽量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一个城邦的公民在比赛中取得的胜利就是他所属的整个城邦的胜利，比如说，当一个斯巴达公民取得了胜利，斯巴达就可以借此增强它在其他领域中的政治声望和影响。换句话说，在奥林匹克的赛会上获得的胜利在外交上同样也是有价值的，而斯巴达人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为了政治目的而千方百计地利用他们的宗教虔诚，因此，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使尽了所有的手段与埃利斯建立了一种永久性的并具有约束性的外交关系。

伯罗奔尼撒同盟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开始初具规模，但是又过了半个世纪，这个联盟才在制度上得以稳固。斯巴达大约在公元前525年的时候，作过一次有趣的尝试，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后续的行动了。在

公元前 480 年之前，这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斯巴达人跑到遥远的爱琴海东边，向亚洲大陆进行了一场海上远征。这是一次与柯林斯人的联合远征，目的是要推翻萨摩司（Samos）的僭主波律克拉铁斯（Polycrates）77 并且帮助一些萨摩司的流亡者恢复原职。要说服不谙航海的斯巴达人远离国土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去进行远征，一定得花大力气才行，而斯巴达最后同意了此次远征，这其中如果不是有一些特别的原因的话，那么就可能与这次远征的提议者有关，或者是上述两方面的综合因素促成了这次唯一的远征，从而使得它不同寻常。

首先，就说说原因吧。在当时，斯巴达人很希望得到一个推翻各种专制政权的声望，也就是推翻那些不合法的、僭越或违反宪法的独裁统治。事实上，斯巴达人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完全始终如一的，或者最重要的是它想要得到的声望有点名不副实，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对具体事例进行具体分析了。在斯巴达准备干涉萨摩司的波律克拉铁斯的统治这件事情当中，既有推动也有拉动的原因。无论出于哪种原因，一些斯巴达人在这之前已经与另一些萨摩司人建立了某种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通过他们相互之间的互访得以巩固和发扬。有例为证，大约在公元前 550 年，一位叫埃乌纳斯特（Eumnastus）的斯巴达居民在一个未知的场合献给萨摩司的赫拉一尊青铜容器，这个礼物上绘着一头令人印象深刻的狮子，同时还刻了进献者的名字。毋庸置疑，一些被波律克拉铁斯驱走的流亡者同时也是亲斯巴达的人（Spartanophiles）。希罗多德的记载相当幽默：斯巴达人面对这些流亡者发表的长篇大论时非常冷静，但却被他们陈述的理由所说服，然而遗憾的是希罗多德并没有说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理由说服了斯巴达人。

斯巴达人作出这个决定的一个因素无疑是由于柯林斯人极力主战。可以肯定的是柯林斯人在公元前 525 年就已经成为了斯巴达的盟友，实际上可能与铁该亚、埃利斯这两个城邦与斯巴达结盟的时间几乎一样早，虽然希罗多德并未明确说明这一点。斯巴达与柯林斯的结盟更多地是出

于地缘政治的考量而非感性的原因，尽管这两个城邦同为多利安民族（与铁该亚、埃利斯不同）。柯林斯人控制了进出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陆上通道，任何人出入伯罗奔尼撒半岛都需要取道柯林斯地峡，而且柯林斯人的港口遍布地峡，这意味着他们的船队向东可进入萨罗尼克湾（Saronic），向西可进入柯林斯湾。一贯对斯巴达持敌对态度的阿尔戈斯正好位于柯林斯的东南方向，因此，对于斯巴达人来说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把柯林斯拉到自己这边来。当然，这种关系对双方都有利，柯林斯人也需要利用斯巴达人来对阿尔戈斯人形成制衡，或是支持他们实现自己在伯罗奔尼撒的内部和外部想要达到的政治目标。正是因为它处于如此重要的战略位置，才使它能够而且不只一次地在一些问题甚至是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如向第三方宣战或是指挥一场已经商定好了的战争等问题上，公然违逆斯巴达的意志。当柯林斯人在公元前525年极力主张向波律克拉铁斯开战的时候，他们这种强有力的姿态本身就足以让斯巴达人加以认真考虑了。

78

波律克拉铁斯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其实并不是萨摩司岛上第一个独揽权力的僭主，但他在这个方面无疑是最有效力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希罗多德掌握了许多关于萨摩司的第一手资料，因为他曾在波律克拉铁斯统治萨摩司的时候在这个岛上居住过，岛上的三大"奇迹"工程正是在波律克拉铁斯的统治期间建造的：一条一公里长的穿山隧道，可以为萨摩司的城镇供应稳定和必要的水源；一座大型的防波堤，可用来保护萨摩司的港口；还有一座为城邦的庇护女神赫拉修建的宏伟的神殿。希罗多德还有趣地将波律克拉铁斯称为"在所谓凡人的一代"中第一位控制了大海的统治者，或建立了第一个海上帝国。据说，克里特的米诺斯王也曾是海上霸王，但那是在波律克拉铁斯之前很早的事了，而且米诺斯王取得制海权是在黑暗遥远的神话和传说时代，并不在可查实的、有记载的人类历史当中。一方面，波律克拉铁斯在海上的野心和实力促使他去干涉位于萨摩司西边的库古拉戴斯（Cyclades）的国内事务，他在那里扶植了吕戈达米斯担任傀儡僭主；另一方面，在东边，他跑去向东方的新强权——波斯帝

国叫板，当时的波斯以萨迪斯为基地设置了它在吕底亚的地方总督。波律克拉铁斯显然想与波斯人建立某种分管协议，在一些现代学者看来，斯巴达之所以决意要推翻他，其背后动机其实是反对波斯帝国。

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这大概不是第一次表明了斯巴达人是反对波斯人的，但这却是第一次有证据表明他们有意愿与敌人在远离自己的国土，或附近的区域进行面对面的直接交战。遗憾的是这只是一种没有真凭实据的猜测，因此我们现在只能暂时把这个问题搁置在一旁，回到前边论述的事情上来，特别是转到斯巴达和阿尔戈斯之间的关系上来。这两个城邦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它们之间的冲突对抗大概早在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就开始了。反正我们可以在提尔泰奥斯尚流传后世的诗歌中找到它们发生直接冲突的确凿证据，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670年。如果传统记载的关于叙喜阿伊之役的时间准确的话，那么这两个国家还曾在公元前669年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当时的阿尔戈斯可能是处在强有力的国王——菲顿(Pheidon)[1]的领导下，令人信服地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叙喜阿伊所处的位置是在杜列亚(Thyreatis)的边境地带，位于斯巴达的东北部，不言而喻，斯巴达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这次战败在很多方面给斯巴达造成了非常深远而持久的伤害，成为了这两个城邦之间长期无法了结的宿怨。在与铁该亚实现了必要的和解之后，斯巴达人显然找到了一条通往伯罗奔尼撒东北部的更好的行军路线，从而使他们觉得有能力去与阿尔戈斯人作一次彻底的了断了。这一事件大概发生在公元前545年的时候，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与此同时波斯征服了吕底亚，萨迪斯也遭沦陷。斯巴达与阿尔戈斯之间的这场冲突所进行的方式，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相当奇特的。

斯巴达人与阿尔戈斯人并未一开始就召集他们所有的重甲步兵投入

[1] 据说，菲顿首先在伯罗奔尼撒人中引入了度量衡，第一个铸造了银币；他还把阿尔哥斯诸邦联合了起来，并且是最先在战争中使用重甲步兵进行作战的人。——译注

阵地战当中，而是同意各自选出300名出类拔萃的勇士进行决斗，这真是一场英雄之间的勇气较量。在经历了一场或一系列的惊天动地的厮杀搏斗之后，出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结果，战场上最后只剩下了三名还活着的战士：两名阿尔戈斯人和一名斯巴达人。这两名阿尔戈斯人，可能是天生的平等主义者和民主派，他们先是依据最后人数上的优势判断自己是获胜的一方，然后就赶回国内去报告战果，阿尔戈斯人闻讯后就开始庆祝这次胜利。然而，那个活下来的斯巴达人既不是民主派也不是平等主义者，他拒绝认输，相反，他认定胜利是属于斯巴达的，因为到了最后只有他一个人还留在了战场上，做一个真正的重甲步兵应该做的事情，"坚守岗位"，而且他还以斯巴达的名义用战利品堆立起一座"胜利纪念碑"。阿尔戈斯人大为光火，他们当然不会接受斯巴达人的这种说法，于是就倾城出动，派出了所有的重甲步兵去攻击斯巴达的军队，而结果却是斯巴达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同时，作为这场战争的直接成果，斯巴达人不但控制了杜列亚，而且还在后来将它并入到了斯巴达的领土拉西代梦之内。 80

斯巴达人用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独特的宗教仪式来庆祝他们所取得的胜利和新得的领土，他们规定每年都要在当时作战的地方举行帕帕罗尼亚节(Parparonia)，参加庆典的人都要头戴"杜列亚"冠，并还为此制作了各种各样的小铜像，其中有一些到现在还保存得很完好，斯巴达人把这些小铜像敬献给各种神明，感谢他们给斯巴达带来了辉煌的胜利并在关键时刻赐予了斯巴达人战斗的力量。希罗多德补充说，在获得这场胜利之后，斯巴达人养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习俗，那就是成年的战士开始骄傲地留起了长发，而且还是惊人的长，但事实上这一习俗是不太可能与任何某一个特别的历史事件联系到一起的，无论这一事件有多么重大。另一方面，这场失败给阿尔戈斯人带来的伤害的程度，绝不亚于公元前669年他们在叙喜阿伊给斯巴达人带去的。到了公元前420年，正值雅典战争中那段短暂的平静时期，阿尔戈斯人要求与斯巴达人再战一场，更确切地说是要再来一场300名战士之战……奇怪的是，斯巴达人拒绝了

这个要求。

到了公元前525年，斯巴达人大概已经摆放好了大部分"拼图"的位置，伯罗奔尼撒同盟在那个时候终于得以正式成形了。斯巴达与雅典的关系构成了这个联盟最终得以出现的背景。让我们简短地回顾一下到那时代为止的雅典吧。与希腊许多城市一样，雅典在其历史早期也是处于贵族的统治之下，这些人自称为"善人"(Eupatridae，即贵族、长老)。他们垄断了雅典的政治和宗教大权，直至公元前6世纪由梭伦(Solon)发起的改革才改变了这种局面。梭伦(与斯巴达人奇隆一样)是希腊早期的七贤之一。然而，即使是这些改革也不足以避免僭主统治的出现，在柯林斯和西库翁(Sicyon)出现了希腊最早的僭主统治的一个世纪之后，僭主制最终还是降临到了雅典。在之前发动了两次政变并获得了部分成功之后，贵族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终于在公元前545年左右的时候建立了稳固的专制政体，从而使他可以在公元前528年或是前527年去世的时候把权力移交到儿子希庇亚斯(Hippias)手中。因此，在公元前525年的时候，当斯巴达和柯林斯试图去终结僭主波律克拉铁斯在萨摩司的统治的时候，雅典还处在希庇亚斯的牢牢统治之下。实际上，在公元前525年或是前524年的时候，希庇亚斯已经通过哄骗或胁迫的方式让其他的雅典贵族成员去担任高官，如阿尔克美欧尼达伊家族(Alcmeondids)的克莱斯铁涅斯(Cleisthenes)，他在公元前525年或前524年的时候担任了雅典的执政官。

81

然而，到了公元前514年，一些贵族的耐性已经慢慢耗尽，于是他们策划了一次刺杀希庇亚斯的行动。这次行动在实施过程中显然出了差错，希庇亚斯之兄希帕尔科斯被刺杀了，幸免的希庇亚斯开始变得更加残酷，他的统治就已经很像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僭主统治"了。克莱斯铁涅斯对从雅典内部发动革命的方式感到绝望，于是，他与他的一些追随者们开始选择流亡。在公元前513年的时候，他试图从外部向雅典发动突袭以图实现政变，亦告失败。他因此将注意力转向了"地球的肚脐"——

德尔斐，为了讨好阿波罗并让他倾向于自己，他就花巨资翻修了阿波罗神殿中的主殿。因此，当斯巴达人按照惯例去德尔斐请求神谕的时候，不论他们询问的是什么，得到的回答都是"去，将雅典人从希庇亚斯的僭政中解放出来"。这个回答让斯巴达人感到有些为难，因为他们——或者至少是斯巴达的领导者，也就是那些真正管事的人——与希庇亚斯及其家族迄今都保持着良好的、实际上是友好的关系。例如，在公元前519年，斯巴达人曾经建议彼奥提亚的小城普拉提亚与希庇亚斯的雅典结盟，而不是加入由底比斯统治的泛彼奥提亚同盟。这一事件也为多年后底比斯与雅典之间的敌对关系埋下了伏笔。

虔诚的斯巴达人在经过一番仔细的考量之后终于说服了自己，派出了一支远征军于公元前512年或前511年去推翻希庇亚斯。相当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这次是从海路而不是从陆路出发的，同时，指挥军队的也不是两位国王（克列欧美涅斯和戴玛拉托斯）中的任何一位，而是一个名叫安启莫里欧司(Anchimolius)的人，此人无疑也是来自斯巴达的一个显要家族，但其他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毫不令人惊讶，这第一支远征军遭遇了惨败，这样，在公元前510年由国王克列欧美涅斯指挥的斯巴达军队从陆地上侵入雅典就显得很有必要了。斯巴达这一次取得了完胜，希庇亚斯和他的儿子们被关进监狱随后被流放，这样，流亡的克莱斯铁涅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就可以返回雅典并恢复政治活动了。然而，那些在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家族实行僭主统治之前曾经被认为是正常的政治主张和政策，现在已经不再那么有效了，它们现在已经无法再满足雅典各阶层的权力要求了，雅典的中层市民认为他们应该分享到更多的权力，而普通的贫苦市民则认为他们至少应该拥有发言的机会，而市民中的大多数却还继续保持着沉默。于是，足智多谋的克莱斯铁涅斯就开始向这部分人进行游说，并在公元前508年或前507年的时候以自己的名义实施了一揽子的改革。现在回顾起来，这套改革制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原始的民主制，它是希腊，实际上也是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民政权"(people-power)。

82

克列欧美涅斯

（执政期间：公元前520年至前490年）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写于公元前4世纪30年代至20年代）一书中颇为不屑地评价斯巴达国王只是一种世袭的将军，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因为他们在国内的时候没有什么权力，而且还要低三下四地去讨好监察官们。在斯巴达历史上曾有两位国王最为积极地挑战过这种来自外界的评价，克列欧美涅斯一世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与他共同执政的另一位国王是阿吉西劳斯二世（Agesilaus II，执政时间从公元前400年至前360年）。事实上，在斯巴达这样一个成功而且富于侵略性的军事社会里，生来就被授予了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国王可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希罗多德关于斯巴达王位的重大意义有自己的看法，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听从他的这种看法好了。他在他的著作的某一个段落中还专门岔开原来的话题来说明斯巴达国王在国内和国外的权力，他这样做（当然也有目的）是要证明斯巴达在与其他普通的希腊城邦进行比较时是多么的奇特与不同，多么的"另类"。同样，他的记述也揭示了一个精明而能干的斯巴达国王在实际上究竟能够行使多大的权力。

83

然而，在克列欧美涅斯一世这个案例中却有一个悖谬之处，因为希罗多德的观点是否有效看上去取决于那些贬损克列欧美涅斯一世的历史记叙。这位国王执政的"时间并不长"，曾经受到过长老会的审问，他还不得不通过行贿德尔斐来废黜另一位国王，他也曾经试图带领斯巴达坚决地反抗波斯但却失败了，而且到后来他竟然完全疯了，落得个可悲的下场——罪有应得！希罗多德将这视为神明对克列欧美涅斯在德尔斐的渎神行为所作的惩罚。然而，幸运的是，尽管希罗多德对克列欧美涅斯有着露骨的偏见，这种偏见混合了希罗多德自己虔诚的宗教信仰，但同时也揭

露了克列欧美涅斯的敌人在其死后精心谋划的诋毁，而且希罗多德自己还为此提供了相当多的证据来证明这种诋毁是确凿无疑的，因此，看来我们有必要重写一个新的历史脚本。

克列欧美涅斯复杂的一生在他还未出生之时即初露端倪，他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Anaxandridas）的第一个儿子，但他的母亲却不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第一个妻子——实际上在当时是他唯一的妻子。这第一个妻子长期不孕，鉴于古代医学水平的落后和男权社会的性别偏见，不孕的原因理所当然地都被归咎于妻子而非丈夫。然而，这个丈夫——阿那克桑德里戴斯深爱自己的妻子，无论如何也想要把她留在自己的身边，后来直至长老会发出正式的命令，他才不得不另娶一个妻子。这第二个妻子来自贤者奇隆家族，她大概是在公元前560年的时候生下了后来的克列欧美涅斯一世。然而，阿那克桑德里戴斯并没有因此抛弃他的第一个妻子，实际上他因为拒绝与她离婚而犯下了重婚罪，按照希罗多德的记述，这"完全不是斯巴达人的做法"。就这样，阿那克桑德里戴斯没有抛弃自己的结发妻子，实际上，这个妻子还接连为他生下了三个儿子，从而在后来引发了斯巴达人关于王位继承的争端，这是获得文献证实的第一次王位争端，但也很可能并非第一次。 84

阿那克桑德里戴斯大约于公元前520年去世，他去世后阿基亚德家族的王位继承人之争就在克列欧美涅斯和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多里欧斯（Dorieus）之间展开。希罗多德可能是受他所掌握的文献资料的影响，认为多里欧斯具有为王的潜质（*andragathiê*）。他在参加"够格者"训练期间以及作为一名年轻的成年战士的时候都表现得勇敢并富有男子气概，公元前525年大概是在反对萨摩司的波律克拉铁斯的战役中他证明了自己的才能。在斯巴达，唯有王储才能免除参加"够格者"训练的义务，其他的孩子都要参加这种强制性的训练，这是他们拥有公民身份的一个必要条件。准予王储不必参与训练，部分原因是基于实际的考虑，为的是防止出现一种情况，即某个王储可能无法满足"够格者"训练对个人的身体和

心理上的严格要求，但这种政策主要还是出于一个象征性的原因，即要强调斯巴达的国王作为宙斯的半人半神之子——赫拉克勒斯的后代是如何的卓尔不凡（因此不需要参加训练）。多里欧斯并非法定的王位继承人，所以不能被免除参加"够格者"训练，而他似乎正是抓住了这个机会来表现自己的优秀。

关于年轻的多里欧斯的有趣的事儿当然不止这些。还有他那个独特的名字，多里欧斯就是"多利安人"（Dorian）的意思，"多利安人"是一个显赫的称号。显然，所有的斯巴达人都是多利安人，所以为何身为其中的一个人还要取这个名字呢？有一种解释认为，取这个名字的过程本身是有计划的。在神话的意义上，拥有统治权的王室和斯巴达的其他贵族都声称自己是荷马所说的"亚加亚人"（Achaeans）的后裔，尤其是王室都会声称自己是墨涅拉俄斯的后代。我们前面说过，大约在公元前550年，斯巴达人曾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们在铁该亚发现了"亚加亚人"俄瑞斯忒斯的遗骨，与此同时又在伯罗奔尼撒的亚加亚地区发现了其子提萨美诺斯的遗骨。这些举措似乎可被视为是一种"亚加亚人"的策略，而取名为"多里欧斯"也许可被视为一种与之针锋相对的反诘，多里欧斯的母亲这样做可能目的在于要强调多里欧斯不属于某个狂妄自大的、排外的贵族阶层，而是一个普通的平民。

85 无论如何，对于已故父王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留下的王位，多里欧斯始终还是构成了一种挑战。面对这种挑战，克列欧美涅斯的回应是：他是先王的长子而且是在先王登基之后出生的，好像这可以使他的出生显得更加合法似的。不出意料，斯巴达人按照传统的惯例拥立克列欧美涅斯为王，然而他们当时不可能会想到这样做会给自己以及斯巴达带来多大的麻烦。多里欧斯发现一山难容二虎，于是一抓住机会就马上离开了祖国，试图去北非或西西里开拓一个成功的殖民地来建立自己的名誉——这是继塔拉斯之后，斯巴达第二次向海外扩张。

如果希罗多德的手抄本所提及的年代可信的话，克列欧美涅斯再一

次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是在公元前519年，克列欧美涅斯当时充当了雅典和底比斯之间的争端的调停者。这次争端是因为普拉提亚的归属问题引起的，底比斯声称无论是从地理还是从民族上来看，这个地方都应属于彼奥提亚，底比斯在当时以及之后一段时间里都是彼奥提亚人中力量最强大的城邦。克列欧美涅斯担心底比斯的力量过于强大，而且斯巴达与雅典的关系当时还不错，此时的雅典正处于僭主希庇亚斯的统治之下，这个人是僭政的建立者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克列欧美涅斯于是想了一个一石二鸟之计，他建议普拉提亚与雅典人结盟，继续坚持不加入彼奥提亚人的政治圈子，这样他既讨好了雅典人，同时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底比斯人的仇恨转移到了雅典人身上。

大约是在两年之后，萨摩司人（Samian）的问题又重回斯巴达人的议程，萨摩司人的领导人迈安多里欧斯（Maeandrius）亲自来到斯巴达，恳求斯巴达援助他赶走国内投靠波斯的傀儡僭主。然而，即使是行贿也没有说服克列欧美涅斯，这位国王还要求迈安多里欧斯马上离开斯巴达甚至是“伯罗奔尼撒”，这清楚地表明斯巴达当时已经成为了伯罗奔尼撒联盟的首领。克列欧美涅斯自己也表现得像一个泛希腊地区的政治舞台上的大人物，但是麻烦已经来到了他面前，而且正是这些麻烦在后来迫使他退位，也有可能最后还导致了他的精神错乱。 86

希罗多德在《历史》第六卷中论及斯巴达的法规和习俗的地方附带地议论了斯巴达的王权，尽管重复较多，但引人注意，他指出来自两个王族的国王之间的仇视是斯巴达人的传统政治生活结构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可以援引阿吉西劳斯二世和阿吉西波里斯一世（Agesipolis I）之间的关系作为反证。然而，毫无疑问，克列欧美涅斯和另一位国王戴玛拉托斯（于公元前511年至前491年间执政）之间的争吵就像成了惯例似的，他们彼此仇恨，水火难容。他们之间的矛盾大约是在公元前506年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点，作为克列欧美涅斯控制雅典的努力的一部分，他在雅典扶植了一个傀儡政府并彻底地推翻了新

生的民主制度。此后，两位国王开始互相敌对，都在寻找各种理由来挑起事端。

戴玛拉托斯是早产儿，一生都未从争议中解脱出来，关于王位的继承问题，他可能在公元前 515 年的时候也遇到了类似于克列欧美涅斯在之前曾遇到过的反对。我们现在已经不清楚戴玛拉托斯在原则和政策上究竟有多少反对克列欧美涅斯，也不清楚在个人和家族上，他与克列欧美涅斯的敌对关系又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无论如何，戴玛拉托斯的反对在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有效的。主要是因为戴玛拉托斯的阻扰，克列欧美涅斯不仅在公元前 506 年发起的针对雅典的远征遭遇了彻底的失败，而且，他随后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努力也宣告失败。得益于在权力上迅速的复原能力和适应能力，他在公元前 499 年重新获取了最高的权力地位，当时，另一位来自东部希腊的米利都的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跑到克列欧美涅斯的门前来请求援助以抵抗波斯。克列欧美涅斯再一次断然拒绝了这个求援者，据说克列欧美涅斯的女儿——机智的戈尔歌，当时只有八九岁，在一旁一眼就看穿了阿里斯塔哥拉斯所陈述的各种理由中的缺陷。

公元前 494 年，在阿尔戈斯地区的赛披亚（Sepeia），克列欧美涅斯对阿尔戈斯实施了致命的一击，歼灭了至少 6000 名阿尔戈斯战士。阿尔戈斯在对待波斯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种中立的立场，这促使我们推断克列欧美涅斯之所以如此对待阿尔戈斯可能与他的波斯政策有关。但是，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前 491 年和前 490 年以前，克列欧美涅斯的态度还未发生巨变。在那之前，克列欧美涅斯的所作所为也被希罗多德难得亲切地称为“全希腊的好人”，那时，他坚定而刚毅地反对波斯。事实上，克列欧美涅斯并未全力推行他的反波斯政策。

87

据说克列欧美涅斯曾经行贿德尔斐，他警告斯巴达人——阿卡狄亚将与斯巴达开战。他还到斯巴达的盟友埃吉纳那里捕捉人质，因为埃吉纳曾经给了波斯人所要求的水和土这些象征屈服的物品。当戴玛拉托斯

表现出要支持埃吉纳来反对他的迹象的时候，他立即废黜了戴玛拉托斯，并且用戴玛拉托斯的一个远方亲戚同时也是私敌取代了戴玛拉托斯，他知道这个人在将来可以成为对自己唯命是从的支持者。传说他后来还疯了。他的随从从他身边路过时会被他戳脸。他变成了斯巴达的累赘，于是被关了起来，看守他的显然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希洛人。克列欧美涅斯此时似乎并没有丧失说服人的能力，他让这个希洛人把一把匕首交给了他，然后用这把小刀从脚往上一片一片地切割自己的身体，自杀了！这个情节大概是说故事的人告诉希罗多德的。

“盖棺定论”(Look to the end)，意味着绝对不要在没有看到一个人如何死去的时候就冒然判断他的一生是否成功，希罗多德欣然采纳了这则希腊箴言。克列欧美涅斯的结局的确令人尴尬而且死状可怖，希罗多德了解不下于四种关于他的死因的解释。希罗多德本人赞成的是希腊人中最为普遍的说法，即阿波罗用这种方式惩罚了克列欧美涅斯，因为他曾在德尔斐向传神谕的女祭司行贿。然而，雅典人和阿尔戈斯人对于这种上天报应的具体情况各有各的说法，但都与克列欧美涅斯曾入侵他们的领土并犯下过渎神的罪行有关。希罗多德给出的四种解释中最有意思的要数斯巴达人自己赞成的那一种了。

根据这种说法，克列欧美涅斯之所以会在最后那样死去是因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发狂的酒鬼，他从一些斯奇提亚(Scythian)使者那里学会了饮用不加水的烈酒，但这种说法中又有多少可信性呢？克列欧美涅斯与斯奇提亚使者相遇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512年，而那恶魔般的酒精大约是过了20年之后才发挥作用的。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那么我们仅可得知克列欧美涅斯与一些野蛮人以及来自黑海北岸的斯奇提亚人会过面，在希罗多德这样经验丰富的旅行者看来，这些人是所有野蛮人中最野蛮和最凶残的。但是，斯奇提亚人又是如何找到去斯巴达的路线的呢？这还真是有点神秘，但有必要说明一下，在一个世纪之后，一个斯巴达人被称呼为“斯奇提亚人”，这可能暗示了在某一个历史点上，这两群人之间

88

曾经产生过某种联系。

酒对于希腊人来说具有深厚的象征和文化意义，并且它几乎从来就不是不掺水的。现代希腊文中表示酒的词语——“*Krasi*”来源于古代希腊单词——“*Krasis*”，意为混合，古代的酒通常是要掺水后才饮用的，有时 1 份酒差不多要加 20 倍那么多的水，混合后的酒就盛在一个混合钵(*kratêr*)中供人饮用。希腊的其他地方有一种正式的饮酒聚会被称为“会饮”(*symposia*)，宾客当中会有一个人被选为当晚的“国王”，他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决定供客人饮用的酒的浓度以及酒钵的数量。酒钵越多，掺的水越少，这聚会就越让人高兴。

然而，众所周知，斯巴达人向来是严格克制饮酒的。他们从不像其他希腊人那样举行私人性的会饮，他们可以在公餐食堂的晚餐中喝一些酒，但是非常节制。最明显的是，希腊的酒神迪奥尼索斯在斯巴达的任何主要节日或祭祀中都不是崇拜的对象，这可能是因为榨取敬神时用的果汁的葡萄不是由自由人，而是由希洛人种植的。事实上，在斯巴达只允许——或者是强迫——一种人喝得烂醉如泥、丑态毕露，这些人就是希洛人。这实际上是成年的斯巴达人故意示范给新一代的年轻人看的，以让他们知道哪些行为不是他们应该做的。

89

所以，如果克列欧美涅斯经常饮用这种纯酒的话，他的这种做法无疑是不为斯巴达社会的律法所容的——这样的行为并不比一个希洛人或一个最粗鄙的野蛮人强多少。可是，嗜酒的行为本身就足以解释他的自杀或自杀的方式吗？对此，我有些怀疑。有一种原因人们却避而不谈，这种原因显得更加凶险，它或许可以解释他的死因，起码也能使故事变得更具娱乐性，那就是他是被谋杀的，并且是由一个后来继承了他在阿基亚德家族的王位的人下命令谋杀的，此人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列奥尼达。而他饮用烈酒过度的说法可能只是事后散布出来的谣言，为的是掩盖国王被人谋杀的真相；一个后来成为神话的人(列奥尼达)竟然参与了对另一位国王的谋杀？不可否认，这种说法可以成为侦探小说的素材，但我不

89

会是第一个试图用文学的方法来探究斯巴达血光四溅的历史的人。

克莱斯铁涅斯引起了雅典人的好感，这肯定是斯巴达人不喜欢而且不能容忍的。克列欧美涅斯再次对雅典进行军事干涉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支持一个亲斯巴达的重要政治家——伊撒哥拉斯(Isagoras)，其目的可能是想扶植他为傀儡僭主。与此同时，克列欧美涅斯又一次流放了克莱斯铁涅斯，随之还有 700 个雅典家族的一些成员，但是，这一次克列欧美涅斯的干涉实在太过分了。雅典的一些温和的富人与穷人联合起来推翻了伊撒哥拉斯，同时坚决要求保留由他们投票产生的民主制。克列欧美涅斯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选择。他的下一个计划在公元前 506 年的时候得到执行，他召集了一支更庞大的军队入侵位于阿提卡的雅典领土，指挥者除了克列欧美涅斯自己外还有斯巴达的另一个国王戴玛拉托斯。然而，由于他如此渴望胜利使得他在外交事务上没有把握好分寸，对待盟友就像是对待自己的臣服者或者甚至是奴仆。柯林斯人率先起来反对他的这种粗暴蛮横的做法，同时，这种反对还得到了戴玛拉托斯的关键性帮 90 助。尽管这支联军穿过了柯林斯的地峡并侵入了雅典的领土，但当军队到达埃列乌西斯(Eleusis)的时候就开始四分五裂了，而且也没有按照原计划与优卑亚和彼奥提亚的军队会师。自此之后的二十多年里，雅典就再也没有遭到过斯巴达人的入侵。

戴玛拉托斯国王

（执政时间：公元前 515 年至前 491 年）

斯巴达的戴玛拉托斯就像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和亚西比德一样，都已经永远地被人记住，或者说至少已经被载入了史册，但却时时笼罩在人民的爱恨交织之中。他们三人可能都曾经是爱国者，可又是哪一国的爱国者呢？正式地说，他们三人都曾出卖过自己的祖国。

亚西比德先是投靠斯巴达，受到欢迎，尔后又讨得了波斯人的欢心——无论如何，他曾经与波斯的统治者们商议过国事并为他们出谋划策，他这样做损害了自己祖国的巨大利益。地米斯托克利的叛国就更加的明目张胆了。公元前480年，他率领希腊海军成功地击败了波斯舰队，取得了萨拉米海战的大捷，正是这场胜利为希腊人最后在普拉提亚和密卡尔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铺平了道路，也就是在此役之后，他似乎就判定斯巴达而不是波斯将会成为雅典未来最主要的对手和敌人。从这一点来看，他实在是太有远见了！此后，他明显地不再热心于反对波斯了，当雅典创立并成功地发展出一个反波斯的海军联盟的时候，他在公众中的影响力也开始每况愈下，大约是在公元前470年或这个时间的前后一段时间里，他被雅典人用陶片放逐法[1]正式放逐10年。于是，他破罐子破摔或者说是一不做二不休，投靠了波斯人并成了波斯国王的随从，死后也葬在了波斯帝国的领土——玛格涅希亚(Magnesia)，此地正是雕塑家巴绪克勒的故乡。

91 戴玛拉托斯同样也曾被自己的祖国所抛弃，但不是经由民主投票的方式，因为斯巴达不是也从未出现过雅典那样的民主政体。他和地米斯托克利一样在波希战争最激烈、紧张的时期参加过马拉松战役。然而，与地米斯托克利不同的是，他并不是被斯巴达正式流放的而是自愿地选择了如此。就这种意义而言，当他决定"投靠波斯"并且成为了波斯国王薛西斯的一名非常重要的随从的时候，他显然是一个更为可恶的叛国者。然而，希罗多德却不顾自己本来是支持希腊的抵抗事业的坚定立场，主动降低了批评戴玛拉托斯的调子，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戴玛拉托斯之所以叛国可能有很多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戴玛拉托斯总的说来是与另一位国王克列欧美涅斯势不两立的。不管怎样，我们还是禁不住要对希罗多德的做法产生疑问，他为何可以原谅一个像戴玛拉托斯这样的叛徒、但在评论地米斯托克利的时候，态度却又变得如此尖酸刻薄呢？

---

[1] 陶片放逐法：在古希腊的雅典和其他城邦内，对大众投票选出的被认为危害社会的公民进行的一种短期放逐。——译注

我想，这里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希罗多德的这种偏袒。首先，他很可能与那些给他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也就是居住在特洛阿德（在安纳托利亚的西北部，赫勒斯庞特海峡的附近）的戴玛拉托斯的直系后裔们相处过一段时间，这些人的观点影响了他对戴玛拉托斯的看法；在色诺芬那个时代他们仍居住在那里，其中有两个人都取了非常响亮的名字，并且是斯巴达的王族才会用的名字：埃乌律斯铁涅斯（Eurysthenes）和普洛克勒斯（Procles）；第二个原因与第一个原因同等重要——有时甚至是更为重要——那就是希罗多德将希腊人民联合起来反抗波斯看作是第二位的政治目标，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排在整个希腊的政治议程中第一位的是调和斯巴达人与雅典人的关系，或者至少让这两个城邦意识到他们彼此之间的需要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要多，而他们亏欠对方的也多于他们为别人付出的。因此，希罗多德有意地将戴玛拉托斯描写成一个表现他的这种泛希腊主义思想的人物，戴玛拉托斯曾经不无悲壮地向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指出，有多少斯巴达人愿意为希腊的胜利献出自己的性命，则他们所代表的希腊文明和文化就有多么的优秀。 92

让我们从宏大的历史图景返回到不太重要的细节上来吧，把注意力从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转移到戴玛拉托斯的一生上来。为了说清他充满争议的出生，我们的故事得从公元前491年或前490年开始，正是在那一年他因为被人质疑是私生子而遭废黜，来自德尔斐的神谕也大致上证实了这种质疑，这则神谕据说其实是他的敌人克列欧美涅斯一世通过行贿德尔斐的祭司编造出来的。戴玛拉托斯被废黜之后，他的继任者列乌杜奇戴斯二世就开始对他百般污辱，这位新国王通过一个仆人之口来询问他，仅仅只做一名官员内心有何感想（那时他正在参与组织一年一度的“少年欢舞节”）。列乌杜奇戴斯这么做可能是想达到让戴玛拉托斯自动流亡的目的，但是，据说戴玛拉托斯在永远离开斯巴达之前，与他已故的母亲的亡灵有过一次交谈。希罗多德的《历史》的第六卷，记叙了戴玛拉托斯是如何向母亲询问她奇怪的受孕以及自己出生的真相的。

令戴玛拉托斯感到悲伤的最终根源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父亲阿里斯通(Ariston)在最初的时候确实否认过戴玛拉托斯是自己的亲生子，理由是从阿里斯通第一次与戴玛拉托斯的母亲同房到戴玛拉托斯出生中间才刚刚7个月，因此他判断戴玛拉托斯不可能是他的亲生儿子。戴玛拉托斯的母亲就是那位儿时长相丑陋，但在遇到了海伦之后却变成了美人的妇女，她是国王阿里斯通从自己最好的朋友那里用狡计骗来的(可参看本书第一章“海伦”一节)。从来没有人提及过这位母亲的名字：这在古希腊人记述的妇女的事迹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因为他们认为不当着不相关的男人的面提及一位受尊敬的女性的名字是一种表示尊敬的方式，当然，王室的女性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受这个规则约束的，这是合乎情理的，而且，斯巴达的妇女通常是那些对斯巴达怀有敌意的文献编撰者抨击或嘲笑的对象。

然而，希罗多德远远说不上对戴玛拉托斯的母亲抱有敌意，他笔下的这位母亲反而让人感到很亲切，他详细地描写了她与戴玛拉托斯的这次长谈。她手中捧着儿子献给她的祭品的一部分内脏，被迫发誓必须向儿子吐露真相。她说她是在被阿里斯通迎娶回家的第三个(一个吉祥数)夜晚受孕的，但她也不能完全肯定阿里斯通就是戴玛拉托斯的父亲，因为那个晚上还有一个幻影般的人也曾“拜访”过她，后来才知道这个幻影是当地的英雄阿司特罗巴科斯(Astrabacus，这位英雄的神殿就在王室的大门口旁边)。因此，戴玛拉托斯要么是阿里斯通的儿子，要么是阿司特罗巴科斯的儿子。

93

这样的回答可能并不能完全让戴玛拉托斯感到振奋。一方面，他的母亲澄清了他7个月就出生的秘密，这正是让阿里斯通生气而不愿承认戴玛拉托斯是其亲生儿子的实情。他母亲解释说男人们对这些问题向来是很无知的，并非每个婴儿都要怀胎满十个月后才可出生的(希腊人计算日期时把首尾两月不包括在内——按照现在的方法就是九个月)。然而，她没有说一个如此早产的婴儿是极难存活下来的；在古代希腊，即使是足

月降生的婴儿都很难确保一定能存活。有意思的是这位母亲也并未指出戴玛拉托斯为何能被允许养大，即使是在阿里斯通已经发誓说儿子不是他亲生的情况下。大概斯巴达当时的权威人物或权力机构——五位监察官，或者可能是长老院对这个问题有另外的看法，正如我们所知，阿基亚德王族的国王阿那克桑德里戴斯曾经在好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生下儿子，这样的话他就没有继承人，于是，斯巴达的权力机构或权威人物就对他的婚姻进行了干涉。"戴玛拉托斯"（Demaratus）这个名字照字面的意思是"人民祈求的"（Damos），因此，这可能是戴玛拉托斯的母亲为设法让自己的儿子得到父亲的喜爱而采取的一种方式。

戴玛拉托斯被允许抚养长大，就我们所知，阿里斯通并没有另外的子嗣，因此作为欧里庞提德王室的继承人，戴玛拉托斯与阿基亚德王室的克列欧美涅斯一样都获准无需参加"够格者"训练。当戴玛拉托斯到了适婚的年龄，大概是在25岁左右的时候，有一件事就充分证明了他真是他那位会要花招的父亲——阿里斯通——的儿子。阿里斯通曾经从他的好友手中骗走了妻子，而戴玛拉托斯则是从自己的远房堂兄那里偷走了新娘。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位女士名叫培尔卡洛斯（Percalus）是奇隆的女儿，因此，或许这次抢夺在纯粹的个人恩怨之外还隐藏着某种政治性的目的。希罗多德如此评述戴玛拉托斯：

94

> 戴玛拉托斯使用了计谋，夺走了对手的新妇，他把这位新娘在婚前拐跑而使她和自己结了婚。[1]

在所有的斯巴达婚礼中，模拟或象征性的抢新娘是正常仪式的一部分，但是如此看来，戴玛拉托斯确确实实曾经抢夺过别人的新娘，这倒是不常见的。他的那个情场敌手就是列乌杜奇戴斯，克列欧美涅斯在后来费尽心

[1] Herodotus VI. 65. 可参见《历史》（下册）中译本，第428页。——译注

思地罢黜了戴玛拉托斯之后，就是用此人替代了他。

在希罗多德的记叙里，戴玛拉托斯作为与克列欧美涅斯共同统治斯巴达的双王之一，或者说是敌对王之一，下一次露面是在雅典战争中。如我们前面所见，大约是在公元前 506 年，当柯林斯人反对克列欧美涅斯攻打雅典的计划或至少是攻打的方式时，戴玛拉托斯站在了柯林斯人的一边，这导致了这次攻打遭受了灾难性的失败。此后，无论是在个人关系还是在政见上，克列欧美涅斯和戴玛拉托斯都成为了不共戴天的死敌，但在他们之间的斗争中，又似乎一直是克列欧美涅斯占据着上风，至少在每次关键时刻作决断的人总会是克列欧美涅斯，而不是戴玛拉托斯。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戴玛拉托斯一定会因此而不顾一切地报复克列欧美涅斯。公元前 491 年，他可能觉得他的时机终于来了。

克列欧美涅斯领导斯巴达人在与阿尔戈斯的战争中赢得了巨大胜利，但他夺取胜利的方式却是有点问题的，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次胜利与两起渎神事件有关(可参见上文)，而斯巴达人在整体上对宗教又都是非常虔诚的。至此之前，克列欧美涅斯的宗教声望显然还完好无损，因为当他的政敌鼓动监察官委员会对他进行质询时，理由不是他的不虔诚而是他为何未能攻陷阿尔戈斯城(尽管他杀死了大约 6000 名阿尔戈斯重甲步兵，从而导致阿尔戈斯国内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危机，并且使这个国家几乎付出了一代人的军事实力)[1]。在他的这些政敌之中，为首的无疑就是戴玛拉托斯。克列欧美涅斯巧妙地利用了斯巴达人的虔诚和对预兆的尊敬来为自己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他说当他一踏进阿尔戈斯城外的赫拉神殿时，一道火焰就从那座远近闻名的、受到人们顶礼膜拜的女神雕像的胸膛射了出来，这正说明他已经完成了神心中所意愿的所有事情；他还声称，只有当火焰是从女神的头部射出时，才说明他必须彻底地夺取阿尔戈斯城。

95

[1] 遭此重创之后，阿尔戈斯的奴隶取得了政权并统治了国家，直至那一代死去的战士的儿子们长大成人后才夺回政权。——译注

关于这次质询的细节，希罗多德只提到了监察官们，这位历史学家对法律上的细节从来都没有表示过特别的兴趣。因此，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克列欧美涅斯的政敌们向五位监察官提出对他的控告，而监察官们认为他有必要为此作出辩护。希罗多德再次在行文中给读者留下了一种印象，即所有斯巴达人由于某种原因似乎都想要审判克列欧美涅斯。无论如何，有证据显示还有一些斯巴达国王在后来也受到过审判，如果这些关于诉讼程序的证据还靠得住的话，那么，能够剥夺公民权力的最高法庭只能是由长老会构成，按照职务戴玛拉托斯也是长老会成员之一，另外还包括五位监察官。这说明大多数的斯巴达人其实还是认为克列欧美涅斯对于他没有攻取阿尔戈斯一事所做的辩护是“可信而且合乎情理的”。 95

三四年之后，戴玛拉托斯认为他找到了另一个惩治他的这位对手的机会。当时克列欧美涅斯正远离希腊中心，在柯林斯地峡的另一边，正试图在雅典和已经投靠波斯的岛屿城邦埃吉纳之间建立起一条抵抗波斯的统一阵线。所以，当他不在斯巴达的时候，戴玛拉托斯，用希罗多德的委婉说法是，“开始诽谤克列欧美涅斯”，推测起来应该是说克列欧美涅斯站在雅典——这个斯巴达的敌人——那一边去反对斯巴达的盟友埃吉纳。当克列欧美涅斯完成了那件带有争议的任务从埃吉纳返回斯巴达之后，立马就因为这件事而废黜了戴玛拉托斯。

在受到列乌杜奇戴斯的难以容忍的侮辱之后，戴玛拉托斯离开斯巴达“去了波斯”，这是希罗多德的说法，但意义含糊。戴玛拉托斯可能是取道拉姆普撒科斯（Lampsacus）去波斯的，与同为变节者的前雅典僭主希庇亚斯一样，他将自己的女儿阿尔启迪凯（Archedice）嫁给了亲波斯的赫勒斯庞特城的僭主的儿子。依据他的子嗣的居住地——特洛阿德（Troad）来推断，这个地方可能正是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赏赐给戴玛拉托斯的个人财产，据推测还有一些财产可能是大流士的儿子及继任者薛西斯（Xerxes）赏赐给他的。下一次我们看到戴玛拉托斯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薛西斯那次针对希腊大陆的不幸征程中的紧密随从。希罗多德笔下 96

的戴玛拉托斯成为了一个“深谋远虑的顾问”，他所发挥的作用可能与他的实际生活是相符合的。例如戴玛拉托斯曾经向他的大王指出，斯巴达人对本国法规的惧怕远甚于对薛西斯的武力征讨。公元前480年在温泉关，也是他向薛西斯解释了为何斯巴达人在战斗即将到来之前会特意梳理他们的长发。

戴玛拉托斯在希罗多德的记述中说过的最后一句话是：

诸神会关心这支大军的！[1]

这句话据推测应该是萨拉米海战之前，即公元前480年之后说的。事后想来，就像德尔斐的神谕那样，这句话也可以作多种阐释，其中之一就是薛西斯的军队将会遭遇灭顶之灾，同时，这句话所表达出来的宗教虔诚感也给读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而事实上这种虔诚可能是由一个，正式地说，一个背叛他的祖国（斯巴达和希腊）的人表达出来的。这肯定正是希罗多德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我们肯定得先把对戴玛拉托斯的道德评判放在一边，而应该问一问在波斯战争期间他是否帮助还是伤害过希腊人的抵抗事业？以及在战争之前，就短期或中期效果而言，究竟是他的还是克列欧美涅斯的政策对斯巴达更为有利？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很清晰了。

这一事件对斯巴达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关系，及斯巴达国王该如何在国外行使军队的最高指挥权等问题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斯巴达人在此之后通过了一条法规，禁止两位国王在远离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的地方共同指挥同一支军队。接下来，大概是公元前504年，当斯巴达人希望伯罗奔尼撒的盟友支持他们对雅典发动进一步进攻的时候，他们在斯巴达召开了一次伯罗奔尼撒同盟代表大会，这一次，斯巴达不得不通过

97

[1] Herodotus VIII. 65.

磋商和投票这样的正常程序来争取盟友的支持。在大会上，同盟国的代表和斯巴达人一样有权发言，发言之后，同盟国开始投票，每个盟国都有一票的权利而不必考虑它们国土面积的大小和地缘政治上的关系。正是在这第一次有案可查的代表大会上，斯巴达的提案被否决了。有人还提议恢复希庇阿斯在雅典的僭主地位，但遭到了以柯林斯为首的大部分盟国的反对，至少从希罗多德所辑录的代表们的演讲内容来看是如此的，有些代表还指责斯巴达违背了他们一直以来反对僭主和专制政体的原则。

然而，尽管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否决了斯巴达的提案，但斯巴达人是绝不会愿意永远都受制于代表大会的，更不可能被迫去接受一项他们不 97 同意的政策，或实施一项他们不认可的行动。实际上，只有斯巴达人才有权力召开这样的大会，而且也只有在他们召开了自己的公民集会并决定了他们想要做什么之后，才会去召集城邦的代表来参加大会，至于盟友的意愿到底如何就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了。这些盟友都曾经宣誓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服从斯巴达人的领导，而不是相反。斯巴达迄今为止还拥有要求其他盟国服从它的指挥而自己并不受此约束的权力，后来制定的新的限制条件正是用来约束斯巴达的这种特权的，这反而使同盟变得更加强大而不是软弱。盟友们可能因此而感觉到它们的愿望也是有价值的，从而认为这个组织是基于它们相互之间的一些共识才建立起来的。二十五年之后，也就是在公元前480年，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成为了希腊世界里抵抗波斯入侵的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在下一章，我们将转为叙述希腊对波斯的抵抗战争，在这之前，我们首先得回顾一下从公元前600年至前500年间斯巴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状况。我们尤其要注意在文学与考古学的文献资料中任何关于斯巴达人的简朴生活的记载，这种生活方式闻名遐迩，到色诺芬来到斯巴达并定居下来的时候，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标志，在公元前4世纪上 98 半叶的时候，色诺芬在自己的著作中记载了很多与斯巴达社会的风俗、习惯相关的内容。

挽歌诗人提尔泰奥斯的政治诗和战争诗写得相当好，而且也相当适合保存，斯巴达人会在公餐食堂进餐或作战期间围在篝火旁边的时候演唱这些诗歌，很多世纪以来都是如此。阿尔克曼（Alcman）的诗在公元前600年前后最为流行，与前者形成完全而彻底的对比。确实，许多古代的评注家都不敢相信阿尔克曼真是个土生土长的斯巴达人——他当然是的——但他反而声称他祖上是来自萨迪斯的吕底亚人，这种判断是参考他的一些诗作中的引文得出来的。但这些引文的珍贵之处不在于证实了阿尔克曼的外国血统，而是说明了斯巴达仍然向外界保持着开放。他们当然也需要进口铜和锡去制造实用的铜制物品，但他们显然没有必要去进口珍贵、奢侈的原料，如黄金和象牙。铜和锡也被男女工匠们用来制作成精美的物品，然后虔诚地献给神灵，首先就是欧西亚。铅和制陶用的黏土和铁矿石一样在当地有着丰富的储量。斯巴达人的极度实用主义以及鄙视审美的名声在后来几乎人人皆知，但关于斯巴达的更早期的考古发现却与这种名声不太符合。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的时候，斯巴达人制作的大量铅制小塑像就并不仅仅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大量质地优良、绘图精美的陶器也不仅仅只用于世俗生活或献给斯巴达的神明，从公元前7世纪晚期起，这些陶器已经出口到了很远的地方，如意大利南部、伊特鲁里亚（Etruria）[1]、今天的法国南部，甚至还到了西边的西班牙，往东则到了萨摩司东部并进入了黑海地区。

在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斯巴达人开始制作另外两种具有独特风格的手工艺品，它们都给后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首先，是大量的黏土面具，它们有着各式各样的造型，有一些是画满图案的，它们都是用来敬献给欧西亚神殿的，大概与一些在神殿举行的仪式或舞蹈有关，但是，这些物品也表明它们受到了来自北非迦太基的腓尼基人的艺术的影响；其次，是一系列的铜制小人像，让人过目难忘，它们再现了各种穿戴着不同

99

[1] 位于今意大利中西部。——译注

的军事服装的成年男性重甲步兵，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他们的武器装备。这两样东西就像前面的手工艺品与绘制陶器一样，在空间上的传播范围也极为广泛，不仅遍及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而且向南还出现在了阿拉伯的亚丁地区（Aden）[1]。它们或许是斯巴达人出于某种宗教上的宣传策略而被分送到斯巴达以外的地方去的，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最后都进入了当地的各种神殿当中，这种说法似乎是有些道理的。

当然，全部或绝大多数的手工艺品都是由边民中的一些能工巧匠制作的，希洛人可能充当了助手，当然也可能没有，总之它们不可能是由斯巴达的公民们制作的，同时，这些工艺品也是由边民、海外贸易者和商人们出口到外面世界的。不过，这些工艺品常常是为斯巴达人或是受斯巴达人委托制作的，委托人既有个人也有团体，有男也有女。我们在这一节前面已经说过萨摩司的埃乌纳斯特敬献的铜碗。同样，我们可以援引由巴绪克勒设计的位于阿密克利的阿波罗神殿，或是后面将说到的在公元前5世纪80年代竖立的“列奥尼达”的大理石雕像，以及在公元前5世纪70年代建造的“波斯人柱廊”（参见下一节）作为例子，换言之，在公元前500年，说此时的斯巴达就像后来的人们所想象的或传说中所描述的那样是文化沙漠或不毛之地，尚为时过早。

[1] 也门最大的城市，位于亚丁湾南部，是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主要港口。——译注

100

第三章　波斯战争:公元前490年至前479年

斯巴达在公元前5世纪80年代开始的时候,一直笼罩在王室成员的死亡阴影当中,他们有些是自杀,有些则可能是被谋杀的,后来还发生过不只一起的渎神事件,从而使斯巴达的声誉进一步受到污损。列奥尼达如果为他长兄的死(谋杀?)而感到内疚,或者是间接地感到内疚的话,那他将会意识到他需要去清理这些污点。同样可以肯定,与他同期执政的另一位国王列乌杜奇戴斯(Leotychidas)之所以能得到欧里庞提德王位,也要归功于一件亵渎神灵的欺骗行为,因此他也需要更多的东西来证明自己。本节主要的篇幅将集中在波斯战争中的一些大型会战上,如公元前480年的温泉关战役、阿提米西恩战役(Artemisium),以及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亚战役和密卡尔战役。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希罗多德更加支持雅典人,但斯巴达人实际上在所有坚决抵抗波斯的希腊人当中是最应为最后的胜利得到最大的荣誉的,而且他们还在温泉关的那种特殊情形之下牺牲了许多勇猛的武士,正是因为他们不可动摇的纪律和钢铁般的决心,才使希腊人最终在普拉提亚一役中赢得了关键性的胜利。

列乌杜奇戴斯和列奥尼达的继任者——摄政王波塞尼亚斯(Pausanias)——在密卡尔和普拉提亚这两场取得胜利的战役中担任了至101 关重要的指挥角色。然而,在希腊人称为"米底人事件",或我们称为"波

斯战争”期间的所有重大会战当中，最高的荣誉一定要给予列奥尼达领导的温泉关防御战，尽管这场战役最终并没有成功地抵挡住波斯人的入侵。可以说，正是这一历史事件而不是其他塑造了一个永久性的“斯巴达神话”或传说（参见本书的第二部和第十章），但是，在斯巴达得以从阴影中摆脱出来之前，斯巴达人在公元前 490 年的马拉松战役中所扮演的显然就不是一个英雄的角色，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扮演过什么角色，这个情况是必须加以说明的。

因为克列欧美涅斯的坚持，斯巴达人在公元前 500 年的时候拒绝了米利都的阿里斯塔哥拉斯的提议，这一点我们在前面一章中已经说过了，然而雅典却对这个提议表示了赞同，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与米利都人有着共同的爱奥尼亚人血统，但主要还是因为雅典人想抓住这次机会来证明他们已经不再被亲波斯的僭主所统治，而是已经实行了自由的民主制。希罗多德认为雅典在摆脱了僭主的束缚之后，第一次成为希腊世界中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公元前 506 年的时候，它在陆地上击败了它的希腊邻居——彼奥提亚和优卑亚（Euboea），这是一个方面；然而在公元前 499 年，当它派出了一支由二十艘战船组成的小型舰队到小亚细亚去援助爱奥尼亚人的起义，并准备给波斯人一点颜色看看时，就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次起义持续了六场战役（campaigning seansons），但雅典人的贡献相对来说并不大，而且仅局限在战争开始阶段袭击和烧毁了吕底亚的波斯总督府所在地萨迪斯的一部分。爱奥尼亚人于公元前 494 年被彻底击败的时候，雅典人并未在场，这场战役是在米利都的拉戴（Lade）展开的，随之而来的就是米利都本身被彻底毁灭。这场起义被完全扑灭之后，雅典与优卑亚的埃列特里亚（Eretria）同样都成为了波斯人报复的目标。波斯帝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无序扩张的民族混合体，它总是要花费几年的时间才能向边境外的国家发动战争，因此，直到公元前 4 世纪的 90 年代中期，波斯国王大流士才向希腊大陆的主要城邦送去盛气凌

人的旨意：要么向波斯帝国献出土和水（这是传统的降服标志）以示服从，要么就等待一场复仇之战。雅典与斯巴达都公开地拒绝了这样的要求并杀死了大流士的信使，这是严重违反宗教礼仪的行为，同时也有悖于外交惯例。而埃吉纳却臣服了，为此，克列欧美涅斯极为不快，决定采用高压的方式进行干涉。阿尔戈斯则仍袖手旁观，保持着中立。

102

公元前 490 年，在波斯王室成员阿尔塔普列涅斯（Artaphrenes）和一个米底人达提斯的共同统率下，波斯的远征军终于出发了，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首先是埃列特里亚，然后是雅典。埃列特里亚很容易地就被攻破了，城市被焚毁，神殿也被毁坏，而且所有的市民都被当作奴隶带走。大流士为了削弱埃列特里亚的力量，就把许多埃列特里亚人虏为囚犯和人质并把他们带离故土，并遣送到波斯南部的内陆去，这是一种显示他的帝国拥有强大力量的典型做法。希罗多德记述这些情节的时候提到了（石）油，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条关于石油的记载。现在，波斯帝国的下一个进攻目标雅典——以及所有想帮助它的希腊城邦——不得不开始准备去应对即将兵临城下的波斯人了。

斯巴达人声明他们将帮助雅典人，但可惜的是，当他们派出的一支 2000 人的军队（大概集结了斯巴达所有市民的四分之一）赶到战场的时候，决定性的战役已经结束了。斯巴达人称他们之所以迟到是因为特殊的宗教原因，他们必须等到满月之后才能正式出发。希罗多德曾经两次在他的著作中说过，对于斯巴达人而言，来自神的命令要比来自人的命令重要得多，但我们不免还是会觉得有时候神的命令到达斯巴达那儿的时机多少有些可疑。无论如何，斯巴达人还是很渴望去看看战场的，而且他们还给予了希腊的胜利者——主要还是雅典人以及来自普拉提亚的盟友们（这里部分归功于克列欧美涅斯以前的外交努力）——以慷慨的祝贺。

斯巴达人有意错过的这场战役——马拉松战役——是整个古代希腊历史上，而且在实际上还并不仅仅是在古代希腊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战役

之一。它就像是大卫战胜了歌利亚(Goliath)[1]，这场战役之所以获胜并不仅仅要归功于雅典的将军——战略天才米泰亚德(Miltiades)的指挥，同时还得感谢那些在自己的国土上英勇作战的战士们，他们的英勇奋战并不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同时更是为了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据统计，波斯方面有六千四百多人阵亡——斯巴达人急于想去看看他们的尸体——与之相比，雅典人仅仅阵亡 192 人(精确数字)，而普拉提亚人的阵亡人数并不清楚。这些普拉提亚的阵亡将士被埋葬在马拉松平原的一个土丘中，以示敬意，雅典人也是如此做的，不过他们选择的土丘明显要更大一些，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更为深刻。

雅典的重甲步兵因为这次战役，而赢得了尊敬并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号——"马拉松战士"(the Marathon-fighters)，甚至到了公元前 5 世纪晚期之后，雅典官方在给阵亡将士举行惯常的葬礼时，仍然会赞颂"马拉松战士"的超人胆量和勇猛。这 192 名阵亡将士也因为他们的英雄壮举而被给予了宗教性的荣誉，他们的事迹被雅典人栩栩如生地雕刻进了巨大的大理石饰带(frieze)中，一种现代的观点认为，这种方式最初是用来装饰帕台农神殿(Parthenon)[2]的。雅典人的另外一个被称作"宝库"(Treasury)的公共纪念塔大概也是马拉松战役的纪念物，它竖立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内的神圣大道(Sacred Way)的旁边。

斯巴达人，或者至少是那些认同克列欧美涅斯的波斯政策的人，会因此感到既懊恼又嫉妒，这是可以想象的。相反，前任国王戴玛拉托斯与此同时却在波斯帝国找到了一个舒服的位置，实际上他还进入了波斯宫廷最核心的圈子中，对波斯国王来说，他是一位难得的既了解斯巴达情况又值得信赖的顾问。最先收留他的大流士在公元前 486 年去世了，薛西斯继承了王位。据说戴玛拉托斯曾警告过薛西斯不要轻易发动远征。而且，薛西斯在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完成父亲死后的遗愿——征服整个希腊

---

〔1〕 歌利亚(Goliath)是《圣经・旧约》中的非利士巨人，被大卫用石头打死。

〔2〕 建造时间是公元前 447 年至前 432 年间，位置在雅典卫城。

之前，他还得先处理其他一些更为迫在眉睫的帝国事务，即埃及和巴比伦的问题。因此，直到公元前484年的时候，一切才准备就绪，这位年轻的帝国霸主现在可以一心一意地实施他的伟大的计划了：征服整个希腊大陆，将其并入波斯的版图。

104 希罗多德乐于去想象薛西斯曾不只一次地反复考量自己对整个希腊大陆开战是否明智，这可能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想象符合历史学家的艺术目的。假如薛西斯决定不发动这次远征的话……那他就可以避免给自己和波斯帝国带来失败的痛苦。假如他要是听从了他的叔叔阿尔塔巴诺斯(Artabanus)的明智建议的话……假如！事实上薛西斯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犹豫多长时间。希腊在他看来其实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敌人。毕竟，在这之前希腊人的变化无常是臭名远扬的，而且他们内部在政治上又是分裂的。爱奥尼亚人的起义，即使是在形势最好的时候，从希腊的岛上和陆地上得到的有效支援也并不多。而且在希腊当时的诸多城邦的领袖当中，不只一个人像戴玛拉托斯那样，提议将希腊作为让波斯人停泊战船的港口，对于一个战败的祖国来说，这不失为一种更合适的选择。希腊最主要的作战力量是陆军，也就是用重甲步兵进行冲锋陷阵，往往一小队士兵便可迎敌无数，堪称以一敌百。如果当时薛西斯好好地运用他的智慧的话，他就应该多注意在公元前480年前后，希腊世界中正在发展的主要的军事力量，那就是在富有领导才能的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的鼓动下，由雅典人创建的一支由三列划桨战船(trireme warships)[1]组成的第一流的舰队，不久之后，这支舰队便成为了世界级的强大舰队。薛西斯当时还应该注意一下斯巴达，准确地说可能是因为戴玛拉托斯的叛逃，使得斯巴达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踌躇不决，何况又受制于各种宗教原因，他

〔1〕三列划桨战船(trireme warships)，也可称为三层桨战船，这种船能载20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划桨手。三层桨战船的名称来自于拉丁语"tiremes"，即"三只桨"的意思，这是因为划桨手分三层坐在船体内。在甲板上，还有舰队的指挥官、士兵、射手和舱面水手。这种船容易启动、停止和掉头，水手们划船的速度可达每小时15公里，快于张帆的速度。战斗开始时，敌对双方的战船面对面呈一字排开。最主要的战术是撞击敌船，以此来击沉它或者损坏它。——译注

们也一向如此，但现在他们似乎比以前要更加坚定地反对薛西斯了。

在获悉波斯人即将发动远征之后，斯巴达人像往常那样去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请求神谕，而神谕却让他们放弃抵抗并向波斯投降。神谕说，斯巴达要么将会在战斗中失去一位国王，要么拉科尼亚将会被波斯人踏平。陷入苦恼的斯巴达人此时采取了非常规的措施，开始频繁地举行民众大会，以前这种集会只在每个月满月的时候才举行一次。表面上看，这些集会是宗教性的，实际上它们只讨论一项议程：哪些斯巴达人现在愿意为斯巴达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在公元前492年的时候，也就是在马拉松战役开始之前，斯巴达人曾经杀死了大流士的信使。最后，有两位高贵的——多种意义上高贵的——斯巴达人表示愿意担任志愿者，这种为了斯巴达的利益而愿意做出自我牺牲的不平常举动是后来历史的一次小型预演，是即将到来的一次更为壮观也更为悲壮的自我牺牲的缩影——那就是在公元前480年，300名斯巴达人在温泉关所做出的集体性的自我牺牲。然而，薛西斯根本就没有兴趣要处死这两位斯巴达人，甚至无暇处置他们。在公元前481年的秋季，数量不多的一些希腊城邦赞同使用一切方法来共同抵抗即将到来的波斯大军的入侵。 105

这些城邦的代表们在柯林斯地峡进行了富有象征意味的会面，这个地方靠近波塞冬神殿，这个神殿每两年主办一次泛希腊的宗教节日——“地峡运动会”(the Isthmina Game)，这是希腊世界四个主要的宗教节日之一。这个地峡当时可能也是斯巴达人的视野和抱负能够到达的最远的边界。即使是在形势开始要求斯巴达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投送到希腊的中部和北部那些远离家乡的地方的时候，斯巴达人仍然还是一门心思地想以地峡为界，不愿再越出一步，他们在地峡的宽约六公里的瓶颈之地修筑了工事，试图把伯罗奔尼撒变成一座堡垒。正如希罗多德所正确理解和阐明的，这完全是斯巴达人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关键在于薛西斯所领导的侵略军是从水陆两路齐头并进的。也就是说，征服希腊需要靠薛西斯的陆军和海军的通力合作。只有薛西斯的舰队在海上被击败了，斯巴

达人守卫地峡的策略才有一丁点儿取胜的可能。这正是斯巴达人致命的弱点，他们根本就没有舰队可言，就算能够集结一些船只，那划船的也将是希洛人，这些人在战时是不可能会完全忠心耿耿的。

尽管如此，公元前 481 年秋，在柯林斯地峡宣誓服从神谕并共同抵抗波斯人的几个希腊城邦及人民，一致决定委托斯巴达人来担任盟军的全权领导。联盟把大部分陆军甚至联合舰队都交给了斯巴达来进行指挥，这是联盟领袖所享有的一项特权，在此之前，斯巴达人只有很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在风云变幻的海上作战的经验。

公元前 480 年，由游牧部落组成的波斯陆军、海军终于向西进发了。这支庞大的军队好不容易才穿过辽阔的帝国疆域。依照希罗多德的记载，在行军途中整条河流都被他们喝干了，据说波斯军队还在暴风雨中损失了大量的船只和人员，这种说法显然更加可信。在即将从陆地发起进攻之前，薛西斯在色雷斯（Thrace）的多里司科斯（Drabescus）举行了集结准备。希罗多德说共有 170 万陆军士兵以及用于支援的 1000 艘船只。而根据最好的军事历史学家的认真计算，这个数字肯定得缩水，他们估计波斯的陆军数目只有 8 万到 25 万，而海军粗略估计是 600 艘船。

106

波斯的军队从多里司科斯出发，然后向西和向南的推进都没有遇到什么阻碍，但到了温泉关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一开始，大陆上的希腊人在传统和制度上是深深分裂的，甚至在如何乃至是否要抵抗薛西斯的问题上都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希罗多德在故事的高潮部分即将到来的时候论述了对“希腊人”（Greekness）的定义，他所列举的那些有可能促成希腊实现统一的众多因素中，显然不包括政治上的合作，更不用说统一的行动了。读者完全无需诧异，为何在地峡会议上参加宣誓的盟国中并不包括帖萨利（Thessaly）的希腊人，因为抵御波斯大军的第一道可能的防线就在它的领土范围之内，即奥萨山（Ossa）和奥林匹斯山之间的坦佩山谷（Tempe）。公元前 480 年的春季或夏季，希腊联军派出了一支军队来守卫坦佩山谷，准备在那里抵抗波斯人的进攻。这支军队由“受到过高度赞

扬的”斯巴达人埃乌艾涅托斯(Euaenetus)和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他因为奉行正义而闻名”)共同指挥,同时,他们这样也是试图去确认帖萨利人对希腊人民的抵抗事业是否忠诚。

不幸的是,他们到那之后很快就发现设在此处的防线很容易被敌人攻破,埃乌艾涅托斯和地米斯托克利没有办法,只好原路撤回。帖萨利人随即就向波斯人投诚了,用一个新的术语表示就是“medized”;事实上,他们一向都是如此,即使不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也总是积极和自愿地站到野蛮的侵略者那一边。第二道,更确切地说是第一道抵御波斯人进攻的可能的防线,实际上就是温泉关。在这里,波斯侵略者和希腊人展开了第一次激烈的、面对面的战斗。

“炙热之门”(Hot Gates)——这是古希腊人对温泉关的称呼——是一条通往希腊大陆中部的狭窄过道。这条通道自然也就成为了从北方陆地上赶来的侵略军的必经之路,波斯人把它当作摧毁雅典和斯巴达军队以及他们在希腊南部的盟友的首要目标。公元前 480 年 8 月,正逢盛夏,面对着即将大举压进的强大的波斯侵略者,一小支军队,在大多数希腊城邦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勇敢地出现在了温泉关。在 1940 年的时候,有人把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坚决反抗德国的“少数派”比作波斯战争期间的少数忠诚的希腊勇士,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类比。

107

温泉关地区现在的地形与古代相比,已经被自然的力量改变得面目全非,以至于大海离曾经发生过战斗的地方都已经相距好几公里了。我们必须得想象,在公元前 480 年的时候,一个狭窄的关口,仅仅只容两辆战车或马车可以擦身而过,它处于高山和大海之间,中间还连续有着三道“门”。希腊人就守卫在中间那道门口;这里是现代的纪念碑竖立之地,当车向北行驶的时候,它们就位于国道的右侧。在国道的另一侧有一个可供游客参观的小山丘,它被标示为希腊人与波斯人进行最后的生死决战的地点,那场最后的战斗也可能确实是在这里发生的。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一种极端危急的时刻,斯巴达都没有设法把它国

内将近 8000 名成年的公民战士全部派往战场，而只是象征性地派出了由列奥尼达率领的 300 名战士。其他希腊城邦也是如此，都没有倾尽全力派出军队来守卫这个关口，以至于在人数达 20000 至 25000 名的伯罗奔尼撒联军中仅仅只有 4000 人到达了阵地。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当时他们给出的理由都是因为宗教的原因，斯巴达人宣称他们要庆祝一年一度的最重要的全国性节日，即为阿波罗举行的卡尔涅亚节，这是他们首要的事务，其他的希腊人同样强调他们要坚定不移地举行纪念宙斯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无疑，宗教在古代希腊总是一个真正能够对历史产生强大影响的因素。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另一个更加世俗而且也不太值得称赞但却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恐惧：波斯人的军队实在是太庞大了，人数多到使希腊人认为他们在温泉关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获胜的可能。更别忘了，希腊大陆的大部分城邦当中，有些已经表示不再支持或加入任何抵抗波斯人的行动了，有些甚至已经投降，更不用说选择去坚决地抗击侵略者了。

108

伯罗奔尼撒北部的希腊人当中，也只有极少的人出现在温泉关，他们只派出了一支先遣部队。雅典人和麦加拉人（Megarians）都没有出现，同时，更加引起争议的是只有很少的彼奥提亚人来了，其中还包括从彼奥提亚人的主要城邦底比斯派出的区区 400 人。后来，在温泉关战役结束后，除泰斯皮亚（Thespiae，底比斯的敌人）之外的所有彼奥提亚人以及普拉提亚人（雅典的一个盟友）都投靠了波斯。当波斯人在公元前 479 年最终被击溃而不得不打道回府的时候，特别是底比斯人的声誉便开始一败涂地。因此，在公元前 480 年的时候，呆在温泉关的那 400 名底比斯人据说完全是被列奥尼达强迫留在那里的，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作为人质被扣留在那儿的，为的是确保他们国内的同胞对希腊保持忠诚。除了这些之外，大约还有 1000 名左右来自当地的两支希腊部队，分别来自波奇司（Phocis）和奥普蒂恩-罗克里斯（Opuntian-Locris），他们在战斗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估算起来，此时的温泉关总共聚集了约 7000 名希腊人，也许就这么多吧！

无论如何，斯巴达派出了列奥尼达和经过挑选的 300 名勇士（其中一位患了严重的眼疾，在被劝阻之后退出了战斗，但他也在次年的普拉提亚战役中英勇地战死了；另外一人在关键时刻因为公务上的差事而缺席了这场决战，他在回到斯巴达后羞愧万分，自缢而死）。希罗多德，我们主要的历史叙事者，告诉我们选拔这 300 名勇士的一个标准就是有没有子嗣，因为如果有的话，即使他们战死沙场，他们家族的血脉还不致中断。然而，让人感到称奇的是这些勇士的妻子们的想法。这些妻子当中我们只了解其中一个具体的情况，她的事迹以奇闻轶事的形式保存在后来的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著作《斯巴达妇女格言》当中。当列奥尼达准备出发奔赴温泉关去证明他对于斯巴达的价值的时候，他的妻子戈尔歌(Gorgo)问丈夫她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他回答道：

109

嫁个好丈夫，生些好孩子！[1]

事实上，戈尔歌那时已经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即他的继承人普列司塔尔科斯(Pleistarchus)，而且据我们所知她在列奥尼达牺牲之后没有再嫁。

戈尔歌

关于戈尔歌，最不平常的并不是她的名字而是她的父亲——克列欧美涅斯一世。我们试着想一想他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给自己的女儿取这样一个名字的？当有人正视她的眼睛时，真的会变成化石吗？当然不能！然而，“戈尔歌”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戈尔戈”，也就是神话中的那个蛇发女妖美杜莎，珀耳修斯[2]曾经砍下她的头，为的是去从海怪掌中拯救安德洛墨达。这确实是个令人感到害怕的名字，但是斯巴达人可能不像希

[1] Plutarch, *Sayings of Spartan Women*. Gorgo no. 6 (Moralia 241b).

[2] 宙斯与达那厄所生之子。——译注

腊其他地方的人那样觉得这个名字有多么可怕或古怪。与她同时代的人当中，有一个比她年长的男人也叫“戈尔哥斯”(Gorgos)，而且他还是一位地位非常高的斯巴达人，曾经在埃利斯担任过斯巴达的“普善庐”(*proxenos*)[1]或官方的外交代表，这是一份名誉领事之类的工作。为了对这位“普善庐”的官员表示尊敬，埃利斯人在奥林匹亚，也就是他们管理奥林匹亚运动会的地方，为他建造了一个精美的大理石座位，并把他的名字雕刻在这个座位上，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 525 年的时候。

差不多是在这之后的第十五年，戈尔歌出生了。大概是在八九岁的时候，她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希罗多德的《历史》当中，在该书中她前后共出现过两次。一个有着奇怪名字的希腊妇女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希腊的历史当中，这肯定会让希罗多德杰出的继任者修昔底德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几乎就从不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任何妇女，无论是个体性的还是集体性的，而且也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女人描写成可以影响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进程的决定性角色。相反，希罗多德却提及了非常多的妇女，既有个体性的也有集体性的，而且在他的著作的民族志部分，他实际上还把男女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性关系当作重点来加以描写。希罗多德主要关注的还不只是希腊的妇女，而是想向读者说明：人类社会的种类有多么丰富，这些社会中的性爱风俗与希腊相比就有多么不同，而且这些不同的习俗并不必然比希腊的更糟糕。

110

然而，把斯巴达人的风俗习惯与别的希腊城邦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斯巴达真是一个超出常规的例外，尤其是斯巴达妇女的地位以及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希罗多德通过不同的办法向读者进行了充分的证明——斯巴达的妇女是与众不同的，是与男人平等的“她者”。比如说，我们前面听希罗多德说过国王戴玛拉托斯的母亲近乎奇迹的受孕和生子的故事，也听说过另一位国王阿那克桑德里戴斯可能犯过重婚罪(quite un-

[1] 古代的一种“外侨接待处”，有的城邦在其他各个大城邦中设立这样一种官职和机构，凡该城邦的公民，在当地做客，可以到此处请求居住或援助。——译注

spartan)。但是,比这些故事更加生动、有趣的是他对戈尔歌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描写,或者我们也可能会说戈尔歌扮演的这个角色其实是希罗多德一手安排的。

公元前500年,戈尔歌大概是八九岁的年龄。有一天,她碰巧在家中,她的父亲在处理完一些公事之后回了家,后面还跟着一位外国来的说客——米利都的阿里斯塔哥拉斯。这个人因为遇到了一起非常紧要的外交危机而来到斯巴达,试图说服国王克列欧美涅斯支持由爱奥尼亚人和其他的希腊人已经计划好了的一次起义,目的是反抗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但是,克列欧美涅斯拒绝派出斯巴达的陆军去参与这场战争,因为这可能会让斯巴达人远离熟悉的地中海,并花费近三个月的时间在内陆行军。随后,克列欧美涅斯命令这个米利都人在日落之前离开斯巴达。可能是因为早就听说过斯巴达人接收贿赂的传闻,眼看口头说服没有效果,阿里斯塔哥拉斯就主动提出要送给克列欧美涅斯私人一大笔钱财,10个塔兰特。这个时候旁边的戈尔歌突然说话了,"爸爸,你最好马上走开,不然这个外国人会把你给毁了的"。

当然,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告诉他这个故事的人都不可能知道戈尔歌当时究竟说过些什么,尽管她用"外国人"(*xeinos*)这个词来称呼阿里斯塔哥拉斯也恰当地表现了斯巴达人排外的特殊心理。有趣的是,在历史上戈尔歌似乎已经被描绘成一个隐藏在王座后面的权力人物,拥有超出她实际年龄的智慧。时间过了大约十五年,此时克列欧美涅斯已经在一种令人费解、困惑的情形下死去了,戈尔歌嫁给了她父亲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兼继承人——列奥尼达,并且成为了未来的斯巴达国王——普列司塔尔科斯——的母亲,她在后来还做了第二件影响斯巴达和整个希腊历史的大事。一个信使带着一块表面上是空白的蜡板来到了斯巴达,这块蜡板由两片木头组成,折叠在一起,上面覆盖着蜡。希罗多德说,"没有人能够猜出蜡板中的秘密",确实没有人,除了戈尔歌之外。她平静地告诉斯巴达的官员们,如果把木块上的蜡刮掉的话,他们就能看见用墨水写在

111

下面木块上的字了，而事实上真是如此。这可不是一封普通信啊，而是由流亡在外的前国王戴玛拉托斯送来的，他在信中向斯巴达人发出警告：薛西斯决定与希腊开战了！

这个故事并没有说明戈尔歌是否会读书识字，但却用可靠的事实证明斯巴达的妇女们即使不会写字作文之类的事情，至少也会识字、阅读，而且这里也告诉我们，书写对戈尔歌来说并不是件多么陌生的事情。不管怎样，这则故事的要点是要说明戈尔歌比所有其他的斯巴达人，尤其是那些掌握权力的男人们都要敏锐、聪明得多，因此，她才能够在一个公共领域内抛头露面去干预一件重要的国家事务，而在希腊世界中，这个公共领域通常只向男人开放。由普鲁塔克编撰的《斯巴达妇女格言》一书中，有六则令人难忘的格言被认为是由戈尔歌说出来的，这些格言同样都传达出了上面的信息。

这些格言中有两则与前文的阿里斯塔哥拉斯的故事有关，其中一则在用词上与希罗多德相比似乎有所改变：

> 爸爸，如果你不马上把这个讨厌的外国人赶出门的话，他会毁了你的。[1]

112 第三则格言说到了她父亲饮酒的问题，她告诫自己的父亲：一个人喝酒越多，就会变得越来越放纵且没有节制。这句话在这里看起来像是事后诸葛亮。第四则格言我们已经在前面引用过，讲的是戈尔歌与即将出征的丈夫讨论死亡的问题。剩下的两则从某个方面来说是所有六则中最有意思的，因为它们的内容与“性别政治”有关，这里我把它们全文引用在下面：

---

[1] Plutarch, *Sayings of Spartan Women*, Gorgo no. 1 (Moralia 240d).

当一个披着精美的织布长袍的外国男人来拜见她的时候，
她毫不客气地斥责这个人道：
"滚开，你连扮一个女人都不像！"[1]

一个雅典妇女曾不怀好意地挖苦她，说：
"为什么你们斯巴达妇女是唯一可以支配你们的男人的女人呢？"
她回答道，"因为我们是唯一可以生育真正的男人的女人！"[2]

这里的第一句话告诉了我们两层意思，首先，斯巴达人可能很瞧不起戏剧表演这类活动；其次，从他们崇尚男性气概的眼光看来，一个男人穿着奢华的衣服是柔弱的表现。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即使是斯巴达人中富甲一方的有钱人都不会穿着华丽的衣服，他们的穿戴与一般的穷人一样，朴素、简单。

然而，这第二则格言就更富有启示意义了。它其实是对吕库古说过的一句话的重复，只是在语词上作了些细微的改变，吕库古的这句话记载在普鲁塔克的另一部著作里，据说普鲁塔克曾专门用这部著作来收录斯巴达男人的言论。这句话显然与吕库古为斯巴达设计的社会制度有着重要的相关性。因为，根据普通的希腊人关于性别和性别角色的看法，无论是智力还是身体，女性在本质上都是不如男人的，因此，妇女们在私底下，更不用说在公共事务当中都应当服从男人。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第一卷以及其他地方，曾经详细地论述了在他看来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妇女的本质，以及为何她们低男人一等的现状是不可改变的。当他在自己的这部著作的第二卷中说道：斯巴达的男人"受他们的女人统治"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内心的震惊和憎恶。在我们前面讨论的那则格言当中，戈尔歌并没有否认斯巴达的 113

[1] Plutarch, *Sayings of Spartan Women*, Gorgo no. 1 (Moralia 240d).
[2] Plutarch, *Sayings of Spartan Women*, Gorgo no. 1 (Moralia 240e).

情形真是如此，而是非常巧妙地把世人对斯巴达妇女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关注从妻子转移到了母亲。她说只有斯巴达的妇女才能够生育真正的男人，而雅典或其他地方的那些可怜的妇女们做不到这一点！戈尔歌在这里其实是加倍地确定了女性的身份，并且承认在斯巴达的政府中存在着一种所谓的由女性支配的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读者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看到，最后的这个观点至少是需要再作一些修正的。

在我们离开谈论戈尔歌之前，我们还是再来讲讲她的家族尤其是她的婚姻状况吧，这次主要谈谈财富和遗产继承的重要性。关于她的最主要的情况是，除了在出生的时候她的父亲还是在位的国王之外，她也是这位国王唯一的女儿兼继承人，斯巴达人有一个专门的词语来称呼像她这样的女性继承人——“*patrouchos*”，其字面意思就是“祖传或父传的遗产所有者”。她的父亲克列欧美涅斯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四个儿子中的一个，所以当阿那克桑德里戴斯死后，如果这四个儿子当时都还健在的话，他的财产就至少会被分割成四份（如果要是再多出几个女儿的话，财产被分割的份数就更多了，因为在斯巴达女儿也有继承的权利，她们所得到的份额可能比她们的兄弟们得到的要小）。另外的三个儿子，都是由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第一位妻子生的，按顺序来排的话分别就是多里欧斯、列奥尼达和克列欧姆布洛托斯（Cleombrotus），但是多里欧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死了，列奥尼达就成了克列欧美涅斯最年长的兄弟。

列奥尼达大概在公元前510年之前，应该就已经达到了适婚年龄（在斯巴达，男性的适婚年龄是在25岁左右），也有可能他一直未婚，或者他的第一个妻子或另外的妻子在他迎娶戈尔歌之前已经死了。他娶戈尔歌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90年代末期，这个时候她正好是20岁左右，也到了斯巴达妇女的适婚年龄。列奥尼达要娶戈尔歌为妻，在当时一定是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因为戈尔歌是克列欧美涅斯唯一的孩子，她将继承父亲所有的财产，而列奥尼达按顺位来讲是阿基亚德家族的王位继承人。按

114 斯巴达的法规，如果去世的国王没有儿子的话，王位就应由他最亲近的男性

亲属来继承，而列奥尼达正是克列欧美涅斯还活着的兄弟中最年长的一位。很难说克列欧美涅斯的在天之灵会祝福女儿的这段婚姻，在斯巴达，近亲内的婚姻尤其是叔父与侄女之间的婚姻并不是没有先例，实际上在希腊的其他地方，叔父与侄女之间的婚姻也是屡见不鲜，其目的都只有一个，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为了保住财产留在男性家族中，肥水不流外人田。

换句话说，戈尔歌其实只是履行了古代希腊世界中那些精英女性所应该履行的一项十分普通的职责，她们的婚姻其实只是用来转移财产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把财产权让渡给其他的精英男性。然而，如果我们认为戈尔歌在这个交易过程中不过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那就错了。从我们所知道的每件与她有关事情上可以看出，戈尔歌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她不但会思考而且还善于表达。

114

保卫温泉关，在斯巴达人看来实质上就是一次自杀性任务，这是在完全理性的思想状态下所做出的一种不顾一切的举动。这一点得到了故事中薛西斯的探子的证明，他看到斯巴达的战士们就像要去参加一次田径比赛那样，正在往自己身上涂油，而且还梳理着他们的披肩长发。戴玛拉托斯向薛西斯解释说，斯巴达战士的这些举动其实象征着他们已经决意战斗到死，如果他们认为应当如此的话。但其他的希腊人对温泉关的军事行动的看法无疑又是非常不同的。面对近在咫尺的敌人，有些人认为不如先作体面的撤退，然后再择日与波斯人决一死战。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当庞大的波斯军队第一次接近温泉关的时候，恐慌开始在大部分希腊人当中蔓延。另外一个引起惊慌的原因是希腊人发现有一条叫阿诺佩亚(Anopaea)的通道正好穿过了南部的山脉，敌人有可能会从这里绕过温泉关到达自己阵地的后方。列奥尼达自然会想方设法去封锁这条敌人可能会走的路径，他派遣了1000名熟悉当地地形和环境的佛西斯人(Phocians)去执行这项任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场战役一旦失败，佛西斯人将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且受害程度也会是最大的。

115　波斯军队到达之后，推迟了三到四天才开始发动真正的攻击。这可能是薛西斯想借此向希腊人施加心理压力并进而摧毁他们的战斗意志，或者其原因也许很平常，那就是波斯人需要几天的时间来与自己的舰队进行联络，后者在海上遭遇了暴风雨，直至最后才安全地停泊到一个靠近赛披亚斯海角(Cape Sepias)的港口。波斯人终于开始进攻了，这是被后人牢记的史诗般的三天遭遇战的第一天。希腊人之前已经重修了温泉关中门的古墙，他们躲藏在这堵墙的后面，轮流地交换岗位与敌人进行战斗。他们的长矛比敌人的要长，而敌人因为进攻的空间非常狭促而无法发挥出数量上的优势。斯巴达人还采用了一种特有的战术来大量地杀伤敌人，这种战术只有接受过最严格训练的士兵才能实施，否则连想一想都是不可能的。他们先是佯装撤退，一次接一次地，然后突然向后转身并用势不可挡的方式猛烈地攻击后面那些正洋洋得意的追赶者。

第二天就像第一天一样，时间过得非常快，战斗的情形也如出一辙。然而，我们可以想象薛西斯一定会为此感到挫败并变得恼羞成怒，但是他马上就碰上了好运气。有一个希腊的“犹大”，他是当地人，熟悉那条特别的通道——阿诺佩亚，他想方设法地出现在了薛西斯面前，并告诉了这位国王他所知道的情况。他的名字现在可算是已经臭名远扬了，他的变节在后来招致了无数的谴责，然而部分人谴责他的动机却可能是想模糊或掩盖一个事实，即在当时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城邦，要么已经整座整座地向波斯人投降了，要么就是即将投降。正是在这个叛徒的帮助下，在第二天晚上和第三天凌晨，波斯人绕到了守卫温泉关的战士们的身后，可是，波斯人在这后面所遇到的抵抗与在前面相比没有什么两样，就像是咬到了一块根本就咬不动的硬骨头似的。薛西斯力求万全，在那天派出了自己最精锐的部队去执行这项特殊的夜间任务。这支部队就是他的贴身卫队，人数达 10000 名的“不死军”(希腊人常常如此称呼这支军队，以为是一支由不死的人组成的军队，这显然是不对的，这支军队之所以采用这个名字是因为一旦它在战斗中出现伤亡，就会马上从预备部队中获得兵源

补充，因此，它就总是可以保持 10000 名的人数）。

可能有人会责怪列奥尼达没有派遣一支人数更多或更具战斗力的军 116 队去防守阿诺佩亚。或许是他认识到只有在希腊军队即将被包围的紧要关头，他才能够更加无可争议地行使自己的指挥权（据说他解散了大部分余下的部队，但有一种质疑的观点认为，事实并不是这样的，那些离开的军队中的大部分人完全是逐渐散去的）。唯一不受到一丁点儿怀疑的，就是他和他的斯巴达战士们以及另外几千名希腊勇士们的坚定决心和非凡勇气，他们毅然地选择留在了阵地上并在第三天血战到底。

有一句相当简短的话能够充分表达出这些斯巴达勇士们的最终立场。当有人说波斯人那边有大量的弓箭手，他们射出的箭如此之多以致会遮住天上的太阳的时候，斯巴达人狄耶涅凯斯（Dieneces），300 名勇士中的一位，回答道：

> 那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日荫下作战了！[1]

在斯巴达人看来，以箭为武器是女人才做的事，是软弱的表现，只有步兵们用长矛和利剑进行面对面的肉搏厮杀才能体现真正的男子气概，这句话没有直接地回答关于箭的问题，但无论是在语言的字面意义上还是比喻意义上都是相当巧妙的，然而不久之后，正是这些他们本不屑一顾的飞箭彻底地击溃了他们。

狄耶涅凯斯

狄耶涅凯斯在希罗多德所讲述的温泉关战役的故事中，直至最后才出现了一次，但他的这次出现却给读者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即

---

[1] Herodotus VII. 226.

使是身处一群最英勇无畏的战士当中，他仍然被称为是“最勇敢的”！希腊人会用一个特殊的词来表示这种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杰出品质——“英武”(*aristeia*)，这个词出现次数最多的地方是在荷马的《伊利亚特》当中，被用来描写像狄俄墨得斯(Diomedes)[1]、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2]，尤其是阿喀琉斯(Achilles)这样的英雄。“*aristeia*”在这个意义上是阴性的单数名词，除此之外，确切地说希腊人也会用这同一个词来表示中性的复数意义。因此，这个词在这里并不是指英勇行为本身，而是对英勇行为的一种奖励，在诸如温泉关、普拉提亚这样的战役之后，它才会颁发给那些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杰出人物。当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在参加温泉关的战斗并战死的所有勇士当中，狄耶涅凯斯被称为“最好”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说狄耶涅凯斯就是一个由活着的希腊人选出来并被授予了“*aristeia*”的人。

117

希腊人是富有竞争精神的，他们用来表示竞争的词语是——“*agônia*”，用英语来表示就是“agony”[3]，这个词本身就告诉了我们在希腊人的思想当中，“竞争”在本质上具有很多的含义。被冠以“最好”，因而也就包含了非常多的意义。要是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料来帮助我们了解为何狄耶涅凯斯在最后会获得如此高的荣誉的话，就再好不过了。美国小说家史蒂文·普雷斯菲尔德(Steven Pressfield)在他的小说《火之门》(*Gates of Fire*)中对狄耶涅凯斯的一生作了一次颇有想象力的重构，他写得非常好，比方说，他在书中向读者们介绍，斯巴达的武士将参加一种新颖的，同时又特别严格的军事训练，尽管这些描写都纯属于他个人的推测。我们还可以推断狄耶涅凯斯肯定曾经以出色的成绩通过了“够格者”训练，他被选入了公餐食堂并获得了公民的资格，然后，他一定是表现

---

[1] 狄俄墨得斯是阿尔哥斯的国王，围攻特洛伊的希腊英雄之一，曾协助奥得赛盗取智慧女神雅典娜神像。——译注

[2] 帕特洛克罗斯是特洛伊战争的参加者，被赫克托尔所杀害，友人阿喀琉斯为其报仇，杀死了赫克托耳——译注

[3] 指精神上或肉体上极度的痛苦，也可用来表达激烈的竞争等意思。——译注

出了非常优秀的军事才能,而且还结了婚,至少有一个活着的儿子,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能被挑选进300名精英战士的行列,与列奥尼达一起奔赴温泉关。

除了他身上具有斯巴达人特有的英武品质之外,希罗多德还告诉我们,狄耶涅凯斯还拥有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才能,那就是用简洁的话语进行机敏的回答。正如读者在前面看到的,"我们就可以在日荫下作战了",这句话确确实实是言简意赅、恰到好处。狄耶涅凯斯其实是在这里暗示,敌人的疯狂进攻只会让斯巴达人在战斗中表现得更为勇猛和有效,而且抵抗的时间也会更长久!

希罗多德补充道,狄耶涅凯斯据说还说过不少类似的令人难忘的格言,如果他当初决定引用这些格言的话,它们在历史中就会被记录下来。118 列奥尼达也通过言语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斯巴达人,据说在最后的战斗即将来临之前,他要求他的士兵们去吃早餐,他说:"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去哈得斯(冥王)那儿吃饭了!"也许他已经知道了那道从德尔斐传来的神谕,据说这道神谕在当时就已经流传开了,神谕称只有牺牲一位斯巴达国王,才能确保希腊取得抗击波斯的最后胜利。无论如何,他去参加战斗并在最后英勇地牺牲都表现得像一个男人,他意识到他为之战斗的东西远比仅仅保住自己的王位要重要得多。斯巴达人在温泉关的战斗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斗志,已经由雅典人在之前大获全胜的马拉松战役中获得了展现,这也是为何希腊人取得了最终胜利的最主要的原因。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人在第三天早晨的伤亡比前两天的加起来还要多。或许是吧,如果希腊人在战斗中完全不顾个人生死的话,情况就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即使是列奥尼达牺牲了,也只是使希腊战士们的抵抗变得更加激烈,他们英勇地战斗,为的是不让野蛮的敌人抢走列奥尼达的遗体并摧残他。此后的战斗发生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座低矮的小山丘上。希腊战士们手中的武器要么已经用尽,要么破损得不能再使用,他们实际上就只能赤手空拳甚至用牙齿来与敌人拼命了。甚至到了最

后，无计可施的波斯人为了安全起见，只得使用弓箭从远处向希腊人进行射击。据说波斯人后来对列奥尼达的遗体进行了野蛮的报复，砍下了他的头，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怒火，这显然也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薛西斯手下的波斯人已经被逼得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了。

当然，正式地说，温泉关一役也是希腊人在抵抗来自东方游牧部落的进攻的过程中遭受的第一次可怕的失败，人们也几乎无法从这次战役的结果中看到任何他们将取得最后胜利的迹象。然而，在不久之后，在这次战役发生的地方竖起了许多墓碑，其中有一段碑文在历史上几乎无人不知，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斯巴达人回想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并非仅仅只有羞愧：

119

> 路人啊，请去告诉斯巴达人，
> 我们是遵从着他们的法律长眠在这里的。[1]

还是在这个位置，后来还竖起了一座石狮雕像，它像前面的碑文那样，既传达出了希腊人内心的自豪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敌人的蔑视，因为狮子作为万兽之王就象征着一种尚武精神；公元前 338 年，在彼奥提亚的克罗尼亚（Chaeronea），[2]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打败的希腊人也竖起了一座石狮，它直至今天还或多或少地存留了部分下来。不管怎样，温泉关的这座纪念碑同时也是对列奥尼达的一种巧妙致敬，因为“列奥尼达”就是“雄狮的后代”（descendant of Leon）的意思，在希腊语中“*leôn*”指的就是“狮子”（lion，可参见本书第十章）。

这些人为了祖国而进行着殊死的搏斗，为了希腊的自由而不惜赴汤蹈火，最后都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为后人树立了爱国的典范，

---

[1] Simonides, epigram, quoted in Herodotus VII. 228.

[2] 马其顿的腓力在公元前 338 年的克罗尼亚（Chaeronea）战役中大败以雅典为首的盟军，从此，希腊不得不臣服于马其顿。——译注

在当时那个危急的时刻,他们的英雄壮举也大大地鼓舞了希腊人民的士气和斗志。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英勇的抵抗尽管最后失败了,但其实也是一种胜利。伟大的波斯国王薛西斯曾亲自来到了战场,据说他自始至终都对斯巴达人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对此,他无法理解,)因为他受困于许多的文化成见之中。也许应该有人告诉他,斯巴达人之所以如此奋不顾身,是因为他们相信有一种比自己的性命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自由!所谓自由,就是能够让人民自由地发展自己独一无二的,同时也产生过独一无二的影响的文明,实际上也正是这种信仰激发了斯巴达人以及其他忠诚的希腊人民的斗志,使他们最终在公元前 479 年的时候把波斯人逐出了国门。

对希腊人来说,他们在这一年里取得了两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即陆地上的普拉提亚之战和海上的密卡尔之战。然而,薛西斯却只能间接地从别人的汇报中得知这些消息,因为自从希腊人在萨拉米取得巨大的海上胜利之后,他就以最快的速度撤回到了苏萨(Susa)[1],萨拉米战役是由地米斯托克利策划的,雅典舰队为这次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八年之后,即公元前 472 年,埃斯库罗斯在自己得奖的悲剧——《波斯人》(*Persians*)中对这一事件重新进行了戏剧性地想象和发挥(这个剧本有幸保存到了现在)。薛西斯把玛尔多纽斯(Mardonius)留在了希腊,任命他为波斯军队的总指挥,玛尔多纽斯是戈布里亚斯(Gobryas)的儿子,而戈布里亚斯则是波斯最高贵的七个人中的一个。这七个人曾经在公元前 6 世纪 20 年代的时候,从篡权者手中恢复了阿凯门尼德(Achaemenid)王朝的统治,并且把薛西斯的父亲——大流士一世送上了王位。玛尔多纽斯,换句话说,可谓是精英之中的精英,在希腊他也并非仅仅只是一个临时充数的指挥官,但是即使如此,在公元前 479 年的时候,他也无法与希腊的战场指挥官——斯巴达的摄政王——波塞尼亚斯相匹敌!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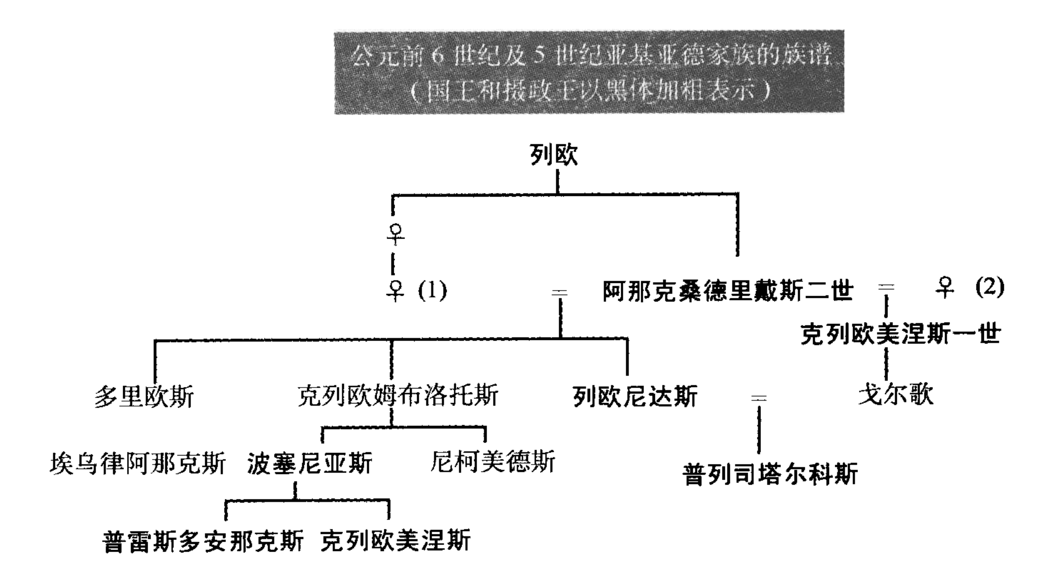
---

[1] 古埃兰国的古城,波斯帝国首都,遗址在今伊朗西部。——译注

波塞尼亚斯之所以能当上指挥官是有原因的，作为亲表兄，他是这个家族中与列奥尼达的未成年的儿子且继承人——普列司塔尔科斯最亲近的男性亲属，因此，他被任命为这个男孩的监护人以及阿基亚德王位的摄政者。他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全力以赴，抢在另一位国王列乌杜奇戴斯之前获得了陆军的主要指挥权，后者反而成了第一位、实际上也是最后一位担任过海军指挥官的斯巴达国王。

摄政王波塞尼亚斯

在公元前479年的时候，波塞尼亚斯从最初的默默无闻一跃而成为当时整个希腊甚至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明星。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他总的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物。在波斯人被彻底打败之后，有人认为他应该为希腊城邦之前的投降政策负责，希罗多德对这种说法持质疑的态度。不过其他的文献资料，尤其是修昔底德和抒情诗人西摩尼得斯对他的论述却与希罗多德大相径庭，他们说波塞尼亚斯妄自尊大、蔑视神明甚至还通敌卖国，这些行为虽然可以理解，但却是不可饶恕的。



波塞尼亚斯大约出生在公元前510年左右，是多里欧斯和列奥尼达最小的亲弟弟克列欧姆布洛托斯的儿子。

多里欧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因此列奥尼达就继承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克列欧美涅斯留下的王位，但是列奥尼达后来又在温泉关一役中牺牲了，留下了一个尚未到法定年龄的儿子普列司塔尔科斯。于是，波塞尼亚斯就被委任为阿基亚德王位的摄政，他在这个位置上呆了十来年，直至他最后也像多里欧斯那样落得声名狼藉才算结束。然而，多里欧斯死在了国外，而波塞尼亚斯却大约是在公元前470年的时候，遵从监察官的传唤从拜占庭(Byzantium)返回了斯巴达。他被指控叛国，于是，他跑到斯巴达卫城里的神殿去寻找庇护，却被人用砖砌了一堵墙困在了黄铜宫的雅典娜神殿里，最后，他就饿死在那里。

这个可怕的结局倒是与他晚年受到指控的生活方式非常一致。在指挥希腊联军取得了普拉提亚的胜利之后，这支最庞大的希腊军队仍然还集结在一起，他开始变得自命不凡，并肆意从事一些非常高调、夸张的活动，即便是在战场上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时有人提议，既然波斯人曾经在温泉关战役之后摧残过列奥尼达的遗体，当然这也是传说的事，那么现在希腊人取胜了，应该也要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玛尔多纽斯的尸体，波塞尼亚斯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这曾经使他获得了不少人的尊敬。而为了强调波斯人与希腊人(尤其是斯巴达人)在生活方式上的不同，他命令他的希洛人奴仆准备了一顿斯巴达人平常食用的饭菜，然后摆放出来，为的是让他的将士们看看这顿饭与玛尔多纽斯设在豪华帐篷里的豪奢筵席相比有多么大的不同。斯巴达人当时还不习惯把缴获来的战利品作为礼物奉献给他们的神殿，于是波塞尼亚斯就命令希洛人去战场上收集波斯人留下的物品，其中包括很多金银器具，并且允许他们任意处置这些财物。希罗多德在这里讲了一个恶毒且不真实的故事，他说在战争中投靠过波斯的埃吉纳人用最低廉的价格从希洛人那里购买了这些财宝，不谙世故的希洛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物品的真实价值，于是埃吉纳人就因此而变得

富裕起来。这种说法之所以恶毒，在于它告诉我们埃吉纳人不但叛逆卖国而且还唯利是图、惯于欺骗。此外，人们盛传波塞尼亚斯放弃了传统的信仰并做出各种浮夸、铺张的行径来，看来也确有其事。

122 在打败波斯的入侵之后，原来的希腊联盟变得更加强大了，波斯之前想要征服的一些岛国和亚洲大陆上的一些希腊国家也开始加入这个联盟。希腊联盟决定继续这场战争，波塞尼亚斯也就很自然地继续担任总指挥，他把统帅部设在拜占庭，但是不久之后，他开始变得傲慢自大并疏远盟友。在公元前 478 年的时候，他被召回了斯巴达，不料第二年他又返回了拜占庭，这次他显然没有获得斯巴达当局的批准。当他决定在黑海入口处的一个巨大的青铜大碗上铭刻上下面的一些话的时候，他身上的傲慢自大就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也正因为此事他才被召回斯巴达：

> 这是英勇的波塞尼亚斯奉献给海神波塞冬的，
> 他是疆域辽阔的希腊的指挥官，
> 就在这黑海边；他生来就是斯巴达人，
> 是克列欧姆布洛托斯的儿子，是古代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后代。[1]

这首对句形式的挽歌据说是由西摩尼得斯创作的，这似乎是很可信的，因为波塞尼亚斯肯定会力推当时的西摩尼得斯去创作一部史诗来歌颂斯巴达人，当然，尤其是他本人在普拉提亚的伟大功业。这部非凡的诗作的大部分内容都书写在草纸上，保藏于上埃及的干燥沙子中，最近才获得出版。这里是一小段节选的诗歌（修复过来的文字用方括号加以提示）：

> 他们[从欧罗]塔斯河和[斯巴达的]城镇[出发远征]，

---

[1] Simonides, quoted in Athenaeus XII. 536ab. See Campbell ed. 1991.

带着宙斯的骑手的儿子们,

[廷达瑞俄斯家族的]英雄们,还带着墨涅拉俄斯的力量,

[那些]他们父亲的民众的[英勇的]军官们,

由[伟大的]克列欧姆布洛托斯的最高贵的[儿子],

……波塞尼亚斯领导着向前进![1]

这首诗显然是为了称颂波塞尼亚斯个人的丰功伟绩而创作的,在他看来,这样的歌颂是恰如其分的。然而,即使是受雇于他的诗人——西摩尼得斯,据说也曾提醒过他不要忘记自己终究还是必有一死,他不是一个神,甚至连一个英雄都算不上。 133

这首黑海边的对句大大地损害了他的名声,不过波塞尼亚斯在德尔斐甚至还做过比这更出格的事情。曾经在波斯战争中联合起来的31个希腊城邦,共同建造一座被人们称为蛇柱(the Serpent Column)的胜利纪念碑。它由一个石制的基座以及一个青铜柱构成,柱子上有三条大蛇相互缠绕,在柱子的上方,也就是这三条蛇的头上顶着一个好像是盛满了物品的青铜大盘,这种盘在《伊利亚特》中的葬礼竞技会或其他勇敢者的竞赛中是被当作奖品颁发给获胜者的。获得了胜利的所有希腊城邦的名字,拉西代梦人(斯巴达人)排在了最前面,都被铭刻在了那些蛇的身体上。这些文字现在都还能看到,只不过这座纪念碑的遗迹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古竞技场(原来的拜占庭,现在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的中部。然而,波塞尼亚斯又想在这里留下关于他个人功绩的记载,于是,他让人在蛇柱的基座上另外刻上了一首由西摩尼得斯创作的对句: 123

战争中希腊人的领袖,此时他已经摧毁了

米底人的军队,

[1] Simonides, Elegy Fragment 11. See also West ed. 1993; Boedeker & Sider eds. 2001.

斯巴达人

波塞尼亚斯建造了这座纪念碑，献给飞巴斯[阿波罗][1]。

看上去好像是由波塞尼亚斯一个人在普拉提亚摧毁了整个波斯人的军队似的……怪不得，修昔底德说，斯巴达人立马就把这首对句给擦掉了。

于是，波塞尼亚斯被剥夺了希腊联军总指挥的权力，不久以后，斯巴达人彻底地退出了当时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反击波斯人的军事行动，雅典人以及新组建的得洛斯海军联盟(Delian League)成为了主角。波塞尼亚斯发现拜占庭与他意气相投，于是就留在了那里，呆了近十年。在这段时间里，据说——修昔底德相信这个故事，但希罗多德却持质疑的态度——他向薛西斯寻求庇护，并希望薛西斯把女儿许配给他，目的是让他成为掌管希腊的大总督以便代理波斯人在这个地区的利益。

124

不管真相到底是什么，反正大约是在公元前469年的时候，他又被召回了斯巴达，他这次遭到指控不是因为向波斯人投怀送抱，而是因为在斯巴达人看来，他犯下了比这更加恶劣的罪行：与希洛人勾结。告发他的人实际上并不值得人们信赖，因为他是波塞尼亚斯以前的“男朋友”，一个从阿尔吉洛斯(Argilus)来的希腊奴隶(在瓦莱里奥·马西莫·曼弗雷迪[2]的小说《*Io Scudo di Talos*》中，这个人物被作者富有想象力地改编成了一个希腊化时期的叙利亚人，该书翻译成英文后，书名就是《斯巴达人》)。然而，这个人拿出的证据却非常确凿，从而使斯巴达的官员们相信波塞尼亚斯不但准备主动给予希洛人自由，而且还要给予他们以斯巴达的公民身份。

这种受到指控的“勾结”是可以进行非常不同的阐释的，而不能只是被理解成波塞尼亚斯的一种险恶用心，如果他真的准备这样做的话，那他其实只是比别的斯巴达人提前了一步而已，因为在后来的雅典战争中，斯

[1] Simonides, Epigram, quoted in Thucydides I. 132.

[2] 曼弗雷迪(Valerio Massimo Manfredi)是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也是新闻记者和考古学家。——译注

巴达人就开始给予一些希洛人一种有条件的自由，以此来换取他们到斯巴达军队中去服务，这种做法后来还成了斯巴达人的一种惯例，非常普遍。获得解放的希洛人被称作“新代梦人”（*Neodamôdeis*），意思是说他们是具有新公民身份的人，但实际上，他们无法像那些出生在正常的斯巴达家庭，并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斯巴达公民那样享有完全的特权。尽管如此，波塞尼亚斯还是被这种指控吓坏了，于是四处避难，最后不得不跑到斯巴达卫城的神殿里去寻求庇护。在他快要饿死的时候，斯巴达人赶紧把他从那里抬了出来，以免他死在里面污染了圣所的神圣。

只有到了后来，也就是在咨询了德尔斐的神谕之后，波塞尼亚斯的名誉才获得了恢复，并且，斯巴达人为表彰他的功绩还专门建造了一座前所未有的纪念碑，这个纪念碑由两座青铜雕像组成。多年之后，他的名字仍然与列奥尼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向他俩表示敬意，斯巴达每年都会举行运动会。

玛尔多纽斯在薛西斯返回了亚洲之后，担任了波斯人的陆军指挥官，时间是在公元前480年到前479年的那个冬季，地点在帖萨利。在公元前479年的夏季，他向南进发，重新占领并再次摧毁了雅典城，就像他在公元前480年曾经做过的那样。无城可居的雅典人向斯巴达人发出了最急迫的请求，他们恳请斯巴达人从伯罗奔尼撒出兵，越过地峡到希腊的中部来援助他们。斯巴达人按自己的节奏和时间对此作出了回应，他们与雅典人以及其他坚定的抵抗者们在彼奥提亚组成了联军，当时玛尔多纽斯已经撤离了那里。除了雅典的忠诚盟友普拉提亚之外，彼奥提亚的其他国家现在都已经屈服于波斯的威势，成了它的盟国，而且也正是在普拉提亚的领土上，希腊人最终打败了波斯人。

125

波塞尼亚斯可能指挥着由大约40000名重甲步兵组成的联军。在这些士兵当中，斯巴达占了5000名，这个数目达到了斯巴达在国内能够征召到的所有士兵人数的三分之二。他们还带上了同样数目的由“边民”组

成的重甲步兵，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应该还有不少于35000名希洛人与他们一同从国内出发，这些人不但可以担任侍役和辅助人员，而且还可以作为轻装步兵上战场。在波塞尼亚斯领导的联军中，除了这些斯巴达人之外，另外一支重要的重甲步兵部队是由阿卡狄亚的铁该亚提供的，希腊军队的人数即使是在被夸大之后，也仍然要远远少于波斯人。波斯人占据着阿色普斯河（Asopus）沿岸的位置，最初是驻扎在南岸。玛尔多纽斯在战斗开始的时候，用他的主力部队——骑兵——发起了进攻。希腊人用弓箭加以回击，其中的一支箭射中了波斯人的骑兵指挥官的战马，于是波斯人就被击退了。希腊人首战告捷！

然而，最后的主要战役的解决，既不是依靠弓箭手也不是依靠骑兵，而是希腊的步兵，斯巴达人总是被部署在令人敬畏的阵线右翼，雅典人和铁该亚人则在左翼，而麦加拉人、柯林斯人和其他城邦来的人就处于前两者之间。在拖延了八天之后，决定性的战役才正式打响。推迟了这么久，实在很不正常，一种现代的解释是玛尔多纽斯其实并不想和希腊人进行一场事先布置好了的陆地战，而是希望利用拖延的战术来击垮希腊人的士气并迫使希腊军队自行解散，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显然，玛尔多纽斯的这种拖延使波塞尼亚斯遭遇到了非常困难且棘手的问题，他开始无法再继续控制自己的军队并保持士兵们的斗志了，同时，他甚至还打算和雅典人调换在阵地上的位置。

126 无论如何，他决定在晚上的时候撤出自己的军队。他实际上可能只打算撤出居于中央位置的军队，而不是全部的军队；但是，把军队撤退到普拉提亚的计划却不知怎么地就传开了，于是，混乱和骚动就接踵而至。在探知了部分真实状况之后，玛尔多纽斯在这天早晨派出了他的骑兵部队向斯巴达人、“边民”和铁该亚人发起了进攻。希腊人到此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深陷绝境，不但走投无路而且还被遮天蔽日的飞箭压制得抬不起头。也不知为什么，在派出重甲步兵发动冲锋之前，波塞尼亚斯竟然还记得要先给神献祭，并征询神的意愿，尽管当时希腊步兵的武器装备和战斗

力要远远胜过波斯人。

这是波塞尼亚斯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虽然它是如此的短暂。希腊人,尤其是斯巴达人,他们先是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坚守着阵地,使得波斯人的骑兵拿他们毫无办法。在攻入了波斯人设在阿色普斯河北部的栅栏之后,希腊人就开始了大屠杀。普拉提亚,在战争开始之前它本是一个受到诅咒的地方,但是到了最后,坚定的希腊人们却在这里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一支波斯军队胆敢把铁蹄踏入希腊大陆,更不要说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了。一个半世纪之后,一支来自马其顿的希腊军队反而侵入并蹂躏了亚洲。波斯国王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再是希腊外交和政治舞台上的主要人物,而且,普拉提亚的胜利也更加肯定了人们之前在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海战中所得出的结论。

回顾那些从公元前 480 年到前 479 年之间发生的战斗,尤其是温泉关一役,可以被看作不仅是在古典时期的希腊,甚至在整个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中都是一个转折点。如果历史的一部分可以倒转或不发生的话,“世界将会怎样”? 当然,对历史学家们来说,这样的假设有时只是一种有趣的猜想,然而,它也能够成为一种解释前因后果的十分有用的方式。比方说,如果希腊人在温泉关根本没有进行抵抗,或者,即使进行了抵抗,但也没有像列奥尼达和他的斯巴达勇士们所领导的抵抗那样坚决而有效,实际的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 如果那些坚决要进行抵抗的希腊人在公元前 480 年至前 479 年这段时间里失败了,同时,波斯又把希腊的大陆、岛屿以及亚洲西部的沿海地区吞并进了它辽阔的帝国疆域之内,历史又将会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呢?

事实上,我们得感谢斯巴达人在波斯人侵入希腊之前,对自己的社会进行了意义非凡的改造,使它变成了一架运转良好的战争机器,同时,他们在外交上也发展出了一个初级的多城邦之间的希腊人联盟,这个联盟在后来成为了团结整个希腊的各种抵抗力量的核心。斯巴达人在温泉关拼尽最后一人的英勇壮举,显示了波斯人至少还是可以被抵挡得住的,这 127

给另一部分时常处于摇摆当中且又缺乏团结的希腊人增添了信心，使他们可以鼓起勇气去想象他们终有一天能够战胜敌人。正是在像国王列奥尼达、摄政王波塞尼亚斯这样有着超凡人格魅力和军事才能的斯巴达指挥官的领导之下，希腊的陆军才有可能先是坚决地抵抗住，既而在最后还挫败了人数上数倍于己方但组织松散、意志消沉的敌人。

第二部

“斯巴达神话”

第四章 “50年时期”：公元前478年至前432年

131

波斯人败退之后的直接后果是促成雅典组建了一个新的反波斯人的海军同盟，我们把它称作得洛斯同盟（因为爱琴海上的神圣的得洛斯岛是这些希腊国家宣誓结盟，并存放联盟财富的地方）。毫不奇怪，斯巴达不是这个联盟的一部分，尤其是当所有的联盟成员都得承认雅典在政治上享有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时候，这一情形就像伯罗奔尼撒同盟中其他城邦与斯巴达的关系一样。得洛斯同盟是一个全新的组织，因为它重设了关于忠诚和同盟的新誓约。另一方面，公元前478年的秋季在柯林斯建立的希腊人联盟（Hellenic League），当然这是现代历史学家的说法，现在还没有完全被得洛斯同盟取而代之。我们将会看到，直到公元前464年，斯巴达人还是试图在这个早期的反波斯人同盟的框架之下来处理他们与雅典人的外交关系。

希腊人在密卡尔取得了胜利之后，斯巴达并没有马上停止直接参与对抗波斯人的战争，这多少有点出人意外，即使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他们要在距离国土很远的地方去指挥各种海军行动。公元前479年，列乌杜奇戴斯与伯里克利的父亲桑提波斯（Xanthippus）共同指挥希腊联军赢得 132 了密卡尔战役的胜利。公元前478年，列乌杜奇戴斯在陆地上发动了一场针对帖萨利人的报复行动，但是有人认为他这样做其实是为了一己之私，实际上，他还穿上了一种带袖子的衣服，这种式样的衣服明显是波斯

人才会穿的，而且人们发现他的帐篷里还堆满了银器。考虑到他如此明目张胆地收受贿赂以及让人生厌的腐败作风，斯巴达人把他召回了国并且剥夺了他所有的指挥权。不久，摄政王波塞尼亚斯被派遣到一个位于拜占庭的基地，以便继续领导希腊海军。

不幸的是，波塞尼亚斯却表现得傲慢专横，据说还有亲波斯人的倾向（有谣言说他准备与一位地位颇高的波斯女人结婚，除此之外，据说他还喜欢穿波斯人的服装——比亚历山大大帝早一个半世纪），同时，他也没有能力领导盟军的海军，尤其是无法领导那些从爱琴海的大岛屿上来的盟国。雅典利用这个机会取代斯巴达成为了盟军的总指挥。斯巴达人以为他们只要把波塞尼亚斯召回，然后再派遣另一位指挥官去代替他就行了，可是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并且雅典人在亚里斯泰迪斯（Aristides）的领导下，在公元前 478 年或前 477 年冬，率先一步建立了得洛斯同盟。海上作战比在陆上作战要花费更多的金钱，从开始建造战舰到日常的操作维护都需要投入巨额的费用，因此雅典人要求它的盟国，要么按义务派出预定数量的战舰，要么拿出一笔规定的现金来代替义务。正如修昔底德所说的，这就是得洛斯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不同，在公元前 5 世纪的其他时间里，这种日益不受欢迎的进贡成了雅典所推行的愈加帝国式的政策的主题。然而，修昔底德随后又补充道，斯巴达人并不像雅典人那样通过强迫性征收贡物的方式来确保盟国的屈从，斯巴达人：

> 通过在一些城邦国家建立与它相似的寡头政府来获取它们的顺从。[1]

133 不管怎样，我们都得思考斯巴达宪法的性质及其运作的方式，一些人，既有古代的也有今天的，想要去强调斯巴达宪法所具有的开放甚至民主的

---

〔1〕 Thucydides I. 19.

特征。其实,斯巴达与历史上绝大多数帝国都是一样的:支持国外的非民主或反民主的政权;如果武力是唯一可以确保帝国自身的安全并且让外国的朋友和追随者们感到满意的途径的话,它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通过武力来强迫不情愿的大多数民众接受寡头的统治。

无论如何,在任何时候,这都不是一个零风险的政策,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早期,一些离斯巴达不远的盟国对斯巴达表现得很冷淡,它们不但有了独立的想法,而且甚至还想模仿雅典人进行民主政治的试验。比如,有证据显示阿卡狄亚的门丁尼亚(Mantinea)和埃利斯在公元前470年就采用了一些民主制的决策方式,并且就在这同一个十年中,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这位伟大的战争领导者不再对波斯战争感兴趣了,而是千方百计地想要去削弱斯巴达的力量,他积极地煽动新建立了民主政府的阿尔戈斯与斯巴达作对。

显然,所有这些都使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公元前465年或前464年爆发的大地震直接摧毁了它的城镇,并引起了同样严重的由希洛人和美塞尼亚两个城镇的“边民”一起发起的暴动,准确地说,这些事件都使斯巴达的地位受到了冲击。希罗多德的《历史》的第九卷的最后一个段落就准确地说明了斯巴达在公元前470年到前460年这段时间里所经受的种种困难的性质和规模。他简要地告诉了我们关于两个占卜师(*manteis*)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彼此之间可以形成对照,这两个占卜师都来自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关键盟友——埃利斯。

他们中的第一个,海该西斯特拉托斯(Hegesistratus),希罗多德如此描述他:

> 这是铁里亚达伊族当中最有声名的人物。[1]

在埃利斯,占卜是一项世袭的、家族性的工作,这和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

---

〔1〕 Herodotus IX. 37.

海该西斯特拉托斯为了金钱投靠了希腊的敌人——波斯人，并且成为了
134 玛尔多纽斯最重要的占卜师。这显然比只是态度上亲波斯要更加严重，他是因为自己的个人原则才反对斯巴达的，因为他可能也是一个支持民主政府的人。总之，海该西斯特拉托斯曾经被斯巴达人逮住过，并且被关进了一个仓库中囚禁了起来，逮捕他的理由是因为他开展了一些反对斯巴达的活动。当想到自己可能已经时日无多的时候，他决定逃跑（他可能曾经听说过斯巴达国王克列欧美涅斯的悲惨结局），他竟然削掉了自己的一只脚，然后摆脱镣铐从仓库里爬了出来，逃脱了。希罗多德把他这一举动称作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勇敢的事”，说来也古怪，他这样做竟然为的是可以继续在波斯战争中为玛尔多纽斯卖命。但是在这场战争结束后，斯巴达人在靠近希腊西部的札昆托斯岛（Zacynthus）上又抓住了他，这次斯巴达人什么机会也没有再留给他，立马就处死了他。

这另外一个来自埃利斯的占卜师叫提撒美诺斯，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高贵的名字（俄瑞斯忒斯的儿子的名字）。希罗多德细致地讲述了提撒美诺斯高贵的祖先的事迹，并且强调他和他的兄弟（没有名字）是唯一一次有两个外邦人获准成为了斯巴达的正式公民。所有传统的希腊城邦都非常珍视这种公民身份，因此绝不会轻易地把它授予外人，而且斯巴达人对这个问题尤其小心谨慎。仅仅是出生在斯巴达的人并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公民，一个人只有凭借自己杰出的才能才可以获得公民身份并且保有它，更确切地说，是不会因为经济或社会原因而失去它。在公元前470年年末的时候，摄政王波塞尼亚斯被指控密谋策划给予希洛人斯巴达公民的身份，这一指控如果属实的话就足够让他下台并被处死了。“边民”充其量只是第二等级的拉西代梦的公民，而不能被称作斯巴达人。在撒美诺斯开出的条件获得满足后，他开始为斯巴达人工作，在他专业性的辅助下，斯巴达人在接下来的十五至二十年里连续赢得了五次关键性战役的胜利。

提撒美诺斯

135

希罗多德关于提撒美诺斯为何要去为斯巴达效力，并且最后还成为斯巴达公民的解释，牵涉到一个典型的德尔斐传说。提撒美诺斯曾经到德尔斐为了子嗣的事情而请示神谕，女祭司给他的回答显得模棱两可：他注定要“在五场最伟大的角逐中取得胜利”。他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注定要在最重要的田径比赛，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成为五项全能的冠军，而且实际上他后来也只在一个项目上失误而没有拿到桂冠。然而，阿波罗的真正用意却是要他去担任正式的占卜师，并最终帮助某个城邦赢得五场不同战役的胜利，因为在希腊语中“角逐”(*agônes*)一词除了有田径比赛的意思之外，其实同样还可指“战争”。

斯巴达人大概是通过安插在德尔斐的“眼线”听说了此事，接下来，斯巴达人与提撒美诺斯进行了一连串富有戏剧性的讨价还价。斯巴达人愿意给他报酬，大笔的现金，然而他索要的却是象征性的奖赏——获得一个斯巴达公民的身份。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公元前480年以前，此时正好是波斯大军兵临城下之际，再加上斯巴达人向来对来自德尔斐的预言敬畏有加，他们相信这些预言会支持他们的事业，考虑再三，斯巴达人最终决定作出让步并答应了提撒美诺斯的要求，可能还满足了他要把自己的兄弟也一块儿拉上的条件。

这就是提撒美诺斯为何能够成为斯巴达的正式占卜师的缘由，他的地位排在了所有斯巴达本地占卜师的前面，他通过观察牺牲的方式来解释预兆，然后为指挥军队的国王或摄政者提供建议。对斯巴达人来说，这种军事性的占卜活动，其重要性不亚于那些为战争而进行的、显而易见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也不亚于这些因素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斯巴达人在行事之前必须先问问神的意愿，不但在之前，甚至在战斗的过程中都要占卜问神。任何显示在牺牲的内脏上的不吉迹象，都可能会被一

136 位斯巴达指挥官理解成不再与敌人交战或中断交战状态的信号;可能纯粹从世俗的或“理性的”观点看来,用这样的方式来决定自己是否行动还是不行动显然是十足不明智的。占卜师成为了决定战争的关键人物,他们常常是指挥作战的国王的固定随从或顾问。斯巴达人在与战争有关的所有宗教活动上都表现得谨小慎微,因此,色诺芬(Xenophon)把斯巴达人称作整个希腊世界唯一的“精通战争的巧匠”。

通常情况下,斯巴达人能够培养出自己本土的专业占卜师来,而且数量也有保证。在斯巴达,祭司和占卜师的工作也是由世袭的家族来完成的,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很有可能是公元前 5 世纪 80 年代的特殊状况让斯巴达人忽视了他们通常的排外心理,并且打破惯例应允给予提撒美诺斯和他的兄弟以斯巴达的市民身份——然而,我猜想真正的事实可能因为这两个人都是从埃利斯——这个关键但不可靠的伯罗奔尼撒盟邦来的贵族,他们在占卜方面的能力可能并不比斯巴达国内那些世袭的占卜师们要高明多少。

在提撒美诺斯的帮助下,斯巴达在五次战役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是在公元前 479 年的普拉提亚一战中,这最后一次则是公元前 458 年或前 457 年的塔那格拉战役(Battle of Tanagra),下面我们还会重新谈谈与之相关的一些具体情况。这两次战役都是斯巴达反对来自外部的敌人,如波斯和雅典,但是他们获胜的其他三次战役在某种意义上则显得更加引人入胜,且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与斯巴达发生战争的差不多都是来自伯罗奔尼撒内部的敌人:其中规模较大的是镇压因公元前 464 年大地震而引发的、由美塞尼亚的希洛人和两个美塞尼亚城邦中的“边民”发动的暴动;规模较小的两次,首先是与铁该亚人(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盟国)和阿尔戈斯人(Argives,斯巴达的宿敌)城邦之间的战争,其次,是与除了门丁尼亚人之外所有阿卡狄亚人作战。希洛人与“边民”的暴乱我们稍后再谈,接下来我们仔细地讨论一下斯巴达与这两帮不同的阿卡狄亚盟国之间的两次战争。

斯巴达要想控制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话,阿卡狄亚就绝对是其中最关键的地方。阿卡狄亚的铁该亚是与斯巴达最接近的城邦,因而其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能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第一个盟国,同时,阿卡狄亚在地理位置上控制了斯巴达从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通往伯罗奔尼撒北部以及希腊中部的必经之路。分而治之,是斯巴达所采取的许多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一项,目的就是要阻止任何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盟国与阿尔戈斯勾结起来。铁该亚与阿尔戈斯的联合给斯巴达带来了潜在的灾难,其程度几乎就像公元前390年柯林斯与阿尔戈斯联合起来对抗斯巴达一样,(斯巴达与这个联盟之间的战争)是提撒美诺斯帮助斯巴达取得的五次胜利中的第二次。这场发生在斯巴达与铁该亚人和阿尔戈斯人联盟之间的冲突的情况,我们只能从希罗多德那里知道一点。战争的地点在铁该亚,这个地方离斯巴达本土实在太近了。时间是在公元前470年的某一天,这个时间是可信的,同时,这场战争的爆发很有可能与地米斯托克利出现在阿尔戈斯有着因果关系。

提撒美诺斯帮助斯巴达人取得的下一次胜利是在迪帕伊耶(Dipaea),此地也叫迪帕伊耶斯(Dipaieis),同样与铁该亚距离不是太远,位于阿卡狄亚地区的南部边境上,这是个令斯巴达人感到忧虑的位置。对于斯巴达人来说,最令人欣慰的迹象来自这个地区的门丁尼亚,它是阿卡狄亚的另一个主要城邦,已经决定要么保持中立,要么站在斯巴达这一边。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门丁尼亚在不久以前已经变成了民主政体(可能是受到了地米斯托克利影响),并且越来越疏远斯巴达,反而与阿尔戈斯越走越近了,这两个城邦本来更有可能威胁到斯巴达的安全,这一点可以从普拉提亚战役中,这两个城邦最后才到达阵地这一情况推断出来。此时,在阿卡狄亚内部的城邦中,铁该亚和门丁尼亚之间出现了争夺领导权的情况,斯巴达人作为运用分而治之策略的高手,当然非常清楚该如何在阿卡狄亚人内部使用这种策略。无论如何,斯巴达人最后顺利地取得了胜利,这次胜利被认为是在提撒美诺斯的帮助下取得的第四次胜利,这是

斯巴达在普拉提亚战役之后所卷入的最为艰难的一次武装冲突。

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的大地震沉重地打击了斯巴达，如果138当时的古人有现在的测量仪器的话，这次地震应该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震级。地震学家发现，它的破坏性影响扩散到了很远的地方。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在公元前1世纪的著作中说(他只是复述了公元前4世纪的一位普通的历史学家埃弗鲁斯的记述)，斯巴达的伤亡人数非常巨大，达到了20000人，这个数字可能有点夸张，这次地震尤其造成了大量年轻人的死亡(如果这种说法确凿的话，这样的损失当然会给下一代造成严重的人口问题)。无论如何，这场地震并没有阻止国王阿基达马斯(Archidamus)——他从列乌杜奇戴斯那里获得了欧里庞提德的王位——在迪帕伊耶领导斯巴达人迅速地行动起来，组建一支军队并挫败了所有来自希洛人的直接进攻。可是，即使是他也不能阻止全体美塞尼亚的希洛人的暴动，相对于在拉科尼亚的远亲，他们谋反的心情总是更为热切，此外，他们还和居住在美塞尼亚东南部的两个“边民”城镇——托瑞厄(Thouria)和埃索伊(Aethaea)的人联合了起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民族主义者的起义，而在另外的意义上，这是一场在经济上受剥削的底层阶级发动的叛乱。

希洛人认为地震简直就是上天赐予他们的良机，是神让他们去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暴动。斯巴达人把这场地震归因于震动大地轰隆作响的天神波塞顿的愤怒，在斯巴达以及拉科尼亚的几个地区，这位天神受到了人们的虔诚崇拜并被尊称为“掌管大地的人”(Earth-Holder)。斯巴达人不明白为何这位神会对他们如此愤怒？获得官方认可的观点是，斯巴达人之前曾经杀害过一些到塔伊那隆(Taenarum)的波塞顿神殿中寻求庇护的希洛人。这是确有其事的，塔伊那隆位于拉科尼亚南部，也就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部突出部分的最底部。希洛人有在此避难的权力(英语中的“asylum”一词就直接来源于希腊语，意思就是避免受到暴力的报复)，这是希腊人曾经达成一致的传统协议，但是，斯巴达人没有尊重这个协议而是把这些希洛人从波塞顿的神坛前拖了出来，并处死了他们，这

显然是亵渎神灵的行为。推测起来，斯巴达人必定是经受了不同寻常的压力才会如此冒险行事，这一事件可能与摄政王波塞尼亚斯的“阴谋”有关，而这个“阴谋”又与希洛人有着直接的联系（可参见本书第三章）。无论如何，这场地震无疑正好发生在斯巴达与希洛人关系特别糟糕的时期，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会有如此多的希洛人会揭竿而起，而且他们中既有美塞尼亚人也有拉科尼亚人。

没有什么其他古代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次暴乱的整个过程。实际上，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留下的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究竟这次暴乱持续了多久？修昔底德说它整整持续了十年，可是，他据以得出这个结论的那些手稿可信吗？经过一种简单的古文转译之后，时间就减少到了四年，这个数字显得更为可信，依此类推，这次暴乱大约是在公元前 460 年结束的，这是个粗略的说法，可即使是四年的暴乱也够让斯巴达人难受的；另外一种资料对此事的记载听起来似乎是相当真实可靠的，据说这场暴乱是以斯巴达人对美塞尼亚的司铁尼克列洛斯平原（Stenyclarus）上的伊托美山（Ithome）实施长时间的包围后才算结束。这座山是一处天然的要塞，它就像雅典的卫城那样，并且，早在公元前 7 世纪的第一次美塞尼亚人暴乱或所谓的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中，美塞尼亚人就开始把这里当作他们最后的抵抗之地。

在这次暴乱被镇压之后，斯巴达看来好像不得不容忍或鼓励一个“边民”城镇在它附近的地区发展起来。考古显示，在宙斯—伊托美山（Zeus Ithomatas）附近的聚居区里发现了当时的居民举办宗教仪式时的献辞，它们有些是雕刻的铭文，有些是印制的。在公元前 4 世纪的 50 年代，这些人没有像南部的埃索伊和托瑞厄这两个“边民”城镇的居民那样参加这次暴乱，但是，他们也没有阻止起义的希洛人占领伊托美山的山顶作为最后的抵抗地，这里可以说是起义的希洛人的马察达（Masada）[1]。事实

〔1〕 古代以色列东南部、死海西南岸的一个山头堡垒。公元 73 年，经过历时两年的被围困后，吉拉德犹太教派成员在这里集体自杀，未向进攻的罗马人投降。——译注

上，如果需要这个在拉科尼亚的“边民”城镇去防御希洛人的暴乱的话，它最起码也可以起到一点威慑的作用，但是，在美塞尼亚的这些“边民”聚居地实在太少了，也太远了，而且力量相对来说非常薄弱，因此，斯巴达人才不得不到它领土之外的其他盟国那里去搬救兵。

140 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给斯巴达招致的麻烦和损害，其程度和时间甚至超过了地震和暴乱本身。因为斯巴达人并不仅仅是到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国那里寻求帮助，这个同盟的条款明确规定每一个盟国都要“尽其所能地去帮助斯巴达”。斯巴达人同时也向雅典寻求援助，这显然是根据之前它们在公元前481年订立的反波斯“希腊人联盟”的协议作出的决定。尽管雅典并不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国，而且它遵守的是与斯巴达完全不同的民主宪法，此时它也更为关注波斯的动向，正努力把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爱琴海和希腊的北部去。尽管如此，它还是答应向斯巴达伸出援助之手，并且这种援助还不是象征性的而是货真价实的——4000名重甲步兵！这要感谢奇蒙(Cimon)不辞辛苦地在雅典为斯巴达所做的说服工作，他对斯巴达人抱有好感，甚至还称呼自己的一个儿子叫拉西达梦纽斯(Lacedaemonius)，也就是“斯巴达人”的意思。

在希腊人把波斯入侵者驱逐出去后，地米斯托克利就开始集中精力在伯罗奔尼撒人中间煽动不和与冲突，以此来对抗斯巴达。后来，奇蒙成为了雅典日渐强大的海军的司令，并指挥得洛斯同盟的舰队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其中最卓越且最重要的战绩是大约公元前466年在帕姆庇利亚(Pamphylia)的埃乌律美东河(River Eurymedon，位于小亚细亚南部)取得的。因此，当斯巴达向雅典寻求帮助以对付希洛人暴乱的时候，奇蒙正处于其政治生涯的顶峰，但是，这个帮助斯巴达人的决定也断送他自己的政治前途。

这支雅典军队一抵达美塞尼亚之后，我们就知道到底是哪儿出错了，而且错得厉害。斯巴达人之所以想得到雅典人的帮助，本是希望能够利用他们在攻城方面的丰富经验来对付希洛人，可事实上，当美塞尼亚的叛

乱者在伊托美山筑起壕沟与斯巴达人打起游击的时候,雅典人的攻城术根本就派不上用场。更让斯巴达人忧心忡忡的是雅典士兵们的态度问题。这些士兵本来就不是雅典最穷或地位最低的人,雅典人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有能力承担得起给自己装备重甲和武器的费用,因此,这4000名重甲步兵算得上是雅典城里生活比较宽裕的人。另外,到他们那一代的时候,雅典人已经差不多在某种形式的民主政府下生活了近半个世纪,让他们感到非常意外甚至震惊的是:斯巴达人的希洛人“奴隶”不但不是野蛮人,而是与他们有着同样令人自豪的文化传统的希腊人,于是,这些雅典人开始变得越来越同情希洛人起来。

斯巴达人对雅典士兵的这种态度转变有点反应过度,他们以为雅典人想要“彻底改革”斯巴达的政制,换句话说,他们认为雅典人正在斯巴达制造某种社会或政治上的动乱。于是,斯巴达人要求雅典人立刻打道回府,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雅典是所有援助国中唯一被要求撤军的城邦,斯巴达人如此公然地破坏外交礼仪,却无法给出任何令雅典人感到满意的解释。奇蒙在雅典的威信立马一落千丈,仅仅在两三年之内,他就信誉扫地并被城邦放逐。他想在希腊世界里建立一种由雅典和斯巴达进行“双元”共治的领导模式失败了。后来,雅典人把参加暴动并躲在伊托美山的希洛人中的幸存者安置到一个新的避难所——纳帕克塔斯(Naupactus),位置就在柯林斯海湾的北部海滨,这简直就是在斯巴达的伤口上撒盐。尽管希洛人的暴乱早在公元前460年就被镇压下去了,但斯巴达之后马上发现它还是被卷入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60—前445年)当中,我之所以如此称呼这次战争,目的是要区分我们以前常称的那场“伯罗奔尼撒战争”,即公元前431年到前404年发生的“雅典战争”。

斯巴达的一些盟国,如同样建立了民主政府的门丁尼亚人,可能会因为他们的领导者——斯巴达——对雅典采取如此专横的态度而感到失望。这样,斯巴达就需要证明它仍然还有能力去显示自己的意志和决心。

而唯一能证明这种能力的场所就是在激烈的阵地战中，斯巴达仍然表现得比其他盟国要高出一筹，这是无可争辩的。公元前 458 年或前 457 年，斯巴达率领着一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横跨柯林斯地峡进入了希腊的中部地区，直抵彼奥提亚的塔那格拉。修昔底德心急如焚地告诉我们，在雅典城内有一帮人与斯巴达人勾结，企图利用斯巴达大军突然压近的态势来迫使雅典的民主派倒台，然后在雅典建立寡头政府，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中，斯巴达最乐意与这样的政府相处。然而，尽管斯巴达人在塔那格拉打败了雅典人及其盟友，但离最初想要达到的迫使雅典进行政府改换的政治目标还相差甚远，于是，斯巴达人放弃了进一步的打算，反而为自己能够平平安安回家而暗自庆幸。

142

我相信，也是在这个时期，斯巴达人，毫无疑问也是非常不安地决定对他们的军队作一次大的调整。之前大地震已经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斯巴达人的死亡，紧接着又发生了有两个“边民”城镇参与的希洛人暴乱。塔那格拉之战尽管取胜但也差点断送了斯巴达。我想，正是基于这三个事实，才促使斯巴达人想要把“边民”中的重甲战士收编到正规的斯巴达军团中来。这样做既可以确保“边民”对斯巴达的忠诚，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提高正在急遽下降的斯巴达公民的数量。这种做法与英国军队在殖民时期招募尼泊尔廓尔喀族人进入正规军队的做法并不完全一样，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希腊公民军队的最重要的组建原则。尽管这些“边民”可以被称作“拉西代梦人”，就像斯巴达人那样，但他们并不是与斯巴达人一样可享有同样权利的公民，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够格者”这样有组织的严格训练，或者没有被选入“公餐食堂”。这样的收编行动在公元前 479 年之后，以及公元前 418 年的门丁尼亚战役之前的时间里都出现过几次。斯巴达人在公元前 5 世纪 50 年代，即塔那格拉这场战争之后之所以决定这样做，在我看来，是因为这个时期对于斯巴达人来说，正处于其军事安全上最为危急、紧迫的时期，当然这都只是我的猜想而已。但这也符合为何斯巴达人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表现不佳的事实。

相反,雅典人却因他们在塔那格拉的战斗中相对较好的表现而大受鼓舞,几个月内,他们就使自己成为了几乎整个彼奥提亚的统治者。在爱琴海,他们从一个小小的陆地帝国一跃而成为一个强大的海上帝国。斯巴达相对来说是失败了,还意外地失去了埃吉纳,在雅典人看来它在萨罗尼克海湾中是一个有着战略意义的重要岛屿,伯里克利曾经明确地指出它是“比雷埃夫斯港的眼中钉”。埃吉纳是伯罗奔尼撒的盟国,雅典人先是包围,然后攻占了它,并把岛上的全体居民都驱逐了出去,以示惩戒,最后再派遣自己的移民居住到了这个岛上。在这种情况下,伯罗奔尼撒能做的就是给这些无家可归的埃吉纳人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提供了一处临时的避难所,这个地方就是库努里亚(Cynouria,也称杜列亚),位置在斯巴达与其死敌——阿尔戈斯接壤的东北边界上。实际上,虽说埃吉纳人只是临时借住在这里,可这一住几乎超过了半个世纪。

接下来,所谓的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又打打停停地持续了十年,当雅典试图同时维持它作为希腊中部的陆地帝国和海上霸主的地位的时候遭遇到了失败,这次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也就基本结束了。公元前446年,雅典不得不应付两次同时发生的叛乱,一次来自西部侧翼的麦加拉(它之前也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一个盟国),另一次来自优卑亚。这对斯巴达来说无疑是一次发动进攻的天赐良机,国王普雷斯多安那克斯(Pleistoanax),他在塔那格拉之战以后就到了法定的登基的年龄,事实上,他真的率领了一支盟国的军队越过柯林斯地峡,向东突进到了雅典的领土内,可是当他到达了埃列乌西斯的附近地区的时候,竟然又莫名其妙地宣布撤退了。雅典人抓住这个难得的喘息机会,马上重新控制了优卑亚,这个岛的战略意义远远要大于麦加拉。不久以后,雅典和斯巴达就开始谈判,然后缔结了一份新的协议,即后来所谓的“三十年和平协议”。

这份协议的基本内容是:每一方都“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斯巴达人实际上承认了雅典人的帝国地位,而雅典人则相应地承认了斯巴达在伯

罗奔尼撒同盟中的领导权。这样，希腊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就被划分到这两大集团当中，这二者之间现在可以说是实现了某种形式的力量平衡。然而，普雷斯多安那克斯，尽管他可能是奇蒙提出的“二元共治论”的坚定支持者，但他还是遭到了废黜并被放逐，斯巴达国内的反对者认为他背弃了斯巴达的最大利益，他被指定放逐到阿卡狄亚的一个神殿里，几乎长达二十年。

同样还是这些反对者，在公元前445年默许了和平协议的签订，也许同样还是这些人在四五年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去破坏这份规定了三十年和平的条约。公元前441年，一些萨摩司岛上的居民来到斯巴达，像他们的那些先辈一样试图来说服斯巴达人，他们的先人曾经在公元前525年的时候，说服斯巴达人派遣了一支海上远征队去推翻僭主波律克拉铁斯。这一次他们竟然又成功地说服了斯巴达人，以至于人们怀疑斯巴达的领导人可能与萨摩司的一些重要人物之间，曾经存在着某种非常紧密的私人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直到此时还在发挥作用。无论如何，希罗多德说他曾经在斯巴达遇到过一个叫阿基阿斯(Archias)的人，这位阿基阿斯的祖父(与他有一样的名字)曾经是公元前525年那支远征军的一员，因为他骁勇善战，萨摩司人还曾经为他举办过国葬。这位年轻的阿基阿斯大概是位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公开号召斯巴达人去帮助那些拥护寡头统治的萨摩司人，这些人想从雅典的帝国中叛离出来。

然而，尽管斯巴达人确实是被说服了，但是这次的情形和公元前525年大不一样，因为它的盟国柯林斯不同意这次行动。柯林斯人还四处游说大多数其他的盟国，告诉它们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不要“被斯巴达人牵着鼻子到处乱跑”。无疑，这确实是一个需要三思而后行的决定。斯巴达人到现在仍然没有建立起海军，缺乏这样的必要条件就根本不要指望到海上去打败雅典人，即使萨迪斯的波斯总督愿意为他们建立海军提供金钱和装备上的帮助。尽管如此，萨摩司人的叛乱还是迫使雅典人进行了一次非常漫长而且代价高昂的海上封锁，这次行动由伯里克利领导，在叛

乱最终被镇压后,雅典人对萨摩司人实施了残酷的报复和惩罚。实际上,一些萨摩司人认为,公元前440年到前439年发生的这次叛乱几乎使雅典人丧失了在海洋上的控制权,在爱琴海东部的霸权。

当然,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一点,尽管以他的实际年龄他可能并没有经历过这一事件。在简要叙述发生在公元前480年至前479年的波斯战争和公元前431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即雅典战争的时候,他选定萨摩司人叛乱作为一个时期的结束。在这之前,即公元前435年,在科西拉岛(Corcyra,即科孚岛)上爆发了一次政治动乱,修昔底德认为这一事件是雅典战争最为直接的起因,也是导致整个希腊局势急转直下的最为重要的缘由。他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即雅典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雅典的势力不断增长,从而使斯巴达人感到恐惧。他们认为如果不加以阻止的话,雅典人就会逐渐损害甚至最后摧毁斯巴达。雅典人在公元前439年的时候狠狠地修理了叛乱的萨摩司人,就是它的帝国力量的一次充分体现及证明。

145

雅典帝国的力量的增长已经构成了实际的威胁,于是,在公元前432年,斯巴达人宣布双方在公元前445年制定的和平协约不再有效,他们指责雅典人的错误行径破坏了它。事实上,是斯巴达人迈出了重新开战的关键性一步,他们最初完全不顾德高望重的国王的劝告,而且这位国王后来还不得不率领着斯巴达人重返战场,他就是阿基达马斯二世。

阿基达马斯二世

(统治时间:公元前469年至前427年)

阿基达马斯,意思是人民的“领袖”或统治者,在斯巴达历史上有两位国王都用这个名字,阿基达马斯二世属于斯巴达两个王族中地位较低的家族,即欧里庞提德王族,他当政的时间长达近四十年。他出生在公元前500年,父亲叫杰乌克西戴莫斯(Zeuxidamus);这个族人的名字的词尾“-

damus”，表示他们家族与某个祖先(*damos*)有关系，从而可以获得普通斯巴达人的另眼相看，这可能是因为欧里庞(Eurypon)的后裔们意识到他146们自己的地位比更为杰出的阿基亚德家族要低吧！然而，杰乌克西戴莫斯从未登基称王，他也许比他的父亲列乌杜奇戴斯二世还要早去世，列乌杜奇戴斯二世死于公元前470年，尽管他曾被贬黜并几乎被流放了近十年。相反，阿基达马斯却在所有的斯巴达国王中享有了最为漫长的统治时光，而且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统治着斯巴达。总的来说，他的统治是成功的，因为他扩大了斯巴达对雅典的优势。

阿基达马斯第一次出现在文献资料中是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的中期，作为斯巴达军队的指挥官，他在迪帕伊耶之战(Battle of Dipaea)中平定了一些伯罗奔尼撒同盟内部的严重的不满情绪。不久以后，他成为了斯巴达的救星，因为他把这个国家从地震与希洛人叛乱这两次重大的危机中拯救了出来。然后，在关于斯巴达的历史记载中，他直至公元前432年才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当斯巴达人举行大会的时候，他在会上认为对雅典宣战这样重大的事情首先要进行谨慎的权衡，并警告斯巴达人不要仓促行事。就像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称赞欧里庞提德家族的前辈戴玛拉托斯那样，修昔底德也认为阿基达马斯的这个建议是富于智慧的。而修昔底德之所以这样，目的就是要说明当时形势的真实状况，并且预示了这场战争后来的实际进程。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修昔底德对阿基达马斯的赞美之辞确实是恰如其分的。

我们稍后再来谈阿基达马斯在自己漫长执政生涯的最后阶段的所作所为吧！首先，让我们把目光重新回到公元前5世纪的70年代，他娶了拉姆披多(Lampito)，列乌杜奇戴斯与自己的第二位妻子所生的女儿，也就是阿基达马斯的继姑妈。这显然不可能是一场因为恋爱而结合的婚姻。确切地说是一场政治促成的婚姻，而且，更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量，因为这样可以确保父亲的财产牢牢地保留在儿子手中。阿里斯托芬的戏剧《吕西斯特拉忒》中有一位强有力的斯巴达妇女，也叫“拉姆披

多”,阿里斯托芬有可能采用的是另一位与拉姆披多同名的妇女的事迹吧!阿基达马斯和拉姆披多生了一个儿子——阿吉斯,阿吉斯在公元前 427 年或前 426 年的时候继承了王位。拉姆披多死后,阿基达马斯又娶了一位非常矮小的女人作妻子(或者可能是在斯巴达妇女中,她是比较矮小的)。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埃乌帕丽尼亚(Eupolia,字面意思是“小马驹”,在古代希腊拥有马匹是一种较高社会地位的象征),她和阿基达马斯一共生下了两个孩子:儿子阿吉西劳斯(即后来的阿吉西劳斯二世)和女儿库尼斯卡(“小狗”或“小母狗”的意思)。

147

关于阿基达马斯,还有一件事就是他与雅典的伯里克利是“*xenos*”关系。“*Xenos*”一词常常被翻译成“宾朋”(guest-friend),因为这种关系涉及相互之间的殷勤好客(就像法语中的 *hôte* 一词,它与“*xenos*”一样既可表示“主人”也可表示“宾客”),但这是一种相当不完整的翻译。“*Xenos*”的根本意思是指“外乡人”、“外人”、“外国人”;而“*xenoi*”在“宾朋”这层意思里,则总是指外国人,即双方分处不同的政治社会中。此外,“*xenia*”指的是一种古老的、贵族间的关系,或者至少是杰出人物之间的关系。比较典型的情况是,双方都是希腊人,但是这种情况也可能扩展到非希腊的社会中去,比如,一位没有高贵血统的希腊公民也有可能和波斯大帝建立一种“*xenia*”关系(就像在公元前 4 世纪初,斯巴达的安塔西达斯和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二世之间的关系一样)。“友谊”(friendship)在英语中是非常平淡的一个词,它更多地指的是一种从道义上和精神上维系两人的关系,环境的变化可能会诱使或迫使“*xenoi*”中的一方优先把他的“*xenos*”给予自己的国家(就像后来 E. M. 福斯特的那句有名的格言——如果要在出卖朋友和背叛国家之间作一个选择的话,他希望自己永远是选择后者)。无论缔结还是维持“*xenia*”关系,都得通过正式的宗教仪式来加以确认。因此,综上所述,“*xenos*”在这里可以被翻译成“通过正式仪式而缔结的宾朋”,这种译法看起来很笨拙,但又不得不如此。

最后,这种关系并不简简单单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同时也是两个家族

之间的"遗产",这种关系是可以世代相传的,即使"*xenia*"的一方或双方的后代都不再知道这种关系了,它也还依然存在。在《伊利亚特》中就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希腊人狄俄墨得斯(Diomedes,来自伯罗奔尼撒的提林斯)和利西亚人格劳柯斯(利西亚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南海岸上)相遇了,狄俄墨得斯必须去提醒或者告诉格劳柯斯,他们之间是世袭的"*xenoi*",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斯巴达的阿基达马斯和雅典的伯里克利之间就存在这样一种关系。我们不知道他们这种世袭的友好关系是从何时开始的,但是,一种似乎有道理的猜测是,这种关系开始于公元前 479 年,即从阿基达马斯的祖父列乌杜奇戴斯二世和伯里克利的父亲桑提波斯一起作为希腊联合舰队的指挥官的时候开始的,并且,当时应该还举行了所有必要的仪式,而且双方都互换了信物。

148

据记载,这种存在斯巴达与雅典的上层人士之间的"*xenia*"关系并不少见。与阿基达马斯同时代的一位叫做伯里克雷得斯(Pericleidas)的人,他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雅典人"(Athenaeus)。公元前 4 世纪 60 年代,正是伯里克雷得斯极力呼吁斯巴达人为对付希洛人暴乱而向雅典请求帮助的,而在雅典人这边与他相呼应的则是奇蒙,他在雅典极力说服雅典人去援助斯巴达。原则上,伯里克雷得斯和奇蒙无疑都相信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可以通力合作,同时,他们家族之间的私人关系也使他们更加愿意去促进这两个城邦互相合作,而不是彼此敌对。

但是,伯里克利和阿基达马斯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如此。伯里克利似乎很早就决定不再顾及与任何斯巴达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或交往了,在他看来,斯巴达而不是波斯,现在已经成为了雅典最为主要的潜在的敌人。他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发展雅典的力量以对付斯巴达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直至最后与斯巴达人兵戎相见,也在所不惜。因此,一种更为有趣的说法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即雅典战争的爆发,其实是因为这两位领导人所属的家族之间的龃龉。这大概算得上是围绕这次战争的爆发所发生的一件小插曲吧!

在公元前432年,斯巴达和雅典的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了,绝大多数斯巴达人都认定雅典人是错误的,因此,正确的决定似乎就是立马与雅典人开战。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召开的大会上,斯巴达的重要盟国柯林斯的代表以及来自敌人——雅典的代表都被邀请作了发言。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只有两位斯巴达的领导人说了话,当然修昔底德也可能遗漏 149 了其他人的发言,即那些从写作艺术的角度来看,没有多大价值的发言。这两个人分别是阿基达马斯,以及强有力的监察官斯森涅莱达斯(Sthenelaidas)。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阿基达马斯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反对向雅典宣战,更不用说为雅典辩护了。他只是表示,斯巴达人在决定宣布战争或加入战争之前,应该考虑得更长远点,并且尽量通过外交斡旋来争取时间。他的发言内容四平八稳,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此也相对来说比较冗长。斯森涅莱达斯的反驳就显得简短且毫无艺术性,他直接挑明自己的想法:雅典人破坏了公元前445年签定的和平条约,斯巴达人为此感到非常愤怒,因此,应该与雅典人决一死战!可能是因为富有经验的阿基达马斯是地位较高的当政国王(另一位共同执政的国王普雷斯多安那克斯因为叛国,在公元前445年就已经被流放了),而且将来不可避免地还得由他来带领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去对付雅典,因此,他的观点受到了尊重。第一轮投票,通过大声呼喊——这是斯巴达人通常采用的投票方式,没有作出什么决定性的结论。于是,斯森涅莱达斯利用一般斯巴达人不愿显得胆怯、畏缩的心态,要求采用分组的方式来进行表决,结果大多数 149 斯巴达人赞成了对雅典宣战。

即使如此,在这次表决之后,斯巴达人实际上还是继续与雅典进行了外交上的斡旋,甚至在德尔斐的神谕同意他们进行战争之后,他们也并未立刻开战。无论如何,这说明阿基达马斯已经无力再掌控局面了,斯巴达人给雅典人发出的最后通牒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个通牒说,如果雅典驱逐那些“被神诅咒的人”的话,战争就可以避免。“被神诅咒的人”指的是

雅典人中的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Alcmeonids),这个家族的人在公元前7世纪的早期曾经亵渎过神灵,因而多年以来一直受到诅咒。但是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的人认为,斯巴达人现在在最后通牒里重提旧事,其真实目的是要扳倒伯里克利,因为他的母亲就是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的人。没有人比阿基达马斯更加清楚伯里克利的家族责任(family liabilities)了。

150 当这种外交上的讨价还价结束之后,阿基达马斯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军队已经准备入侵阿提卡了,伯里克利反而担心他的"*xenos*"——阿基达马斯可能会借此故意破坏他在雅典的权威地位,于是,不管是故意还是无意,他宣布把自己的主要领地都"国有化",更确切地说,他把这些土地都交给了城邦。他之所以这样做,为的是防止阿基达马斯在破坏其他雅典人在阿提卡的土地的时候,可能会有意不去碰他的财产。实际上,阿基达马斯似乎根本就不想去蹂躏任何雅典人的土地,甚至是到了公元前431年,军队开始出发的时候,他还在试图寻找任何可能的转机。他似乎还是不太情愿与雅典进行一场彻底的战争。

然而,在公元前430年夏季的早期,他又重新领导着一支伯罗奔尼撒军队进入了阿提卡,双方最初用重甲步兵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常规作战。大瘟疫(可能是斑疹伤寒)在雅典爆发的时候,他立马就撤退了自己的军队。公元前429年,他领导了一支伯罗奔尼撒军队集中全力去围攻雅典的盟友——普拉提亚,而不是去蹂躏阿提卡和威吓雅典。到了公元前428年,他又恢复了公元前431年和前430年时的战争模式,公元前427年,他对普拉提亚发动的围攻结束了,但是在公元前426年,伯罗奔尼撒联军对阿提卡的再次入侵却是由阿基达马斯的长子及继承人阿吉斯二世领导的。在这个时间之前,阿基达马斯应该已经去世了。

正如他在公元前432年已经预料到的那样,伯罗奔尼撒战争对斯巴达人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实际上,在阿基达马斯死后,这场战争就开始向着逐渐恶化的方向发展,完全不像当初那些反对阿基

达马斯的、头脑发热的斯巴达人所设想的那样，他们本以为在几年，至多三年之内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因此，退一步讲，战争最初的十年可以照例以阿基达马斯二世来命名，称作“阿基达马斯战争”，但这多少显得有点讽刺。事实上，在这十年还不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在本书里，我们将像修昔底德那样，严格地把这最初十年的战争称作“十年战争”，就阿基达马斯的真实意图和目的而言，我们假定他在这场战争中是没有什么过失的。 151

修昔底德有意地对斯巴达人作出这次重大决定的整个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他描述了当时的场景，斯巴达人举行了一次集会，首先是由外国代表发言，然后再由挑选出来的斯巴达人讲话，这些人中包括阿基达马斯。修昔底德记下了四次演讲的内容，当然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记述的。最先发言的是来自柯林斯的代表，柯林斯是斯巴达最重要的盟友，他们极力主张战争，主要理由是雅典人已经破坏了公元前 445 年签订的和平协议，因此就必须宜快不宜迟地阻止雅典人继续破坏下去。接下来，是一位来自雅典的代表力劝斯巴达人不要破坏现状，也就是要保持双方目前的和平状态。然后，国王阿基达马斯，凭借着他世袭的权威以及声望，劝告斯巴达人无论如何都不要马上向雅典宣战。最后，在这一年当选的五位监察官中的一位，也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作了一次非常简短的演讲，其大意是事实已经非常明显——雅典犯了错误，(因此就要受到惩罚，)此外，斯巴达人还对它的盟友们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严格地来说，这位监察官的发言并不足以让斯巴达人作出战争的决定。斯巴达人，通常都是通过大声呐喊来进行表决的，这是很特别的地方，他们大声地喊着“赞成”(战争)或“反对”(战争)，哪种声音最大就代表着哪一种意见占上风。这一次，担任主持的监察官声称他无法完全确定哪一种声音最大，因此他要求市民们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站队，然后再计算两队的人数。也许他是真的无法作出确定的判断，也可能是阿基达马

斯的权威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相当多的斯巴达人在之前进行的表决中压制了自己天生的——毋宁说是被培养出来的——好战性格，投了“反对”票（要和平）。这位担任会议主持的监察官可能是想尽可能地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支持，于是，他便利用了斯巴达人在特有的文化熏陶下形成的爱国热情和尚武精神，让他们，确确实实地说，是站出来进行表决。有哪一个斯巴达人愿意，至少是冒着风险，被人看作是一个懦夫，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是一个被“吓得尿裤子的人”呢？

152

完全可以推断，最终赞成战争的人占到了多数，在随后的公元前431年的春季，斯巴达和雅典以及它们各自的盟国开始了长达一代人的、不顾一切的、痛苦的战争。或许，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真的是雅典人的力量增长得太快了，但是率先挑起这场战争的确实是斯巴达人。

第五章　妇女和宗教

153

一般来说，女性的人数差不多都会占到人类各个种族的一半左右，然而在历史资料和历史叙述中，她们却常常得不到应得的关注，这与她们在社会和历史中所担任的角色以及发挥的作用是不相匹配的。古代斯巴达的妇女则是一个大大的例外，应该说始终都显得很不寻常。她们非但没有受到压制或表现得默默无闻，反而还能够畅所欲言，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有一些古代的文献还专门记载了她们的言论。戈尔歌是一个斯巴达国王的女儿，也是一个斯巴达国王的妻子。有一次，一位来自外邦的妇女看到斯巴达妇女竟然可以明目张胆地支配男人的时候，感到非常惊异，于是问戈尔歌：为什么只有斯巴达的妇女才能这样统治她们的男人？戈尔歌如此回答道："因为我们是唯一可以生育真正的男人的女人！"这个答复无疑是无法确定真伪的，但是，那些研究斯巴达历史的外界观察家们，甚至他们当中那些最持重和敏锐的人也都非常相信这样一个事实：斯巴达的妇女掌握着的权力，更正确地说，是她们在统治着斯巴达。

这些观察家当中，最持重和敏锐的当属亚里士多德。他来自希腊北部的一个上层家族（他的父亲是马其顿的国王阿敏塔斯三世的宫廷医生，阿敏塔斯三世是菲利二世的父亲），但他成年后，基本上是在雅典度过的。公元前 367 年，此时距柏拉图创办"爱德美"学园（Academy）已过了近二十年，17 岁的亚里士多德上门求学，并成为了这个学园中最为杰出的学

154

生。后来，大概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期，他创办了自己的讲学场所——吕克昂学园(Lyceum)。在这两个学园中，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生们做了大量的整理、编纂工作，研究了158个政治实体(其中大部分是希腊城邦)的主要法律和宪法的形成、发展的状况。这些工作最后促使亚里士多德写作了《政治学》(*Politics*)，即《城邦的事务》(*Matters Concerning the Polis*)一书，这是从古代世界流传至今的、对政治进行研究的最为杰出的作品。在这本书的第二卷，亚里士多德花了大量的笔墨来论述他在考察斯巴达的社会和政治体系的过程中发现的重要缺陷。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太难做的工作，亚里士多德编撰这部著作是在公元前3世纪的30年代到20年代这段时间，此时的斯巴达已经不再是希腊世界的强国了，但对某些出于政治或哲学的原因而对自己城邦的社会或政治安排感到不满的人来说，它仍然还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象征，这些人还仍然把斯巴达当作一种理想的选择。我之所以对《政治学》中与斯巴达有关的内容感兴趣，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在本书中明确地指出：在斯巴达，妇女统治着男人。在他看来，妇女当政正是斯巴达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最终遭受彻底失败的关键原因。这种观点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

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论点的基础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他的洞见，一部分则基本上是纯粹的成见。首先来说说为什么他会带有成见。亚里士多德完全认同希腊男性(男子至上主义者)的标准观点：女人比男人要低劣，但是在这种传统的态度之上，他又掺和了一些亚里士多德式的“科学”成分。他认为可以科学地证明女性的身体和思想(他把思想称作“灵魂”)都绝对地、天生地比男性要低劣，而且这种低劣是不可改变的。换言之，妇女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第二性”的：身体上，她们是畸形的男人身体；智力上，她们缺乏运用理性的能力。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的诸如此类的缺陷都是可以进行论证的，并且他的这种“理论”基本上适用于所有女人，当然不仅仅只涵盖希腊的妇女。在这些方面，亚里士多德比他的老师柏

155

拉图有过之而无不及，柏拉图尚且还承认有极少数妇女能够像理想国中的杰出的“哲学王”那样，拥有同等的智慧并且成为他们真正的搭档。

那么，既然斯巴达的女性也有这些与生俱来的缺陷，她们又怎么能够到达这样高的社会位置并统治着她们的男人呢？所有人都会认识到这一事实显然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相抵触的，或者是自相矛盾的。然而，亚里士多德还是固执己见，并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试图去证明自己是对的。最后，他提出了下面这样一种历史性的解释（historical explanation）。他认为斯巴达妇女有一种特有的根深蒂固的毛病——缺乏自律和自制。他的这种解释也是基于某种假设，即在最初的时候，斯巴达的男人们被训练得心甘情愿地遵从吕库古所制定的铁的法律，以及建立在这种法律之上的政体，而斯巴达的妇女们却拒绝服从吕库古，因而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人可以控制住她们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她们沉溺于所有的奢侈享受和自我放纵等恶习当中，而那些乐于顺从且又溺爱妻子的斯巴达丈夫们则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了她们的同谋。事实上，斯巴达的女孩们即使不必像她们的兄弟那样从七岁起就开始住在集体兵营里，但她们也同样要接受一些公共的教育和训练，根据普通希腊人的标准，斯巴达妇女确实是比较没有女人味的。

另一方面，她们的所享有的地位和权利很容易让亚里士多德认为斯巴达是由妇女当政的。除了她们所接受的正式教育之外，还有两个社会性的因素使她们显得与希腊其他地方的妇女大为不同。首先，她们有权利拥有和处置自己的财产，包括土地财产，男性监护人大概是没有权力来干涉她们的。在斯巴达，女继承人，即那些没有与她共同拥有同一个父亲的合法的兄弟的女性，被称作“*patrouchoi*”，其字面意思就是“遗产拥有者”，而在雅典这样的人被称作“*epiklêroi*”，意即她可以获得一部分财产（*klêros*）。被称作“*epiklêroi*”的雅典人，仅仅只是作为一个把父亲的遗产转移给另一个男性继承人或主人的中介，这些人可以是她们的兄长也可以是她们父亲的孙子，而在斯巴达，“*patrouchoi*”是有权利自己来继承财

156

产的。这样的女性继承者在斯巴达往往会受到高度重视，她们中很多人会得到众多男士的追求，她们可以嫁给任何斯巴达人，而不是只能嫁给父系亲属中最密切的那些男性。第二个不同点是斯巴达妇女可以和丈夫之外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而且还不会被指责犯有通奸罪。斯巴达并没有像希腊的其他地方那样制定了类似的法律。实际上，她们的丈夫们可能会为了一些特殊的目的，比如为了某些男人的家族和血统，而把她们"借"给这些男人生育合法的后代。在这种情况下，妻子们是很乐意有如此安排的，因为她们因此而获得了去管理超出一个家庭的财产的机会，色诺芬在他写于公元前4世纪的、关于斯巴达社会和其他情况的文章中向我们确认了这一点。我们还知道：所有的斯巴达妻子们，在希腊其他地方只有那些富人们的妻子才能像她们那样，可以免于乏味、辛苦的家务活。她们不必去做饭、制衣或从事其他家务劳动，希洛人妇女会为她们打理这些。她们可能甚至不需要给自己的婴儿哺乳；斯巴达人的奶妈，大概都是希洛人妇女，在斯巴达之外的地方享有盛名，雅典的亚西比德就是由一位来自斯巴达的希洛人奶妈养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妇女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事实就很容易遭到扭曲，再加上她们在性方面似乎颇为开放，可以随便与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从而被外人视为道德败坏，似乎整个世界也因此颠倒了。一则德尔斐的神谕这样说，"当女人统治男人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将变得乱七八糟、好坏不分。"在斯巴达，女人统治着男人"，许多外国人都这样看待斯巴达，这些人中就有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的第二卷这样写道：

157

> 当斯巴达的国力处于鼎盛的时候，很多事情是由妇女们完成的。[1]

---

[1]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中文译文根据英文译本有修改。——译注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公元前4世纪的早期,斯巴达的妇女们不但在家庭里控制了她们的男人,而且,她们也设法在国家的事务上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在亚里士多德所指的这段时间内发生的唯一一件可用来证明女性介入公共事务的确凿事例,不但无法证明他自己的观点,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公元前370年或前369年,当斯巴达的妇女们看到强大的底比斯军队向斯巴达发动进攻,并侵入她们的国家、摧毁她们的土地和财产的时候,据说这些斯巴达妇女们表现得非常惊惶失措,反而比敌人造成了更大的恐慌和混乱。妇女们的这种反应在纯粹的男性主义者看来是非常令人不舒服的,勇气在战争中被认定是一种只有男性才有的品质和美德。但女人们的惊惶失措,无论如何也是可以理解的,目睹斯巴达的领土,包括自己的土地,在眼前被敌人蹂躏而无动于衷,任何国家规定的课程中都不可能提供这样的训练。

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因循守旧的外国人其实是下意识地,有时是有意识地害怕女性掌握权力。希腊男性的这种惧怕心理的一个表征就是他们虚构了一个关于神秘的亚马逊族的传说。但是,至少亚马逊族的女战士们还刻意地与男人们保持着距离,而这些斯巴达的"悍妇们"却明目张胆地在她们的社会中心行使着权力。正是被这样一种恐惧感紧紧攫住,男人们就常常利用他们可以接触文献资料,但往往还是第二手资料的机会来扭曲与斯巴达妇女有关的事实的真相。让我们马上来更正这种褊狭的做法吧,尽量全面地考察斯巴达妇女的生活,更确切地说,就是努力从各个方面来了解她们的生活全貌,比如一个普通的斯巴达女孩和妇女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

158

斯巴达的法律因为社会的需要,给予了能够生育的妇女们更多的特权。除了个体的斯巴达人需要一个儿子和继承人来传宗接代外,还有另外一个更为迫切的压力就是斯巴达城邦需要维持一支由成年男性组成的军队,他们在内要镇压希洛人,向外还得抵御敌人。因此,斯巴达社会很多方面对其他的希腊人来说,就显得非常的奇特,如公共性的处罚,其中

就有在宗教节日中让妇女们对那些不愿结婚生子的成年男性进行公开的羞辱，以及给予那些有三个甚至更多孩子的父亲一些公共的好处，人们可以在墓碑上刻下因生小孩而难产致死的妇女的名字，同时，法律还容许男女私通且不会加以处罚。

可是，尽管私通不会受到处罚，甚至还受到法律的认可，但正式婚姻仍然被认为是斯巴达人的后代是否合法的先决条件，而且只有两个斯巴达人之间的婚姻才能得到法律认可。求婚的方式和希腊其他地区是一样的：一个到了适婚年龄的女孩，如果有男人想要娶她，这个男人或他的代表就会想办法与她的父亲接近。那些女继承人，如果她的父亲在为她的婚姻作出决定以前就去世了的话，那么她们的利益就由国王们来负责代理，这是显示他们在社会中具有至关紧要的地位的一种象征。然而，斯巴达人实际的婚礼仪式，按一般的希腊人的标准来看是完全不正常的。

首先，婚礼是从抢夺开始的，毫无疑问，这种抢夺完全是象征性或仪式性的，但是，这种象征性的行为本身也暗示着一种潜在的男性暴力。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未来的斯巴达国王戴玛拉托斯把一位已经与别的男人订婚的女孩夺走了，这个男人正是他的远房表兄，并且还是后来取代他成为国王的列乌杜奇戴斯。新娘被带到丈夫的洞房后，伴娘就会帮她准备晚上的婚礼。首先是为新娘剃发，从此以后，作为一名已婚妇女，她必须一直是平头，而且还可能被禁止在公共场合佩戴面纱。然后，她得穿着用皮带扣住的简单衬衣，这条皮带在丈夫与她做爱前是不能解开的。如果某个男人是在三十岁以前结婚的话，一般来说，他还得继续呆在兵营参加全职的军事训练，只有在晚上借着夜色才能偷偷地溜回来与妻子相会。也就是说，一个斯巴达丈夫可能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却还没有在大白天见过自己的妻子。

159

在斯巴达，这种婚姻的理想结果，用马里奥·普佐的“教父”[1]的话

[1] 马里奥·普佐在1972年的电影《教父》中担任编剧，同时也是原著的作者。——译注

来说，是生出一个强壮的儿子来。这种理想部分是因为从传统的农民式的家长眼光看来，男性是具有优越性的，而且父亲往往会渴望有一个儿子来尽可能地延续自己的生命；斯巴达人之所以都想生男孩，也是因为古代斯巴达社会所处的独特环境急切需要人员来补充军队。在后来，玛里(Mani)的居民(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中南部)会将他们的儿子称作"枪炮"，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从字面上来说，男性的玛里人都是枪炮的儿子。在古代希腊的其他地方，据猜测经常会出现杀女婴的事情，但是这种猜测不可能想当然地用来概括斯巴达的情况。至少，我们还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曾经非常不受喜爱的女婴得到了抚养，她长大后还成为了一位美貌如仙的女子，最后还成了国王戴玛拉托斯的母亲。另一方面，她的父母当初虔诚地向海伦祈祷，希望他们的女儿在长大后能够像这位传说中的美女(海伦)一样美丽，他们这样做一点都不显得奇怪。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斯巴达的女孩们不必像她们的兄弟们那样在七岁的时候必须离开家并住到寄宿学校去。她们也要接受教育，只是在家里，她们的母亲和希洛人奴仆会担负起教育的职责，但她们绝不会因此只是被关在闺房里学习。她们要像男孩们那样接受一些公共的教育训练，这种情况在希腊世界里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训练主要是进行大量的身体锻炼，如跑步、跳高、投掷以及摔跤，据说她们与男孩们进行摔跤时是赤身裸体的。她们以一种与众不同，同时又是竞争激烈的方式参与唱歌跳舞这样的活动。女孩们参与的这种跳舞比赛在希腊的其他地方也很普遍，但是，斯巴达人很聪明地把女孩们的舞会转变成了一种具有政治性目的的活动。比如，被挑选出来的女孩会被派遣去卡黎亚(Caryae)的阿尔忒弥斯神殿跳舞，卡黎亚是位于斯巴达东北部边境的一个"边民"城镇。 160

在斯巴达，这些参加比赛的女孩的合唱促使了一种新的希腊诗歌的发明，这就是"*partheneion*"，即"少女颂"(maiden-song)。这种诗歌的发明者是阿尔克曼(Alcman，大约是在公元前 600 年)，他对抒情诗有着特别敏锐的感受力，并且能够到不同的地域中去博采众长，他曾经在诗中提

到过吕底亚，因而有人猜测他出生在萨迪斯，当然，这种猜测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我们现有所拥有的由阿尔克曼创作的“*Partheneion*”的残篇是在埃及找到的，它们写在纸草上。在这些残存的片断中，记载着参加比赛的歌手们对她们合唱队的指挥或领唱的赞颂，她们是：哈葛斯寇(Hagesichor，这里仅仅指当时的合唱队的领导人)和阿吉朵(Agido，这可能是阿基亚德王族中某位女性成员的名字)：

> 我们紫色的华丽服饰
> 不是保护我们的财富，
> 没有纯金制成的手镯，
> 也没有吕底亚人的头巾
> 戴在有着黑亮眼睛的女孩们的头上，
> 让她们光彩夺目，
> 没有纳诺(Nanno)的秀发，不，也没有女神般的卓越不凡(Areta)。
> 不是 Thulacis，也不是 Clesithera……
> 不，她是哈葛斯寇——
> 她就是我心中梦寐以求的！
> 舞会中没有这个美丽的人儿：
> 阿吉朵在等候着她，
> 称赞我们的庆典。[1]

161 推测起来，这样的诗歌最初可能是在一些宗教性的节日上进行演唱的，为的是向某位特别的女神表示敬意；尽管这位女神到底是谁现在还无法确定，但是，她非常像某种版本的阿尔忒弥斯，可能就是斯巴达人所称的欧西亚，因为“*parthenoi*”是指即将结婚的处女们，而且阿尔忒弥斯正好又

---

[1] Alcman, *Partheneion* fr. 1. See also West ed. 1993.

是掌管着女孩和处女向妻子和母亲进行转变这个过程的女神。结婚后，一个"*parthenos*"首先成为一个"*numphê*"(即"新娘")，然后成为一个"*gunê*"。"*Gunê*"可以被翻译成"妻子"，但是，它就像法语中的"*femme*"这个词一样，同时还有"妇女"之意：重点在于，每一个斯巴达女孩都期盼着成为一个妻子和母亲。成为妻子和母亲是每一个希腊女性的社会命运(social destiny)，同样，也是她们生理结构意义上的命运(anatomical destiny)，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像在斯巴达那样，成为妻子和母亲会受到如此高度的重视和强调。与怀孕和生育有关而受到祭拜的天神是艾莉西雅(Eileithyia)，她在斯巴达，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常常非常密切地与阿尔忒弥斯(欧西亚)联系在一起。

那么，为什么斯巴达女性参加的公共教育如此强调身体锻炼呢？可能有两个主要的并且是决定性的原因。一个是实际的和世俗的原因：斯巴达人认为最健康的母亲才是最好的母亲，换句话说，身体好才能生健康的孩子；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社会性的和象征性的：斯巴达的女性，不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外人所凭空臆想的那样，绝对地比男人低劣，她们在斯巴达不会受到低男人一等的对待。年幼的女孩能够得到与她的兄弟们份量相当的食物，青春期的少女要接受一段时间的公共教育，并学习如何更好地融入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将被灌输这个社会的理想，并且，让她们认识到她们成年后的所作所为将对实现这个理想起到多么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女性还有权力继承并管理自己的财产。甚至当父亲或监护人为她们选择夫婿的时候，她们还有发言权，她们实际上是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家庭生活的。 161

在很多古代社会里，妇女都担任了非常关键的宗教角色。斯巴达的妇女也不例外，但斯巴达与其他希腊城邦相比，在宗教实践和态度上存在着不少差异。斯巴达人对宗教的虔诚是远近闻名的，即使按古代希腊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而且他们还会极力地去维护这种虔诚。我们，甚至一个古代的雅典人都可能会认为他们太过于迷信了。希罗多德说过两次， 162

斯巴达人遵奉神意胜过对人事的关注。他的意思是说，在所有希腊城邦的民众当中，斯巴达人对神的虔诚和对宗教的奉献精神已经达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高度。为了证明自己这种观点，他举出了实例——斯巴达人之所以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中直至最后都没有出现，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的月相呈现出了不祥的征兆，此外，在公元前480年的温泉关战役中，他们也没有派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他们自称正在举行卡尔涅亚祭[1]。

此外，当色诺芬把斯巴达人描述成“战争巧匠”(craftsmen of war)的时候，他特别指出的其实是斯巴达人在军事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宗教虔诚，比如他们会在穿过河流、边境，甚至在一场战斗即将开始的时候先举行祭祀。斯巴达人对那些与军事有关的预言特别敏感。如果征兆(通过观察动物的内脏来获得)预示不“宜”行动的话，即使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迫在眉睫，他们也会推迟、中断或取消。色诺芬曾经记载了一位斯巴达的指挥官在做了不下四次祭祀后才得到一次吉兆，然后才敢有所行动。

除了他们这种异常的虔诚之外，斯巴达人的宗教惯例与希腊其他地方相比，在两个主要的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不同。斯巴达妇女，像希腊的其他妇女那样，在斯巴达人公共的宗教或其他类似宗教的事务中担任着最主要的角色。但是，在斯巴达似乎并不存在只有公民妇女才能参加的节日，即使是在铁斯莫波里亚祭(Thesmophoria)这个纪念得墨忒耳(Demeter，这位女神主管农业生产、保护婚姻)的节日里，也不是只有妇女才能参加。尽管得墨忒耳拥有自己的神殿，在埃列乌西里昂(Eleusinion)，位于斯巴达人的领土内，但并不位于斯巴达自己的城镇里，也不在阿密克利，而是在南部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在斯巴达，与铁斯莫波里亚祭类似的本土性节日最有可能的就是提特尼底亚节(Tithenidia)，这是为了新生儿的养育和护理而举行的祈福性节日，但是，这也不是一个

163

[1] 这个节日每四年在斯巴达举行一次。——译注

只局限于斯巴达妇女才可参加的节日。斯巴达人对祭拜得墨忒耳并不太热心，一种解释是：斯巴达人可能认为他们既然已经把土地上的劳作交给希洛人了，那么农作物是否丰收、牲口是否多产就不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了。还有一种与此相似的说法，也被拿来解释斯巴达人在宗教上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即他们不举行狄俄尼索斯节（酒神节），这颇让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希腊的其他地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祭祀狄俄尼索斯都是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也许这也是因为斯巴达人自己不从事劳动，而是让希洛人去种植、采摘葡萄有关吧！

我们已经看到，年少的斯巴达女孩们在快要结婚的时候会加入合唱队，去参加歌舞竞赛，而成年的已婚妇女则会围着一个祭坛，用唱歌的方式去嘲笑、羞辱那些不愿结婚的老光棍们，以迫使他们遵守斯巴达的法律去结婚生子。妇女们似乎在每年祭祀阿波罗和叙阿琴提斯的节日里也担任了特别重要的角色。色诺芬在他编写的阿吉西劳斯二世的传记里说，这位国王总是会让他的女儿们乘坐普通公民的女儿才乘坐的马车去参加这个节日的庆典，庆典仪式在距离斯巴达南部有几公里远的阿密克利举行，而他之所以要这么做，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拉近他的家族与其他公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在重大的宗教节日中做出这样的姿态，其最大的作用其实是传递了行为本身之外的信息。

然而，斯巴达妇女为外界所了解，最为有名的并不是她们高度的宗教热情。除了她们被认为荒淫无耻之外，最让外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她们在有家人过世的时候的表现，因为她们在这种状况中绝不会像其他地区的希腊妇女那样痛哭哀号。公元前 371 年，在彼奥提亚的留克特拉(Leuctra)，具体情况我会在稍后的章节中再作描述，斯巴达在这场激战中被敌人彻底击败，这真是一次灾难性的失败。色诺芬当时可能正在斯巴达，他记录了在家的斯巴达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反应：

当大败的消息传到斯巴达的时候，正是“少年欢舞节”的最后一　164

> 天。男子合唱队正在剧场上表演合唱,当监察官们听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后,他们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是这样的。然而,他们没有立即停止演出,而是让合唱队一直表演到结束。当他们把战死者的名字告诉每一位亲人的时候,他们要求妇女们要保持沉默,并且要抑制住任何因悲伤而流出的眼泪。在第二天,你会看到,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的女人们开始走街串户,脸上已经看不到悲伤。还有些女人的亲人据说还活着,只是情况还不确定,这些女人反而不会出门,而是愁容满面地呆在家里。[1]

换句话说,失去了亲人的妇女们不会"披麻戴孝",抱着骨灰缸在家里哭天抢地,也不为死去的亲人治丧祭奠,她们的反应竟然是这样的!不论发生了什么,生活还得照常进行。这就是斯巴达的妇女们为何会有如此表现的原因,很久以来,甚至可能在这次惨败发生以前的几个世纪以来,不需要别人的告诫,她们就明白应当这样去做,而且她们就是这样做的。

色诺芬在此处对斯巴达妇女的描述,与亚里士多德对她们不遵从传统所做的负面评价之间,存在着不一致或矛盾的地方,对此,这里就不再多费口舌了。小说家史蒂文·普雷斯菲尔德用一种色诺芬式的台词来描述发生在公元前 480 年的温泉关战役。普雷斯菲尔德有一个完全原创的观点,不幸的是这个观点完全没有任何历史依据,他说列奥尼达在决定要挑选 300 名贴身勇士去参战的时候,主要就是通过考察他们妻子的个性来定的。那些战士之所以能够最终入选,就是考虑到他们的妻子不但能够微笑着面对可能会失去丈夫的危险,而且还会为丈夫能够入选而兴高采烈,并歌之舞之。

让我们用一位斯巴达母亲的故事来结束这一节吧,她的故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那些据说是斯巴达妇女们所说的格言中,这些格言在普

165

[1] Xenophon, *Hellenica* [*History of Greece*] Book VI, chapter 4, section 16.

鲁塔克的作品中还有记载，一直流传至今，其中第一则被认为是由阿尔吉列欧尼斯（Argileonis，意思是“狮子般机智”，Lion-bright）说出来的，她是伯拉西达（Brasidas）的母亲。这句话非常明确地指出，斯巴达妇女其实同样在忠诚地遵守着社会的规范，虽然是以一种多少有点另类的方式：

> 阿尔吉列欧尼斯是伯拉西达的母亲，当她的儿子死后，一些来自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的市民去斯巴达拜访她。她问他们，她的儿子是否死得光荣并对得起斯巴达人的称号？这些对伯拉西达极尽赞美，说他是死去的斯巴达战士中最勇猛的一位。她听了这些话后，回答道：“我的朋友们，我的孩子确实是个不错的男人，但是，在斯巴达还有很多的人要强过他。”[1]

这句话充满了力量，真正的事实并不像这位乐于自我牺牲的母亲所轻描淡写的那样，在伯拉西达死后，安菲波利斯人实际上是把他当作一位立国英雄（founder-hero）来崇拜的，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平凡的男人。

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材料来为阿尔吉列欧尼斯的生平作一个详细的记录（如同第 3 节的“戈尔歌”和第 7 节的“库尼斯卡”那样），除了这则轶闻之外，我们还知道她嫁给了一个叫泰利斯（Tellis）的人，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我们知道泰利斯是公元前 421 年被斯巴达派往雅典参加谈判的官方代表团的成员，双方在这次谈判之后签定了第一份全面的和平协议。泰利斯可能是长老会的一员，那么他也就肯定是来自斯巴达的一个尊贵家族。然而，阿尔吉列欧尼斯就像国王阿吉西劳斯让他的女儿坐着公共的马车去参加宗教节日那样，她宁愿自降身份，也不想凸显自己的家庭在斯巴达是如何的与众不同，尽管那些荣誉毋庸置疑是她和她的家庭应得的。她因此成为了所有斯巴达女性的标志。

---

〔1〕 Plutarch, *Sayings of Spartan Women*, Argileonis (Moralia 240c).

《斯巴达妇女格言》中记载的其他格言，生动活泼地再现了斯巴达妇女们的语言和神态，从而使得古代斯巴达妇女的形象变得有血有肉，更为具体。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当公元前422年，伯拉西达准备出发去安菲波利斯的时候，阿尔吉列欧尼斯会如此激励她的儿子——“要么带着你的盾牌，要么躺在上面”从战场上回来。或者，假使伯拉西达最终被证明是个懦夫并且在打败后还活着回来了的话，我们也可以设想阿尔吉列欧尼斯会指着自己的小腹，公开地质问她的儿子是否愿意再蜷缩到她的子宫里去，以此来羞辱他。这些都是斯巴达的妇女们可能会做的、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又不得不令人敬畏有加的事情。

166

第六章　雅典战争:公元前432年至前404年

167

这一章将说一说“雅典战争”。从雅典人的立场来看,这场战争应该称作“伯罗奔尼撒战争”,但是,在本书中,我将从斯巴达人的角度来观察和描述这场战争。因此,以“雅典战争”为题可能会让现代的读者感觉到有点陌生,按古希腊的言语方式来理解,它指的是“对付雅典的战争”。这场冲突最先是由斯巴达人挑起的,他们在最初对这场战争有着很高的期望,然而这种期望是错误的。直到后来斯巴达人为了财政的问题而与希腊世界的宿敌波斯人达成协议后,战争才算结束,此时距离战争开始已经过去了二十七年。然而,波斯人之所以帮助斯巴达人,其实也有自己的野心,它只是想利用斯巴达的力量去摧毁雅典。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多少显得有点讽刺,参与战争的每一方都是有罪的,而斯巴达人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不但毒害了自己,也使希腊各个城邦之间的关系,从那时起直到腓力二世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领导的马其顿大军征服整个希腊时为止,都深受其害。然后,腓力二世父子俩同样又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征服了波斯。

在某种意义上说,斯巴达人制定的试图战胜雅典人的策略,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他们拘泥于一种在陆地上使用重甲步兵进行作战的思想,毕竟这种战术已经被他们操练、运用了两个多世纪,在他们开疆扩土、镇

乱御敌的过程中可谓是功不可没。他们本认为只要多使用几次这种战术
168 就可以击败雅典。他们相信，在夏季的早期，也就是粮食快要收割的时候，把军队从陆地上开进雅典的领土——阿提卡，那么，雅典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农田就会不得不从城墙后面跑出来与他们交战，这样斯巴达的军队就有可能利用重甲步兵击败雅典人，或者，至少也可以摧毁雅典人在阿提卡的土地上种植的庄稼，从而使城内的雅典人陷入饥荒，不得不在最后请求和平并接受斯巴达人提出的各种条件。确切地说，绝大多数斯巴达人都相信这种策略是可行的，只有极少数人不以为然。国王阿基达马斯努力劝阻自己的国人不要在公元前 432 年立即宣布对雅典作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其他的斯巴达人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而此后战争的发展，又证明了他是多么的有先见之明。

伯里克利把地米斯托克利当成了自己的导师，他在很久以前就预见到，斯巴达人的这个策略，就其本身而言，是不会有什么决定性意义的，因为雅典实际上就像是一个岛屿，它的全体居民不必完全依赖土地才能生存。雅典与其他地区是相互隔离开来的，连接雅典和它的港口——比雷埃夫斯(Piraeus)以及法莱雷奥斯(Phaleron)的“长城”起到了这个作用，比雷埃夫斯港实际上是雅典的第二个城市。雅典完全或者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不需要依靠地里的收成来养活自己的居民，阿提卡的土地(主要生产的是大麦，这种作物在产量和营养上都要逊于小麦)最多只能养活 75000 人，而阿提卡当时的人口大约在 25 万到 30 万之间。这多出来的 20 万人生活所需要的粮食都是通过进口得来的，这些粮食有一部分是直接从雅典控制的爱琴海北部的利姆诺斯岛(Lemnos)进口的，其中大部分是通过交易的方式从我们今天的乌克兰(Ukraine)和克里木半岛(Crimea)等地获得的，然后，再从塞浦路斯和北非这两个地方输入粮食来进行必要的、有效的补充。换句话说，只要雅典利用好它在海上的压倒性优势，并保持对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和赫勒斯庞特海峡这些至关重要的通道的控制，那么从黑海这个主要的粮食供应地运过来的小麦就是安全的，无论

斯巴达人出于哪种战略目的并设法摧毁了阿提卡的所有农作物，雅典都不会出现饥荒。

事实上，要想破坏地里所有的庄稼也不是件多么容易的事。庄稼如果不够干燥的话是无法放火去焚烧的，而且，这支想要大干一场的伯罗奔尼撒军队要带上足够的引火物和木柴才行，再加上他们在蹂躏阿提卡的土地的时候，还得提防雅典人随时都可能会冲出来发动袭击。如果想要破坏庄稼，那就不能指望从这片土地上获得给养，那么，他们就必须从家里带上足够的粮食来竭力维持自己的供应。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综合起来，就给斯巴达人的远征带来了巨大的技术上的困难，这些困难意味着在这场雅典战争中，任何从伯罗奔尼撒开始的远征实际上最多只能维持40天。这区区40天是完全不够他们去蹂躏阿提卡的，更不要说彻底地摧毁阿提卡的所有农作物了，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去砍伐那些葡萄藤和橄榄树了（橄榄树生命力极强，几乎是不能被毁灭的）。其实，对于斯巴达人来说，更为有成效的策略应该是在雅典的国土内占领一块土地，然后派军队永久性地驻防在那里，这样就既可以以此为据点向周围的地方发动突袭，同时，也可以阻止当地的雅典农民继续从事耕种，可谓是一举两得。到了后来，斯巴达人真的采用了这个策略，但是时间已经到了公元前413年，而且，这个计策还是由一名雅典叛徒（亚西比德）进献出来的。我们将会看到，这个策略对雅典的经济有着更为深远的破坏，尽管它并不是按斯巴达人所喜爱的方式来结束这场战争。

因此，斯巴达人最初的计划进行得很不顺利，雅典人反而能够从陆地和海洋两个方向上狠狠地反击斯巴达人。修昔底德想强调伯里克利的远见和智慧，并且，为了证明雅典人没有挑起这场爆发在多国之间的灾难性战争，从而免受人们的谴责，他把雅典的反击描述成一种迫不得已的防御行为。但作为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也两次提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在每一季的军事行动中，雅典都要用重甲步兵从陆地上袭击它的邻居麦加拉，而麦加拉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中一个很重要的盟友；

169

而且，他还描述了雅典在这场战争的初期向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发动的大规模的海上远征。因此，在公元前 428 年，当斯巴达人试图带领着它的盟国在向雅典发动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厌战情绪已经开始在伯罗奔尼撒人中间蔓延开来了。斯巴达人此时已经不需要米提列奈人(Mytilenaeans，他们发动了反抗雅典统治的叛乱，此时正在向斯巴达人寻求帮助)告诉他们：在公元前 428 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他们不会在阿提卡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及阿提卡从克里木半岛(Crimea)、乌克兰等地获得了小麦供应等诸如此类的信息。在他们当初不顾一切地决定挑起战争的时候，显然更需要有人来告诉他们这些情况。

170

到了此时，斯巴达人发现事态正令人不安地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公元前 431 年，他们曾经在战争开始之前到德尔斐去征询过神谕，神谕说，如果他们发动战争的话，他们将是正义的一方，因此，他们相信自己可以令人信服地迅速击败雅典人，并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可是，在战争爆发的第六年，也就是在公元前 425 年的时候，雅典人在狄摩西尼(Demosthenes)的领导下，竟然在斯巴达人的领土上建立了一个大本营，地点就在美塞尼亚的派娄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海岸(靠近后来被称作纳瓦里诺岛的地方，是 1827 年大海战的地点)。狄摩西尼带领着美塞尼亚人，或者说是美塞尼亚人后代中的战士来到了这里，这些人来自纳帕克塔斯。公元前 4 世纪 60 年代发生的大地震之后，希洛人发动叛乱，雅典人就在纳帕克塔斯设立了避难所来安置那些获得了自由的希洛人。狄摩西尼这样做是非常狡猾的。这些纳帕克塔斯的美塞尼亚人和那些新逃离出来的美塞尼亚希洛人，都被吸引到雅典人建立在派娄斯的基地来了，他们千方百计地去破坏斯巴达人在美塞尼亚的农田。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说与斯巴达人一样的语言，这样他们就可以伪装成一个老实巴交的希洛人，然后去刺杀那些真正向斯巴达人效忠的希洛人，他们还可以去毁坏希洛人种植的农作物和斯巴达人的财产。

斯巴达人迅速对此事作出了反应。他们从阿提卡召回了自己的军

队，派遣了一支由精锐士兵组成的军队到派娄斯地区进行巡查。在经过了一些延迟之后，他们也派出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中有一艘三列桨战船，由伯拉西达指挥，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他在一次从海上向雅典人的要塞发动的进攻中是表现最为杰出的战士，尽管那次战斗他们没有取得胜利。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直至公元前 422 年因受伤而死的这段时间里，伯拉西达同时在伯罗奔尼撒以及北至卡尔奇底斯(Chalcidice)的安菲波利斯这些地方，都给雅典人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在斯巴达人决意或能够重新与雅典人进行有效的和平谈判之前，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可以左右局势的人物，他的影响力变得如此之大以至只有死亡才能撤他的职，并让他离开战场(否则和平协议就无法签订)。 171

伯拉西达

伯拉西达，首先得感谢修昔底德对他有着强烈的兴趣，并在其著作中给予了他极大的关注，在来自非正统王室的斯巴达人中，只有极少的人有较为详细的、适当的生平传记，而他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名字可能是来自普拉西厄(Prasiae)这个城镇，它位于拉科尼亚的东北海岸，在成为一个“边民”城镇之前，是属于以离岛(Calaurea，即现在的波罗斯岛)为基地的近邻同盟或宗教同盟(amphictyony or religious league)[1]中的一员。这个时间可能要追溯到公元前 7 世纪了。伯拉西达的父母的名字都已经为读者所熟知。他的父亲泰利斯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斯巴达人，在公元前 421 年的时候，被选派出来代表斯巴达去雅典参加和平谈判，为的是结束这场雅典战争。他的母亲阿尔吉列欧尼斯，我们已经在前面谈到过她，普鲁塔克收集编撰的《斯巴达妇女格言》中保留着她的一则非常特殊的格言。

---

〔1〕 在古希腊为保护共同的宗教中心而结成的近邻各邦的联盟，也叫做邻邦同盟。——译注

她的这则格言在前文已经引述过(第五章),无论它的内容是否真实,其实都在刻意传达两个观点:首先,即便是一个像她的儿子伯拉西达这样杰出的人物,在斯巴达也绝不是少数;其次,像阿尔吉列欧尼斯这样堪称模范的斯巴达母亲,对斯巴达共同利益的关心更甚于自己的直系亲属能否获得某种荣耀。可是,事实是,无论是在生前还是身后,没有几个斯巴达人能比伯拉西达更为出色、更有影响力,或者像他那样在斯巴达之外受到那么多的尊敬。如果不是英年早逝的话,他完全有资格登上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至少可以和后来的吕山德——这个唯一来自非正统王室的斯巴达名人——平起平坐。

公元前431年,当雅典战争爆发的时候,伯拉西达是五位监察官中的一位。这绝不会是偶然或巧合。一个监察官是不应该再去担任军官的,如果他选择或者是获得允许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被推选——去担任军官的话,是肯定会让人感到古怪的,在这之前,人们并不知道他属于"鹰派",所谓"鹰派"就是雅典人在斯巴达的死对头,正是他们在最初要求立即向雅典开战。伯拉西达在后来的所作所为,据我们所知,都证明了他的这一不为人知的一面。公元前430年,在美塞尼亚的西海岸墨托涅(Methone),这是他第二次出现,在那里他正领导着一支机动的防御部队。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29年,在伯罗奔尼撒西北部的库勒涅(Cyllene),他看来已经得到了提拔,因为他当时已经成为了一支舰队的一名长官;到公元前427年的时候,他还依然呆在那里。他的职责是保卫那条海上的"西北通道",阻止雅典人的船舰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去与纳乌帕克塔(Naupactian)的美塞尼亚人,以及奥尼亚岛上的其他潜在的或事实上的盟友联合起来对付斯巴达,一旦这些城邦真有谋反的举动,他就要去进行压制,在斯巴达人看来,他的工作对整个城邦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伯拉西达协助斯巴达的舰队司令进行了一些极不道德的战斗,其中包括那年夏天发生在科西拉的、被修昔底德大书特书的内战。

然而,这些预防措施并没有阻挡住雅典人,他们在公元前425年的时

候，听从狄摩西尼的倡议派兵占领并驻守在了美塞尼亚的派娄斯。不出所料，伯拉西达临危授命，被派往这个重要的地区，现在他已经是一艘三列桨战船的指挥官了。他的指挥才能可以说是当时所有人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从全局而言，派娄斯对斯巴达人来说是一个灾难，因此，他们迫切需要一次行动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以挽救国内渐趋颓丧的民心和斗志，并重振斯巴达在外邦中的威望。麦加拉的问题在于当地出现了一股强劲的亲雅典人的倾向，并且，麦加拉人还可能会建立民主式的政权。伯拉西达得心应手地处理了这场危机，他在公元前 424 年的时候，阻止了这个城邦投向雅典人的阵营，但是，在更远的北方，还有更为紧要的事情等待着他去做。

公元前 426 年，斯巴达人已经在希腊的中部，也就是特累启斯(Trachis)的赫拉克里亚(Heraclea)建立了一个新的军事殖民地。这个新定居点的主要军事和战略目的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从这里，斯巴达人可以向雅典人控制的优卑亚施加压力。从这里还有路通往希腊北部，从盟友彼奥提亚出发可以到达帖萨利、马其顿(Macedonia)以及色雷斯人的卡尔息狄斯(Chalcidice)。伯拉西达获准去组建一支新的、很特别的军队，在这个过程中他展现出了独一无二的才华，并且推翻了人们已往习惯上认为的所有斯巴达人在思想上都极端保守的看法。为了补充伯罗奔尼撒盟军重甲步兵的兵源，伯拉西达获得了大量金钱去招募雇佣兵；这种做法在希腊早期的战争中已经出现过，但是只有在这次雅典战争中，这种方法才开始起到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这次战争之后，雇佣兵更是迅速地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除了这些伯罗奔尼撒人和雇佣兵之外，他还组建了一支由 700 名希洛人组成的军队，他们被斯巴达人武装成重甲步兵。这些希洛人当中的幸存者从战争返回斯巴达之后，终于获得了解放，但是他们被集体性地称为“伯拉西达人”或者“伯拉西达的人”(Brasideioi)，这是他们的独特身份。看来在这些人和他们的指挥官伯拉西达之间曾经建立过某种特殊的契约关系。在伯拉西达死后四年，即在公元前 418 年爆

173

发的门丁尼亚之战中，这些被称为“伯拉西达人”的士兵加入了正规的斯巴达军队并参加了战斗。

有意思的是，伯拉西达据说在帖萨利的一些城镇和部落中有一些特别的朋友。这种关系帮助他安全地通过了帖萨利，并进入到了马其顿和卡尔息狄斯。后者是他此次远征的真正目标，雅典在公元前437年之前，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地——安菲波利斯。此处既可扼守通往爱琴海北部沿岸地区的陆上要道，同时也是往雅典运送木材和金属的必经之地，这些资源对于海军来说至关重要。因此，设想一下，当伯拉西达成功地说服了马其顿国王帕迪卡斯一世(first King Perdiccas)，继而又争取到了爱琴海北岸一连串城邦的支持之后，雅典人会是多么地惊惶失措。他之所以能如此成功地做到这些，部分是依靠他的武力，但是，也可部分地归功于他雄辩的口才，这对一个斯巴达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修昔底德称赞伯拉西达的口才了得，而且还记录下了他的两个简短(用词相当简洁)的演说。修昔底德除了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必要操守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相当尴尬的个人原因使他不想过分地贬低伯拉西达。公元前424年，修昔底德正是雅典十将军中的一员，他的具体任务就是去阻止伯拉西达得到安菲波利斯，但显然他最终失败了。

174

公元前422年，伯拉西达在战斗中因伤不治而亡之后，“获得解放的”安菲波利斯人给予了他极大的荣誉，把他遵奉为这片新殖民地的开拓者(new oecist)或英雄，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他们在他的坟墓周围建造了一道墙垣。换言之，他们不再祭祀他们这块殖民地的真正开拓者——雅典人哈格浓(Hagnon)了，这充分说明在古代希腊，宗教和政治是完全休戚与共的。在这个地区，并不只有安菲波利斯人才对伯拉西达抱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赛翁尼人(Scione)：

> 用所有可能的荣誉来欢迎伯拉西达。他们公开地把金冠加在他的头上，称他为希腊的解放者；普通百姓簇拥着他，在他的身上挂上

各种花环，好像他是一个得胜的运动员似的。[1]

从公元前 432 年到前 429 年的这段时间里，波提狄亚（Potidaea）一直遭受着惨酷围攻，雅典人最终成功地阻止了它脱离自己的掌控。现在只有它还丝毫不为伯拉西达的甘言劝诱所动，但这已足以终止伯拉西达在这个地区锐不可当的势头了，而阻挡伯拉西达继续前进的还有来自他在国内的政治对手们的嫉妒，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促使斯巴达人改变了之前的进攻性政策，转而寻求与雅典人缔结和平协议。

然而，伯拉西达根本不理会双方在公元前 423 年达成的这份停战协议，他的战争意志与雅典的克里昂（Cleon）不相上下。公元前 425 年，雅典在派娄斯狠狠地羞辱了斯巴达一番，克里昂作为政治家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是最为卖力的推手。所以，在公元前 422 年，这两个人就像荷马笔下的不败英雄那样，在安菲波利斯城外的战场上摆开了阵势准备决一死战。他们谁也没有真正杀死对方，却都双双死于这场冲突当中，然而他们的死也重启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和平谈判的大门。安菲波利斯从此脱离了雅典人的控制，这可能才是为伯拉西达建立的最为持久的纪念碑。

175

伯拉西达认识到斯巴达人有必要去爱琴海的北部开辟第二战场，这样可以从内部动摇、分裂雅典联盟。在公元前 426 年的时候，斯巴达人就已经在特累启斯建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地——赫拉克里亚，此地正好位于雅典通往它在色雷斯地区的重要盟友的路线上，而安菲波利斯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盟友。公元前 425 年发生了派娄斯这样的事件，派娄斯还依然被牢牢地控制在雅典人的手里，因此，开辟与雅典人的第二战场就变得越来越急迫了。斯巴达人为此不惜孤注一掷，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允

[1] Thucydides IV. 121；中文译文可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1960 年 4 月第 1 版，2007 年 2 月第 8 次印刷，第 386 页。此处的译文参考英文原文翻译，较谢氏译文有较大出入。——译注

许伯拉西达组建一支由同盟中重甲步兵、雇佣兵和希洛人混合而成的杂牌军。

有一点必须要强调一下，那就是希洛人被招募进斯巴达的军队，在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亚战役中就已经出现过了。然而，正是因为派娄斯事件的影响，从公元前424年开始，斯巴达人开始恢复从希洛人中招募战士的政策，通过承诺给予参战的希洛人以自由身份，来鼓励他们为斯巴达的军队效忠，斯巴达人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些被伯拉西达招募的希洛人，当他们活着返回斯巴达的时候确实获得了自由，并归入到了另外一个由以前是希洛人的斯巴达人组成的新的社会群体——“新代梦人”当中，他们在历史资料中出现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424年至前370年。毫无疑问，这些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主要是从拉科尼亚而不是美塞尼亚的希洛人中吸收进来的，这与斯巴达人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是相一致的。但是，这些希洛人被招募进军队，既标志着斯巴达人与希洛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也意味着斯巴达人有了一支全新的、供他们在海外征战的军队，这种军队既可以去冲锋陷阵，也可以参与驻防守卫。实际上，“新代梦人”在国外比在国内要容易应付得多，他们聚集在一起就像一块还没有被消化的食物，既不是完全没有自由的希洛人，也不被当作是那些自由且平等的公民们的同侪，他们仍然没有完全融入斯巴达人中去。[1]

伯拉西达在北方一路高歌猛进，尤其是从雅典人手里赢得了安菲波利斯并驻守在那里的时候，他的事业达到了其人生的最高峰，尽管他所做的这一切代表的只是斯巴达的利益。可是，他的成功不但招惹了斯巴达国内一些与他作对的精英分子的嫉妒，也使人们注意到，他在军事上的首创之举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向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出现了，但这对斯巴

〔1〕 Thucydides IV. 80，修昔底德在此处讲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说大约有2000名希洛人，也有可能是美塞尼亚人被斯巴达人秘密屠杀；按时间来看，这次大屠杀应该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原注

达来说并不适合。此外,国王普雷斯多安那克斯在流放阿卡狄亚十八年之后,在公元前 427 或前 426 年最终复辟成功,重新登上了属于阿基亚德家族的王位,此时,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不少人,他们大致上都是拥护与雅典签署和平协议的人。他们要么相信那种在上一代早期由奇蒙提出的雅典和斯巴达共建"双元霸权"("dual hegemony")的观点,要么就是"不干预"政策的拥护者,或者,至少在对待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其他盟友的态度上是更加的听之任之,不加干涉。所有这些力量联合起来,最终促使斯巴达与雅典在公元前 423 年实现了休战。

176

伯拉西达和他在雅典的对手克里昂都尽其所能地去破坏这次休战,而且他们几乎取得了成功,直至公元前 422 年,这两个男人在安菲波利斯附近爆发的新一轮战斗中双双战死,他们的努力才告结束。和平谈判之门因此重新打开了,双方最终签署了一项停战协议,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尼西阿斯和平协议"(Peace of Nicias),因为在雅典方面促成签署这项协议的最主要的人物是尼西阿斯,但是,准确地来说它应该称为"普雷斯多安那克斯和平协议"。这个协议肯定会对双方各自的盟国都产生效力,但是,停战在根本上是由两个主导的国家缔结的,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个别盟国的特殊要求或满足它们的愿望。这导致斯巴达最重要的两个盟友柯林斯和埃利斯不仅不同意这份停战协议,而且还组建了一个新的反斯巴达人的同盟,试图以此迫使斯巴达人也照顾照顾它们的利益。而阿尔戈斯人(Argives)此时正虎视眈眈地隐藏在这些争执的背后,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着机会想要成为伯罗奔尼撒的霸主。

斯巴达人对此的反应就是与雅典人进行商定,然后双方撇开各自的盟国,单独签定一份有效期长达五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签定这一新的条约的主要动机,是要尽力确保之前的和平协议中的两个最紧要的目标能够得到尽快实现,即雅典人把派娄斯和 300 名斯巴达人以及其他"边民"人质归还给斯巴达人,而斯巴达人则把安菲波利斯还给雅典人。然而,这份新条约反而在柯林斯人和埃利斯人中间引发了更多的猜疑,但

是，由底比斯领导的彼奥提亚人城邦拒绝加入这个由两个城邦签订的反斯巴达同盟，因为呆在传统的亲寡头政治的斯巴达的羽翼之下，更有利于它们现在的政府继续执掌权力。尽管如此，它们依然坚决地反对“尼西阿斯和平协议”，而且还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斯巴达在公元前 420 年选立的新的五位监察官中的两位的支持，这两位监察官代表着斯巴达国内在伯拉西达之后出现的好战倾向。

177

雅典确实把那些人质遣返给了斯巴达，可是他们却没有相应地收回安菲波利斯，因此斯巴达也就要不回派娄斯了。斯巴达人中间的好战派此时取得了优势，而后，雅典人亚西比德又欺骗了斯巴达人，更是助长了这种好战情绪。“亚西比德”这个名字显示了他与斯巴达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最初是一个斯巴达人才用的名字，经由一种跨越城邦的宾朋关系（a cross-state *xenia* relationship）才进入亚西比德的父系家族当中。亚西比德出生在公元前 450 年，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此后，他就在父亲的朋友伯里克利及其情妇阿斯帕西亚（Aspasia）的家里生活。在这样一种政治家庭中长大，亚西比德想要参与公共政治的野心很早就被点燃了。当他快三十岁的时候，在雅典人看来这是成年男子能够适应政治生活的最小年龄，亚西比德第一次，但也是笨拙的第一次，在雅典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可惜这次他把事情给搞砸了。他想恢复之前在斯巴达与雅典之间存在过的宾朋关系（*proxenia*），或由他来担任斯巴达人的代表，以照料斯巴达人在雅典的利益，而这些事务之前是由他的祖父来打理的。但是，有年龄歧视的斯巴达人断然拒绝了他的好意。于是，恼羞成怒的亚西比德当即就在雅典建立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反斯巴达人阵线，他尽其所能地说服雅典人去反对斯巴达，除了要公开地废止雅典在公元前 421 年与斯巴达签订的和平协议及建立的联盟之外，还要实实在在地攻击斯巴达。

公元前 418 年在门丁尼亚爆发的战斗，是这种反对斯巴达人的行动的最符合逻辑的结局。在门丁尼亚，雅典人和同是民主政体的盟友们以

及伯罗奔尼撒的反叛城邦门丁尼亚一起，与强大的斯巴达及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重甲步兵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修昔底德，作为记载雅典战争的历史学家，着实是花了不少笔墨来描述这次遭遇战，并为他的非斯巴达听众或读者补充了很多说明性的、但又令人信服的细节。比如，当战斗即将开始的时候，雅典人开始侧身移动着向右边挤——这是所有重甲步兵在战斗中的典型动作，修昔底德说道：

> 因为恐惧的心理，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没有武装防护的身体右侧，靠到他旁边的兵士的盾牌下面以取得遮护，以为彼此的盾牌靠得越近，就越安全。[1]

178

然后，当双方军队面对面准备进攻的时候，阿尔戈斯人和他们的盟军这一方的士兵大呼小叫、不顾一切地向前猛冲，而斯巴达人却是伴随着乐手们吹奏的奥洛斯[2]（*aulos*）音乐缓慢地向前推进。对此，修昔底德补充道：

> 这是他们的军队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这种习惯与宗教没有关系；它不过使他们的步伐变得整齐，不至于打乱队列，因为，当大军相

---

〔1〕 此处中文译文可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4月第1版，2007年2月第8次印刷，第454页。译文参考英文原文翻译，较谢氏译文有出入。在谢译中，此段内容描述的对象应该是所有处于战斗状态的步兵，而不只是雅典人。谢氏的译文与本书作者保罗·卡特里奇（Paul Cartledge）的论述在此处有相当大的出入，可能与彼此依据的英文译本不同有关。谢氏在其译著的“序言”中称他的译文主要是根据雷克斯·华尔纳（Rex Warner）的版本（企鹅古典丛书，1956年伦敦企鹅出版公司重印本）译出，而保罗·卡特里奇则采用的是理查德·克劳莱（Richard Crawley）的英文译本（近代丛书，1934年纽约出版）。——译注

〔2〕 一种古希腊管乐器，它是有簧片的乐器，人们推测它是双簧的，一般是成双或四个人一起演奏。——译注

互交战的时候，队列常常会被打乱。[1]

我们已经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看到过斯巴达人在马拉松战役以及其后与波斯人的战争中的表现，我们也都知道他们对宗教是格外的虔诚。奥洛斯是一种装了簧的乐器，可能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双簧管，希腊人会在宗教仪式和典礼中演奏这种乐器，在雅典演出悲剧的时候，也会用它来进行伴奏。因此，那些目睹过公元前 418 年发生在门丁尼亚的这场战争的人，很容易就会根据以往的事实来想当然地认为，斯巴达人在战斗中用奥洛斯来伴奏是出于宗教的原因。修昔底德认为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斯巴达人之所以吹奏奥洛斯，纯粹是为了军事的用途，而且仅仅如此。他也许应该补充一下，斯巴达人吹奏这种乐器的原因与雅典人在三列桨战船(trireme)上由乐手(*trieraulês*)来演奏音乐是完全一样的。而雅典人的乐手往往是军队临时雇佣来吹奏奥洛斯的，目的就是帮助桨手们在摇桨时能做到整齐划一，不出差错。

修昔底德还没有补充的一点是，在这种语境中他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去说明，担任乐手(*aulêtai*)的斯巴达人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是受人尊重的，而且基本上是“子承父业”，正如希罗多德曾经说过的那样。这样，他们在179 地位上与那些世袭担任传令官和宗教仪式祭司的斯巴达公民是平等的。事实上，在斯巴达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中，音乐通常占据着一个光荣的位置。普鲁塔克在其著作《论音乐》(*On Music*)中提及了一些早期的作曲家和诗人，其中如来自“边民”城镇库铁拉(Cythera)的谢纳达摩斯(Xenodamus)当时就已经声名远扬了。从阿耳忒弥斯——欧西亚的神殿中发现的物品中就有奥洛斯的碎片，由动物的骨头制成，其中一些上面留有铭文，这些物品中还有一些奉祀用的粗陋的铅制人像，它们既代表着吹奏奥洛斯的乐手，也代表着演奏基萨拉(*kithara*)的琴手，基萨拉是一种

[1] Thucydides V. 70；可参见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454 页。此处译文参考英文原文翻译，较谢氏译文有出入。——译注

七弦琴[1]。保守的斯巴达人据说对乐手演奏基萨拉时所用的琴弦的数量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除了演奏各种乐器之外，斯巴达人也特别热衷于合唱；有趣的是，埃利斯的普拉提纳斯(Pratinas)把斯巴达人比作夏天的鸣蝉，逮着机会就会来个大合唱。同样，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斯巴达的阿尔克曼发明了一种属于希腊人的特别的合唱形式——"*partheneion*"，或者也可称作"少女颂"。

"合唱"(*choros*)一词在希腊语中最初的意思是指跳舞，所以，人们常常会发现斯巴达人实际上是既唱歌又跳舞的。事实上，他们还创造了很多有特色的地方性舞蹈，坦率地说也包括一些比较淫秽的舞蹈。大约是在公元前575年，一个雅典的贵族青年在一次争取一位伯罗奔尼撒僭主的女儿青睐的比赛中，有点兴奋过了头，为了展示自己的舞艺，他竟然爬上一面桌子跳起了斯巴达的舞蹈，这可能就是桌面舞的来源吧！而这些情况又和人们对古代斯巴达的想象相矛盾，因为在以前有很多人认为务实的斯巴达人与高雅艺术是格格不入的。不管怎样，在结束这次离题的叙述之前，如果不提一提那尊漂亮的由青铜制成的号手雕像，实在说不过去。这尊雕像是献给城邦的保护者——女神雅典娜的，地点在斯巴达的卫城，制造时间大约是公元前500年。这尊号手雕像无疑代表着某一类型的人物，他们在把斯巴达指挥官的意志传达给士兵们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实际的作战和行军当中，是乐手吹奏着奥洛斯把战士们带入战场的。

门丁尼亚的这场战斗是双方的一次激烈较量，用修昔底德的话说，"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希腊各邦之间爆发的最大的一场战斗"。最后，它对斯巴达人来说也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180

---

[1] 这是古代一种类似吉他的弦乐器，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但传到希腊后特别受欢迎，竟成为了希腊最民族化的乐器。古希腊黄金时代的游吟诗人总是喜欢边弹基萨拉边吟唱。基萨拉起先只用来伴唱，到后来才成为独奏乐器。包括吉他、齐特尔也许还有西塔尔琴在内的许多拨弦乐器都是基萨拉的直系子孙。——译注

斯巴达人

> 过去，因为在派娄斯遭到的失败，斯巴达人受到希腊人的责难，他们被说成是懦弱无能的，有时候，说他们决心不够；这些责难，现在都因为这一战役而一齐被洗掉了。而今大家都认为他们虽然有时受到挫折，但是斯巴达人还是斯巴达人，和以前的斯巴达人还是一样。[1]

严格地来说，这种说法不是非常准确。首先，斯巴达的公民，这些处于困境中的男人们，第一次与“边民”重甲步兵组成了混合军团，并在这样一次重大的阵地战中接受了考验；第二，除了这些混合军团之外，斯巴达人还依赖一支由“边民”组成的特别军队，他们是从北部边界地区拉科尼亚的司奇瑞提斯(Sciritis)抽调过来的。他们可能之前已经被招募和部署过，但是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文献中出现，他们被招募来补充军队可能说明了斯巴达人对边界安全的重新关注；然后是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斯巴达人第一次在正规的战斗队列中使用了由获得自由的希洛人——“伯拉西达人”和“新代梦人”——组成的重甲步兵。因此，这一次实际上是一支新型的斯巴达军队获得了门丁尼亚之战的胜利，尽管斯巴达人可能希望外界的人别这样认为。

在门丁尼亚遭受的失败迫使雅典人重新开始思考自己先前的战略。公元前 415 年，在亚西比德这个桀骜不驯的赌徒又一次天花乱坠般的许诺，或是蛊惑之下，雅典人大会决定开辟一条全新的战线，也就是说在雅典战争之外另外开始一场战争，这两场战争到最后终于纠缠在了一起，对雅典人来说这是致命的。公元前 415 年，雅典人倾尽全力派出了一支最强大的舰队去讨伐西西里岛，并把叙拉古当作他们首要的敌人和目标。叙拉古是约公元前 8 世纪的后期由柯林斯的多利安移民建立的。它当时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僭主统治，从公元前 4 世纪 60 年代开始，进入了

[1] Thucydides V. 75；可参见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457 页。此处译文参考英文原文翻译，较谢氏译文有所出入。——译注

民主政体时代。修昔底德对发生在公元前415年到前413年的这场西西里战役有着令人难忘的记述,其中最主要的主题就是讨论存在于雅典和叙拉古这两个主要敌手间的相似之处。 181

还有,就像门丁尼亚之役一样,这场争夺西西里的战役对战争双方来说都是孤注一掷,其结局是雅典人又一次遭受了失败。让雅典人遭受这场大祸的罪魁祸首竟然就是亚西比德,这位发起此次海上远征的最主要的鼓动者。他被指控与一系列发生在雅典的渎神事件有关,当雅典人试图把他从已经开拔的舰队中召回并准备进行审问时,他从遣送他回国的船上逃跑了,转而投靠了斯巴达,成为了雅典的背叛者。关于他在斯巴达如何地入乡随俗,最后变得比斯巴达人还斯巴达人的情况,流传着许多吸引人的轶闻趣事,甚至据说他在国王阿吉斯二世不在家的时候,勾引了这位国王的妻子,并且还和她生下了一个儿子,除了这些之外,亚西比德也让雅典人吃尽了苦头。斯巴达人该如何以及去哪里找出雅典的命门,然后一剑封喉置雅典于死地?亚西比德是提供这类建议的最佳人选。据说,正是因为他的出谋划策,斯巴达人首先派出了一位有魄力的指挥官——吉利普斯(Gylippus)——去援助叙拉古人,并最终成功地抵抗住了雅典人发动的围攻;然后,在公元前413年,斯巴达军队在狄西里亚(Decelea)占领了一个据点并永久性地驻守了下来,这个地方正好处于靠近雅典边境的区域。 181

公元前413年,国王阿吉斯在狄西里亚建立的这个军事要塞(*epiteichismos*)标示着这场由陆地开始的雅典战争已经进入了决战阶段。但是,对于通常只善于陆地作战的斯巴达人来说,最终决定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的法宝却是海战,这显然颇具讽刺意味。而之所以如此,斯巴达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雅典人的宿敌波斯人,正是他们给斯巴达提供了金钱资助。大流士二世派驻到波斯帝国西部的两个总督——北方的法那培萨斯(Pharnabazus)和南方的替萨斐尼(Tissaphernes)——在援助斯巴达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在波斯人的黄金的帮助下,斯巴达人建造了一

支舰队,这是他们第一次有了可以与雅典人相匹敌的海军,在不久之后,它的战斗力甚至还超过了一直以来所向披靡的雅典海军。

亚西比德逐渐对斯巴达的生活感到厌倦(或者,可能是因为受到戴了"绿帽子"的国王阿吉斯的朋友的迫害),他出现在了东部的战区,再一次做起伤害母邦——雅典——的事情来,但是到了公元前411年的时候,他似乎更想回到他的祖国当一名受人尊敬的预言家(prophet with honour)。182 雅典在那一年发生了一场国内革命,极端的寡头政治取代了民主政府,这场革命是由一位叫安替芬(Antiphon)的智者精心策划的,修昔底德在自己的著作中给予了此人以不同寻常的尊重。这场由主张寡头政治的人发动的革命,最先得到了雅典重甲步兵的响应,但是,由最穷困和最具有民主意识的雅典人掌控的舰队却仍然坚决地反对这场革命。雅典舰队在爱琴海的主要基地是萨摩司岛,新的寡头政权从雅典派出的代表来到这里,试图劝说舰队返回比雷埃夫斯港。亚西比德当时正好就在萨摩司,他意识到舰队如果就这样离开萨摩司,将会使雅典失去对海上的控制。于是,他说服舰队的指挥官继续留在萨摩司的海军基地里。修昔底德评论亚西比德的这一举动是他平生第一次真正的为自己的城邦所做出的贡献,用语颇为尖刻。

然而,尽管一系列的胜利使雅典可以继续保持对赫勒斯庞特海峡,这个十分重要的要道的控制,但雅典舰队已经无力再去阻止发生在联盟内部的各种反抗和背叛了。公元前411年发生在优卑亚、开俄斯(Chios)和塔索斯(Thasos)的反叛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尽管雅典人后来暂时把优卑亚拉回了联盟,但他们却已经无法恢复对开俄斯和塔索斯的控制了。最后,在它的主要盟国当中,只有由亲雅典的民主派统治的萨摩司还依然保持着对联盟的忠诚。然而,这已经远远不够使雅典有能力去对抗它的几个强敌的联合进攻了,因为在公元前407年,波斯王子居鲁士,他是大流士二世(Darius II,当政时间是从公元前425年至前404年)的小儿子,与一位了不起的斯巴达人——吕山德——建立了共同对付雅典的极其重要

的联合阵线。

吕山德

吕山德，在希腊语中称作“*Lusandros*”，他是第一位也差不多是最后一位已经在一部古代的传记中被单独立传，在这本书中又被选出来立传的斯巴达人。然而，那部古代传记编撰的时间与他并不是同一个时代，或者压根儿就不是同一时代：普鲁塔克在写“吕山德的一生”的时候，已经是吕山德死后近五个世纪的罗马帝国早期了，时代的状况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普鲁塔克编撰这部传记的目的，是想让那些现在是卑贱的、或者说是被贬抑的希腊同胞们能够认识到新的罗马世界是可以理解的，为此，他分别从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伟人中，各挑选出一位他认为命运和气质相类似的人物，然后以对照比较的形式分别为他们立传。对普鲁塔克身边的读者来说，那些被挑选出来的希腊人几乎都是“古代的”，而一些罗马人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要贴近得多。比如，尤利乌斯·恺撒，他在公元前 44 年被刺杀，离普鲁塔克的出生（公元 46 年）还不到一百年。

183

普鲁塔克给予了吕山德相当多的褒扬，不但浓墨重彩地为他立了相当出色的传记，而且还把他与苏拉（Sulla）[1]——这位罗马早期的执政官相提并论。苏拉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不但使罗马帝国的版图发生了巨变，而且也彻底改制这个共和国的宪法，这是两件让他功成名就的伟绩。他的绰号叫“幸运儿”（Lucky），后来还主动辞去了罗马执政官的职位，回到了家中，从而有了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最后，平平安安地在床上离开了人世。相反，吕山德不但从来没有成为任何帝国的执政官，而且还很不体面地死在了发生在彼奥提亚（普鲁塔克的

[1] 苏拉（公元前 138—前 78），古罗马将军，政治家，全名卢修斯·科内利厄斯·苏拉·费利克斯，在战胜了米特拉达梯六世以后，苏拉于公元前 83 年入侵意大利，公元前 82 年他当选为独裁官，实施了有利于长老会的宪法改革。——译注

家乡)的战斗当中。

普鲁塔克为吕山德立传并把他与苏拉并列,肯定有他自己的理由,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都不能增进我们对吕山德一生的了解。除了普鲁塔克之外,其他与吕山德相关的历史资料主要都是来自他同时代的另一位雅典历史学家色诺芬的记载。色诺芬曾亲眼见过吕山德,对他很了解,但色诺芬是国王阿吉西劳斯的忠诚支持者,我们将在后文看到,国王阿吉西劳斯与吕山德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所以,我们在阅读色诺芬关于吕山德的记述的时候,不得不保持适当的警惕,当然,他记述的一些内容普鲁塔克也曾引用过。

据说,吕山德是一个"养子"(*mothax*),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被人收养的斯巴达公民,不是在自己的父亲家长大而是作为别的斯巴达人的儿子才通过"够格者"训练。如果这个传说是正确的话,吕山德的母亲可能是一位希洛人而不是他父亲的正式妻子,或者他父亲可能因为太穷而无法给予他正常的抚养,吕山德的父亲亚里斯多克瑞塔斯(Aristocritus)据说是个穷人,尽管他也属于赫拉克勒斯的后裔,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叫做利比斯(Libys),"利比亚人"(Libyan)是对一些有名望的并与利比亚王子有"宾朋"关系(xenia)的斯巴达人的一种尊称。反过来说,吕山德属于贵族同时又是奴隶的私生子,这个情况是很难不为人所知的,因此吕山德的母亲可能确实是他父亲家中的一个希洛人妇女。

184

关于吕山德的童年和青年期的情况,除了知道他所谓的"养子"身份之外,其余的我们一无所知。但是,当他第一次抛头露面的时候,就已经不再仅仅是一名无足轻重的斯巴达公民了,他的这次出现与斯巴达社会里特有的性爱与教育状况有关。大约在公元前430年的某个时候,吕山德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龄,他设法成为了斯巴达一位最为高贵的青年的情人,这位青年不是别人正是当政的国王阿基达马斯二世的小儿子阿吉西劳斯,此人当时正在参加"够格者"训练。阿吉西劳斯作为阿基达马斯的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儿子,是没有希望成为欧里庞提德王位的继承人

的,因此他也就不能享受免除参加“够格者”训练的待遇,就像王储阿吉斯(未来的阿吉斯二世)已经得到的特权那样。事实上,阿吉西劳斯能够通过“够格者”训练,至少在两个方面是让人感到吃惊的:首先,他天生跛足,这样的身体条件只会让他在婴儿期就早早夭折;其次,尽管他是跛足,但他却以非常出色的成绩完成了“够格者”所规定的所有训练。

因此,吕山德应该有必要与其他可能比他更为杰出的追求者们进行激烈的竞争,以赢得并保持阿吉西劳斯对他的喜爱。他这样做既可以迅速地提升他自己的声望,同时也可以加强他未来的政治影响力。

吕山德大概在雅典战争中表现不错。我们对他的这段经历一无所知,直到公元前 407 年,此时,他大概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依据有着年龄崇拜的斯巴达人的标准,达到这个岁数的人已经有资格去担任海军的最高指挥官了,这个职位没有什么限制,所有斯巴达人都可以担任,而且在地位上与陆军指挥官是平等的,但陆军指挥官只能由合格的斯巴达国王担任。公元前 407 年,吕山德被任命为海军舰队的司令。当时,斯巴达的海军还非常弱小,甚至还远远没有达到斯巴达人能够或者想要达到的普通规模。吕山德表现得非常自信,他有着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以及作为将军所应有的独立的决策能力,在指挥海军的过程中他一贯都是我行我素的,但是,斯巴达的法律禁止他有这样的作派,到了公元前 405 年,他再一次被派往爱琴海战区担任实际上的海军指挥官。[1] 正是在这个职位上,吕山德在关键时刻得到了他的密友波斯王子居鲁士提供的资金援助,得以最终带领斯巴达人在困境中扭转战局,一举结束了长达二十七年的雅典战争。

185

然而,根据斯巴达人的政治传统,即使是权倾天下的吕山德也不能一意孤行,只有国王才能成为手握关键牌的人。吕山德最初还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对雅典进行各种战后安排,为的是确保雅典被控制在一个得到斯

[1] 斯巴达海军司令的职务每次只能担任一年。——译注

巴达驻军支持的、亲斯巴达的寡头政府手中，而雅典以前的其他盟国或附属国，则由他的那些党徒组建一些非常保守的政权来进行控制。但是，仅仅在雅典被打败后的几年之内，这个新的斯巴达帝国就不再完完全全地按他的意愿行事了。首要的原因就是来自阿基亚德王族的国王波塞尼亚斯的反对，波塞尼亚斯是曾经与雅典人缔结过和平协约的普雷斯多安那克斯的儿子。吕山德能够指望的就是从阿吉斯二世那里得到支持，阿吉斯二世与波塞尼亚斯都是国王，相互之间也彼此敌对。在公元前403年，波塞尼亚斯在斯巴达受到提审，起诉他的理由毫无疑问是由阿吉斯提出来的，但是他最终却被裁定无罪，主要是因为五位监察官支持他相对来说更为自由、开明的政策，即尽量少地干预之前属于雅典帝国的各个城邦的内部事务，尤其是雅典的内政。

吕山德无法让国内的人对他言听计从，相较于自己在国外叱咤风云、处处受人追捧的情形而言，他开始感到屈辱并愈发地焦躁起来。尤其是在萨摩司岛，他的一些党羽采取了一些在希腊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举措。186 他们尊奉吕山德为天神，把他这个活着的、终有一死的人当作一个不朽的神来崇拜，并且为了纪念他，还把他们原来最为重要的宗教节日赫拉亚(Heraea，以宙斯的妻子赫拉命名的运动会)改名为“吕山德节”。在德尔斐这个希腊宗教的绝对中心，吕山德还不敢把自己的雕像搬到公共的祭祀场所里去让人们永远地膜拜他，但他也差不多这样干了。他派人为自己制作了一尊巨大的雕像，并用在战争中获得的大量战利品来支付这些费用。然后，他把这尊雕像放置在“德尔菲的神圣之路”(Delphi's Scared Way)的入口的显著位置上，这条路上已经竖立着很多青铜雕像，既有人的也有神的。奥林匹亚的十二位天神和女神们都在这里面，在他们的中央是海神波塞冬，整个场面看上去似乎是众神正在给吕山德加封一顶胜利的王冠。

赞美诗诗人西摩尼得斯曾经劝导另一位在泛希腊地区取得过军事胜利的斯巴达人——摄政者波塞尼亚斯，“永远不要忘了，你也是终有一死

的”。吕山德当时应该是反思了这位圣贤的话,并觉得这是有益的谏言。而他唯一可走的路就是放弃已有的高位,自降为平民,他确实这样做了,但是,他还仍然不是一个已经完完全全失去了影响力的人物。大约是在公元前400年的时候,对他来说,一个更好的机会出现了,从而使他可以再一次在斯巴达的各种内外事务中展现自己的权威。就在那个时候,他的波斯朋友居鲁士死了,是在企图篡夺自己的长兄阿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II)的王位时被杀死的;斯巴达又重新与波斯交战了,但这一次,斯巴达是作为雅典帝国的继承者以及希腊文化的捍卫者去对付东方的野蛮人。因此,吕山德有很多的机会在此时的国际舞台上大展拳脚,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而阿吉斯的去世则使他意识到,他或许可以通过为自己挑选一位代理人的方式来统治斯巴达。具体的步骤就是首先坚决地拥护自己之前的情人——阿吉西劳斯——坐上欧里庞提德的王位,然后再由自己来实际上统治整个斯巴达。

事实上,对阿吉西劳斯来说,在这场充满非议的争夺王位的竞赛中,吕山德对他的支持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曾经有一则神谕预言,如果一个跛足的人成为国王的话,将会给斯巴达带来可怕的灾难,于是,吕山德努力说服斯巴达人相信,神谕所称的瘸子并不是指身体上有缺陷的人——阿吉西劳斯,而是指阿吉西劳斯的竞争者列乌杜奇戴斯,这个阿吉斯的“可疑的”儿子的合法继承地位正受到严重的怀疑(有谣言称他实际上是亚西比德的儿子,大概是因为他的出生日期正好符合那种推测)。要让斯巴达人认可国王的职务具有真正的效力,这个国王的血统的纯正性和真实性是至关重要的。狡猾的吕山德能够祭出如此聪明的一招,实在是高明至极,而且效果奇佳。就这样,阿吉西劳斯正式地登上了王位,此后一直统治了斯巴达近四十年。

187

然而,如果吕山德因此就以为阿吉西劳斯会成为他手中的布偶任他摆布的话,那么,他不久之后就会幡然醒悟自己打错了“算盘”,因为事实比想象的要冷酷得多。阿吉西劳斯曾经通过了“够格者”训练,了解普通

斯巴达人的想法，也清楚该如何在斯巴达的精英分子当中左右逢源，以取得他们在政治上的支持和帮助，事实证明他正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公元前 396 年，阿吉西劳斯任命自己为抗击波斯人的远征军的指挥官，而且，还接替了吕山德在亚洲的工作，吕山德很快就发现自己反而成为了一个纯粹的摆设，于是垂头丧气地返回了斯巴达。尽管又一次遭受了失败，但他并没有因此就放弃。在公元前 395 年的时候，斯巴达人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与不同的敌人作战：亚洲的波斯，以及一个位于希腊中心的包括雅典和底比斯在内的城邦联盟。吕山德作为两位最高指挥官中的一位，再次被派往彼奥提亚人前线，另一位正是国王波塞尼亚斯。

部分的原因，无疑是因为古代的军事通讯方式在战斗中运用起来非常困难，另外的原因是他内心燃烧起来的争取个人荣誉的愿望过于急切，再加上他与国王波塞尼亚斯一直龃龉不断，所有这些不利的因素使得吕山德在军事行动中没有按计划与国王的军队进行联系，而是带领着自己的部队提前向彼奥提亚人的哈利阿塔城（Haliartus）发起了进攻。他就是在那里被杀死的，用一种相当乏味、平淡的方式结束了自己轰轰烈烈的一生。尽管他死了，但他仍然还是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传奇，他有着无数的追随者，不只是在国外，在斯巴达国内也同样如此。公元前 394 年，从亚洲赶回来的阿吉西劳斯感到自己有必要与吕山德在国内的追随者们进行斗争，而他斗争的方式是非常有趣的。

他宣称在吕山德的住所里发现了一份写在纸草上的文件，上面记有吕山德还未公开发表的演讲，这份演讲据说是由一位国外的智者代写的。演讲的主题与斯巴达的王权问题有关，吕山德在这份稿子里认为斯巴达的王位应该停止世袭，王权不应再由阿基亚德和欧里庞提德这两个家族独揽，而是应该让更多的人参与分享，至少应该是所有“赫拉克勒斯的后代”（吕山德就是其中的一个）都有机会当王，而且有可能的话，全体斯巴达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机会。显然，阿吉西劳斯的这一举动应该是非常有效地削弱了吕山德的朋友和党羽在斯巴达的影响。我个人并不全然相信

188

这个故事的所有细节,但是,吕山德曾经有想法要成为斯巴达的国王,我则一点儿也不会感到难以置信。别忘了,正是两位国王,首先是波塞尼亚斯,然后是阿吉西劳斯,一次又一次地扼杀了他逐渐膨胀的野心。

最后,用一则轶闻来结束吕山德的这篇简短传记吧!他死的时候,已经有几个女儿到了适婚的年龄(他可能在四十岁的时候再婚了),并且有很多的追求者,很多人以为吕山德应该会非常富有。可后来人们发现他其实是潦倒而终,事实上,他没有多少兴趣把权力和声望转换成个人的财富,而只是对权力和声望本身充满着热望。因此,当那些追求者们发现他们有可能会因为一场"不幸的"婚姻而受到指控的时候,马上就都奇迹般地消失了,其实这些人求婚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金钱。可以肯定,生活俭朴的吕山德应该是认同斯巴达人那种真正的严苛的生活方式的。

吕山德通过一种颇为新颖的方法获得了斯巴达舰队司令的任命。他不仅仅把这个司令官当作是一个海军的职位,同时也把它视为一件政治工具。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里把吕山德这个舰队司令比作斯巴达的国王。就军事而言,他的这种观点确实准确地反映了一个斯巴达舰队司令在战役中所拥有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同斯巴达的两个国王一样,像吕山德这样有能力、有野心的海军司令同时还掌握着不受限制的官员任免权,这一点是亚里士多德没有完全明确指出过的。吕山德除了兢兢业业地管理着自己的舰队外,还很注意去取悦他在爱琴海东部每一个主要城邦里的一小撮狂热、忠诚的支持者。这些人后来成了"十人内阁"或"十人委员会"的核心,他的计划就是要借助这些人来统治曾经的雅典帝国,当然,是以斯巴达的名义。 189

所有这一切能按着计划进行实施,首先要归功于他能够与居鲁士建立一种不平常的私人关系。居鲁士可能有着自己的长远打算,那就是当他想要去篡夺自己长兄的王位的时候可能用得着斯巴达,当然这只是我们的后见之明。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正是他所提供的资金才使得吕山

德有能力去组建一支不但在规模上，而且在技术能力上与雅典不相上下的舰队，实际上这支舰队里的战船比雅典海军的要更为优良。公元前407年，在他第一年的司令官任期结束之后，吕山德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职位，因为斯巴达的法律规定一个舰队司令的任期一次不得超过一年，或者，无论如何也不得超过一个战季(one campaigning season)。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的继任者卡利克拉提达斯(Callicratidas)却无所作为，此人还曾公然地宣称绝不会向居鲁士这样的野蛮人叩头以求得援助，在公元前405年的时候，吕山德又被派往爱琴海战区，为了不违反法律，斯巴达人的权宜之计就是任命他为舰队的副司令官。

最终，正如米提列奈人早在公元前428年就曾预言的：雅典战争将取决于赫勒斯庞特海峡周围的战斗情况，而事实上这场战争最终确实是在山地解决的。吕山德是这场战争的赢家，他特别善于在激烈的冲突中运用计谋。他在一个叫作的伊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或者"山羊河"(The Goat's Rivers)的停泊点，趁雅典人的舰队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地发起了进攻。雅典人被大量杀戮，另外还有很多人被俘虏，对于这些战俘，吕山德并没有采用以往希腊人对待其他希腊战俘时所采用的常规方式，而是砍掉了他们的右手，以示惩罚和警告。吕山德把幸存的人赶回了雅典，此时的雅典人，正在遭受着他们十年以前曾经使叙拉古人遭受过的最为痛苦的折磨。公元前405年到前404年的整个冬季，许多雅典人饿死街头。公元前404年的春季刚到，雅典人，即使不是全部的话，不得不无条件地向斯巴达人投降，他们接受了吕山德开出的所有条件。

190

首先，也是最为明显的，就是雅典作为昔日强大的帝国所拥有的东西都被剥夺了，几乎没有剩下什么；然后，雅典帝国的军事根基——舰队被大大削弱了，他们能留下的只是一支不中用的小舰队，舰船的数量不超过一打。在曾经归属于这个帝国的其他地方，吕山德就设立"十人内阁"，即一种由他的十个党羽和极端的政治寡头们建立的政权。但雅典太大了，因此不能由一个小型的团体来进行管理，而是由亲斯巴达的克里底亚

(Critias，他曾是苏格拉底的信徒，也是柏拉图的一个亲戚)作为领导，去建立一个由三十名成员组成的僭主政府来控制雅典，与之相配合的就是再设立一个“十人内阁”来管理雅典的港口城市——比雷埃夫斯。为了确保这三十人统治的稳定性，吕山德迅速派遣了一支由那些获得了自由的希洛人组成的军队驻守在雅典，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就可以提供必要的支援。然而，正是雅典人所持有的信念和民主精神再加上“三十僭主”的倒行逆施，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雅典就重新恢复了民主政府，这是在斯巴达人的严格监管之下实现的，这是事实，但其实也是在斯巴达人默许的情况下实现的。



第三部

跛足的王权



第七章　斯巴达帝国：公元前404年至前371年

193

由于得到了波斯人的金钱支持，再加上雅典人自己在战略和战术上的失误，斯巴达最终成为了雅典战争的胜利者。当时，斯巴达人的各项政治决议权都已经被吕山德把持，同时，吕山德开始大力宣扬一种最高纲领主义者式的[1]、强硬的帝国主义路线。这个帝国有时被称作“第二”斯巴达帝国(the “Second” Spartan Empire)，它与之前分别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大陆占据支配地位的斯巴达帝国及雅典帝国是不同的，这是另一种更为极端的帝国主义模式。斯巴达人同样向其他城邦征索贡品并维持着一支海军，但是，人们相信并且基本上都认为雅典帝国是反抗波斯的，而依据吕山德的理念建立起来的斯巴达帝国大体上却是反民主、亲独裁的。不久之后，斯巴达的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更为保守的成员，包括国王波塞尼亚斯，都认为应该采取一种“双元霸权”(dual hegemony)的模式来与雅典共同管理希腊并彼此和平共处，尽管吕山德反对他们这样做。吕山德很快发现自己被撇在了斯巴达的决策圈之外了，于是，他努力通过对王位继承权发表有争议性的言论来扶持自己之前的爱

[1] 最高纲领主义者原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一个派别(1904年起)，1906年成为独立的党。其纲领是土地、工厂社会化，并采取个人恐怖主义和财产没收手段。1917年十月革命后，曾参加反苏维埃叛乱。1919年该党解体，部分成员1920年加入了俄共(布)。——译注

人——阿吉西劳斯——登上王位，以达到自己重掌乾坤的目的，大约在公元前 400 年，阿吉西劳斯继承了他的同父异母兄弟阿吉斯的王位，成为了斯巴达的国王。

在以后的三十年里，斯巴达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希腊的——历史就是阿吉西劳斯的时代。总的来说，他的一生如此紧密地与斯巴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克列欧美涅斯一世。在本书中，我将不再为他另写一篇独立的传记，色诺芬和普鲁塔克已经这样做过了。因为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位国王，所以他接受过所有普通的斯巴达人都必须要接受的成年教育，尽管他天生跛足，但却以最优的成绩通过了各种测试。在他身上既有斯巴达人的美德，也有斯巴达人才有的恶习。因为不愿意对斯巴达人的寡头统治作任何改变，致使他最后不得不在公元前 371 年的留克特拉一战中，接受斯巴达军队被彻底击溃的事实以及相应的后果。然而，在公元前大约 400 年，即他继承了欧里庞提德王位的时候，谁又能够自信地预言神谕所说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事实呢？

无论如何，继承王位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按照常规，阿吉西劳斯的同父异母的兄长阿吉斯二世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应该继承王位，这是大家本来的想法。但是，在公元前 400 年，在斯巴达历史上这是非常普通的一年，此人却没有成功地当上国王。一些人怀疑他的王位继承权的合法性，有谣言说他真正的父亲是来自雅典的亚西比德。此外，当阿吉斯去世的时候，列乌杜奇戴斯还只是刚出蒙昧的少年，并且，也缺少一个成年男性亲属来代替他打理朝政，直到他成年后有资格为王。或者，如他的对手阿吉西劳斯那样，有一个像吕山德这样的男人来为自己摇旗呐喊，协助他赢得这场王位之争。

阿吉西劳斯曾经接受过非常严格的训练，他成功地通过了“够格者”测试，是一个已经获得认可的勇猛的斯巴达人，同时，他还绝对地信奉吕库古式的价值观念。然而，他天生跛足，不得不去与那则跛足的人当王将会毁灭斯巴达的神谕作斗争。吕山德曾经设法以寓言的方式来诠释这则

神谕，但是，对这一神谕的字面理解还是在困扰着阿吉西劳斯和斯巴达。因此，本书的第三章，也是最后一章就以此为题。

阿吉西劳斯当上了欧里庞提德家族的国王之后，开始与另一位国王——阿基亚德的波塞尼亚斯——共同统治斯巴达，然而没过多久，一位预言家宣称在占卜的时候从祭物的内脏上看到了最为可怕的凶兆。他说预兆显示斯巴达似乎将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当中。有人说预兆指示的其实只是一个枯燥、平常的事实，即每年新一届的监察官委员会都会对希洛人宣战，这样就等于正式宣布所有希洛人都是敌人。然而，这位预言家所宣称的"敌人"很快就被证明其涉及的面要更为广泛，危险的程度也更为紧迫，因为这些敌人不但来自底层而且也来自社会最上层。据说，一位叫塞纳冬(Cinadon)的人为首策划了一起阴谋，但阴谋最后被揭发了出来，此人可能是一个因为经济问题而被降级的斯巴达人，也可能是一个混种(mixed-birth)的斯巴达人。据说塞纳冬正在谋划做一些对城邦不利的事情，一个之前与他交往密切的人向监察官们告发了他，这个告密者非常夸张地宣称塞纳冬的支持者包括所有"边民"、"新代梦人"、希洛人以及身份模糊而被称作"下人"(Hupomeiones)的那些斯巴达人，而且他还说这些人憎恨所有的斯巴达公民，以致都想要生吃他们的肉。

195

在此人所告发的内容中，有很大部分纯粹是猜测、暗示和夸张，但色诺芬把这些都忠实地甚至可能是毫无偏袒地记录了下来，尽管他是阿吉西劳斯的支持者，也是受其庇护的门客。然而，这一事件也生动地揭示了斯巴达作为一个社会是多么的奇特，因为其他的希腊城邦是不必去考虑自由人与非自由人、前市民以及不完全市民(half-citizens)之间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的，这样的事情甚至连最模糊的可能性都不会有。到最后，这起阴谋不了了之，什么也没有查出来，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为了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斯巴达人对塞纳冬进行了公开的残酷的惩罚：他被捆绑着由马拖着跑过斯巴达的大街小道，可能直到最后他的身体被拖扯成小碎片后，马才停了下来。亚里士多德在后来注意到了这种潜在

的、对斯巴达现有政治秩序进行挑战所具有的重大意义，阿吉西劳斯对传统政治秩序的保护，公正地说来，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诸如此类来自内部的严重挑衅行为的一种反应，他的这种极端的保守主义最后对斯巴达来说反而是适得其反。

公元前4世纪的90年代，正是斯巴达帝国最具扩张性的时期。它不但对希腊本土的其他国家，甚至在海外，如亚洲大陆都采取了军事行动。起初，斯巴达至少看上去还是在为一个正当的理由而战：解放希腊。实际上，这是对雅典人以前所做的政治宣传的一种不太明显的模仿，雅典人当初其实只想借此来发展和维持自己的帝国地位，这个帝国不久前在雅典战争中被斯巴达人摧毁了。然而，对于斯巴达人来说，这样的宣传策略对他们的战斗力的影响，从来就没有达到雅典人的宣传策略所取得过的良好效果，因为从一开始，这样的宣传就被大家认为是伪善的。

196

好几任斯巴达的指挥官都努力想要在对付狡猾的波斯总督替萨斐尼（据守在萨迪斯的），以及他的同事法那培萨斯（据守在靠近赫勒斯庞特海峡以北的 Dascylium）的过程中取得进展。最后，在公元前396年的时候，阿吉西劳斯说服当时的政府授予他在亚洲的最高指挥权。因此，他是自列乌杜奇戴斯二世之后唯一一个把征战的步伐推进到远东的斯巴达指挥官，并且在公元前395年，他成为了第一位大权独揽、同时统管陆军和海军的斯巴达国王。对阿吉西劳斯来说，公元前396年，在另一个方面也是极重要的一年，因为正是在这一年，他的妹妹库尼斯卡在奥林匹亚运动会上为斯巴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1]

库尼斯卡

库尼斯卡，这个名字本来指的是一种小狗（雌性），听起来像一个小孩

〔1〕 下文关于库尼斯卡的传记，是卡特里奇在他自己的著作《希腊人：文明的熔炉》（*The Greeks: Crucible of Civilization*, 2000）的相关内容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的昵称；她的一个男性先辈曾经有一个差不多的外号——库尼司科斯(Cyniscus)。人们可能最初用“库尼斯卡”来称呼斯巴达的一种特别的猎犬，这种猎犬中的雌性特别善长追踪可怕的野猪，因而非常有名。如果，当然也是可能，库尼斯卡真的是阿吉西劳斯的亲妹妹以及阿基达马斯二世和埃乌帕丽尼亚的女儿的话，那么，她就可能出生在公元前 440 年。她应该是在 40 岁左右的时候(公元前 396 年)，成为了第一个赢得奥林匹亚运动会冠军的妇女，紧接着她又在公元前 392 年的奥运会上卫冕成功，再获殊荣！

197

因此，库尼斯卡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斯巴达女孩而是一位尊贵的公主。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在通常情况下，斯巴达人的婚姻关系是相当复杂的；王室的婚姻安排也是同样如此，在所有的王朝政权当中，婚姻关系都是与经济尤其是政治上的权衡牵涉在一起的。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狄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曾经转述过一个真伪可疑的故事，后来的普鲁塔克也引述过这个故事，说的是监察官们认为阿基达马斯所娶的妻子过于娇小，因而要对他课以罚金。按希腊人的一般标准，斯巴达妇女的身材看上去确实要高大一些，可能是因为她们相对来说吃得更多、更好的原因吧。因此，作为第二任妻子，埃乌帕丽尼亚身上可能具有比身材高大更吸引阿基达马斯的优点。

成年斯巴达人在性别方面是相对平等的，女孩们可以参与一些男孩们在官方教育中所接受的相同的身体训练，同时，女孩们的参与反过来也加强了斯巴达人的这种平等观念。斯巴达教育的必修课程规定，一个男孩如果到了青少年时期，就必须与某个成年男子建立配对关系，有证据显示，斯巴达女生所接受的教育中也有类似的课程。库尼斯卡大概也曾接受过此类教育，就像他的哥哥阿吉西劳斯通过“够格者”训练那样。在斯巴达找到的一些非常精美的青铜人像，展现了青春期的少女或年轻的妇女们的各种运动姿势，这有力地说明了斯巴达当时的社会状况在整个希腊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所有这些对其他希腊人来说是震惊大于

羡慕，他们用"露腿癖"这样带污辱性的名字来称呼斯巴达的女孩，因为这些女孩们总是穿着非常短的、暴露身体的束腰外衣，在一些外邦人看来，所有的斯巴达女孩和妇女比娼妓好不了多少。

男人们参加"够格者"训练的意义在于年轻人通过它可以成为一名公民战士，从而为国内、国外的战争作好准备。然而，一个斯巴达公民在其一生中并不全是在从事战斗，或以战斗为真正乐趣的。宗教对于斯巴达人来说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而且排成队列跳集体舞，既是赞美神灵，也可以培养重甲步兵在组成密集方阵进行作战时所需要的集体节奏感和凝聚力。至于女孩们，她们不但在斯巴达跳舞，还到邻近地区的很多城镇去跳。比如叙阿琴提亚节，这是为纪念阿波罗而在斯巴达南部几公里的阿密克利举办的节日，女孩们会坐着马车去那里参加庆祝活动。在色诺芬关于阿吉西劳斯的传记中，其中一段内容告诉我们即使是国王的女儿们也得像其他女孩那样乘坐公共的马车到那里去。推测起来，库尼斯卡也不会因为她的父亲是国王阿基达马斯而受到什么特别的照顾。

198

竞技(athletics)作为另外一种宗教庆典特别吸引富有好胜与战斗精神的斯巴达人。根据传统的记载，第一届泛希腊(全希腊且仅限于希腊)竞技运动会是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 Game)，举办的时间是在公元前776年。这个日期可能有点过于靠后。"运动会"(Game)现在是一个相当宏大的字眼，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进行个人的跑步比赛，相当于今天的200米短跑。然而，经过一些年份之后，其他的一些项目增加了进来，如赛马。在比赛中，选手们根据年龄被分成"成年"组和"少年"组。到公元前472年的时候，奥运会的主办国家埃利斯对会务的组织管理工作进行了大幅的修改，把运动会的时间延长到了五天。

奥运会上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可奖品却是象征性的，仅仅只是一顶由橄榄枝编成的花冠。人们认为获得奥运会的胜利本身就已经足够了，因为折得桂冠的人会得到最有价值的奖赏——不朽之名。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运动会在最初的意义上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运动会作为一个

节日,最重要的活动就是进行全民性的宗教游行,并集体向奥林匹斯山上的守护神宙斯献祭。另一方面,争夺奖品的行为并不总是遵守着我们所认为的某种特别的宗教精神。事实上,竞争的氛围感觉更像是在进行准军事性的演习。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就像希腊文化中的其他很多根本性方面那样,是极端性别化的。他们严格地规定只有男性才能参加奥运会,妇女(可能除了官方的女祭司之外)甚至连观看比赛都是不被允许的。

赛跑和对抗性运动是在奥林匹亚的主运动场之内或附近举行的,除此之外的项目,如赛马是在另外一个单独的跑马场(实际上就是一个让马跑的跑道)上进行的。这是唯一一个可以让妇女参加的比赛——尽管她们也只能通过代理人来参加,因为她们不能担任骑手或驾车手,这些工作通常是由男性来担任,而女性则只能作为双轮战车和车队的所有者。在公元前 396 年,库尼斯卡的驷马车队参加了比赛,竟然夺得了冠军。公元前 392 年,她的车队再次出赛并卫冕成功!

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准确地了解她连续两次获胜的事迹,是因为在公元 2 世纪中期的时候,一位小亚细亚的希腊旅行家帕萨尼亚斯被她的事迹所吸引,慕名而来参观了奥林匹亚。他当时看到了由库尼斯卡本人建立的纪念碑,并在底座上发现了还仍然清晰可辨的碑文:

> 我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斯巴达人的国王,
> 我用四匹骏马组成的车队赢得了比赛,
> 并且竖立此碑:我是库尼斯卡,
> 我是整个希腊
> 唯一一位赢得过这顶桂冠的女人。[1]

〔1〕 *Palatine Anthology* XIII. 16.

从碑文中这个坚定而自信的“我”可以看出，库尼斯卡在主动争取荣誉的时候是毫不谦虚的。然而，我们正好还可以通过色诺芬为她的哥哥阿吉西劳斯所作的传记来了解这件事情，色诺芬的这部著作是在阿吉西劳斯基本知情的状况下撰写的，并作为一部用于政治宣传的作品，在阿吉西劳斯死后(大约是公元前 359 年)马上就获得了发行。在这部著作里，我们被告知，库尼斯卡之所以能够养育赛马、组建车队并且用它们去参加奥林匹亚赛会，并不是她个人的主意，而是出自阿吉西劳斯的想法。而且，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向人们证明，一个人只要足够富有就可能获得这种比赛的胜利，而不像在其他项目或领域内(尤其是在战斗中)，取胜的关键取决于个人是否具有男子汉的美德。他言外之意就是说，什么样的男人才会去参加连女人都能夺冠的比赛呢?

阿吉西劳斯和他的宣传家们竭力想要掩盖一个事实，即库尼斯卡其实是在没有官方的支持下用自己的方式获得冠军的。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还是不得不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阿吉西劳斯要用这种方法来使劲贬低妹妹所取得的开创性的成就，以及在整个希腊地区获得的非凡荣誉呢?这里可能有几个因素和动机在起作用。从某个层面上说，阿吉西劳斯试图通过此举来维护斯巴达社会中正在逐渐衰退的奉献精神，并激励斯巴达人继续在战争中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因此，就有必要去抵制赛马——这种既耗资巨大又可能会给个人带来巨大荣誉的比赛项目——对每一个斯巴达人的诱惑。事实上，在公元前 5 世纪的时候，斯巴达人在奥林匹克的战车比赛中获得的这次胜利的确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色诺芬记载道，阿吉西劳斯对此作过特别的强调:库尼斯卡饲养的只是赛马，而他饲养的则是真正的战马。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可能因为库尼斯卡是一个女人，他才这样贬损她，因为在斯巴达的历史上有一段时间里，“很多事情是由妇女来完成的”，这是亚里士多德后来评述这段时期的原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运动会就成了男女之间的一场危险的政治角力了，不久之后，也是在阿吉西劳斯执政期间，据说，他认为有必要处死两个

200

地位很高的斯巴达妇女，她们分别是一个被降级了的斯巴达指挥官的母亲和姑妈，这可能不仅仅是巧合。

最终，无论如何，库尼斯卡笑到了最后。她死后，除了在奥林匹亚有她的纪念碑之外，斯巴达人也把她视为女英雄并为她建造了神殿，并且还在那里还举行相应的宗教仪式。诚然，所有的斯巴达国王在死后都会受到这样的崇拜，但在历史记载中，库尼斯卡是唯一一位获得过如此高的、令人艳羡的社会地位的斯巴达妇女。

阿吉西劳斯史无前例地独揽斯巴达的海陆军权，到公元前 395 年或前 394 年的时候，这样的专权方式已经不起作用了。尽管获得了一些胜利，这些胜利在色诺芬的历史著作《希腊志》(*Hellenic*)中被说得有点言过其实，事实上阿吉西劳斯从来就没有为斯巴达取得过什么决定性的进展，他在出征的时候也没有随军带上有效的攻城装备；同时，他既不想也没有能力离开爱琴海的沿岸冒险向波斯帝国的腹地发动进攻，就在六年以前，近万名希腊雇佣兵曾在那里深陷泥潭，几近全军覆灭，成了后来的斯巴达人的一个反面教材。公元前 394 年，斯巴达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海上失利，攻击他们的是由雅典人担任司令官的波斯舰队，这一失利导致斯巴达人从亚洲召回了阿吉西劳斯，以对付来自希腊世界内部的敌人的严重威胁；雅典、彼奥提亚、柯林斯和阿尔戈斯在波斯人的金钱资助下，组建了一个四国同盟来与斯巴达为敌。这个同盟在公元前 395 年的时候开始逐渐强大起来，也就是在这一年，先是吕山德战死，然后另一位国王波塞尼亚斯被放逐(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两件事都可算作是这个反斯巴达同盟间接取得的胜利。公元前 394 年，在斯巴达在陆地上取得了两次重大胜利之后，这个同盟也开始逐渐衰弱了，这两次陆战的第一次发生是在柯林斯的尼米亚河(River of Nemea)附近，第二次是在彼奥提亚的科罗尼亚(Coronea)。　201

在科罗尼亚一役中担任指挥官的是阿吉西劳斯，他得到了上文提到

的那支万人雇佣军中余剩下来的士兵(色诺芬就是其中一员)的帮助,早在几年以前,这些人就被重新招募进了斯巴达军队去对抗波斯人。因为曾经帮助斯巴达人战胜过自己的城邦——雅典,犯下叛国罪的色诺芬就不得不选择流亡斯巴达,但是阿吉西劳斯认定他是忠诚的并予以了奖赏,把一处靠近奥林匹亚的舒适的乡村休养地给了他。在这里,阿吉西劳斯用从亚洲带回来的战利品建造了一座献给阿耳忒弥斯的神殿,阿耳忒弥斯是他从事自己最喜爱的运动——狩猎——的女守护神。这一次,阿吉西劳斯也把自己的战利品奉献给了德尔菲的阿波罗。按记载,如果奉献给神灵的钱财真的只占到了所有战利品的十分之一的话,那么,阿吉西劳斯从亚洲掠夺回来的钱财差不多就是 1000 塔兰特(*talents*,按等值来算的话,三塔兰特就足够让今天的一个人成为百万富翁)。这些金银财宝像水一样流入了斯巴达,就像公元前 404 年的时候那样,当时,吕山德在战胜雅典及它的帝国之后同样也是带回了大量的金钱,正是这些钱财开始严重地动摇斯巴达人传统的道德观念。

后来的一些文献资料曾引述了一个听起来很切合此意的神谕,其大意是"贪财而不爱其他,将会毁灭斯巴达"。这种对金钱的贪恋,在公元前 400 年左右的时候,可能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公开地表示喜爱金钱却是比较少有的,而且,这样的后果也不利于斯巴达社会维持吕库古的严格法规。阿吉西劳斯就像吕山德那样,作为个人显然并不为财富的诱惑所动,可是,不幸的是大多数斯巴达人却不是这样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对斯巴达的妇女们嗜好奢侈的生活方式有过不好的评价,而且他们都认为是斯巴达的男人们对她们过于迁就才这样的。或许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断言的:"在斯巴达作为帝国的时候,很多事情是由妇女来完成的。"

202 公元前 394 年,通过在尼米亚河和科罗尼亚这两场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斯巴达帝国至少暂时确保了它在希腊大陆的安全。可是,它的敌人们仍然在不断地进行着反抗,并且偶尔还会取得一些成功,比如在公元前

390 年的时候,他们彻底摧毁了斯巴达在柯林斯附近的一个军团,而且,他们的这种敌对行动还得到了波斯人的金钱支持,这种情形直到公元前 4 世纪 80 年代初期,当斯巴达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后才告结束。阿吉西劳斯和他的更为年轻的、通常都很顺从的共同执政王阿吉西波里斯(他是遭放逐的波塞尼亚斯的儿子)在这一次转变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不得而知。反正在这个时期,站在政治舞台中央的斯巴达人是安塔西达斯。跟吕山德一样,安塔西达斯成为了舰队的司令,而且执掌这一大权的时间在事实上超过了一年,他所取得的成就是使斯巴达由原来是波斯在希腊的最大敌人,转变成了它第一要好的朋友。此外,安塔西达斯也像吕山德那样,在军事和外交上都表现出了非常杰出的才能。借助波斯人的金钱,斯巴达人重新加强了舰队的实力,从公元前 388 年开始,安塔西达斯第一次从雅典手里夺回了对赫勒斯庞特海峡的控制,使雅　202 典再次陷入了饥荒的危机当中,从而为后来通过谈判达致和平的目的铺平了道路,这样,斯巴达在波斯的支持下瓜分到了整个爱琴海希腊,包括希腊大陆和岛屿,而"亚洲"则由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二世去控制。

安塔西达斯

在现代世界里,我们常常用谈判和签署某个和平协议的所在地来命名这份协议,如"乌得勒支协议"(Utrecht)、"凡尔赛协议"(Versailles)等。在古代希腊,情况就与之大相径庭了。希腊人并不签署什么和平协议,而是以众神的名义起誓的方式来订立和约,这些神被视为是协议的担保人;在古希腊,某一方破坏和约或盟友之间的协议是一种亵渎神灵的举动,要么会遭致神灵的惩罚,要么另一方就会以神灵的名义对之施行惩罚。通常他们会用参与谈判的负责人或负责人之一的名字来命名协议。在公元　203 前 5 世纪的时候,一些人的名字就代表着外交关系上的一些关键转折点,如卡利阿斯(Callias)本是雅典的一个贵族,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他好像是

一个"左翼政党"的成员；还有一个人叫尼西阿斯，另外一个雅典政治家，这个人是永远都不会被人称作"左翼政客"的。

"卡利阿斯和约"在公元前5世纪40年代由雅典与波斯国王订立，这个协议象征着雅典在地中海的东岸正逐渐成长为一个超级强权。无论波斯国王是否因此正式发过誓，反正这个和平协议在历史上确确实实地发挥了影响，它结束了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的敌对状态，时间长达一代人之久。"尼西阿斯和约"是在公元前421年，由雅典和斯巴达以及它们各自的盟国（其中的绝大多数）订立的，与其说这份协议仅仅是因为雅典战争而遭到破坏，还不如说正是它最终结束了这场战争，而它所保留下来的用于处理希腊人与希腊人之间的最为重要的外交方针，直到"安塔西达斯和约"订立前还仍然有效。

这后一份协议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波斯大王和约"（King's Peace），因为，波斯国王乐于见到，希腊人正是按照他的要求承认了所有的条款。实际上，这份和平协议的实际效力远不止这些；它还是历史上第一份"共同和约"（Common Peaces），因为它可适用于所有希腊人，无论他们是否直接为这份协议宣过誓。为了在这个已经声名狼藉、受尽战火折磨的世界里建立和平，这种外交关系上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基本性的作用，因此安塔西达斯功不可没。要是我们能够知道多一点他的生平情况该多好啊……

他的名字曾经以另外一种形式四处传播——既被人叫做安塔西达斯，也被人称呼为安提奥西达斯（Antialcidas），但前者显然是正确的。它的意思是"奥西达斯（Alcidas）的接替者"，而奥西达斯正好曾经是安塔西达斯的前任，也担任过舰队的司令，他在雅典战争的第一阶段担任了这一职务，但业绩并不突出。四十年之后，时间正好是公元前388年，安塔西达斯被任命为舰队司令，他所肩负的任务有着双重意义，首先，为了防患于未然，要阻止雅典再一次通过色雷西布拉斯（Thrasybulus）去控制赫勒斯庞特海峡附近地区；反过来，如果斯巴达控制了赫勒斯庞特海峡的话，就能迫使雅典

204

再次臣服,就像公元前 405 年或前 404 年吕山德所做的那样。

安塔西达斯沉着应对,顺利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他像吕山德那样有能力与上层的波斯人搭上"宾朋"(*Xenia*)关系。这一次,他和接替法那培萨斯担任赫勒斯庞特的弗里吉亚(Phrygia)的总督的阿里奥巴佐涅斯(Ariobarzanes)建立了这种关系。色诺芬说他实际上与阿里奥巴佐涅斯有着为时甚久的"宾朋"关系,读者们可能因此而焦急地想知道,这种关系究竟是安塔西达斯从家族中继承下来的,还是他其实有可能早在雅典战争期间就已经活跃在爱琴海东部地区?实际上,他第一次进入历史记载是在公元前 393 年或前 392 年,当时,他作为斯巴达的正式大使被派往波斯驻萨迪斯的总督提律巴佐斯(Tiribazus)的宫廷。我们对安塔西达斯在公元前 393 年之前的情况一无所知,因此,读者可能要感到沮丧了。无论如何,人们以前可能会猜测他属于斯巴达精英分子中的一员,但是,同样还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他的父亲列奥就是那个娶了铁列优提亚(Teleutia,这个名字让人想起了阿吉西劳斯的同父异母的兄弟铁列优提亚斯)的人,列奥和她生下了佩达瑞托斯(Pedaritos)。与安塔西达斯一样,佩达瑞托斯在公元前 411 年的时候担任了最高指挥官,并死于那一年,因此,安塔西达斯大概是列奥和铁列优提亚的小儿子,生于公元前 435 年左右。

公元前 393 年,安塔西达斯受命去会见提律巴佐斯,这一趟出使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尽管他从波斯人那里得到了可观的财政资助。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五年之后他在指挥斯巴达的舰队时同样非常出色,但他最大的成就还是在外交上,并在苏萨亲自拜会过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二世。因此,和约也被人们称做"安塔西达斯"和约。这份和约完全实现了斯巴达国王阿吉西劳斯的愿望和目标,但是,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这两个男人对此还是有过争执的。然而,这也有可能是普鲁塔克所犯的一个年代错误,通过从保存得更好且似乎更可信的资料中可以推断出,这两人在后来确实因为外交政策而发生过争吵,但针对的不是波斯而是底比斯。

205 普鲁塔克记载的一段轶闻似乎指明了这件事。这件事在普鲁塔克的文集《斯巴达人格言》(*Sayings of Spartans*)一书中出现过两次,一次篇幅较长,一次稍短。篇幅较长的那篇如下:

> [阿吉西劳斯]不断地与底比斯人打仗,有一次,他在与底比斯人作战的过程中负了伤,据说这个时候安塔西达斯对他说:"因为你对底比斯人的指导,你从他们那里拿到了多么丰厚的报偿啊!当他们既没有意志也没有能力作战的时候,正是你告诉了他们如何去做。"事实上,底比斯人这段时期之所以变得精通于战争,据说正是因为斯巴达人不断地向他们发动战争。这就是为什么古时的吕库古在他制定的"瑞特拉"中[有一条]规定:禁止对同一些人发动频繁的军事进攻,为的是不让他们学会如何作战。[1]

公元前4世纪70年代,当底比斯逐渐强大起来的时候,这则轶闻似乎暗示了斯巴达人中间存在的对待底比斯人的不同态度。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一段轶闻而已,在这个故事里,安塔西达斯是美好的古风时代及生活方式的捍卫者;如此就有点讽刺意味了,因为阿吉西劳斯喜欢处处标榜自己是如何严格地遵守这样的生活方式的。阿吉西劳斯像榔头一样不停地敲打底比斯人,只要没有取得最后的全胜,他决不罢休。而安塔西达斯则赞同采用一种不那么生硬但更加巧妙的方式来对付敌人,显然,他是一位比阿吉西劳斯更为高明的外交家。当阿吉西劳斯对底比斯人发起猛烈的进攻,并于公元前371年在留克特拉反而被底比斯人彻底击败的时候,安塔西达斯正在他再一次远赴苏萨与波斯人谈判,以求得更多的外交和财政上的支持的路上,无论如何,这都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

在留克特拉战役之后的一年间,安塔西达斯担任了监察官。这件事

---

[1] Plutarch, *Sayings of Spartans*, Agesilaus no. 71(*Moralia* 213f); also *Moralia* 189f, Lycurgus, no. 5; 227c, Lycurgus, no. 11; *Life of Lycurgus*, ch. 13.

有着双重意味。按常规,只有一位正处于任期内的监察官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宣布放弃自己的职务之后,另一位政坛元老才能代替他担当此任,而且,每位监察官只能担任一届,因此,这意味着安塔西达斯以前没有竞选过这个职位,或至少以前没有获得过推选。其次,这也说明在这个极端危急的时刻,甚至是阿吉西劳斯也不得不容忍他的一位批评者且有可能的对手担任高职。这将是安塔西达斯最后的奋力一搏。三年后,即公元前367年,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向东方进行长途跋涉来到苏萨,为的是与佩洛皮达斯领导的底比斯人一起争取波斯国王的青睐和恩惠。但是,这一次他和斯巴达都失败了,而且是决定性的。 206

这种外交政策上的重大变化,对于那些处于亚洲并与之相关的希腊人来说,意味着斯巴达抛弃了它之前的"解放希腊"的政策宣传,在公元前431年、前404年以及之前的公元前481年,当波斯帝国的铁蹄向西一直踏入爱琴海沿岸的时候,斯巴达人曾经这样宣传过。作为交换,斯巴达轻而易举地就把爱琴海的希腊人献给了波斯管理,而斯巴达人,首先是阿吉西劳斯,则得偿所愿地获得了全权"处置"希腊大陆的权力。斯巴达人制定的新秩序有一个漂亮的口号"自治",就其本来意义来说是每一个希腊城邦无论大小,从此以后彼此都是自治的,当然,拉科尼亚以及美塞尼亚的"边民"城市除外,因为斯巴达想恢复对它们的直接控制。也就是说,究竟哪里适合搞自治,得由斯巴达说了算。因此,雅典被强行与地中海东岸的城镇以及赫勒斯庞特地区分开了,雅典曾经申明要在这个区域复兴自己的帝国;阿尔戈斯从柯林斯分离了出来,它们之间这种有趣的合伙尝试结束了;本来是联邦国家的彼奥提亚变成了一些原子式的单元,从而使底比斯无法再进行全面的控制;甚至连统一的门丁尼亚也被分解成村庄,斯巴达用这样一种方式除掉了它所痛恨的民主政权。

反对民主政府,实际上就是斯巴达的外交政策的主题,这个政策是由阿吉西劳斯制定的,并且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获得了实施。斯巴达对 207

待普里欧斯(Phlius)的态度,可能是它在对待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国的过程中最突出也最为粗暴的例子。公元前 381 年,阿吉西劳斯开始围攻普里欧斯,其理由是这个城邦在斯巴达对柯林斯的战争中有不忠诚的行为。至少还有一个与之同样重要的考虑,那就是阿吉西劳斯想帮助一些普里欧斯的流亡者进行复辟,这些人是普里欧斯原来的寡头政治的支持者,与阿吉西劳斯有着私人交往,于是他们到斯巴达向他求援。他的这种极度的偏袒让人厌恶,加之这也是对普里欧斯的自治的侵犯,因此即使是在斯巴达人中间都激起了广泛的异议和批评。色诺芬,他通常都是斯巴达和阿吉西劳斯的温和的朋友,也忍不住在他为阿吉西劳斯撰写的传记中提及了这些批评,这部传记在阿吉西劳斯死后就立即获得发行了,但是,只是到了他的另一部记述更为全面的《希腊志》(*History of Greece*)中,他才十分明确地对这些争议作了详细的交待:

207

> 有许多斯巴达人都在抱怨,不该为了几个人[流亡的寡头政治的支持者]而招致一个有着 5000 人的城邦的憎恨。[1]

色诺芬未能明确说出的情况是——当时的普里欧斯是一个民主政体的城邦,不过,从他的其他与之有关的零星记述中,显然可以推断出这样的结论。

对普里欧斯的围攻,直到公元前 391 年,也就是差不多两年后才取得成功。然而,这一成功与斯巴达在公元前 382 年军事介入彼奥提亚所取得的胜利相比,简直是不值一提。当时,一支斯巴达军队控制了底比斯的卫城,而且,就像公元前 404 年在雅典那样,斯巴达人紧接着就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权力有限的、亲斯巴达的寡头政府,这个政府由一支斯巴达驻军提供保护,而这支驻军则由一位斯巴达官员统帅着,他掌握着当地的军政

[1] Xenophon, *Hellenica* V. 3. 16.

大权,人们称这个人为“哈默斯特”(*harmost*)。[1] 事实上,这种“哈默斯特”体系推广到了在公元前 386 年之前还保持着独立的整个彼奥提亚人的联邦国家中,并且自从雅典战争之后,它实际上被斯巴达人广泛地运用到了整个希腊的大陆、岛屿以及爱琴海的亚洲沿海地区。公元前 379 年,斯巴达人分解了普里欧斯,就在同一年,他们通过控制卡尔奇底斯的欧伦托斯(Olynthus),以及解散曾经由欧伦托斯统治的卡尔奇底人联邦,实现了斯巴达人控制整个希腊大陆的野心。因此,到了公元前 379 年的夏季,斯巴达看上去可能已经成为一个与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完全一样强大的帝国了。然而,在公元前 379 年到前 378 年的这个冬季,所有的这一切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208

神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这是欧里庇得斯所创作的一个戏剧人物曾经说过的话。在彼奥提亚人的泰斯皮亚担任“哈默斯特”的斯巴达人是斯佛德里亚斯(Sphodrias),他在公元前 378 年初期的所作所为,就只能用精神失常来形容。斯佛德里亚斯可能想要获得一些不同一般的声誉,也可能已经被底比斯人收买,或者可能是按着自己对国王克列欧姆布洛托斯(与阿吉西劳斯共同执政)的命令或愿望的理解,他竟然试图去夺取雅典的港口——比雷埃夫斯。但这次尝试以惨败告终。如果需要什么因素来刺激雅典人主动为底比斯人的解放提供什么强有力的援助的话,这一事件就再合适不过了。一天晚上,这是一个混合着悲剧和闹剧的戏剧性的夜晚,佩洛皮达斯和人数不多的底比斯人成功地混进了底比斯,战胜、杀死或者说是赶走了斯巴达驻军并推翻了原来的亲斯巴达政府。

在斯巴达国内,斯佛德里亚斯因叛国罪而受到审判,但是,这一审判又不得不在斯佛德里亚斯本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可以肯定,他过去是有罪的,并且,他还拒绝回到斯巴达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事实上就等于提前宣判了自己的死刑。然而,即便如此,审判结果竟然是无罪,色诺

---

[1] 即斯巴达在殖民地设置的军事统治者。——译注

芬称这次审判是整个希腊人历史上最荒唐的一次误判。斯佛德里亚斯之所以最后被宣布无罪，还得感谢阿吉西劳斯，因为阿吉西劳斯控制了斯巴达最高裁判院（由长老会组成，但他们在进行表决的时候，监察官们可能也会参与）里的大部分表决权。影响阿吉西劳斯采取这样的立场的因素之一，可能是因为一个男人——他的儿子及继承人阿基达马斯，这个人是斯佛德里亚斯的儿子的情人。色诺芬说这个阿基达马斯曾竭力为了爱人的父亲而向自己的父亲求情，可阿吉西劳斯不会仅仅出于情感的原因而随便改变自己的立场。据说，阿吉西劳斯告诉他的儿子，尽管斯佛德里亚斯有犯罪的事实，自己之所以赞成判他无罪是出于实际的原因，因为斯巴达需要像斯佛德里亚斯这样的战士。可以肯定，斯巴达的军队当时迫切地需要补充人力；但是，更确切地或者更坦率地说，阿吉西劳斯希望他的手下都成为像斯佛德里亚斯这样的斯巴达人，因为在判定这样的人无罪之后，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对阿吉西劳斯保持忠诚并且言听计从。七年以后，斯佛德里亚斯战死在留克特拉，悲壮地见证了阿吉西劳斯在斯巴达一手遮天所带来的致命影响。

209

刚刚获得解放的底比斯在公元前 378 年的时候，第一次对自己进行了政治上的重建，成立了一个温和的民主政府，并且还恢复了彼奥提亚人的联邦制国家，使之第一次成为了一个民主的体系。流亡返国的佩洛皮达斯与比他更有才气的将军及哲学家伊巴密浓达一起合作，对底比斯军队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改革。他们所做的革新之一就是组建了一支精英的重甲部队，这支部队有 300 人，由 150 对同性恋伴侣组成，被人称为“神圣军”(Sacred Band)。这支军队士兵的数量与斯巴达军队中的国王卫队，以及温泉关战役中特别挑选出来的那支斯巴达军队的数量是一样的，因此，这有可能是底比斯人对斯巴达人的某种观念的刻意模仿，但在斯巴达的军队中，同性恋伴侣是不会调配在同一战斗方阵中的。在下一个十年里，“神圣军”是彼奥提亚人最重要的攻击力量；也是在这十年里，彼奥提亚不但在希腊大陆的中部组建了一个令人畏惧的军事联盟，而且

还为雅典所领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海军联盟即“第二雅典联盟”(Second Athenian League)的成立和发展提供了帮助。这两个联盟所宣称的目标都是反对斯巴达，因为斯巴达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以及各种反动的目的，不仅利用而且还明目张胆地破坏了“安塔西达斯和约”中的各项条款，这样的反对理由是相当充分的。

底比斯和雅典之间的军事合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就仅仅只是打败斯巴达而言，并不需要它们之间有太多的合作。在公元前 375 年的时候，在彼奥提亚的铁该拉(Tegyra)战役中，世人开始发现斯巴达已经不再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了。尽管佩洛皮达斯和他的“神圣军”在这次战役中击败的不是全部斯巴达军队或被征召来的伯罗奔尼撒人，而只是斯巴达的一支分遣部队，但是，这次胜利仍然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柯林斯战争中，即在公元前 390 年的时候，斯巴达曾在莱克伊昂(Lechaeum)遭受过一次重创，自此以后，铁该拉战役就差不多是第一次有别国的军队在常规的重甲步兵战斗中击败了斯巴达。然而，斯巴达拒绝放弃它在希腊中部的权利，它表面上声称这是要帮助波奇司的盟国；最后，国王克列欧姆布洛托斯在公元前 371 年的时候，带领着一支从伯罗奔尼撒征召来的正规军队向由底比斯领导的联盟发起了进攻；在之前的公元前 376 年和前 375 年的时候，阿吉西劳斯和克列欧姆布洛托斯都未能向底比斯联盟发动过任何有效的进攻。 210

可以肯定，留克特拉之战在公元前 4 世纪前半期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色诺芬说克列欧姆布洛托斯和最高统帅部的人是带着醉意上阵作战的，他试图以此来尽量淡化阿吉西劳斯个人在这场大灾难中所应承担的最主要的责任。伊巴密浓达和佩洛皮达斯在军事训练及战术上的创新，使得斯巴达人在战场上遭到了真正的重创。不管斯巴达是否真如安塔西达斯曾经说过的那样，是底比斯人的师傅，反正现在的底比斯人在战场上显得比斯巴达人更加精通战争，这一点特别类似于雅典战争后期斯巴达的舰队强过雅典的情形。伊巴密浓达在集结他的底比斯重甲步 210

兵的时候，战斗阵列的一些地方的厚度达到了 50 层，步兵方阵在以往通常的厚度是 8 层。伊巴密浓达把由佩洛皮达斯率领的精锐部队——“神圣军”——部署在左翼，而按惯例，在重甲步兵战斗当中，右翼是最强的。他让自己的军队排成斜线，不像通常那样与敌人正面相对。同时，他现在所面对的是一支意志消沉、战力失衡的斯巴达军队。

到了公元前 371 年的时候，斯巴达的成年公民的人数总共已经不到1000名了。之所以如此，有很多的原因，首先是公元前 464 年的大地震，其次是战斗中的伤亡减员以及斯巴达人的财产继承制度，这几个原因综合在一起导致了所谓的“*oliganthrôpia*”，即军队兵源短缺，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斯巴达曾经是一个强国但最终却失败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剩余的公民当中相当大一部分都参加了留克特拉战役，并战死沙场；死亡的 700 人当中，有 400 人是斯巴达公民，其中包括了国王克列欧姆布洛托斯以及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斯佛德里亚斯。即使是色诺芬也忍不住指出，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一些盟友对这个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什么不高兴的。这次战败对斯巴达人的士气、民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以致国王阿吉西劳斯不得不自作主张，不再对那些在留克特拉战役中临阵脱逃或表现胆怯的斯巴达人施行通常的惩罚了。无疑，这其实是默认吕库古所创立的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了。

211

第八章　衰落与崩溃：公元前 371 年至前 331 年

212

这一章将记述斯巴达人在留克特拉遭受了重大失败之后，所经历的灾难性的衰落。美塞尼亚的希洛人，在由哲学家及将军伊巴密浓达领导的底比斯的民主政府的帮助之下，再一次掀起了起义的浪潮，但是，他们这一次的起义可谓是一劳永逸。新首都美塞尼(Messene)的建立就是对斯巴达的一种公开的羞辱。就在几年之内，伯罗奔尼撒同盟作为斯巴达人曾经在海外行使霸权的一个有效工具，也已经分崩离析了。在这些年里，斯巴达不得不再次与雅典结盟，这一事实表明这个城邦已经变得多么绝望。显然，阿吉西劳斯的王权现在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

美塞尼亚人所获得的最终解放，如果没有来自外界的干涉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这种干涉是由希腊世界最杰出的将军来实施的，这位将军同时还具有哲学家的头脑。伊巴密浓达的声誉主要来自战场，但是，华特・拉雷爵士(Sir Walter Raleigh)自认为有充分的理由把此人称为古代希腊最伟大的人物，而不仅仅是一位古希腊最伟大的将军。他确实是一位至今无人可比的解放者。阿卡狄亚靠近斯巴达，在公元前 370 年后期，它的内部发生了分裂，这令斯巴达人感到非常不安，但这种形势鼓舞了伊巴密浓达，使他最终在留克特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同时，他还充分利用了斯巴达所遭受的这次历史性的失败，开始乘胜追击。

213 他带领着一支人数在 30000 到 40000 名之间的盟军侵入了拉科尼亚。拉科尼亚北部的很多“边民”城市于是纷纷变节，背叛了斯巴达，当然，他们也曾经作过一些抵抗，但也只能仅仅延缓伊巴密浓达的脚步，根本就无法阻止他。他开始逼近斯巴达，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焚烧农作物和建筑时所产生的火焰和气味，都能被住在没有城墙保护的城镇内的斯巴达居民们看到或闻到。亚里士多德颇有点无礼地宣称，斯巴达妇女在斯巴达人当中所造成的骚动和混乱远甚于敌人，这可能只是一种有成见的说法，妇女们之所以感到如此恐惧，是因为她们看到的是自己以前完全不熟悉的景象，蜂拥而来的敌人竟然在蹂躏着斯巴达的土地和财产，其中也包括她们自己，而且就在她们的跟前。然而，伊巴密浓达对夺取斯巴达没有兴趣，也就更谈不上要摧毁斯巴达了。他继续前进穿过了欧罗达河的河谷，到达了斯巴达的港口城市——基赛阿姆，出于军事和政治的目的，他可能摧毁了这个城市。然后，他循原路向北返回了拉科尼亚，再向西进入了美塞尼亚，这里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地。

大概就在拉科尼亚北部的“边民”们开始变节的同时，美塞尼亚的希洛人也开始起义了；推测起来，至少有一部分美塞尼亚的“边民”也参与了这次起义，就像他们的先辈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即上次大地震发生之后所做的那样。伊巴密浓达此行的任务就是要去看看这次起义有没有受到斯巴达镇压，以及获得了自由的希洛人是不是已经享有了永久性的权利。他的成就之一是督促美塞尼亚人建设了新美塞尼城，这座新城的城址背倚伊托美山的侧面，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地理优势，然后，再建造了巨大的城墙加以保护，使之固若金汤。这座带城墙的城市与没有城墙的斯巴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的城墙遗迹至今还依然会给到过此地的游客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新美塞尼的市民首先是之前居住在此地的成年男性希洛人，但是，不久之后，也有一些流散在外的美塞尼亚人的后裔加入了进来，其中包括一些从遥远的北非回来的人。

大约在公元前 490 年的时候，西西里人的臧克列(Sicilian Zancle)被

改名成麦西拿(Messana)，雅典人在公元前460年建造了纳帕克塔斯，从那时起"美塞尼亚人"就自豪地自称为纳帕克塔斯人，在奥林匹亚进行献祭的时候，他们会用这个名号向神奉献祭品，而且奉献的东西会很有针对性，以此来故意刁难他们先前的斯巴达主人。他们的供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座至今还大体保存了下来的胜利纪念碑，它是在公元前5世纪20年代后期由门戴(Mende)的派欧尼乌斯(Paeonius)雕刻的；但是，在公元前369年之后，"美塞尼亚人"中最优秀的当属新美塞尼的市民了，而且就其本身而言，他们当时是希腊世界其他地方那些兴奋不已的知识分子们热烈讨论的话题。 214

阿尔西德马斯(Alcidamas)是一位来自小亚细亚的修辞学家和智者，他用写作的方式来声援美塞尼亚人的解放事业，"神从来没有造过奴隶"，这句话暗示了所谓的奴隶制纯粹只是一种人类的习俗，并没有什么神圣的正当理由，而且，还可能因此而无法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柏拉图的思想实际上还没有到达这个程度，奴隶制对他的思想反而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不过他认为斯巴达人的希洛人体系在整个希腊是最具争议的奴隶制度，可能因为这些希洛人本身也是希腊人而不是外来的野蛮人吧！然而，对已经获得自由的美塞尼亚人的最有力的评论来自伊索克拉特(Isocrates)，他既是阿尔西德马斯也是柏拉图的思想的专业挑战者，他的一本小册子里记录了王储阿基达马斯在一个戏剧性的语境下所作的一次演讲，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366年。根据伊索克拉特的记载，最令阿基达马斯感到烦乱的是斯巴达人必须容忍他们原来的奴隶现在成了自由、独立的市民，而这些人不久前还老老实实地呆在他们家的后院子里干活。

阿基达马斯三世

阿基达马斯是阿吉西劳斯与妻子克列欧拉(Cleora)的儿子，大概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末期。他自己是在公元前4世纪70年代或者是60年

代初期结婚的，妻子是埃乌达米德斯(Eudamidas)的女儿。埃乌达米德斯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官，曾受到过阿吉西劳斯的青睐，而且他还是已故的
215 佛比达斯(Phoebidas，死于公元前378年)的兄弟，佛比达斯同样受到过阿吉西劳斯的保护和喜爱。推测起来，阿基达马斯的婚姻应该是一次王族内部的婚姻。

他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记录中是公元前378年，当时他是斯佛德里亚斯的儿子的爱人，他向无所不能的父亲求情，希望能够保全爱人的父亲的性命。斯佛德里亚斯当时确实是逃过了一死，但不久之后，在公元前371年的时候战死在留克特拉。阿基达马斯没有参加那次非常危险的交战，可能是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成为父亲，即没有生下一个可以在将来继承自己王位的儿子。他当时只是担任了后方辅助的工作，去麦加里德(Megarid)迎接那些幸存者并护送他们回家。三年之后，在阿卡狄亚，他第一次担任了指挥官并接受了战争的检验，事实上他是在代理年迈的父亲行使权力。他在这里赢得了所谓“无泪之战”(Tearless Battle)的胜利，因为这一次没有一个斯巴达人为此失去了性命，现在，他们的人数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他们的性命也就变得越来越宝贵。在普鲁塔克编撰的《国王和指挥官的格言》(*Sayings of Kings and Commanders*)中，有一则与阿基达马斯有关，这则轶闻透露出当时的斯巴达正面临的可怕情形：

> 阿基达马斯，阿吉西劳斯的儿子，当他看到从西西里带来的弹弩发射出飞箭的时候，大声惊呼：“赫拉克勒斯啊，凡人的英勇不再有用了！”[1]

在留克特拉危机之后，斯巴达人曾经主动与叙拉古的僭主狄奥尼修斯一

---

〔1〕 Plutarch, *Sayings of Kings and Commanders*, Archidamus (*Moralia* 191e); see also *Moralia* 219a, Archidamos, no. 8.

世(Dionysius I,在位时间为公元前 405 年至前 367 年;他们在对待僭政的主要立场上是非常一致的……)结成了同盟,为的是回报狄奥尼修斯一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曾经给予过斯巴达的军事援助,包括雇佣军及最先进的装备。在狄奥尼修斯的武器革新当中,他曾经改进了弹射武器的性能,公元前 398 年,这种武器在他围攻西西里西部的摩担亚(Motya)时派上了用场,并为最后成功夺取该城立下了汗马功劳。阿基达马斯在公元前 4 世纪 60 年代早期的时候见到了这种弹弩,因而发出了前文中的感叹,这几乎就是公元前 425 年那个在斯法克特利亚被雅典人俘虏,并被扣为人质的斯巴达人所说过的话的翻版,这个斯巴达人说箭("纺锤状的箭")是女人才用的武器,只有阵地上面对面的兵刃相见才是对男人勇气的一种真正考验,这些内容都记载在修昔底德的著作里。凭借弹弩的扭力发射出来的弩箭比弓箭的威力更大,阿基达马斯的惊骇反应也恰好说明了斯巴达人之所以在后来战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在公元前 4 世纪,当战争的各种条件都发生了变化的时候,为何因循守旧的斯巴达军队遭遇了失败。 216

公元前 362 年,伊巴密浓达率领军队侵入斯巴达,当底比斯的军队穿过斯巴达的城镇时候,据说阿基达马斯又一次表现得非常杰出。直到他父亲在公元前 360 年或前 359 年去世之后,他才获得了空间完全施展自己的手脚,显然,他没有遇到任何挑战就登上了欧里庞提德的王位,成为了阿基达马斯三世。他的共同执政王是来自阿基亚德家族的克列欧美涅斯二世,这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在位(很难说他曾经统治过斯巴达)的时间从公元前 370 年到前 309 年,毫无疑问地打破了历史纪录。然而,即使是聪明能干又积极主动的阿基达马斯,也丝毫不能阻挡腓力二世(公元前 359—前 336 年)领导的马其顿大军由北向南的滚滚铁流;他也无法重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的地位,尽管在公元前 352 年的时候,他曾经向"大都会"(Megalopolis)发动过一次进攻。在佛西斯人与腓力长达十年的战争期间,即公元前 346 年,他为了帮助佛西斯人也曾短暂地占领

过温泉关，但是，曾经在此浴血奋战过的斯巴达先烈们的在天之灵不会为此感到欣慰，因为他后来不光彩地从那里撤退了。

公元前 338 年，腓力在彼奥提亚的克罗尼亚取得了胜利，这是他征服整个希腊大陆的高潮部分，然而，当时的斯巴达国力过于虚弱以致都没有能力参与这场战役。当腓力在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之后，随即又侵入了拉科尼亚，就像当年的伊巴密浓达那样，而且他同样也没有大费周章地去征服或占领斯巴达的城市，而是故意把斯巴达排除在新的柯林斯联盟之外。柯林斯，公元前 481 年的那份著名的“抵抗波斯宣言”就是在这里昭告天下的，它曾经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中最主要的盟友，到了公元前 4 世纪 60 年代中期，曾经的联盟已经在静默无声中四分五裂了。柯林斯人现在就像新城邦美塞尼和“大都会”那样宁愿投靠腓力也不愿再跟随斯巴达，其他原属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国，如阿尔戈斯也同样如此。作为老练的外交家，腓力本人非常明白，把斯巴达排挤在新联盟之外，就可以确保这些反对斯巴达的城邦对他保持忠诚。

斯巴达在外交关系上的软弱无力，在腓力(Philip)的儿子及继任者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曾经发表过的两次精辟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第一次是在公元前 334 年，也就是在格拉尼科斯河(River Granicus)战役之后，亚历山大大帝送给雅典 300 套完整的战斗盔甲(重甲步兵披挂的甲胄)，正好 300 套，都献给雅典的卫城并题辞：

> 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以及希腊人，斯巴达人除外，一起奉献了这些从亚洲带回来的战利品。[1]

对斯巴达人来说，300 这个数字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们民族的集体意识当中，因此，“斯巴达人除外”这样的措辞显然是对斯巴达人的一种处心积

[1] Arrian, *Anabasis* [*The Campaign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Book I, Chapter 16.

虑的侮辱,亚历山大用这种公开羞辱的方式提醒斯巴达人,他们并不是他所领导的反击波斯的希腊东征军的一员。第二次是在这三年之后,即公元前 331 年,阿基达马斯的儿子和继承者阿吉斯三世曾试图发起反对马其顿人统治的起义,但是,最终在“大都会”被马其顿军队以绝对的优势击败了。亚历山大轻蔑地把这次骚乱称为“老鼠的战斗”。

言归正传,当公元前 338 年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时候,阿基达马斯正在干什么呢?他当时在海外,正指挥着雇佣军为斯巴达真正的殖民地——塔拉斯——与其相邻的本土的路卡尼亚人(Lucanians)作战,并死在了那里。这个人一生都生活在父亲阿吉西劳斯的阴影之下,而且同样的回天乏术。然而,即使如此,一尊阿基达马斯的雕像还是建立在了奥林匹亚,我们现在拥有的他的雕像可能是罗马时期的复制品。阿吉西劳斯应该会为此感到震惊。对他来说,一个人只有死才能让人们永远地记住他,而不是任何毫无价值的、伪造的铜像。简而言之,“世间富贵,转瞬即逝”(*Sic transit gloria laconica*)。

留克特拉战役之后,伊巴密浓达建立了新美塞尼,这还不是他给予斯巴达人的唯一打击。让斯巴达人感到雪上加霜的是在公元前 368 年,又是在他的监督下,在阿卡狄亚的南部修建了“大都会”(Megalopolis,即“伟大的城市”),它由先前的四十个村落混合而成,其中一些是以前的拉科尼亚“边民”城镇。至少从公元前 5 世纪早期开始,在阿卡狄亚就已经出现过联邦制的倾向,但是,直到伊巴密浓达把“大都会”设定为阿卡狄亚新联邦的首都之后,这种倾向才真正成为现实,伊巴密浓达自己就是彼奥提亚人联邦国家的公民。“大都会”的剧场的规模在整个伯罗奔尼撒都是最大的,它反映了这个城市作为一个位于中央的、联邦制的集会地点的重要性。斯巴达当然会竭尽全力去压制这个联邦制的国家,只要有可能就会解散它们(如公元前 386 年的彼奥提亚人,公元前 379 年卡尔奇底斯人)。此外,“大都会”所在的位置还直接威胁着斯巴达军队通往北方的道 218

路，如果斯巴达想要去干预伯罗奔尼撒内部的其他地方或者进入北部的柯林斯地峡的话，都会受到这个城市的威胁，斯巴达为此难受不堪，如鲠在喉！

在献给伊巴密浓达的葬礼的短诗（刻在底比斯卫城的伊巴密浓达的雕像上）中，这个新伯罗奔尼撒城市有着特别重要的分量，这是一点儿也不用感到惊讶的：

这是我的忠告：
斯巴达已经剃光了它光荣的头发；
美塞尼接纳了她的孩子们：
底比斯之矛的花冠
已经加冕于“大都会”：
希腊自由了！[1]

诗中提到了剃去斯巴达的头发，这里流露出的自豪或自负让人印象深刻；剃发，在希腊世界里是一种普遍的表达哀痛的方式，但是，斯巴达的男人们显然有着特别多的头发要剃。诗中美塞尼的母性形象，含蓄、巧妙地与斯巴达奴役、虐杀希洛人时的凶残态度形成了对照，而且着重强调斯巴达不把希洛人当作一家人。“大都会”在争夺花冠的比赛中成了最后的胜利者，这得感谢“底比斯之矛”——伊巴密浓达，他的名字在这里被用来代表底比斯。当初，斯巴达人阻击了波斯人并捍卫了希腊人的自由，“多里安人之矛”（埃斯库罗斯创作的优美短语）这个荣誉的称号曾经是属于他们的。但是，今日的拉科尼亚已经不同往昔了。

这首献给伊巴密浓达的葬礼的诗其创作时间仅仅只是在“大都会”建立的六年之后，伊巴密浓达在第二次发生在门丁尼亚的重大战役中（地点

219

[1] Pausanias, *Guide to Greece*, Book IX, chapter 15. See Levi 1971.

位于阿卡狄亚的北方，第一次重大战役发生在公元前 418 年）取得了胜利，但他也死在了这次战役当中。在公元前 362 年的时候，他第四次侵入伯罗奔尼撒，为的是确保斯巴达在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役中无法以全部力量出战；他实施了第二次入侵拉科尼亚的行动，但是这一次，他穿过了没有城墙保护的斯巴达人的住地。为斯巴达辩护的人宁愿把注意力转移到一个十八或十九岁的青年人的英勇行为上，而不愿意关注阿吉西劳斯领导下的斯巴达人在抵抗伊巴密浓达时的毫无还手之力，以及在斯巴达的各个阶层中所爆发的影响深远的争论。

伊萨达斯

关于伊萨达斯（Isadas）的值得信赖的信息，我们只能从普鲁塔克记叙"阿吉西劳斯的生平"的一个段落中找到。公元前 362 年，伊巴密浓达带领他的军队在斯巴达的领土上长驱直入，就是下面这个将要讲述的故事所发生的背景，尽管对于这一背景是否真实还存在着明显的争议，但争议本身绝不会冲淡这个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和重要性：

> 伊萨达斯，佛比达斯的儿子，在我看来，他向他的同胞以及敌人展示了一种真正的勇气。无论是相貌还是体形，他都不同凡响，而且他正处于从少年向成年过渡的时期，这是一个人见人爱的青春时代。他全身赤裸，既没有携带任何武器也没有披挂什么可以保护自己的盔甲，因为他当时正在给自己涂抹膏油，可是他竟然一只手抓住一根长矛，另一只手举起一把利剑冲出了房门。他就这样扑进了密集的敌群当中，把一个又一个敌人击倒在地。没有一个人能伤害到他，或许是有一些神灵因为他的勇敢而守护着他，又或者是因为在敌人看来他比常人要更加高大、更加强大。据说后来监察官们先是给他戴上了荣誉的花环，然后又罚了他一千达利克（drachmas），因为他没有

220

穿戴任何防护装备就冒着生命危险投入了战斗。[1]

佛比达斯是伊萨达斯的父亲,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斯巴达人,甚至还是一个有着非同一般的雄心壮志的人。在公元前 382 年,据说他占领了底比斯,并且驻守在那里,这是在和平时期发生的事,尽管后来阿吉西劳斯撤销了他的这一行动,阿吉西劳斯是否在事先怂恿或者指使他实施了这一行动,就不得而知了。佛比达斯的兄弟埃乌达米德斯,即伊萨达斯的叔叔,在抗击欧伦托斯的战役(公元前 381—前 379 年)中担任过指挥官,同样也表现得非常杰出;而且,可能是在公元前 4 世纪 70 年代晚期或 60 年代的早期,阿吉西劳斯的儿子阿基达马斯娶了埃乌达米德斯的一个女儿作妻子,毫无疑问,这是一场金钱与政治的婚姻。然而,公元前 378 年,佛比达斯在彼奥提亚担任高级指挥官时被杀死了,伊萨达斯出生在公元前 4 世纪 80 年代,所以在他成长的阶段时是没有父亲的,但是,在意识深处,他也许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斯巴达英雄。

在公元前 362 年的时候,伊巴密浓达侵入斯巴达,此时的伊萨达斯正处在"*paidiskos*"阶段,即"少年"时期,这是斯巴达人对男性的一种专门称呼,也就是说,此时的男性正处在从男孩(*pais*,从 7 岁至 18 岁)到完全成年的战士(*anêr*,二十多岁)这个阶段。此时,他们也正处于训练的中级阶段,在这个时期,一些特别优秀的青年会被挑选出来参加猎杀希洛人的"特别行动队",他们会被派遣到乡村地区,身上只能携带一把匕首,除了自己去拾掇谷物或者偷窃之外,不会供给他们任何食物。作为一种对男人勇气的检验或战士进阶的仪式,他们可以杀死任何偶然遇到的希洛人,或他们认为可能会制造麻烦的希洛人,以此来获得杀人的经验。伊萨达斯赤裸着身体说明他正处于快成年的青春期,而他用橄榄油涂抹在自己身上,则意味着他已经做完了身体锻炼。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在希腊世界

221

[1] Plutarch, *Agesilaus*, 30. See also Shipley 1997.

最先举行涂油净身仪式的是斯巴达人，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在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有着适宜橄榄树生长的自然条件，因此当地橄榄油的产量非常大，同时，我们回想一下当初薛西斯的探子在温泉关第一次看到斯巴达人的情形吧，那些斯巴达人当时也是在做体操，进行身体锻炼，个个都显得孔武有力，每当斯巴达人准备奔赴战场的时候，他们就会如此。

因此，可能是对自己了不起的英雄父亲的记忆，也可能是温泉关三百勇士的壮举激发了他的斗志，从而使他表现得如此英勇。然而，他的行为与成年的斯巴达人有着关键的不同，那就是他只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并不像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步兵那样参加阵地战，而且，他是带着狂怒投入战斗的，有点像公元前 479 年亚里斯托达摩斯(Aristodamus)在普拉提亚那样；斯巴达人之所以没有对他的英勇予以嘉奖，可能是在他们看来，这个人是带着求死的意愿去战斗的，而没有恰当地显示出他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勇气。这可能就是监察官们，这些既坚守律法又务实独断的人，为何在授予他花冠之后——就像他是一个在比赛中获胜的运动员似的——接着还要对他处以一笔重重的罚金的原因，这是相当发人深省的。

221

在把阿吉西劳斯钳制在斯巴达之后，伊巴密浓达班师返回了北方。在战役的开始阶段是骑兵部队之间的前哨战，色诺芬的一个儿子格里卢斯(Gryllus)[1]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他曾经通过了“够格者”训练，是一个居住在斯巴达的外国贵宾。这场战役的主要战事紧接着就爆发了。进行定位进攻的重甲步兵投入了战斗，这个第二次门丁尼亚战役的情形与留克特拉战役几乎一模一样，而且结果也完全相同，尽管这一次斯巴达人得到了雅典人的援助。

接着又订立了一份《共同和平协议》(Common Peace)，这份和约实际上是在战场上订立的，或者，它其实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混乱？这后一种观

[1] 色诺芬的父亲也叫格里卢斯。——译注

点是当时的历史学家色诺芬的看法，他曾经是一个亲斯巴达的流亡者，接受过阿吉西劳斯的救助，是阿吉西劳斯的追随者，但到那时他已经重新与雅典——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城邦——言归于好了。至于阿吉西劳斯，当他的城邦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的时候，他所能想到的最有用的措施就是出发前往北非，尽管他此时已经八十多岁了，他去那里为人卖命，担任了一支雇佣军的指挥官。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想要尽快从埃及人那里挣到足够的金钱，来填补斯巴达因为军费开支而几乎耗尽了的国库，但是，他死在了回家的路上，在一个叫墨涅拉俄斯的港口，也就是现在的利比亚的某个地方。

这个临终之地对一个斯巴达国王来说是合适不过了，但是，他这样的离去也标志着一个王朝悲哀地结束了，这个王朝开始的时候，斯巴达似乎已经达到了它力量的顶峰，而且，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取得了成功。现代的学者们在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依然还会认为阿吉西劳斯应该为斯巴达的衰落承担其个人责任。但是，我自己对此的看法是，从正面来说，是因为他大力地推行一种始终错误的、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而从负面来说，则是因为他没有认真地去解决斯巴达社会中那些长期存在的、根本性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问题，后世对他的那些责备，很大一部分确实是他应得的。他的统治最终反而削弱了国家的实力，他确实是一个跛脚的国王！

第九章　复兴与重新发现：公元前 331 年至公元 14 年

223

尽管斯巴达在公元前 331 年被打败了，但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还没有来得及赶回希腊就死在了巴比伦，假如他当初真有想法要恢复或者改变他父亲设计的策略，即搁置斯巴达的地位不予处理的话，那或许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斯巴达问题。在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他们的情况我们将在后面逐渐了解到）之间爆发的战争，使整个爱琴海希腊世界随后就陷入了动乱之中，公元前 301 年的伊普萨斯(Ipsus)战役标志着这场动乱在某种意义上结束了，在这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纷争当中，斯巴达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卒子，在大多数时间里，它只能在幕后等待着上场的机会，与主要的战事或历史事件都没有什么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斯巴达没有参加公元前 323 年或前 322 年由雅典领导的反抗马其顿的战争，即所谓的拉米亚战争（Lamian War）；公元前 315 年，当马其顿的卡桑德（Cassander）入侵伯罗奔尼撒的时候，他的目标也只是想要去夺取对美塞尼亚的控制权。

而此时的斯巴达却做起了雇佣军的买卖。它不但自己提供雇佣军，而且还在玛里南部的塔伊那隆，为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之间这场没完没了的厮杀提供雇佣兵；当时，雇佣兵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了，塔伊那隆是几个主要的雇佣兵招募中心之一。实际上，在公元前 315 年的时候，阿基亚

德王族的阿克罗塔图斯(Acrotatus,他就是那个无足轻重的国王克列欧美涅斯二世的儿子,克列欧美涅斯二世从公元前370年到前309年一直
224
"统治着"斯巴达,这简直就是奇迹)紧跟欧里庞提德王族的阿吉西劳斯二世及其儿子阿基达马斯三世的脚步,继续选择去海外做雇佣军的生意。他在西西里没有取得多少成就,于是返回了斯巴达,死在了他父亲的前面。但是他的专横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斯巴达传统习俗的拥护者。他的儿子阿瑞乌斯(Areus)继承了祖父的阿基亚德王位,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人是非常反传统的。

大约在公元前300年,阿基达马斯四世继承了他的父亲埃乌达米德斯一世的王位,成为了欧里庞提德国王。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斯巴达第一次直接地卷入了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之间的战争,此时应该是伊普萨斯战役之后的几年了,战争一结束,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就把"赃物"的大部分都瓜分走了。在公元前294年的时候,卡桑德的儿子狄米特里·波立尔塞特司(Demetrius Poliorcetes)侵入伯罗奔尼撒,他想夺回自己因在伊普萨斯被人击败而失去的马其顿王位,他把控制伯罗奔尼撒视为自己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当中的重要一步。在门丁尼亚,他和阿基达马斯四世遭遇了,后者不仅迅即被击败而且还丢了性命,与他一起遭殃的可能还有包括斯巴达公民在内的整整700名士兵。如果不是因为希腊北方出现了更为紧急的事情转移了狄米特里的注意力,他一定还会继续挥师南下直捣斯巴达的领土,而且毫无疑问会占领并狠狠地蹂躏它。从公元前370年开始到此时,拉科尼亚已经被侵略过四次了,但不平常的是,斯巴达竟然还从来没有被外敌占领过。十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281年,阿瑞乌斯初次在国际舞台上登台亮相,最终成为了一位真正占据支配地位的斯巴达国王(ruling king)。可以说,斯巴达与他一起彻底地进入了历史上的"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Age)。这个时代,与其说是希腊与东方在文化习惯与实践上的融合,不如说是两者在文化上的逐渐接近和靠齐,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彼此混合、相互借鉴,但是,又没有完全消除或整个地改变对方的文化。

阿瑞乌斯一世

225

阿瑞乌斯一世（Areus I）是已故国王阿克罗塔图斯的儿子，在公元前 309 年继承了长寿的祖父克列欧美涅斯二世的阿基亚德王位，尽管在开始的时候，因为他还没有到达法定的继承年龄，管理国家的事务在名义上还是由他的叔叔摄政克列欧利玛斯（Cleonymus）来负责。然而，不久之后，克列欧利玛斯决定像他的兄弟那样去意大利南部当雇佣军，最后也同样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不过，阿瑞乌斯已经属于一个与他的父辈们完全不同的世界了，但他拥有希腊世界的新型统治者才有的眼光。

公元前 307 年，争夺亚历山大的遗产的几位主要的竞争者，宣布他们是各自领土的国王。阿瑞乌斯把他们视为自己的榜样，在他到了法定年龄并且担任了阿基亚德国王一段时间之后，他发行了斯巴达人有史以来的第一套银币，并且仿照亚历山大的方式，把自己的肖像和名号都非常醒目地铸造在银币上。标称自己是唯一的“斯巴达人的王”，就好像欧里庞提德王朝根本不存在了似的；他这样做严重违背了吕库古的传统。事实上，他所做的违背传统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在公元前 3 世纪 80 年代的某个时候，他的叔叔，也就是以前的摄政克列欧利玛斯娶了一位欧里庞提德家族的女继承人，从而越过了两个王族之间的界限。但是，阿瑞乌斯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后来，他的儿子阿克罗塔图斯（未来的阿基亚德国王）又与克列欧利玛斯的（欧里庞提德家的）妻子发生了通奸，他也成功地处置了如此危险的局面，这些全都靠了他老练、圆滑的处事手腕。

他的这种才能在更高的层次，即泛希腊地区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争端中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公元前 3 世纪的早期，人们以为他就是那封从耶路撒冷寄来的信的收信人，这封信是耶路撒冷的主教写的，收信人是“阿瑞伊乌斯”（Areius），这位主教在信中说斯巴达人和犹太人有着共同的祖先。主教的目的其实是希望斯巴达人能够帮助耶路撒冷去抵抗塞

226 流西的国王安条克(Seleucid King Antiochus)。公元前280年,阿瑞乌斯在组建了一个反对希腊的宗主国马其顿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后,侵入埃托利亚(Aetolia)。到了公元前3世纪7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转换了阵营,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二世(Antigonus II)哥那塔(Gonatas)给他及时派遣来了雇佣军,补充了他的军事力量,帮助他成功地击败了来自伊庇鲁斯(Epirus)国王皮洛斯(Pyrrhus)对斯巴达的进攻。此后不久,他和埃及的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菲腊德勒夫斯(Philadelphus)订立同盟,成为了"斯巴达—雅典—托勒密轴心同盟"的一员,从而使他有能力考虑越过柯林斯的地峡去介入所谓的克里蒙尼迪亚战争(Chremonidean War,以雅典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命名,时间从公元前267年至前262年)。但是,也正是在他当政期间,举世闻名的"吕库古"政体也开始真正地解体了;公元前265年,他没能突破占领并驻守在亚利哥林德斯山(Acrocorinth)的马其顿人的封锁,反而被杀死在这个地方的附近。

226 阿瑞乌斯最初的任务是去把德尔斐从埃托利亚人联盟的手中解放出来。这个目标既是因为斯巴达人对宗教的虔诚,无疑也是因为阿瑞乌斯个人对权力和声誉的热望,尽管斯巴达人世代相传的对德尔斐的尊敬十有八九是足够真诚的。虽然在军事的意义上,阿瑞乌斯损失惨重,但是,无论如何这次行动还是给他带来了一些名誉,而不是完全一无所获,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曾设法说服麦加拉、彼奥提亚以及阿尔戈斯的一些城镇和伯罗奔尼撒北部的亚加亚的四个城镇(它们在公元前280年时候是亚加亚人同盟的核心)来加入他的事业。在遭到断然拒绝之后,阿瑞乌斯在公元前3世纪70年代又卷土重来,这一次他采用的是对当时的斯巴达国王来说轻车熟路的策略——到克里特征募雇佣兵。但是,在公元前272年,他又被从克里特火速召回,去应对伊庇鲁斯的国王皮洛斯对拉科尼亚发动的另一次入侵以及对斯巴达的进攻。与阿瑞乌斯一同回国的还有2000名雇佣兵,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二世哥那塔也从柯林斯派来了雇佣军增援他,从而使他能够

解除敌人对斯巴达的围攻。据说,一些斯巴达的贵族妇女表现得极为勇敢,也为国家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些妇女中就有埃乌达米德斯一世的孀妇。这预示着一些斯巴达妇女将在公元前 3 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这段时期里,在斯巴达的历史上扮演毋庸置疑的重要角色。

227

阿瑞乌斯千方百计地想要挤入希腊世界的"超级联赛",但是,他的这种努力在公元前 3 世纪 60 年代的克里蒙尼迪亚战争中遭遇了重挫。尽管斯巴达与这个"联赛"中的一名"顶级球员"——埃及的托勒密二世建立了某种形式的联合,但阿瑞乌斯自己却被杀死在柯林斯附近。此时,斯巴达的国运也差不多降到了谷底,甚至比公元前 4 世纪 60 年代的留克特拉战役之后的十年还要低落。斯巴达不但没有在国外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而且在国内,历史悠久的"吕库古式"的各种习惯风俗也开始遭到破坏,在本来被认为是"平等"的斯巴达人当中,不平等的现象开始加剧,而且,此时的斯巴达人也只剩下 700 名左右了。两位斯巴达"改革家"在此时出场了,他们分别来自两个王族,他们能获得这样的声名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古代最杰出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曾为他们写过了完整的传记,普鲁塔克来自彼奥提亚,活跃于公元 1 世纪前后的几十年里。

当普鲁塔克准备坐下来撰写《希腊罗马名人平行列传》(*Parallel Lives*)的时候,他不可能没注意到罗马的格拉古兄弟俩在当时的巨大声名,他们分别是提比略(Tiberius)[1]和盖约(Gaius)[2]。两人都曾经担

---

〔1〕 提比略·格拉古(Gracchus, Tiberius Sempronius,公元前 169? —前 133),罗马贵族和护民官(公元前 133 年)。他倡导农业改革,主张恢复罗马经济和个体小农阶级,虽然这种传统的土地政策在三十年前即有,长老会中的敌对派仍认为他过于激进。他的非正统政治策略激怒了长老会的反对派,发动暴乱,在混乱中他被暗杀。后来他的弟弟盖约·格拉古执行了他的改革计划。——译注

〔2〕 盖约·格拉古(Gracchus, Gaius Sempronius,公元前 160? —前 121),罗马护民官(公元前 123～前 122 年)。他参与指控元老谋害其兄长提比略·格拉古的抗争活动,并协助实现其兄长所提出的农业法。他联合平民和骑士团的选票通过旨在抑制贵族贪污的改革。他试图将公民权扩大到罗马的意大利盟邦,并使平民获得更多的自由,不过并不获得支持。虽然出身于贵族家族,但他的政策被极端保守派视为企图摧毁贵族体制。后在阿芬丁山被围时自杀。——译注

任过平民护民官(分别是在公元前 133 年以及前 123 年和前 122 年)。而且,在罗马国内的激烈政治斗争中,他们俩都因为试图对罗马的共和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丢了性命,罗马政府在当时仍然由一个极端保守且又颇具凝聚力的元老院把持着。格拉古兄弟俩不但活着的时候响当当,死时更是轰轰烈烈,在希腊历史上,有什么样的人可以与他们俩相比呢?如果再有一对类似的兄弟那就最理想了,可是,没有,即使是任何意义上的一对兄弟都没有。为此,普鲁塔克不得不有点尴尬地来处理这个问题:斯巴达的国王阿吉斯四世(Agis IV)和克列欧美涅斯三世。这解释了我为什么在本书中没有为这两位不平常的国王分别作传的原因。这两个人的生平事迹都发生在斯巴达历史上的同一时期,即公元前 3 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里。

把阿吉斯和克列欧美涅斯与格拉古兄弟俩进行平行比较,只是一种勉强的做法,整个的来说是不太准确的。首先,阿吉斯和克列欧美涅斯不是兄弟,尽管直到其中一个人死后,他们才算是发生了一点联系:克列欧美涅斯娶了阿吉斯的孀妇阿基阿蒂斯(Agiatis)作妻子。阿吉斯和克列欧美涅斯并不是斯巴达人民的正式代表,而格拉古兄弟俩则是经民众投票选举出来担任护民官的。阿吉斯和克列欧美涅斯都是世袭的国王,分别在公元前 244 年至前 241 年和公元前 235 年至前 222 年继承了欧里庞提德和阿基亚德的王位。然而,普鲁塔克肯定不会是第一个看出,在这两个斯巴达国王与两个罗马护民官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相当多的共同之处。这两个斯巴达人同样都是在激烈的国内斗争中被杀害的,而且两人都明确地支持一种激进的、即使不是革命性的社会改革方案,他们都曾经试图通过运用自己的权力来实施这样的改革。

228

那么,阿吉斯四世和克列欧美涅斯三世到底做了什么,以致连他们的性命都搭上了呢?显然,仅仅依靠普鲁塔克的《传记》,是不足以为如此复杂的问题找到可能的答案的。首先,我们必须调查普鲁塔克选择的那些历史文献的性质是什么,尤其是它们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有一个作家,

即公元前3世纪的雅典历史学家菲拉尔克斯(Phylarchus)，他与普鲁塔克所记载的一些希腊人物基本属于同一时代，也是普鲁塔克首选的资料来源。但是，菲拉尔克斯记述的内容又有多少值得信赖的呢？如果我们相信罗马崛起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阿卡狄亚人波利比奥斯(Polybius)对此人所作的猛烈批评的话，那么他根本就不值得相信。菲拉尔克斯记述的材料，实际上是被波利比奥斯特意挑选出来作为优秀的历史写作的反面范例的。菲拉尔克斯让波利比奥斯感到难受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他的文体风格，因为他犯了一个范畴上的错误，即把本应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编纂与虚构的、富于情感的悲剧混为一谈。

但是，波利比奥斯本人也曾因为偏见而受到人们的指责。大约在公元前200年的时候，他出生在"大都会"，属于公元前3世纪晚期到公元前2世纪早期这段时期里统治亚加亚联盟的贵族精英。就相关的历史写作而言，他曾明确地声称偏爱自己的祖国才是真正的爱国。斯巴达的克列欧美涅斯三世是一个性格坚毅的人，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还是亚加亚人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敌人；在波利比奥斯的父辈们所处的时代里，"大都会"曾经确实遭受过克列欧美涅斯三世的洗劫和野蛮对待。这是波利比奥斯感到无法接受的事实，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去驳斥菲拉尔克斯对克列欧美涅斯三世的美化。 229

真相究竟在哪里？很不幸，普鲁塔克选择遵从菲拉尔克斯对历史的阐释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菲拉尔克斯其实只是一个喜欢说教的传记作家，而不是一个最好的历史学家。因此，我们最多只能宣称，我们的记述不会与菲拉尔克斯、波利比奥斯和普鲁塔克所记载的事实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同时，这些事实保持了原样，没有什么渲染；而且，我们对这些事实的阐释，最起码使斯巴达历史上一段最引人入胜、也最为重要的插曲获得了前后一致的意义。

这段插曲之所以如此吸引人的一个原因就是斯巴达妇女们的作用不但显得非常突出，而且在事实上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这

样的情形在整个希腊(或罗马)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亚里士多德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在他的《政治学》里说过：

> 在斯巴达人统治的时候,很多事情是由妇女来完成的。[1]

这句话可能主要指的是从公元前 404 年到前 371 年这段时间。然而,在公元前 244 年与前 221 年这段时间中,这一相当受争议的言论获得了实质性的内容并得到了证实。我前面已经提及过,克列欧美涅斯娶了阿吉斯四世的孀妇——阿基阿蒂斯。此外,普鲁塔克告诉我们,阿基阿蒂斯曾千方百计地想要报杀夫之仇,并且她比自己的丈夫还要更急于实行改革的方案,她的丈夫当初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遭人谋害的;她还促使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克列欧美涅斯转变成了一位改革者。在当时,阿吉斯的母亲和祖母——阿格西斯特拉塔(Agesistrata)和阿尔奇达米娅(Archidamia),她俩被普鲁塔克言之凿凿称为"所有斯巴达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当中最富有的人",而且,她们都同样毫不含糊地支持阿吉斯的改革事业;最后但同样也绝对重要的是,克列欧美涅斯的令人敬畏的母亲——克拉提西克列娅(Cratesicleia),她在自己的儿子被流放之前就曾到托勒密三世的宫廷当人质,并且,她在那儿也是因为一场血腥的派系斗争而遭到杀害的。

230

在希腊语中,表示内乱、派系斗争或内战的词是"*stasis*"(在现代希腊语中表示"巴士站"……)。因为"*stasis*"有时会威胁到一个希腊城邦(*polis*)的生存,所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的第五卷的主题就是如何预防和避免出现"*stasis*"。但是,从事实上看,这样显然也收不到多大的效果,或者说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公元前 3 世纪的希腊和公元前 4、5 世纪的希腊没有什么两样,仍然继续受到"*stasis*"的折磨。不过,

---

[1] Aristotle, *Politics*, Book II, p. 1270.

这段时间在表面上有点新意的地方是斯巴达也开始出现了"*stasis*"；这个城邦在先前的年代里向来是以有序、有效的治理(*eunomia*)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而闻名于天下的，可现在它也与其他希腊城邦一样被"*stasis*"搅得焦头烂额。而且，在斯巴达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和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在土地财产的分配和拥有上出现了极端而且持续恶化的不平等现象。

在以前，让斯巴达人感到自豪的正是与之相反的状况。他们所夸耀的"平等者"(Similars)之间的政治平等，是以在公民之间实现了一种根本性的经济平等为基础的；这种经济平等应该追溯到所谓的吕库古立法，据说在吕库古制定的法律中，就包括了对拉科尼亚以及美塞尼亚的土地进行平等分配。事实上，斯巴达人的土地分配一点儿也不平等，而且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平等。与希腊的其他城邦一样，斯巴达也毫无例外地存在穷人和富人。斯巴达和其他一些城邦之间存在着的一种明显而且变得越来越敏感的差异在于：如果一个斯巴达人太穷以致无法向他所在的"公餐食堂"提供法定的最低份额的农产品的话，就会被剥夺作为"平等者"的资格，并且成为一个"低等人"(Hupomeiones, Inferiors)。这样的自动降级处理反过来又越来越严重地削弱了斯巴达军队的实际力量，而之前正是在这支军队的保障之下，直到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斯巴达在希腊世界内外还一直保持着强国的地位。 230

然而，在斯巴达，土地被大量集中的确切机制到底是什么(现代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各执一辞与古代文献对此所作的不同描述是一样的)？斯巴达军队中人源短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可能是其中的主要因素；在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250年的这段时间里，斯巴达公民的数量从3000人降到700人，而且，其中仅仅只有100人真正拥有土地所有权。这就是阿吉斯决意要进行改革时斯巴达正面临的可怕状况，他重新打出了由来已久的、用来团结被压迫农民的旗号：废除债务并重新分配土地。这种改革本身就象征着斯巴达正在变得越来越"正常化"(normalization)，而改革的内容却与这种变化是自相矛盾的。在社会和经济的层面上，斯巴达已 231

经变得越来越不“特殊”了，即使在政治上，依据希腊的普遍标准，它还仍然显得非常古怪。

且不说一小撮富人，如阿吉斯的亲戚或与他有关系的人，即使是其他富有的斯巴达人作为一个群体也肯定都会团结起来反对他的这项改革举措，并且，是用斯巴达人通常的方式来反对他，那就是转向阿吉斯的共同执政王——阿基亚德的列奥尼达二世（执政期从公元前 254 年到前 235 年）——的阵营，希望由这个人来保护他们的利益。阿吉斯最初不得不以一敌众。他流放了列奥尼达，勾销了债务，而且，还把订立抵押的契据（*klaria*，这个词来自 *klaros*，意味着很多或一块土地）都象征性地公开烧毁了。但是，这些都只是他所取得的意料之中的成功而已。在他能够认真地计划去重新进行土地分配之前，他在柯林斯的地峡遭受到了一次不光彩的失败，而在返回斯巴达的过程中，他的敌人与他的一些直系亲属勾结起来谋杀了他。

这场改革是必要的，尽管从道德伦理的立场来讲是务实和公正的，改革的事业在随后仍然被推迟了差不多十五年。有点令人吃惊的是，恢复这场改革事业的竟然是列奥尼达二世的儿子克列欧美涅斯，他在公元前 235 年继承了父亲的阿基亚德王位。与阿吉斯不同，克列欧美涅斯意识到对外政策与内政一样的重要；因此，他通过在国外取得的一连串的重大军事胜利来为国内的改革做准备，在这些胜利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功绩是在对付西库翁的阿拉图（Aratus）以及他所领导的亚加亚联盟的过程中取得的。公元前 223 年他洗劫了“大都会”，此事前面已经提过，这是他一生的顶点，这一事件甚至也使人们在一段时间里认为克列欧美涅斯将有能力带领斯巴达复兴起来，重新恢复直到公元前 371 年它仍在国际关系上拥有的支配性地位。

232

克列欧美涅斯不仅仅是一位高明的军事领袖，在国内，他也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改革者，也许，甚至还算得上是一位真正改变社会的革命者。阿吉斯，我们可以说他仅仅是提出了一个激进的土地重新分配方案。4500

份土地给斯巴达人，15000 份给"边民"，这就是他的最终目标，但是，他为实现这个目标所做的事情非常少，或者说是毫无进展。然而，公元前 227 年，克列欧美涅斯在拉科尼亚真的开始实施了一次土地重新分配，而且在很多方面与阿吉斯的方案是相似的。他的方案不仅涵盖了贫穷的斯巴达人，也照顾到了贫穷的"边民"。另外，他还释放了 6000 名余下的拉科尼亚希洛人；这些希洛人现在可以用现金来向斯巴达换取自己的自由。他们有现金来购买自由，这一事实本身是耐人寻味的，也说明斯巴达的经济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获得了自由的希洛人大概因此就成为了土地的所有者，在以前，他们被迫在这些土地上进行劳作的。同时，他们也成为了享有全部权利的公民，不再仅仅像"新代梦人"那样了；"新代梦人"是在公元前 5 世纪 20 年代到 4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斯巴达出于军事目的而释放的一些希洛人。同样，在克列欧美涅斯的一揽子改革计划当中，也涉及了许多雇佣兵。这成为了克列欧美涅斯所进行的军事改革的关键，他试图以这种方式来提高已经衰弱和落伍的斯巴达军队的战斗力，达到由安提柯的马其顿或托勒密的埃及所设定的希腊化世界中的最高标准。

为了绝对地确保他的政治对手没有能力来反对或颠覆他的改革，他一开始就杀掉了他们，并且，还控制了那些可能会被人用来反对他的政治机构和组织。监察官被杀了，当克列欧美涅斯把他的兄弟埃乌克里达斯(Euclidas)任命为欧里庞提德的国王的时候，斯巴达的双王制在实际上也就这样被废除了；同时，古老的长老会(在"大瑞特拉"中已经提及过)受到冷落，他通过创建由"法律守护者"(Patronomos)组成的机构来削弱长老会的作用与影响力。克列欧美涅斯的改革并不局限在经济和政治这些领域，他同样也着手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打算恢复"够格者"训练，这种"吕库古式"的综合性训练曾经为所有未来的斯巴达男性公民们提供了统一的公共教育；而且，他还要恢复公餐食堂的生活方式，同时，成年的公民战士还要经常参加身体锻炼。就这一点而言，一个问题就摆在面前了： 233

克列欧美涅斯是否不仅仅是一个改革者，而且还是一个社会革命家，同时，他还可能是一个思想上的，或者甚至是一个出于某种哲学动机的革命家？

斯潘伊洛斯(Sphaerus)来自黑海的布拉塞尼斯(Borysthenes)，据说在克列欧美涅斯掌权并实施改革的时候，他曾经访问过斯巴达；他是一位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对如何把世界改造成它实际的样子有着不平常的现实关怀(practical concern)，同时，他也追求如何把斯多葛派的哲学观念运用于实践当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克列欧美涅斯之所以能够在事实上进行上述一揽子的社会改革，其背后的理念就是来自这位斯潘伊洛斯，而且，也正是在受到此人的哲学思想的启发后才这样去做的；安德鲁·厄斯金(Andrew Erskine)近年来为此所作的解释是最令人信服的，也最具说服力。[1] 也许吧！如果克列欧美涅斯真是出于哲学动机并受到过某种哲学思想的启发的话，那么，这也清楚地表明，这是斯巴达自全盛时期(以国王阿吉西劳斯二世为例，他在政的时间是从公元前445年到前360年)以来所经历的一次规模巨大的文化转型。但是，可惜的是，这种联系无法获得证实。无论如何，这次改革也没有维持多长的时间。在公元前222年的时候，克列欧美涅斯在斯巴达北方的塞拉西亚(Sellasia)被马其顿的安提柯三世彻底击败。他的改革因此也就被废止了，原来的政策又开始死灰复燃。三年之后，被流放的克列欧美涅斯来到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然后，在那里毫不光荣地死去。这也意味着这场不同寻常同时也可能是无法再重复的政治和社会的改革实验结束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斯巴达又重新陷入了衰退。有两个人，首先是一个叫"吕库古"(意味深长的名义!)的人，然后是玛卡涅达斯(Machanidas)，他们获得了机会并脱颖而出，都曾短暂地担任过军事和政

[1] Erskine 1990.

治上的最高职务,一些不太友善的文献资料称他们为“僭主”。公元前207年,玛卡涅达斯在门丁尼亚的战斗中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且损失巨大(据说牺牲了4000名“斯巴达人”),这也正是在克列欧美涅斯死后的第十二年发生的,但是,斯巴达紧接着又迎来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复兴,而且竟然是在另一位“僭主”的领导之下实现的。在以后的十五年里,斯巴达的命运与一个叫纳比斯(Nabis)的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据说他是戴玛拉托斯的后代。

纳比斯

234

曾经有人认为“纳比斯”这个名字来自闪米特语而非(印欧语系)希腊语,尽管他宣称,根据他父亲的名字,他是那个大约在公元前490年被废黜并遭流放的国王戴玛拉托斯的直系后代,但纳比斯有可能不过是一名自命不凡的篡位者而已。他大概是在公元前250年到前245年这段时间内,生于斯巴达某个地方。在公元前207年的时候,此时斯巴达已经是单王制了,国王佩罗普斯(Pelops)死了,尽管令人感到可疑但又恰到好处,纳比斯抓住时机篡夺了王权。他采用古代希腊的僭主的统治方式,组建了一支私人卫队,这支卫队由雇佣兵和一些从克里特召来的海盗组成。上台之后,他就丝毫不再顾忌自己与王族的任何联系了。相反,他住进了一座王宫,这是自迈锡尼的青铜器时代的末期以来,在希腊的南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建筑,他还饲养了很多用于阅兵的马匹;当然,在斯巴达铸造的钱币、官方的邮戳以及其他署名的文件上,他都自封为“国王”。

据说,纳比斯曾经先是拷打斯巴达人当中的反对者,然后再把他们流放,并迫使这些人的妻子嫁给已经获得了解放的希洛人,纳比斯不但给了这些人自由,还使他们成了斯巴达公民。他自己的妻子是一个来自阿尔戈斯的希腊女人,名叫阿皮亚(Apia);这样的王室婚姻在泛希腊地区的统治者当中是很平常的事,但是,这可是第一次有一位斯巴达国王娶了一个

外国女人作妻子。他的一位先辈——列奥尼达二世——曾经被短暂地免去过王位，确切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妻子不是斯巴达人。

纳比斯费尽心思地维持自己的王位长达十五年，但是，在公元前192年的时候，他在一次由埃托利亚人联盟发动的政变中被暗杀了，埃托利亚人联盟是亚加亚联盟在希腊的主要对手。有一种说法是，纳比斯出于自己独裁者的利益考虑，一直想要恢复克列欧美涅斯三世时的一些激进的改革措施，借此来彻底改变自己的国家，克列欧美涅斯三世的王权在公元前222年被推翻之后，这些措施都已经被废除了；我们现有的历史文献资料都异口同声地对纳比斯持有敌意，因此也就很难去判断他的这些做法的重要意义了。也许另一种说法要显得更为贴切些，那就是他启动了一场对斯巴达来说势在必行的现代化运动，这样将最终促使斯巴达从带有特殊性、地方性的"吕库古式"的阴影下摆脱出来，进入更具世界性的希腊化的阳光当中，尽管这一切已经有点姗姗来迟了。[1]

235

克列欧美涅斯三世曾经解放过6000名希洛人，但他这样做也仅仅是出于一种迫不得已的军事考虑，除此之外毫无变化；总之，他内心并没有认识到结束希洛人制度会造成什么样的长期的社会影响，而纳比斯把解放希洛人当作一项确定的政策来加以实施，并把它作为实现斯巴达的经济现代化的一揽子计划中的一部分。他鼓励建立一种更加灵活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并推动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至到了他执政末期的时候，斯巴达似乎真的成为了一个在经济上需要依靠外部世界的国家，这在斯巴达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外交事务上，他的运气也是时好时坏，最后，在公元前195年的时候，罗马采纳了提图斯·奎茵提斯·弗拉米尼努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的外交政策，不再虚伪地保持中立立场，并向斯巴

[1] 在亚历山大东侵后不久，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就进入了一个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的新时期，历史上称为"希腊化时代"，一般资料认为这段时期是从公元前323年到公元前30年。——译注

达正式宣战，于是，纳比斯不得不交出斯巴达对阿尔戈斯以及拉科尼亚的“边民”港口的控制权。公元前193年，当他试图重新夺回对这些地方的控制的时候，遭到了弗拉米尼努斯与菲洛佩门（Philopoemen）的联合打压，菲洛佩门是亚加亚联盟的将军，纳比斯在这第二年就被刺杀了。

纳比斯所留下的遗产中以斯巴达的城墙最为具体、明显，斯巴达人最终建成它的时间应该不晚于公元前188年，尽管它可能只是纳比斯执政时期的一种构想，或者至少是纳比斯决定要修筑这座城墙的。在古典时期的那些美好日子里，尽管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斯巴达人即使是建议给城邦的四周建一个防护带，都会被耻笑为像女人一样的胆小鬼；斯巴达人有非常好的理由不用去这样做，不论是积极的（斯巴达在环境和人口上，都可胜任防御的需要）还是消极的（修筑城墙或防护带会在物理空间上把斯巴达的第五个组成村庄——阿密克利隔离在外）。现在，在公元前3世纪与前2世纪的这个转折点上，斯巴达人却拼命地想要修筑一座城墙来保护自己，此外，一个像纳比斯这样的统治者也可以通过建造一座格外宏大的城墙来捞取政治资本。结果，斯巴达的新城墙的周长达到了48 236 斯塔德（48 *stades*，大约是6英里），修筑好的城墙部分以石料为底座，然后在上面砌上泥砖，最后再铺盖上瓦片，城墙上按照固定的距离分布着瞭望台。公元前200年，就在城墙开始逐渐升高的同时，斯巴达的四个核心村庄之一——居诺苏拉，公开地对负责供水的官员表示了感谢，这既意味着斯巴达开始进入了城市化阶段，同时，也意味着斯巴达人提高了对城市安全的关注程度。

罗马决定介入希腊内部的纷争，无论它确切的动机是什么，结果反倒是让亚加亚联盟捡尽了便宜。亚加亚联盟从公元前280年建立开始就成为了希腊的两个最强大的城邦集团中的一个，另一个就是埃托利亚人联盟。从克列欧美涅斯三世开始，斯巴达和亚加亚就已经是仇家了；而根据那个人人皆知的原则：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斯巴达与埃托利亚成为了盟友。然而，饶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公元前192年的时候，正是埃

托利亚人在出人意料的情况下刺杀了纳比斯，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害怕纳比斯摇摆不定，这个人不值得信任。但是，这样做也仅仅只对亚加亚有利，同一年，亚加亚的菲洛佩门用强迫的方式把斯巴达合并进了亚加亚联盟。对斯巴达人来说，这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耻辱和打击。曾经，而且就在不久以前，斯巴达至少在伯罗奔尼撒的政治活动中，仍然还算得上是一个有分量的角色，可现在，其地位竟然与亚加亚联盟中其他最低贱的小城邦没有什么两样了。斯巴达的自治，希腊人最珍视的价值观念——自由，没有了！ 四年之后，即公元前 118 年，菲洛佩门通过在斯巴达内部实施一场彻底改革，完成了对斯巴达人的羞辱；这场改革与阿吉斯、克列欧美涅斯的，在某种程度上，还与纳比斯的改革是完全相反的。菲洛佩门废除了“吕库古式”的法律，并且，他还破坏了非“吕库古式”的新城墙，(在摧毁斯巴达人的意志与力量的意义上)这两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致的。

可以说，斯巴达此时不得不一仆事二主——亚加亚和罗马。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各式各样的流亡在外的斯巴达人团体频繁地往返于希腊南部与罗马的城市之间进行外交斡旋，这些人试图说服罗马的元老院，为了反对亚加亚人的残酷镇压，允许他们回到原来的土地上去，并重建一个包括城墙在内的类似“吕库古式”的斯巴达。最后，大约是在公元前 180 年至前 179 年的时候，流亡在外的斯巴达人终于回到了故土，城墙也开始获得了重建，但是，任何形式的对吕库古式的斯巴达的重建还必须再等待更长的时间，至少是要到公元前 146 年，即罗马对希腊南部进行全面的殖民之后了。公元前 168 年到前 167 年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起极其重要的事件，公元前 168 年的夏天，罗马将军保鲁斯(L. Aemilius Paullus)在皮得那(Pydna)的战役中击败了马其顿的国王菲利四世。就在这一年的冬天，他带领着大队人马进入了希腊，此行的目的，至少部分来说，可以被称作是文化观光。在他的这趟旅行当中，他特意在斯巴达作了停留并进行了一次访问，历史文献记载他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向斯巴达人的祖先的生活方式表示自己的敬意。事实上，除了一种古怪的衣着以及男式的发

237

型之外，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已经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了。但是，也可能是因为保鲁斯的访问给当地的斯巴达人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动力，他们随后就决定努力把自己的城市建成一座“主题公园”，一个展览他们的光荣过去的博物馆，确切地说，就是要以此来吸引像保鲁斯这样的文化观光客们，并借此希望能在希腊化世界里占据一席之地，但现在不是因为军事和政治，而是因为其独特的文化。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斯巴达人因为不得不屈从于亚加亚而感到极为痛苦。而在亚加亚这一边，也因为斯巴达曾经在马其顿与罗马的战争中支持过前者，而不得不在现在被罗马施以连带的严厉惩罚；1000 名最重要的亚加亚人作为人质被迫迁往罗马和意大利，这些人中就包括波利比奥斯。斯巴达人现在想要从亚加亚联盟中独立出来，从而使亚加亚再一次与它发生冲突，进而导致亚加亚与罗马爆发冲突，并最终被罗马打败，这段时间正好在公元前 152 年至前 146 年之间，波利比奥斯（他最终在公元前 150 年的时候被遣送回国，在那时以前他就已经成为罗马的坚定支持者了）傲慢地称这一时期为“混乱与骚动”。公元前 148 年，此时的斯巴达正处在孟那奇达斯（Menalcidas）[1]的强有力的领导之下，终于从亚加亚联盟中脱离了出来，从而使斯巴达在亚加亚人后来与罗马对抗的时候能够抽身而退，作壁上观；从罗马人的观点看来，这只是一场亚加亚战争。

238 这场战争在公元前 146 年的时候，罗马总督木米乌斯（L. Mummius）率领的军队获得了彻底的胜利，战争便宣告结束了；然后，罗马人对叛乱的城邦实施了野蛮的报复。相比之下，斯巴达倒是保全了自己。从已经不复存在的亚加亚联盟中独立出来之后，无疑就得服从整个希腊的最大宗主——罗马，但是在斯巴达，重建后的城墙还是原封不动地被保存了下来，而且也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吕库古”制度也得到了有限的恢复。首先是“够格者”训练，在公元前 146 年之后还存在着这种“够格者”训练的证

〔1〕 这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名字，整个名字就是由希腊文字中的“能力”（might）与“力量”（strength）组合而成。——原注

据，主要是从欧罗达河河岸的欧西亚神殿中尚未毁坏的石碑上找到的，碑铭中记录了与之相关的内容。然而，此时的斯巴达，几乎完全被限制在了斯巴达平原的腹地上，与其他城邦相比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一个普通的城邦，可以肯定它已经没有什么"边民"城镇了，也有可能在欧罗达河河谷上端的贝尔米纳提斯(Belminatis)地区还存在着例外情况，甚至连斯巴达平原上也可能很快就不再有任何希洛人了。严格地说来，这里已经是罗马人的斯巴达了，它已经不复是原来的斯巴达。总而言之，与希腊化时期、古典时期以及古风时期的斯巴达相比，它已经是另外一个城邦了。

"好古主义"或"古文物研究"(antiquarianism)成了新斯巴达的施政方针，恰当地说，这个城邦以前从来没有被称誉过为一个"书写文化的中心"(a centre of written culture)，现在竟然在本国出现了一批古文物研究者，正是他们记录了斯巴达这个文化"化石"的石化过程。斯巴达和罗马之间的接触也得到了加强，斯巴达甚至为前来参观的罗马官员们建造了一座专用的客栈。从公元前146年到前88年，在斯巴达人所记录的公共历史中，没有发生过多少值得注意的事情；罗马为抗击黑海国王密特拉达提(Pontic king Mithradates)而发动的战争，把不情愿的斯巴达人也卷入了进来。斯巴达看来是遭到过来自海上的袭击，敌人取道欧罗达河河谷发动了这次突袭，这也促使斯巴达人对自己的城墙做了几次维修。然而，到公元前70年代初期，斯巴达还是相当和平安宁的，年轻的西塞罗(Cicero)因而得以能够效仿保鲁斯来到斯巴达进行了一次访问，但他表现得更像一个学生而不是一个征服者。

公元前49年，罗马帝国的内战达到了最高潮，敌对的双方是庞培(Pompey)和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希腊作为一个整体处于庞培的势力范围之内，当希腊很短暂地成为这场内战的主战场的时候，斯巴达人与其他人一样不得不服从于庞培的军队。从这段时期斯巴达人所铸造的钱币就可以断定任何形式的王权在当时都已经被废止了；波利比奥斯对斯巴达的宪法和罗马的共和国宪法进行了有趣的，尽管也是有缺陷

239

的比较,如把斯巴达的"双王制"(dual kingship)比做罗马的"双执政官制度"(dual consulship),这样的比较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地方。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君主政体在斯巴达是绝不会再有什么出头之日了。

庞培在公元前48年的时候被杀死在埃及,恺撒从而以"执政官"(Dictator)的名义取得了罗马世界的统治权。然而,他在公元前44年的时候也被暗杀,罗马世界于是不可改变地开始向一种君主政体发展,最终,恺撒的养子及继承人成功地夺得了国家大权并执政多年,他就是屋大维(Octavian),即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奥古斯都(Augustus)。在公元前42年的时候,屋大维还仅仅只有19岁,当时的希腊正处于保守的、拥护共和政体的布鲁图斯(Marcus Brutus)的管辖之下,斯巴达人大胆地,不如说是轻率地宣布他们支持屋大维以及他当时的政治伙伴——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斯巴达人的这一立场性表态,再加上他们还在公元前40年的时候为屋大维未来的妻子利维娅(Livia)提供过庇护,事后证明他们这样做是很有先见之明的,简直就是天意如此。奥古斯都在公元前31年的时候,第一次在亚克兴(Actium)海战中击败了安东尼,并且随后,即在公元前27年的时候立自己为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在亚克兴战役中,斯巴达是整个希腊大陆上唯一支持屋大维的城邦,"有那么一些时候,它在新成立的亚加亚行省中成了受人注目的焦点"。[1] 公元前21年,奥古斯都甚至亲临这个城邦进行访问并与当地的官员一同进餐,以示对斯巴达的尊重。

在我们所知的历史记载中,最后一位斯巴达英雄(如果这种称呼正确的话)是盖乌斯·尤利乌斯·欧里克莱斯(Gaius Julius Eurycles),他的这个名字告诉我们——历史已经进入罗马的时代了。他的族名——"尤利乌斯"(Julius)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他已经被授予了罗马的公民身份,这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尤利乌斯"给予此人的赏赐。这个"尤利乌斯"就是

---

[1] A. Spawforth in Cartledge & Spawforth 2001:99.

盖乌斯·尤利乌斯·屋大维·恺撒·奥古斯都(Gaius Julius Octavianus Caesar Augustus),对我们来说,他还有另外一些称呼,如屋大维或奥古斯都,但是,在那个时代,他通常也被直呼为恺撒。我们在前面提到奥古斯都曾亲自造访过斯巴达,部分的原因就是为了奖赏欧里克莱斯。此时的斯巴达就像其他的希腊城邦一样,为满足城邦的各种常规和非常规的开支,而不得不依赖于某些"恩主"的赏赐,并为此还建立了一种政治体制,从而可以以政治的方式来公开地吸引捐赠,欧里克莱斯就处于这种体制的顶峰。因此,给予欧里克莱斯一些必要的资金,这既符合奥古斯都,同时也符合欧里克莱斯的利益。而且,欧里克莱斯确实获得了充足的资金供应。

240

斯特拉博(Strabo)[1],这位当时来自小亚细亚的希腊地理学家,在谈到欧里克莱斯的地位时,把他比作一位斯巴达人的"总管"(*epistasia*),并称他为斯巴达人的"领袖"或"指挥官"(*hêgemôn*)。因此,斯巴达事实上是再一次有了最高统治者,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斯巴达就像埃及一样实在是不能没有国王。奥古斯都实际上是整个罗马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他应该能够理解并同情斯巴达人的这种做法。欧里克莱斯自然会像阿瑞乌斯那样,发行了带有"欧里克莱斯铸造"字样的货币。他掌握了大量的财富,这可能得感谢利维娅后来的亲自干预,他还控制了近海的岛屿库铁拉,因此他在宗教礼仪和其他花钱的事情上都非常慷慨大方。在建筑方面,他重建了剧场,其规模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位列第二,这个剧场并不是用来演出雅典式的悲剧和喜剧的,而是为了举办政治性的民众集会;还建了一个体育馆,以及一个水渠。其他方面的开支主要是用于官方的宗教活动;实际上,可以说他主管着斯巴达的宗教仪式,包括在斯巴达以斯巴达的名义向海伦以及狄俄斯库里(卡斯特和波吕刻斯,海伦的兄弟,我们在此书的前面部分已经讲过这些内容)奉献祭品,同时,还在玛里南部

---

[1] 斯特拉博(Strabo,公元前63? —公元21?),古希腊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译注。

的塔伊那隆负责向波塞冬(在当地方言中以前被称作“Phoidan”)献祭。

这种宗教上的活动是应当在事先向奥古斯都提出申请的,事实上他们确实有意这样做了。但是,欧里克莱斯从事的其他一些活动却没有这样做。当他重申斯巴达对位于拉科尼亚的从前属于“边民”的沿海城市(现在已经获得解放)拥有控制权的时候,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也可能是他们对利维娅的儿子,即奥古斯都的继子提比略(Tiberius)表现得过于友好,后者在公元前6年的时候不再受到奥古斯都的公开喜爱了。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欧里克莱斯在奥古斯都剥夺他的领袖位置之前,曾两次被投入监狱并遭流放。公元前2年,他在不光彩的流放途中死去,这一年,奥古斯都从元老院(Senate)那里获得了独裁的权力并被封为“国父”(Father of the Fatherland,Pater Patriae),换句话说,他成为了一个世袭王朝的创立者!　241

在奥古斯都结束了其漫长的一生及统治的十五年之后,即公元14年,欧里克莱斯的继任者们开始去讨好帝国的新皇帝——提比略,从而使他们重新获得了罗马帝国的青睐,并恢复了他们在斯巴达的统治地位。欧里克莱斯的一个儿子被称作“拉科”(Laco,即“斯巴达人”),另一个儿子则被称作“斯巴提亚提科卡斯”(Spartiaticus,即希腊语中的“Spartiates”的拉丁语表达形式)。传统,就这样以一种完全斯巴达人的方式获得了重新发明。

242

第十章　遗产：列奥尼达万岁！

最后一章我将以列奥尼达为主线来简要地谈一谈从古代到今天，斯巴达人的神话是如何形成的。列奥尼达在他的有生之年并没享有过多少盛誉，但是，他在温泉关担任领袖、拼死抗敌的英勇事迹，却使他在死后立即成为传奇并流传开来。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这个传奇从古代到现在就从来没有被人们遗忘过，并且，实际上当我撰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它又一次受到了一种完全好莱坞式的对待。在我们准备攀登那些令人晕眩的高度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简单地回顾一下，在他的一生中究竟是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最终导致他愿意用自我牺牲的方式，在达到其生命顶点的时候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我们知道有很多斯巴达人都被称作“列奥”（Leon，意思就是“狮子”）。在一个尚武的社会里，用这样一个名字来给人命名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这个名字带着一种野性，比一般名字更加接近狂野的自然。在斯巴达，有很多贵族，其中包括两个王族都宣称他们是曾经猎杀过雄狮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后代。因此，“列奥”被当作一个高贵的名字是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惊讶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是，只有两个斯巴达人曾被称作“列奥尼达”（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雄狮的后代”），他们俩都来自阿基亚德王族。显然，他们当中最有名的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列奥尼达一世！

他可能出生在公元前540年左右的某个时间，其特殊的出生是相当有意思的，或者这对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是父亲的第一任妻子所生，但在出生之前，他的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已经生下了另一个合法的儿子——克列欧美涅斯，这个斯巴达父亲显然犯了重婚罪。希罗多德说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重婚妻子“根本就不是一个斯巴达人”，也许有这种可能，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克列欧美涅斯大约在公元前520年的时候，即自己的父亲死后登上王位，并且在实际上成为了斯巴达历史上最有权势并且也最有吸引力的一个统治者。在克列欧美涅斯出生后，阿那克桑德里戴斯也终于成功地让自己的第一任妻子受孕，先是生下了多里欧斯，然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儿子——列奥尼达和克列欧姆布洛托斯。

243

因此，列奥尼达其实是他的父亲的四个儿子中的一个，也是他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在同父异母四兄弟中排行第三。如果他确实是在公元前540年左右出生的话，那么到了公元前510年左右的时候，按斯巴达人的标准来看，他应该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列奥尼达要么曾经结过婚，但后来妻子死了或与他离婚了，要么他就根本没有结婚，直到公元前5世纪90年代，我们知道他在这个时候迎娶了戈尔歌（读者可翻至本书的第三章，阅读关于戈尔歌的传记）。戈尔歌是一位已故国王的公主，也是一大笔财富的女继承人，另外，她还是列奥尼达的侄女，尽管是旁支的。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列奥尼达可能是有意地推迟了自己的婚姻，直到戈尔歌到了二十出头的适婚年龄之后他才结婚，之所以如此，既是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同样也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大约是在公元前490年或前489年的时候，他的长兄也就是同父异母的哥哥克列欧美涅斯用一种非常奇特的自杀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结束了自己的国王生涯。他到底有没有负罪潜逃，或者他其实是受到了排挤，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是列奥尼达在排挤他吗？怀疑的矛头一直都指向列奥尼达，有人认为他犯有弑君之罪，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点，而且，如果他与别人合谋陷害自己的兄长这件事情，真的存在着确

凿的证据或受到了严肃的怀疑的话，那他就不可能在十年之后还被斯巴达人选为派赴温泉关的部队的指挥官。

他和戈尔歌有一个儿子——普列司塔尔科斯，在这一点上他与另外300名特别卫士是一样的，这些斯巴达人之所以能和他一起去温泉关，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活着的儿子（这样，他们家族的血脉就不至于断绝）。然而，为何是他而不是另外一位国王——列乌杜奇戴斯——获得允许并带领着斯巴达的先遣部队去温泉关呢？有一个活着的儿子，大概不会是他之所以获得这次推选的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原因。无论如何，他随后担任指挥官的表现完全证明了斯巴达人民的选择是正确的。列奥尼达所表现出来的才能毋庸置疑。他说过的话也和他的行为是相称的，而且同样出色。他曾说过两句特别有名的格言，显示出他即使是在大难临头时也会保持着幽默，这是一种斯巴达式的、语言简洁精炼的幽默，在这一点上他并不逊色于斯巴达人当中最优秀的人物。据说，当薛西斯要求他投降并交出武器的时候，他回复道："来吧，你自己来拿！"在温泉关进行抵抗的第三天，也是在最后一天的早晨进行短暂休息的时候，他对战士们说："好好吃一顿丰盛的早餐吧，今天晚上我们得去哈得斯（冥王）那儿吃晚餐了！"这句话也间接地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斯巴达人在斯巴达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强制规定的饭食，那就是在公餐食堂共进的集体晚餐。

在温泉关战斗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的战斗中，有一件事情仿佛就像是荷马史诗在现实中的再现，当时列奥尼达已经战死，几个幸存的斯巴达战士拼命地想要去夺回他的遗体，以免被波斯人凌辱，他们完全就像荷马笔下的希腊人那样拼命地想要保护已经战死的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的遗体，为的是让阿喀琉斯(Achilles)可以更好地安葬他。到了最后，斯巴达人实在无法再阻止波斯人，不得不放弃了。在希腊人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波斯人在战斗结束后蹂躏了列奥尼达的遗体。希罗多德所记载的一则轶闻从另一方面增强了这个故事的可信性，他说

在公元前479年，当希腊人取得了胜利之后，一个鲁莽的希腊人向联军统帅——斯巴达人波塞尼亚斯——建议，作为报复，他们也应该毁坏波斯人的主帅玛尔多纽斯的尸体。波塞尼亚斯的回答显得相当冷静、直率而又令人钦佩，他说毁坏敌人的尸体不是希腊人的行事方式。

无论列奥尼达的遗体是否真的被波斯人毁坏过，总之他的遗骸，或者说被认为是属于他的遗骸在四十年之后被带回了斯巴达进行安葬。公元前480年刚过去不久，在他牺牲的地方就立起了一座石狮，这头狮子被永久性地称呼为"列奥尼达"。战死在海外的普通的斯巴达人都会埋葬在这个地点，同时再在斯巴达家乡建立墓碑来纪念他们，这些墓碑上会刻上"他在战争中牺牲了"诸如此类的简短文字；而作为通常的惯例，斯巴达人显然会把在国外死去的国王的遗体带回斯巴达，然后在给他们的遗体上涂上蜡或蜂蜜之后才加以安葬。具体到列奥尼达，这样做就不可能了，于是，斯巴达人就在安葬他的遗体的地方放上一个模仿他真人的画像。作为弥补，斯巴达人为他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简直就不像是为人类举行的"葬礼仪式，这是色诺芬的描述），这样的葬礼会为所有死去的国王举行，见多识广的希罗多德认为这样的葬礼看上去更像是外邦人，尤其是西塞亚人的做法，通常希腊人是不会这样操办的。

245

至于葬礼的实际状况，经过文献的重组之后大致是这样的：骑着马的信使首先要到斯巴达辽阔的国土上四处去召集送葬者，这些人来自"边民"和希洛人家庭，既有男人也有女人。按规定，国丧期长达十天，这期间斯巴达国内的所有公共事务都要推迟，所有公共债务都会被取消，一些犯人也会获得特赦。实际上，仪式进行过程当中还会伴随着非常大的喧闹声，这些声音既有来自女性送葬者的恸哭（她们获得了特别的许可），也来自人们砸碎和猛击金属容器发出的声响。在这一段时间里，整个斯巴达城邦的社会和政治组织都会处于一种停摆状态，直到改朝换代完成且新王继位之后，这个国家才能恢复生气，当然，这得假设在王位继承的问题上没有出现争吵，尽管这样的事情在斯巴达历史上经常发生。列奥尼达

大约在公元前440年的时候得到了重新安葬，此时正值国际关系非常微妙的时期。公元前445年的和平协议还在生效期，在对待雅典的态度上，斯巴达人正在主战与主和两种意见之间左右摇摆。列奥尼达的葬礼之所以延迟到此时才举行，可能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使所有的斯巴达人都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主题上来，那就是追忆斯巴达曾经带领着希腊人们英勇地抵抗过波斯人，并取得了最终胜利的那段光荣岁月（斯巴达的这种领导地位后来被雅典篡夺，或是拱手让给了雅典），以此来调和斯巴达社会中各派的意见。

所有的斯巴达国王，在我看来，他们在死后按照规定都会被视为英雄，也就是说，他们会作为英雄或超越凡人的天神而受到宗教祭礼上的崇拜。不管怎样，就列奥尼达来说，他在身后获得如此高的崇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希腊化时期，斯巴达人曾经修建过一座永久性的神殿——列奥尼达神殿（Leonidaeum），并且开始每年举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节日——列奥尼达节（Leonidaea festival）。后来，这个节日在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在位时间从公元98年至117年）执政期间又开始举行了，可能因为当时图拉真正在与古代波斯人的后代帕提亚人（Parthians）进行交战吧，另外，这个节日的举办还获得了一个捐献人的资金赞助，此人有一个非常显赫且颇具古典意味的名字——C. 尤利乌斯·阿吉西劳斯（C. Julius Agesilaus）。在这种宗教节日的借口之下，还同时举办了一场商品交易会，罗马时期的斯巴达人已经违背了他们祖先仇外或排外的习俗，反而是通过免除地方交易税和进口税的方式来千方百计地吸引外来的客商。据说，甚至曾经还有一座正规的银行在那里开展商业汇兑业务，倘若是列奥尼达那个时代的斯巴达人的话，是绝不会多看这些东西一眼的，更不用说去容忍或鼓励这样的事情了。

在公元2世纪中期，当来自小亚细亚的诗人帕萨尼亚斯经过斯巴达的时候，他发现斯巴达人正在积极地把他们的城市建设成一个纪念六个世纪甚至更早以前的希波战争的场所。在他沿着舰队司令优利比亚戴斯

(Eurybiads)的坟墓旅行的时候,他发现了人们为列奥尼达、摄政王波塞尼亚斯和温泉关死难将士们修建的纪念碑,以及集市上的波斯人柱廊(Persian Stoa)。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帕萨尼亚斯此时正身处一股全面的复古文化的浪潮当中,这场运动可以被简称为"第二次智者派运动"(the Second Sophistic)。对这个时代的修辞学家和智者来说,列奥尼达显然是希腊历史上的一位英雄,是他们赞颂的对象,尽管他们的赞美往往显得过分,并还受到过才华横溢且风趣幽默的卢奇安[1]的讥讽和批评。

另一方面,普鲁塔克是为"第二次智者派运动"增光添彩的人物,他一定没有想过要去讽刺列奥尼达。相反,他为列奥尼达撰写过一部传记,不幸的是,这部传记没有流传到今天。实际上,我们知道有一些格言据说是列奥尼达曾经说过的,并且它们还都被记载在普鲁塔克的《国王和指挥官的格言》(*Sayings of Kings and Commanders*)一书中,在普鲁塔克的另一部保存至今的传记——《希腊罗马名人平行列传》——中也记述了一些列奥尼达的格言,因为来源可靠,显然它们要更加可信些,其中关于吕库古和克列欧美涅斯三世(在位时间是从公元前 236 年至前 221 年)的传记中加入了一些与列奥尼达有关的事迹。下面引述的内容是从后者的传记中找到的:

> 据说,当有人问列奥尼达,提尔泰奥斯是因为什么样的才能而被称作诗人时,他回答道:"一句妙语可以激发年轻人的勇气。"他的理由是充满激情的诗句可以让年轻人在战斗中不再顾及个人的生死。[2]

247

因此,公元 2 世纪的一位作者的作品中的一句被认为是由公元前 5 世纪的一位国王说过的话,让我们想起了公元前 7 世纪的一位斯巴达民族诗

[1] 卢奇安(Loukianou,公元 120—180),又译琉善,希腊讽刺作家。——译注

[2] Plutarch, *Life of Cleomenes*, chapter 2. See also Talbert ed. 1988.

人，这是一个跨越了近八百年历史的文化传统。

公元3世纪，基督教的辩护者奥利金(Origen)[1]在与异教徒克理索(Celsus)的口水战中，曾经就向古代希腊的异教徒们请求过帮助。他毫不顾忌地提议，可以用列奥尼达主动选择一种原本可避免的牺牲，来对耶稣的受难和死亡这件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神迹加以阐释。一个世纪之后，当异教徒和基督徒(实际上是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的时候，昔兰尼(Cyrene)[2]的席尼西斯(Synesius)自豪地宣称他有斯巴达人的血统，而且更特别的是他的这一血统还与列奥尼达一样，都出自据说是建立了斯巴达的埃乌律斯铁涅斯。席尼西斯的书呆子气在古代斯巴达人身上是一点儿也找不到的，但是，他如此充满激情地到基督教创立以前的历史中去寻根认祖，是完全不会让那些他认定的斯巴达先辈们感到古怪的。

诸如此类的宣称与斯巴达有着血缘关系的说法，既有来自个人，也有来自集体，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这种事情就肯定已经出现过，但是它成为整个希腊的一种通行做法却是从希腊化时期(公元前的最后三个世纪)才开始的。比方说，在公元前3世纪早期，耶路撒冷的主教甚至还宣称犹太人和斯巴达人都是亚伯拉罕和摩西的后代。在身世上如此大吹大擂的做法其实是各个团体出于自身所处的特殊时局的一种政治需要，与他们的家谱是否准确和可信没有多大关系。就席尼西斯所宣称的内容来说，昔兰尼确实是锡拉人在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建立的，希罗多德的著作也可以证实这一点[3]，可要进一步认定锡拉(现代的圣托里尼岛)是由斯巴达建立就非常令人怀疑了。席尼西斯个人的直接目的多半是积极的，但也肯定有自己的需要，他其实是想把自己与此时正在蹂躏昔兰尼加

248

[1] 奥利金(Origen，公元185? —254?)，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的作家、基督教神学家、教师。——译注

[2] 昔兰尼是锡拉岛希腊人的殖民地，是希腊最主要的城市之一。——译注

[3] 昔兰尼于公元前630年由锡拉岛的殖民者建立，希罗多德的《历史》第四卷中详述了建城的经过。——译注

(Cyrenaica)的游牧部落的斗争,比作列奥尼达为保卫希腊而向入侵的波斯人发起的抵抗。因此,席尼西斯不仅没有资格可被称作是最后的异教徒(他后来成为了一个主教,改变信仰皈依了基督教……),他这样做其实也只是在为自己后来的退出,而到古代世界中去寻找一个更体面的借口而已。

文艺复兴更像一场西方的而不是东方的、罗马的而不是希腊的知识和文化的运动。这种看法的一个例外是一个叫做西里亚科·德·匹兹柯尼(Ciriaco dei Pizzicolli)的人,他沟通了本来处于分裂状态的东方和西方,他是一个商人,人们通常用他在意大利的出生地来称呼他——安科纳的西里亚科。我们应该感谢他在公元1147年的时候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旅行纪录,他用大量的篇幅追忆了似水年华,其文字之悲婉要远远超过诗人波塞尼亚斯的诗作。当他经由米斯特拉(Mistra,当时还存在这个地方,只不过是摩里亚半岛的德斯波塔特的首府[1],但是不久之后就不得不屈服于奥斯曼土耳其)来到斯巴达的时候,在一列长长的斯巴达昔日的战士名单中,他为其中一个人已经不在人世而感到深深的惋惜,无疑,这个人就列奥尼达。

16世纪晚期,从欧洲的一端来到另一端,我们发现苏格兰的人文主义者和历史学家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在1579年的时候曾经称颂过列奥尼达、阿吉西劳斯二世以及其他人,并把他们称作真正的国王,从而与那些他同时代的过分沉溺于奢侈生活的君主们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他的观点在1581年遭到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Algernon Blackwood)的反驳,后者从宪政的立场认为,在斯巴达,国王仅仅只是名义上拥有国王头衔的人,并不能利用其国王的权力来获取任何实际的利益。几乎就在这同一时期,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一篇题为《话说

[1] 摩里亚半岛(Morea)是中世纪和近代初期称呼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名称。这个名称来源于拜占庭帝国的一个名为摩里亚采邑的省份;德斯波塔特(Despotate)是欧洲中世纪曾经存在的一个国家的名字。——译注

食人部落》(On the Cannibals)的散文里写下了如下的文字——读者在这段话里也许找不到非常明显的观点：

> ……有些战败可与胜利相媲美。萨拉米、普拉提亚、密卡尔以及西西里这四次战役〔他的意思是 Himera 战役传奇性地与萨拉米战役发生在同一天〕都同样是天下最为辉煌的胜利，然而，即使把它们加起来，也永远无法与国王列奥尼达和他的勇士们在温泉关所获得的荣誉相比！[1]

249

显然，这是一段相当敏锐的评述。尽管温泉关战役在事实上是失败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普通的角度来看待成败的话，它实际上是获得了胜利。

蒙田的同胞费内龙(Fénelon)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把列奥尼达——他唯一使用过的斯巴达人——作为《死者的对话》(*Dialogues des Morts*)中的一个角色。他写作这部作品的想法和题目基本上都是从卢奇安(他富于想象力地表现历史人物的对话，既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也具有历史的可能性)那儿借来的。然而，这个让斯巴达国王与波斯国王薛西斯进行对话的想法，更确切地说是来自希罗多德(甚至严格地来说，与薛西斯对话的人应该是希罗多德笔下的戴玛拉托斯，但他当时流亡在外，已经不再是国王了)。像布坎南(Buchanan)一样，费内龙把列奥尼达描绘成一位与薛西斯截然不同的真正的国王，而且完全是用一种斯巴达人的口吻来描写他：

249

> 如果我在生活中努力、稳重且兢兢业业，就像我的人民那样的话，我就可以行使我的王权。我是国王，完全是因为我保护了我的祖

〔1〕 M. de Montaigne, 'On the Cannibals', in Essays, ed. M. A. Screech, *The Complete Essays*, Harmondsworth 1993, p. 238.

国并确保了一切都按法律行事。我的王位给了我做好事的权力，而绝不允许我利用它去行恶。[1]

薛西斯，唉，则很不幸地被费内龙简单地刻画成了一位拥有“太多权力和财富”的国王，用费内龙的话说，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他“本来应该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尊贵的人”。

不久以后，即在17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列奥尼达捍卫自由的英勇壮举横渡英吉利海峡出现在了英国的文化舞台上，他的英雄事迹受到了高度的赞美并开始广泛流传。有人以摄政王波塞尼亚斯的名字创作了一部不太出名的戏剧，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把列奥尼达的奋不顾身，与波塞尼亚斯令人遗憾地热衷于派系斗争的行为进行了对比，普赛尔曾经为这部戏剧谱写过配乐（1696年）。在理查德·格罗弗（Richard Glover）创作的诗歌《列奥尼达》（*Leonidas*）中，列奥尼达的功绩受到了应有的赞颂，而且在实际上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首著名的诗歌在公元前1737年正式出版，是列奥尼达的事迹成为神话的过程中的一个高峰。格罗弗的列奥尼达是一位彻底的爱国者、一位受到民众爱戴且珍视自由的勇士，并且他在生活上朴素、节制，这一点与骄奢淫逸的波斯人形成了根本上的反差，波斯人在“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国王”——薛西斯的统治下正变得萎靡不振。 250

这部内容包罗万象的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开始了一个新的神话的建构过程，这个神话从格罗弗手下的一个文学范例演变成了一个赞成或反对革命的战斗口号。这个神话以传统的形式融汇进了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2]创办的拉格比（Rugby）公学的教育改革当中，然后在20世纪由科·翰（Kurt Hahn）创办的高登斯顿学校

[1] Fénelon, *Dialogue* XL, quoted from Rawson 1969/1991:220（引文为作者个人翻译）。

[2] 19世纪以后，英国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其中以阿诺德在拉格比公学的改革最为成功，他在改革中明确指出，学校要培养“虔诚的基督勇士”（Christian manliness）。他创立了“竞技运动自治”制度，以充分发挥竞技运动的锻炼价值和教育功能。——译注

(Gordonstoun School)[1]的教育训练中得到了延续，这种传统竟然成为了后来的人们认同英国或者说是英国的政治和文化的最好的载体之一。传说中的古典范例在18世纪本是人们想象中的完美事物，就这样变成了整个古典传统中最重要的核心。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实例，可以用来说明人们对“古典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即古代的希腊罗马)的接受其250 实是一直在不断变化的，而这个“古典古代”从文艺复兴开始就在欧洲文化的很多方面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

然而，对温泉关战役的狂热崇拜并不为英格兰文化所特有。18世纪末期爆发的民族主义战争，与当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爱好希腊文化这种潮流汇聚在一起，为欧洲历史上所谓的“列奥尼达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对这种文化现象所作的最为了不起的艺术表现是雅克-路易斯·达维特(Jacques-Louis Davids)[2]创作的一幅油画——《列奥尼达在温泉关》，这幅画最先是在1814年展出的，但他为此所作的准备却花费了很多年的时间。拿破仑显然并不了解或没有理会蒙田曾经说过的关于温泉关战役的话，当他跑去参观这幅油画的时候，他问道，为什么达维特要劳神费力地描绘这次失败的战役呢？后来的观众当中，多数并不赞同拿破仑的这种肤浅的看法，反而都会认为他们去卢浮宫参观这幅油画是值得的。

画面的前景由一群戴着头盔的战士和裸体的年轻人占据着，他们摆出各种各样的姿态，构图和人物安排在整体上显得非常的工整和对称。在他们的右后方，号兵们吹出了告警的号声，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在左边，一群戴着头盔并披挂着斯巴达样式的红色披风的战士们，正向另一个与他们同样着装的战士挥动着花冠，这个人看上

---

〔1〕 1934年，德国人科·翰和其他人创办了高登斯顿学校，训练年轻海员在海上的生存能力和船触礁后的生存技巧，这些培训课程明显提高了海员的生存率。——译注

〔2〕 雅克-路易斯·达维特(Jacques-Louis David)是法国新古典主义运动的先驱，其画风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的影响。18世纪80年代凭系列组画获得了名誉。——译注

去正用他的剑柄在岩石上刻上几行文字(实际上是西摩尼得斯的那首短诗"去,请告诉斯巴达……",只是被翻译成了法文并作了稍微的修改)。画面的中心,也就这幅油画的中心人物无疑是列奥尼达了。他同样被描画成英勇的形象,全身裸体,披风的一角挂在他的左肩上,其余部分被压在身体下面,脚上穿着一双凉鞋,头上戴着一顶装饰着羽毛的精制的头盔。他的盾牌用带子系在左手臂上,就像身后的一个靠背。他的左手握着一把长矛,右手紧紧地提着一把利剑,剑鞘带着点挑逗性地遮盖住了关键的部位,它同时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如今的通俗小报或许会认为这是男子气概的表现。达维特是同性恋,观众首先会注意列奥尼达的男性特征,然后目光会被吸引到靠近画面的右边,一个有着光亮、结实的屁股的年轻人正在欢呼雀跃,这些显然都不是偶然的。达维特认为这幅画是他的杰作,他在自己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不无委婉地问身边的人:"我想你一定知道,除了我达维特之外还有谁能画出真正的列奥尼达呢?"

这幅画尽管非常的了不起,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希腊人民此时也正在努力恢复他们过去的文化遗产。康士坦丁诺斯·里加斯(Constantinos Rhigas)创作的《爱国主义颂歌》(*Patriotic Hymn*, 1789 年)就是这股潮流在早期的证明,它是作者受到《马赛曲》的启发后创作出来的,其中一段内容歌颂列奥尼达的精神,令人激动:

> 起来吧,希腊的儿女们!
> ……
> 想想以前的首领和圣人的英勇吧,
> 看,眼前就是生死的关头!
> 啊,昔日的希腊人,
> 为了生存,再次出发吧!
> ……
> 斯巴达、斯巴达,为什么不见动静,

斯巴达人

为什么还躲在那里昏睡?

觉醒吧,与以前的盟友——雅典——联合起来!

召回英雄的列奥尼达,

这位古代的首领,

他将把你们从衰败中拯救出来,

他是令人生畏的人! 他是强有力的人![1]

252

拜伦(Byron)[2]在热爱希腊文化的人当中是最为出名的,他也在1812年创作的诗歌——《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中仿写过这首诗,以此来鼓励希腊人民。[3]

几年之后,甘迪(J. M. Gandy),他是崇尚古典风格的建筑师——约翰·索恩爵士(Sir John Soane)的追随者,构思了一座"波斯人走廊和拉西代梦人的议事厅",这是对公元前5世纪的斯巴达的唯一一种规模较大的纪念性建筑——波斯人走廊或柱廊的二维"重建",意义非同一般,这种建筑大约是在公元前5世纪70年代修建的。不用说,甘迪的想象力远远

[1] 这首诗由拜伦翻译成英文。——译注

[2] 拜伦,英国的诗人(1788—1824)。——译注

[3] 拜伦的诗节选如下:

美丽的希腊! 使人伤心的光荣残迹,

逝去了,但是不朽,伟大,虽已沉陷!

有谁来领导你一盘散沙似的后裔,

起来挣脱那久已习惯了的绍绊?

在过去,你的儿子却并不是这般,

他们是视死如归的勇敢的军人,

把守温泉关,不怕尸体堆积如山,

啊! 有谁能够恢复那英勇的精神,

在幼洛他斯河畔崛起,把你从坟墓里唤醒!

(引自拜伦:《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杨熙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幼洛他斯河"应该就是指伯罗奔尼撒南部的欧罗达河)。——译注

超过了古代斯巴达人的实践和创造能力，但是，这件事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位英国建筑界的领袖人物，在一个新古典主义特别具有影响力和创造力的时期，竟然会选择去把自己的想象力挥霍在古代斯巴达毫无生气的建筑遗址上。

1821 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这次战争也引发了一股爱国主义文学潮流，列奥尼达一直都是这股文学潮流的中心。马科斯·波查里斯（Marcos Botzaris）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英勇、冷静，并且也是在以寡敌众的情况下壮烈牺牲，他的英勇事迹激励着拜伦把他描绘成一个当代的列奥尼达。这股文学浪潮在麦克·皮撒（Michel Pichat）的浪漫古典悲剧《列奥尼达》（1825 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部悲剧在列奥尼达说出了一个动人的预言的时候达到了高潮，预言提及了人们对斯巴达的记忆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更有名也更令人难忘的是拜伦的长诗《唐璜》中的一些句子，它们选自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诗歌：《希腊群岛》（*the isles of greece*），在这首诗里一个来自英国的贵族假扮成四处游历的诗人，用“希腊也许仍然是自由的”梦来娱乐着他的希腊听众们。下面引用的段落特别提到了斯巴达和列奥尼达领导的三百勇士：

253

缅怀往昔，只流泪，只羞惭？
我们的祖先却热血喷流！
大地啊！从你怀抱里
送还斯巴达英雄好汉的零头吧！
三百个勇士给三个就够了，
去重演一次温泉关战斗！[1]

---

[1] Lord Byron, *Don Juan*, Canto.

然而，在一个消除谬误并让人省悟的世纪之后，上个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康斯坦丁·卡瓦菲(Constantine Cavafy)还在告诫人们要吸取历史的教训，纠正过去的错误做法：

> 荣誉属于那些人，他们在自己的一生中，
> 守卫着一个温泉关……
> 即使是更多的荣誉也应归于他们，
> 他们预知(就像很多人所预知的那样)
> 厄菲阿尔特(Ephialtes)在最后将会出现，
> 总之，米底人(Medes)将突破防线！[1]

那些对诸如美地亚人正在侵入，或斯巴达和斯巴达的形象被纳粹德国在二战前和二战中被扭曲使用的说法不感兴趣的人，宁愿把他们的心思转移到从斯巴达卫城的剧场下挖掘出来的一座精美的、灰白色的大理石人像上去，这只是一位裸体战士的身体躯干，是由雅典的英国考古学校的一些成员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发掘出来的。这座雕像出土后立刻就被称为"列奥尼达"，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但却是错误的。之所以错误，原因在于这座雕像最初其实是一组雕像中的一部分，它并不是独立的，而且这组雕像很可能还只是一座神殿的三角墙的附加物，因此，它代表的可能是一个英雄或神而不是一个终有一死的凡人。(像列奥尼达这样被认为是宙斯的半人半神的儿子——赫拉克勒斯——的子孙的人，甚至连资格都没有。)另外，这座被挖掘出来的雕像，很有可能在公元前 480 年之前而不是在之后就存在了，说实在的，这尽管也只是一种主观的意见。总之，无论是哪种情况，这样一座我们今天所谓的人物雕像，在这么早的时间里，在希腊

[1] 这些诗句选自康斯坦丁·卡瓦菲的诗歌《温泉关》，英文由埃德蒙·基利(Edmund Keeley)和菲利普·谢拉德(Philip Sherrard)翻译。——原注；"美地亚人"("米底人")在这里就是指波斯人，诗人在这里用它喻指野蛮的、侵犯文明世界的敌人。——译注

任何一地方都是不太可能单独出现的，即使是在相当“个人主义”的雅典也不会如此，更不用说遵从团体利益、信奉“社团主义”的斯巴达了。

然而，现在矗立在斯巴达和温泉关战役遗址上的各种现代雕像，正是以这座被称作“列奥尼达”的雕像为基础的。当新大陆上的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镇，它也叫斯巴达，竖立起这座雕像的一件复制品的时候，就其本身而言多少会给我们带来不少感触和启发，在美国据说有上百个小镇都叫斯巴达。这座公共雕像在各个方面都已经相当的美国化了，人像手握的盾牌上刻绘着一个倒写的字母“S”，显然这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古代的斯巴达战士在战斗中会称呼自己为“拉西代梦人”，而不是“斯巴达人”，因此，他们就把希腊字母“Λ”（lambda，像一个倒写的英文字母“V”）[1]而不是“Σ”（Sigma，字形与英文字母“S”相似）[2]印在盾牌上作为他们独具一格的标志。 254

总的来说，在大众传媒的时代，列奥尼达在很大程度上还仍然是一个传奇。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有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电影就叫《斯巴达三百勇士》，从而使他展现出巨星风采，而且，即使是在今天，他还受到好莱坞的关注，或许是因为这座雕像带来的运气吧，据说乔治·克鲁尼和布鲁斯·威利斯正在准备不计成本地拍摄一部关于温泉关的电影，剧本改编自史蒂文·普雷斯菲尔德的热卖小说——《火之门》（1998 年）。在亚马逊网站上专门用来登载读者阅读这部小说的读后感的长长的网页，本身就是“斯巴达神话”在西方的最新体现。

列奥尼达万岁！因为有了他，斯巴达也将万古长存！

---

〔1〕希腊字母表的第 11 个字母，读音接近汉语发音的“拉姆达”。——译注

〔2〕希腊字母表的第 18 个字母，读音接近汉语发音的“西格马”。——译注

附　　录

斯巴达人的狩猎方式[1]

与以往相比，如今大学里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古典学，或者是开设了或多或少的非语言学的古典文化或古典学研究的课程。现在似乎有更多的人想要去学习古代语言。然而，古典学并没有被正式地包括在英国政府为公立学校所设置的全国性的必修课程当中；这样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进入大学之前，学生对各种古代语言的学习反而越来越少了。因此，一直以来开设这样一个科目都是有必要的，这类似一个大使的工作，为大学和中学之间以及大学和更广泛的普通公众之间建立起了连接的桥梁。这就是法国人相当优雅地根据词源学的原则所称呼的“高深学术问题的普及化”(haute vulgarization)，用我们更为平淡的英语来说是“通俗化”(popularization)。我想强调的是，在我看来这并非一种“粗俗化”的过

[1] 2000年12月15日，我在哈佛大学的“詹姆士·洛布讲座”(James Loeb lecture)上作了名为“为古希腊的幽灵献血：追猎一个新的过去”(Blood for the Ancient Greek Ghosts: Hunting for a New Past)的演讲，这篇新的附录就是以这次演讲的演讲稿为基础改写的。感谢哈佛大学对我的盛情邀请，我特别要感谢哈佛大学古典学院的初级教员们，尤其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尼诺(Nino Luraghi)，以及友善的主持人格洛里亚·费拉里·平尼教授(Professor Gloria Ferrari Pinney)，她与我在学术上意气相投。

程，而是人们已经明白：有必要让我们西方文明的根源，或主要的根源之一更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从而使今天对文化只能保持三分钟注意力的人们认识到，在文化的意义上我们究竟来自哪里是多么的重要。

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就是德国伟大的古希腊学者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曾经说过的向古代的“幽灵献血”。不过，如果继续用这个双关语的话，我想说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放血。我认为从广义上看，现今应该继续研究古代希腊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它们与我们如此相似，在许多基本的文化方面它们是我们名副其实的真正的祖先；其次，却是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他们与我们相比在最为基本的方面又是如此不同。例如，他们直接参与式的民主制度并不是我们现在相对而言的非暴力的代议制民主；他们的戏剧和运动会之所以被发明并不断地被表演和举办，都是在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宗教背景下产生的。通常情况下，基于批判性的、学术性的和史学转向的原因，我更愿意强调古希腊人与我们之间的差异。尤其当希腊人被一些人称作我们的祖先，而目的却是为了给一些现在正流行的、有争议的活动和消遣寻找合法性的理由，或罩上一个讨人喜欢的伪装的时候，我更会选择坚持这样的做法。这就是为什么狩猎这个热门的政治话题会在这里得到讨论的原因。不知何故，维拉莫维茨的类比似乎特别适合于研究古希腊和斯巴达人的狩猎。 256

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写过一本很有趣的书——《波波族的天堂：新兴上层阶级及其由来》(*Bobos in Paradise: 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 2000年)，他在书中这样评论上世纪50年代：“这是社会能接受饮用烈性酒的最后一个伟大时代，也是不把猎狐和马球当成是老古董的时代。”不幸的是，我认为我所在的乡村地区，这些活动看来仍然还不够古董。虽然苏格兰已经立法禁止了，但在英格兰的许多郡中带着猎犬进行猎狐仍然还很活跃，尽管在当地也受有到法律制裁的威胁，任何一种严格的限制或全面的禁止大都是基于各种伦理道德的理由。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是我在剑桥大学卡莱尔学

院的一位校友，如果他能够再多活30年的话，想必一定会很高兴地看到他的一部轻松的历史小说在最近再版之后的销量会如此之好，这本书叫《一个猎狐人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Fox-Hunting Man*，初版是在1928年)。另一方面，最近有人出书呼吁重新恢复神话中的猎杀卡莱敦野猪(Calydonian Boar Hunt)的活动，这本书名为《以野猪的形式》(*In the Shape of a Boar*，2000年出版)，作者是曾接受过古典学教育的小说家劳伦斯·诺福克(Lawrence Norfolk)，他至少还部分地关注过这种更优雅、更现代的狩猎形式在当前的政治影响力，这种狩猎活动据说是由萨松的那本《回忆录》激发起来的。

257

1998年，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的一本只有161页的小册子《论狩猎》(*On Hunting*)正是在这种激烈的公开的政治讨论的大气候下出版的。这一书名其实是现存的著作对色诺芬(公元前4世纪)和阿利安[1](公元2世纪)的著作的一种致敬，学者马尔科姆·威尔科克(Malcolm Willcock)最近将他们的论述编辑整理后进行出版，这是很有用的一本书，他这样做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斯克拉顿的《论狩猎》一书前言是这样开头的：

> 带着猎犬进行狩猎是一种既需要耐力又需要方法的技艺(craft)。它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了，同时，色诺芬对这个话题的论述证明了古希腊的猎人使用的技巧与今天的猎人是多么的相似。在对待猎犬、狩猎的追随者们以及乡村的态度上古今都是相似的。然而，不相似的就是猎物了……

人们能够明白为何斯克拉顿想要回到古希腊，去援引那个时代的文化权威们曾经说过的话，当他最喜爱的运动和消遣正面临着来自政府的

[1] 阿利安(Arrian，公元86—160)，希腊史学家，代表作为《亚历山大远征记》。——译注

法律威胁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我与他分享着这样的怀旧之情：返回到古希腊的世界中去。我自己在阅读希腊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最美好的经历来自《奥德赛》的第 17 卷，在这一卷里奥德赛衣衫褴褛，乔装成乞丐返回他在伊萨卡岛的宫殿，到此时他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二十年了，他看到了年老的猎犬阿尔哥斯(Argos)浑身污秽不堪，受着虱蝇折磨，没人搭理地躺在厨房的垃圾上。主人和猎犬都认出了对方，尽管他们彼此的外表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条老狗挣扎着想要靠近主人，这种举动包含了太多的意味，沃尔特·施瑞英(Walter Shewring)对这一情景的翻译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当二十年之后，它又一次见到主人的时候，死黑的命运突然降临到了它的身上”。二十年以前，阿尔哥斯的生活条件在很多方面肯定与现在大不一样。那个时候，正如猪倌欧迈俄斯(Eumaeus)所说的，“没有什么躲在灌木丛中的野兽能够逃脱它的追捕。它在跟踪猎物的时候几乎没有失手过！”那些猎物包括了野山羊、鹿以及野兔。

然而，事实真的就像斯克拉顿所说的那样，现代的英国人与古代的希腊人在狩猎的时候只有这猎物发生了变化吗？而且，狩猎的技巧也没有多少不同，希腊人和现代英国人对狩猎的态度也是“相似”的，事实真是如此吗？如此宽泛、殷切地谈论“古代希腊人”对待狩猎的态度，真的可能或有用吗？在这一附录后面的内容里，我将联系古代的斯巴达人来依次地讨论上述与狩猎有关的三个方面：猎物、态度以及狩猎群体的认同感。　258

我想读者不需要太丰富的想象力就能理解今天的人们举着火枪在北美猎鹿，或者在地中海的一些乡村打候鸟，与斯克拉顿专门要谈的骑着马带着狗去猎狐这样的狩猎方式之间有着多么巨大的不同。同样，尽管斯克拉顿认为在狩猎技巧上古今有着“相似的地方”，但骑在马背上去猎狐在实际上也与所有古代希腊人狩猎时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古希腊人在到达狩猎地点后都是要赤脚的。即使希腊的猎人们是骑着马前往狩猎地点，但在实际狩猎的时候，他们就会下马，并且光着脚去追捕猎物。

事实上，在技巧与猎物上最具有类似性的两种狩猎活动是古代的猎

兔(hare-hunting)和现代猎人所称的“比格领”(beagling,以一种叫比格的猎犬的名字命名)[1]。但是,“比格领”不是一种非常有魅力的现代“运动”或消遣活动,而且,很难想象斯克拉顿会为了它就像为了猎狐那样而愤愤不平,同时又用一种充满诗意的方式去捍卫这种运动,更确切地说是为它作正面的辩护。此外,在古希腊的大部分猎兔活动中,至少有一个目的与我们今天的观念和实践是不完全一致的,可是它之于古希腊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又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兔子是一种独特的用于爱人之间的赠物,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成年男性与少年男性之间的情色关系的证明,大多数现代的法律体系都会基于道德的立场认定这种关系是对儿童的侵害,因而是非法的。在我们更加具体地讨论如何对待狩猎的态度时,我们还会回到古代希腊人的狩猎是否具有性爱意味这个话题上来。但是,现在结束我们对猎物的讨论,让我们再进一步考虑存在于古希腊人与现代英国人或美国人的狩猎活动之间的两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吧:猎野猪(boar-hunting)和猎人(man-hunting)。

259

斯克拉顿本人提到过猎杀野猪,色诺芬在他的论述中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谈论这项狩猎活动。斯克拉顿没有提及的是,尽管一些狩猎爱好者在努力尝试一种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现代的狩猎方式(a sociology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of modern hunting),古代希腊人猎杀野猪并不像现代英国人猎狐,因为在希腊人看来狩猎在最具体的意义上是对勇气的一种考验,这是一种对希腊重甲步兵在阵地战中所需要的男子气概的再合适不过的考验了。严格地说来,猎杀野猪具有一种够格仪式(rite of passage)上的象征意义,同样,在所有城邦,除了斯巴达之外,它也是社会名流的身份的一种象征。斯克拉顿热切地——有点过于热切——强调他理解的猎狐活动所具有的大众的、跨阶级的品质。但是没有几个希腊人能够骑着马带着装备去猎杀野猪,同时,他们也不会带着奴仆——这是斯

[1] 这是一种携小猎狗步行追猎的狩猎方式。——译注

克拉顿另一个不诚实或无知的体现——去拍打树丛、草丛等以惊起猎物，支起捕猎的网，做马夫以及其他必不可少的后勤工作。只有在斯巴达，因为它拥有大量的希洛人，而且一直就重视狩猎这项活动作为一种全体性的军事训练所具有的价值，即使普通的市民也会参与这种高危险性的"消遣"活动。但是，斯克拉顿是否愿意把斯巴达挑选出来当作为他的狩猎社会的古代范例是值得怀疑的。

提到奴仆就引起了"猎人"(manhunting)问题。在像古代雅典这样的一个奴隶社会里，个人试图抵抗被奴役的命运的最典型方式就是逃跑。历史记载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发生在雅典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当时，如果修昔底德的记述属实的话，斯巴达在占领了雅典部分领土之后，"至少有两次，一万多名奴隶"在斯巴达的掩护下逃跑了。通常情况下，是一个、两个或零零星星的几个奴隶逃跑。但是，如此有规律的、持久的奴隶逃跑导致了一种专业的奴隶追捕者(*drapetagôgos*, slave-catcher)的出现。他——以及他的狗——无疑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行业。古希腊另一个非常不同的奴隶社会是斯巴达，在稍后我们将会重新讨论雅典和斯巴达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眼下，引人注目的是"猎人"成为了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奴隶阶层——同样也是希腊人的希洛人——之间的一种日常关系的系统组成部分。希洛人——追捕——希洛人——挑选——这个程序在斯巴达，就像雅典出现大规模的奴隶奔逃时那样，是一种社会系统功能紊乱的征兆。确切地说，这其实是一种"常态"事件，因为斯巴达人每年都要向希洛人正式宣战，在这种合法的外表下，"猎人"就是斯巴达人用来对付希洛人的一系列镇压手段中的一种。当时，在斯巴达，追捕和战争在实际上都是团体性的活动，并带上了斯巴达人特有的差异或扭曲。

差异在古代和现代社会之间以及在古代希腊内部之间都存在，相对于社会结构的差异性来说，猎物的差异就具有了相当令人不安的含义，因此，我将把注意力转向本质上的差异，即狩猎的隐喻性方面(metaphorical

260

aspects)。"狩猎"这个术语现在进入了我们日常的英语词汇当中并变得毫无威胁,这似乎已经是一种老生常谈了。例如,我们学术意义上的"狩猎"指的是图书馆的一种参考文献的做法,其实是一门课程。也就是说,狩猎已经存在于很多的社会层面以及语义的表达当中,并渗透进了我们每天使用的英语词汇里。在古希腊也是如此。阿兰·施纳普(Alain Schnapp)关于古希腊狩猎的文本和图像的精彩专著的第三章,也是第一个独立的章节,准确的标题就是"狩猎的隐喻"(*La mêtaphore du chasseur*)。

然而,在狩猎的隐喻性目标上(metaphors ends),古代和现代确实存在一些有用的或可用的相似性。施纳普的著作的标题是《狩猎与城邦》(*Le chasseur et la cité*),他指出古希腊的狩猎活动作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或经济现象,只有在包罗一切的城邦的范围之内,它才有存在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政治性的,这是现代的狩猎活动不可能具有的。此外,这部专著的副标题是"古希腊的狩猎与色情"(*Chasse et érotique dans la Grèce ancienne*)。无疑,异国风味和情爱冲动已经而且将会在现代的狩猎情景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艾德里安·菲利浦斯(Adrian Phillips)在他关于色诺芬的有趣评论中说,"一些(狩猎)甚至会从脑中驱逐'爱的念头'"。但是,关键在于性爱和情色是不能直接被看作整个现代狩猎活动的目标,或者说是一个主要的目标。

261

这种关键的差别使我们回到了正确的阐释路径上来了,我想,这种路径强调我们与他们之间、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差异。就是说,今天的猎狐是绝不会像斯克拉顿想要说服我们相信的那样是"自然的"或质朴的;可以这么说,它即使分离成为第二自然或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还相差太远。实际上,在古代希腊甚至连关于人权(更不用说动物的权利)的概念都还没有发展出来,回想一下这一点对于理解古希腊的狩猎是有益的。

这促使我要谈一谈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话题:斯克拉顿求助的古希

腊祖先或权威，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希腊人？古代的希腊人自己十分清楚他们绝不是完全相同的文化，他们大部分都承认他们相互之间的相同之处要多于差异，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斯巴达人。斯巴达人自己是古代传统的培育者之一，但这种传统又主要是由雅典人加以促进和发扬的，即使是在这种传统中，斯巴达也是一个“他者”，它与其他所有的希腊城邦和社会在最基本的社会方式上存在着关键性的差异。对斯巴达“幻景”或“神话”的宣传已经促使一些现代学者竟然宣称斯巴达在希腊世界里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是我们要警惕的观点。无论是以哪种理由——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宗教的等等，我都不赞同这种观点，而且不只是基于一个与我们讨论的狩猎话题直接相关的理由。我想说的是，斯巴达人狩猎与任何其他同时代的希腊城邦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认为这绝不是一种纯粹虚构的观点，而是一种值得再一次简要地说明一下它的基本情况的观点，正好可以用来证明任何现代人请古代希腊人来作权威的做法在事实上是多么地成问题。

斯巴达人的政治体系（*politeia*）的中心是“公餐制”，正式的斯巴达公民就是在持续参加这种活动的过程中行使自己的“公民权”的。只有两种情况是法律允许的个人不必参加本来是必须参加的晚餐：第一，是举办必须的献祭活动；第二，就是狩猎。斯巴达人狩猎的对象与其他希腊城邦，　262 如雅典是一样的：鹿、野猪等等。但与雅典不同的是，在斯巴达狩猎不能被描述成一种休闲活动——这是无法想象的，更不用说是一种运动了。据我们所知，捕猎的收获也不会成为斯巴达的情人或追求者为求爱而作为送给他的少年情人的礼物。更正确地说，斯巴达人猎杀野兽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活动，所得的收获通常都要献给公餐食堂。

无论如何，斯巴达人与雅典人在狩猎方面更为明显的不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斯巴达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在官方政策上鼓励所有的斯巴达人，无论他们处于什么样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地位都要定期去参加狩猎，表面上这是出于军事训练的目的。因此，马匹和猎犬——它们

是归私人所有的——以及希洛人——这些人不归私人所有，但被强制性地要求为个体的斯巴达主人和女主人服务，这些配置和人员在任何斯巴达人想要去打猎的时候随时都要准备好。实际上，普通的、比较穷262困的斯巴达人都能从这种官方的要求中得到好处，他们参加狩猎部分是出于军事的原因，但也是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能够为自己所在的公餐食堂提供额外的美味食物，从而维系他们与比较富裕的斯巴达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富人们为公餐食堂提供了比这些穷人的份额更大的农产品。

此外，斯巴达人会为自己能够饲养马匹、狗——也许还有希洛人——这些在狩猎时具有很高价值的“帮手”或人员而感到非常自豪，并且会为此而投入巨大的精力。在泰格特斯山的山脚有一片广阔的土地，它与斯巴达相距不远，有一个平淡无奇的名字：铁瑞（Therai），此地就是斯巴达人的狩猎场。在整个公元前 6 世纪，拉科尼亚的黑色人像花瓶的绘画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些图像是由那些狩猎画家（Hunt Painter）[1]绘制而成的。比如说，“人像 9 号”，这是狩猎画家创作的一个花瓶的名字，展示了一种从独特的视角对狩猎场景的描画。图画的重点放在猎人之间出于直觉的相互合作上，这种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其中一个人蓄着络腮胡子且留着长发，他显然是一个已经成年的男子，另外一个也是长发，但却没有络腮胡子，他可能是正在向那位年长的导师学习如何使用绳索捆绑动物。263在图 10 中描绘了一幅典型的重甲步兵像，他正与自己的“阿尔哥斯”，一条忠诚的猎犬呆在一起。图 11 是一个年代相当早的赤土陶器，上面有浮雕加以装饰，这个器物在当时是被当作一个墓穴标识器（grave-marker）或墓碑加以使用的。在这个瓶的一面再现了一幅成功的狩猎情景，这正是那种一个优秀的斯巴达人想要携带着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图像。最后，不管怎样，模仿性的狩猎肯定会集中地用来再现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

[1] 从形式上说，不可能绝对地断定“狩猎画家”的绘画是以斯巴达人的日常生活情景，而不是以猎杀卡莱敦野猪或其他神话中的猎杀野猪为主题，我想阿兰·施纳普对前一种阐释已经作了非常令人信服并具有结论性的讨论。

再度复苏的“够格者”训练——这种斯巴达人的综合性的教育体系。但是，它可能已经包含在古典时期的“够格者”训练当中，因为这一整套训练当中最为重要的仪式是在阿耳忒弥斯—欧西亚的神殿里举行的，这位女神掌管着繁殖、生育和野外，因此与猎杀野外动物的活动有着紧密联系。

然而，在猎杀动物的过程中开展正式的政治教育，并不是斯巴达人用尽一切方法和手段去开展的狩猎活动的最值得注意的特色。它无疑是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斯巴达人对希洛人开展的个体性的和集体性的猎捕。这种获得官方授权的活动，既可以作为一种让希洛人时时陷入惊恐的方式，同时，它也可以用来考验那些被挑选进“特别行动队”的未成年斯巴达人的男子气概。我想，这种在国家支持下进行的猎捕希洛人的活动，最能说明亚里士多德对斯巴达人的独一无二的教育体系所作的严厉批判。他说斯巴达人的这种教育是有系统性缺陷的，这种教育的目标只追求一种美德——战斗中的勇气，所以，只能培养出“野兽般”的、具体来说就是像狼一样的斯巴达人！

众所周知，狼是技巧高超的猎人和杀手。斯巴达人称阿波罗（另一个称号叫阿波罗・勒科乌斯，Apollo Lyceius）[1]像“狼似的”，而吕库古（Lycurgus，即“狼工”，Wolf-Worker）这位被人们认为是斯巴达的教育体系的建立者的名字可能正是对阿波罗的那个称号的模仿，阿波罗是某种活动（狩猎）的庇护神，斯克拉顿大概是不想搬他来为自己喜欢的消遣活动作合法辩护的。

---

[1] 勒科乌斯，“Lyceius”的词根是希腊语的“Lycos”，也就是“狼”的意思。——译注

延伸阅读

完整的书名请参见本书“附录”的“参考书目”部分

i. Books and Articles on Sparta

Cartledge 1987, 2001a, 2001b; Cartledge & Spawforth 2001; Chrimnes1949/1999; Den Boer 1954; Finley 1968/1981; Fitzhardinge 1980; Forrest 1968; Hodkinson 1983, 1986, 1989, 1996, 1997b, 1999b, 2000; Hodkinson & Powell eds. 1989; Hooker 1980; Huxley 1962; Jones 1967; Malkin 1994; Oliva 1971; Poralla & Bradford 1985/1913; Powell ed. 1989; Powell & Hodkinson eds 1994.

ii. Literary Sources [see also ch. 9]

Boedeker & Sider eds. 2001; David 1982/3; Campbell ed. 1991; Marincola ed. 1996; Moore 1983; Shipley 1997; Starr 1965/1979; Strassler ed. 1996; Talbert ed. 1988; West ed. 1993.

iii. Spartan Archaeology

Boardman 1963; Cartledge 1976a; Cavanagh et al. 1996, 2003; Cavanagh & Walker eds 1998; Congdon 1981; Dawkins ed. 1929;

Dickins 1908; Fitzhardinge1980; Hodkinson 1998; Pipili 1987; Powell 1989; Steinhauer 1978.

iv. Spartan Politics

Adcock & Mosley 1975; Andrewes 1956; Bonner & Smith 1942; Cartledge 1976b, 1978, 1980; David 1985; Herman 1987; Jeffery 1961/1990,1976; MacDowell1986; de Ste. Croix 1972; Staveley 1972.

v. Spartan Society (incl. Helots)

Bryant 1996; Cartledge 1981a, 1985,1992; David 1989a, 1989b, 1992,1993; Dickins 1929; Ducat 1999; Figueira 1984; Garlan 1988; Garland 1995; van Gennep 1960/1909; Golden 1998; Hodkinson 1996, 1997a, 1997b, 1999a; Hunt 1998; Kennell 1995; Oliva 1971; Pettersson 1992; de Ste. Croix 1981; Scanlon 1988; Vernant 1991; Vidal-Naquet 1968,1986a, 1986b.

vi. Spartan Warfare

Adcock 1957; Cartledge 1977,1996; Ferguson 1918; Hanson 1989, ed. 1991; Lazenby 1985.

vii. Historical Novels

Pressfield 1998; Manfredi 2002/1988.

Chapter 1

Andrewes 1956; de Polignac 1995; Svenbro 1993.

Chapter 2

Cawkwell 1993.

Chapter 3

Lazenby 1985.

Chapter 4

de Ste. Croix 1972: esp. ch. 4.

Chapter 5

Bradford 1986; Bruit & Schmitt 1992; Calame 1997; Cartledge 1981b; Congdon 1981; Kunstler 1983,1987; Lacey 1968/1980; Parker 1989; Pettersson 1992; Pomeroy 1976,1997,2002, ed. 1991; Stewart 1997; Zweig 1993.

270

Chapter 6

de Ste. Croix 1972.

Chapter 7

Cartledge 1987/2000; Hodkinson 1996.

Chapter 8

Hodkinson 1996.

Chapter 9

Cartledge & Spawforth 1989/2001.

Chapter 10

Cartledge 1999; Finley 1962; Jenkyns 1980; Oilier 1933 - 43/1973. ; Rawson1969/1991; Tigerstedt 1965 - 78; Turner 1981.

Appendix

Anderson 1985; Barringer 2000; Cartledge & Waterfield 1997 [the Xenophontic treatise On Hunting]; David 1993; Lane Fox 1996; Norfolk 2000; Parisinou 2002; Phillips & Willcock 1999; Scanlon 1988, 2002; Schnapp 1997.

参考书目

ADCOCK, EE. (1957) *The Greek and Macedonian Art of War*, California & London

ADCOCK, EE. & D. J-MOSLEY (1975) *Diplomacy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ANDERSON, J. K. (1985) *Hunt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Berkeley

ANDREWES, A. (1956) *The Greek Tyrants*, London

BARRINGER, J. M. (2001) *The Hunt in Ancient Greece*, Baltimore & London

BOARDMAN, J. (1963) 'Artemis Orthia and Chronology', *ABSA* 58: 1 – 7

BOEDEKER, D. & SIDER, D. (2001) eds. *The New Simonides: Contexts of Praise and Desire*, Oxford

BONNER, R. J. & G. SMITH (1942)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Sparta', *Classical Philology* 37:113 – 29

BRADFORD, A. S. (1977) *A Prosopography of Lacedaemonians from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323 B. C., *to the sack of Sparta by Alaric*, Munich

BRADFORD, A. S. (1986) 'Gynaikokratoumenoi: did Spartan women

rule Spartan men?', *The Ancient World* 14:13 - 18

BRUIT-ZAIDMAN, L. & P. SCHMITT-PANTEL (1992) *Religion in the Ancient Greek City*, ed. and trans. P. A. Cartledge, Cambridge

BRYANT, J. M. (1996) *Moral Codes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Ancient Greece. A Sociology of Greek Ethics from Homer to the Epicureans and Stoics*, Albany, N. Y.

CAMPBELL, D. A. (1991) ed. *Greek Lyric* vol. III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CALAME, C. (1997) *Choruses of Young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Their Morphology, Religious Role, and Social Functions* (Lanharn, MD & London 1997)

CARTLEDGE, P. AI (1976a) '*Did Spartan citizens ever practise a manual tekbne?* ', *Liverpool Classical Monthly* 1:115 - 19

CARTLEDGE, P. A. (1976b) 'The new Spartan treaty', *LCM* 1:87 - 92

CARTLEDGE, P. A. (1977) 'Hoplites and Heroes: Sparta's contribution to the technique of ancient warfare', *JHS* 97:11 - 27 [repr. in German trans., with add., in Christ ed. 1986:387 - 425,470]

CARTLEDGE, P. A. (1978), 'Literacy in the Spartan oligarchy',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98:25 - 37 repr in Cartledge 2001b

CARTLEDGE, P. A. (1980) 'The peculiar position of Spart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ek city-stat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Irish Academy* 80C: 91 - 108 repr in Cartledge 2001b

CARTLEDGE, P. A. (1981a) 'The politics of Spartan pederasty',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n. s, 27:17 - 36 [repr. with add. in Siems ed. 1988:385 - 415] repr. in Cartledge 2001b

CARTLEDGE, P. A. (1981b) 'Spartan wives: liberation or licence?', *Classical Quarterly* n. s. 31:84 - 105 repr in Cartledge 2001b

272

CARTLEDGE, P. A. (1985) 'Rebels and Sambos in Classical Greece: a comparative view' in Cartledge & Harvey eds 1985:16 - 46 repr. in Cartledge 2001b

CARTLEDGE, P. A. (1987) *Agesilaos and the Crisis of Sparta*, London & Baltimore [repr. in paperback 2000]

CARTLEDGE, P. A. (1992) 'A Spartan education' in *Apodosis. Essays presented to Dr W. W. Cruickshank to mark his eightieth birthday*, London: 10 - 19 [St Paul's School, privately printed] repr. in Cartledge 2001b

CARTLEDGE, P. A. (1996) 'La nascitadegli opliti e l'organizzazione militate' in S. Settis ed. *I Greci H. Una Storia Greta 1. Formazione*, Turin, 681 - 714 repr. in English in Cartledge 2001b

CARTLEDGE, P. A. (1999) 'The Socratics' Sparta and Rousseaus' in Hodkinson & Powell eds 1999:311 - 37

CARTLEDGE, P. A. (2000) *The Greeks: Crucible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repr. London 2001]

CARTLEDGE, P. A. (200la) *Sparta and Lakonia. A regional history* 1300 - 362 BC, 2nd edn London, Henley & Boston

273 CARTLEDGE, P. A. (2001b) *Spartan Reflections*, London & California

CARTLEDGE, P. A. (2002) *The Greeks. A portrait of Self and Others*, 2nd edn, Oxford [German trans., with Nachwort, Stuttgart 1998]

CARTLEDGE, P. A. & A. J. S. SPAWFORTH (2001) *Hellenistic and Roman Sparta: a tale of two cities*, rev. edn London & New York

CARTLEDGE, P. A. & R. WATERFIELD (1997) eds. Xenophon 'On Hunting' in *Xenophon: Hiero the Tyrant & other Treatises*, London. 123 - 62

CAVANAGH, W. G., J. H. CROUWEL, R. W. V. CATLING & D.

J. G. SHIVERY (1996)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a Greek Rural Landscape: the Lakonia Survey II: Archaeological Data*,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Supplementary Volume 27, London

CAVANAGH, W. G., J. H. CROUWEL, R. W. V. CATLING & D. J. G. SHIPLEY (2003)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a Greek Rural Landscape: the Lakonia Survey I: Methodology and Interpretation*,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Supplementary Volume 26, London

CAVANAGRI, W. G. & WALKER, S. E. C. (1998) eds *Sparta in Laconia* (Proceedings of the 19th British Museum Classical Colloquium: B. S. A. Studiesr 4), London

CAWKWELL, G. L. (1993) 'Cleomenes', *Mnemosyne* 4th ser. 46:506 - 27

CHRIMES, K. M. T. (1949) *Ancient Sparta. A Re-examination of the Evidence*, Manchester [repr. Oxford 1999]

CHRIST, K. (1986) ed. *Sparta*, Darmstadt

CONGDON, L. O. K. (1981) *Caryatid Mirrors of Ancient Greece*, Mainz

DAVID, E. (1982/3) 'Aristotle on Sparta', *Ancient Society* 13/14:67 - 103

DAVID, E. (1985) 'The trial of Spartan kings',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Droits de l'Antiquité* 32:131 - 40

DAVID, E. (1989a) 'Dress in Spartan society', *The Ancient World* 19:3 - 13

DAVID, E. (1989b) 'Laughter in Spartan society' in Powell ed. 1989: 1 - 25

DAVID, E. (1992) 'Sparta's social hair', *Eranos* 90:11 - 21

DAVID, E. (1993) 'Hunting in Spartan society and consciousness', *Echos du Monde Classique/Classical Views* 37:393 - 417

DAWKINS, R. M. (1929) ed. *The Sanctuary of Artemis Orthia At Sparta. Excavated and described by memb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1906 - 1910*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Supp. V), London

274 DEN BOER, W. (1954) *Laconian Studies*, Amsterdam

DICKINS, G. (1908) 'The art of Sparta', *Burlington Magazine* 14:66－84

DICKINS, G. (1929) 'The terracotta masks' in Dawkins ed. 1929:163－86

DUCAT, J. (1999) 'Perspectives on Spartan education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in Hodkinson & Powell eds 1999:43－66

ERSILTNE, A. W. (1990) *The Hellenistic Stoa. Political Thought and Action*, London

FERGUSON, W. S. (1918) 'The Zulus and the Spartans: a comparison of their military systems', *Harvard African Studies* 2:197－234

FIGUEIRA, T. J. (1984) 'Mess contributions and subsistence at Spart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14:87－109

FINLEY, M. I. (1962) 'The myth of Sparta', *The Listener*, August 2:171－3

FINLEY, M. I. (1968) 'Sparta' in J.-P. Vernant ed. *Problémes de la guerre en Grèce ancienne*, Paris: 141－60 [repr. in Finley 1981: 24－40, 1986a:161－77]

FINLEY, M. I. (1981)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ed. B. D. Shaw & R. P. Saller, London [repr. Harmondsworth 1983]

FITZHARDINGE, L. E. (1980) *The Spartans*, London & N. Y.

FORREST, W. G. (1968) *A History of Sparta 950－192 B. C.*, London [repr. 1980]

GARLAN, Y. (1988) *Slavery in Ancient Greece*, Ithaca & London [French original 1982]

GARLAND, R. (1995)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Deformity and disabilit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London.

GENNEV, A. VAN (1960) *The Rites of Passage*, London [French original 1909]

GOLDEN, M. (1998) *Sport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GRIFHTHS, A. H. (1989) 'Was Kleomenes mad?' in Powell ed. 1989:51 - 78

HANSON, V. D. (1989) *The Western Way of War: infantry battle in classical Greece*, New York [rev. edn, California 2000]

HANSON, V. D. (1991) ed. *Hoplites. The Classical Greek Battle Experience*, London & New York

HERMAN, G. (1987) *Ritualised Friendship and the Greek City*, Cambridge

HODKINSON, S. (1983) 'Social order and the conflict of values in classical Sparta', *Chiton* 13:239 - 81

HODKINSON, S. (1986) 'Land tenure and inheritance in classical Sparta', *Classical Quarterly* n. s. 36:378 - 406

HODKINSON, S. (1989) 'Inheritance, marriage and demography. Perspectives upon the decline and success of classical Sparta' in Powell ed. 1989:79 - 121

HODKINSON, S. (1996) 'Spartan society in the fourth century: crisis and continuity' in P. Carlier ed. *Le IVe siècle av. J.-C. Approches historiographiques*, paris, 85 - 101

HODKINSON, S. (1997a) 'Servile and free dependants of the classical Spartan "oikos"' in M. Moggi & G. Cordiano eds *Schiavi e Dipendenti nell 'ambito dell' 'oikos' e della 'familia'*, Pisa: 45 - 71

HODKINSON, S. (1997b) 'The development of Spartan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archaic period' in Mitchell & Rhodes eds 1997:83 - 102

HODKINSON, S. (1998) 'Patterns of bronze dedications at Spartan sanctuaries, c. 650 - 350 BC: towards a quantified database of material and religious investment' in Cavanagh & Walker eds 1998: 55 - 63

HODKINSON, S. (1999a) 'An agonistic culture? Athletic competition

275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Spartan society' in Hodkinson & Powell eds 1999:147 - 87

HODKINSON, S. (1999b) 'Introduction' in Hodkinson & Powell eds 1999: ix - xxvi

HODKINSON, S. (2000) *Property and Wealth in Classical Sparta*, London

HODKINSON, S. & C. A. POWELL (1999) eds *Sparta. New Perspectives*, London

HOOKER, J. T. (1980) *The Ancient Spartans*, London

HUNT, P. (1998) *Slaves, Warfare, and Ideology in the Greek Historians*, Cambridge

HUXLEY, G. L. (1962) *Early Sparta*, London

JEVFERY, L. H. (1961) *The Local Scripts of Archaic Greece*, Oxford [rev. edn by A. W. Johnston 1990]

JEFFERY, L. H. (1976) *Archaic Greece. The City-States c.* 700 - 500 *B. C.*, London

JENKYNS, R. (1980) *The Victorians and Ancient Greece*, Oxford

JONES, A. H. M. (1967) *Sparta*, Oxford

KENNELL, N. M. (1995) *The Gymnasium of Virtue.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Ancient Sparta*, Chapel Hill & London

KUNSTLER, B. L. (1983) 'Wome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artan Polis. A Study of Sex Rol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diss. Boston University

KUNSTLER, B. L. (1987) 'Family dynamics and female power in ancient Sparta' in M. Skinner ed. Rescuing Creusa. *New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Women in Antiquity* (Helios Supp. 13. 2), Austin, TX: 32 - 48

LACEY, W. K. (1968) *The Family in Classical Greece*, London [repr. Auckland 1980]

LANE FOX, R. (1996) 'Ancient hunting: from Homer to Polybios' in G. Shipley & J. Salmon eds. *Human Landscap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London & New York, 119 - 53 276

LEVI, P. (1971) ed. & trans. *Pausanias. Guide to Greece*, 2 vols, Harmondsworth

LAZENBY, J. E (1985) *The Spartan Army*, Warminster

MacDOWELL, D. M. (1986) *Spartan Law*, Edinburgh

MALKIN, I. (1994) *Myth and Territory in the Spartan Mediterranean*, Cambridge

MANFREDI, V. M. (2002) *Spartan*, London [Italian original, 1988]

MITCHELL, L. G. & P. J. RHODES (1997) e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ls in Archaic Greece*, London & New York

MOORE, J, M. (1983)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2nd edn, Cambridge

MOSSÉ, C. (1991) 'Women in the Spartan Revolutions of the Third Century B. C.' in S. Pomeroy ed. *Women's History & Ancient History*, Chapel Hill & London, 138 - 53

NORFOLK, L. (2000) *In the Shape of a Boar*, London

OLIVA, P. (1971) *Sparta and its Social Problems*, Amsterdam & Prague

OLLIER, E (1933 - 1943) *Le mirage spartiate*, Paris [repr. in I vol., New York, 1973]

PARISION, E. (2002) 'The "language" of female hunting outfit in ancient Greece' in L. Llewellyn-Jones ed. *Women's Dress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London, 55 - 72

PARKER, R. (1989) 'Spartan Religion' in Powell ed. 1989: 142 - 72

PETTERSSON, M. (1992) *Cults of Apollo at Sparta. The Hyakinthia, the Gymnopaidiai and the Karneia*, Stockholm

PHILLIPS, A. A. & M. M. WILLCOCK (1999) eds. *Xenophon & Arrian On Hunting with Hounds*, Warminster

PIPILI, M. (1987) *Laconian Iconography of the Sixth Century B.C.*, Oxford

POLIGNAC, F. DE (1995) *Cults, Territo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 2nd edn, Chicago [French original 1984]

POMEROY, S. B. (1976) *Goddesse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 women in classical antiquity*, London

POMEROY, S. B. (1997) *Families in Classical and Hellenistic Greece*. Representations and realities, Oxford

277 POMEROY, S. B. (2002) *The Women of Sparta*, New York

POMEROY, S. B. (1991) ed. *Women's History and Ancient History*, Chapel Hill, NC, & London

PORM. LA, P. & A. S. BRADFORD (1985) *A Prosopography of Lacedaemonia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X - 323 B. C.)/Prosopographie der Lakedaimonier bis auf die Zeit Alexanders des Grossen*, 2nd edn, Chicago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1913]

POWELL, A. (1989) 'Mendacity and Sparta's use of the visual' in Powell ed. 1989:173 - 192

POWELL, A. (2001) *Athens and Sparta. Constructing Greek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to 323 BC*, 2nd edn, London

POWELL, A. (1989) ed. *Classical Sparta: tecbniques behind her success*, London & New York

POWELL, A. (1995) ed. *The Greek World*, London. & New York

POWELL, A. & S. HODKINSON (1994) eds *The Shadow of Sparta*, London & New York

PRESSFIELD, S. (1998) *Gates of Fire*, New York

RAWSON, E. (1969) *The Spartan Tradition in European Thought*, Oxford [repr. 1991]

STE. CROIX, G. E. M. DE (1972),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London & Ithaca

STE. CROIX, G. E. M. DE (1983) *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From the Archaic Age to the Arab Conquests*, *corrected impr.*, London & Ithaca [original 1981]

SCANLON, T. F (1988) '*Virgineum gymnasium*: Spartan females and early Greek athletics' in W. J. Raschke e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Olympics*, *Madison*: 185 – 216

SCANLON, T. F (2002) *Eros & Greek Athletics*, New York

SCHAPS, D. M. (1979) *Economic Rights of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Edinburgh

SCHNAPP, A. (1997) *Le chasseur et la cité. Chasse et érotique dans la Grèce ancienne*, Paris

SHIPLEY, G. (2000) *The Greek World After Alexander* 323 – 30 *BC*, London & New York

SHIPLEY, D. R. (1997) *Plutarch's Life of Agesilaos*, Oxford

278

STEMS, A. K. (1988) ed. *Sexualität and Erotik in der Antike*, Darmstadt

STARR, C. G. (1965) '*The credibility of early Spartan history*', *Historia* 14:257 – 72 [repr. in Starr 1979: 144 – 59]

STARR, C. G. (1979) *Essays on Ancient History. A Selection of Articles and Reviews*, ed. A. Ferrill & T. Kelly, Leiden

STAVELEY, E. S. (1972) *Greek and Roman Voting and Elections*, London & New York

STRASSLER, R. B. (1996) ed.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New York

STEINHAUER, G. (1978) *The Museum of Sparta*, Athens

STEWART, A. (1997) *Art, Desire and the Body in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SVENBRO, J. (1993) *Phrasikleia. An Anthropology of Reading in Ancient Greece*, Ithaca [French original 1988]

TALBERT, R. (1988) ed. *Plutarch on Sparta*, Harmondsworth

TIGERSTEDT, E. N. (1965 – 1978) *The Legend of Sparta in Classical Antiquity*, 3 vols, Stockholm, Uppsala & Göteborg

TOD, M. N. (1933) 'A Spartan grave on Attic soil', *Greece & Rome* 2:108 – 11

TURNER, F. M. (1981) *The Greek Heritage in Victorian Britain*, New Haven & London

VERNANT, J. —P. (1991) 'Between shame and glory: the identity of the young Spartan warrior' in *Mortals and Immortals. Collected Essays*, ed. F Zeitlin, Princeton: 220 – 43

VIDAL-NAQUET, P. (1968) 'The Black Hunter and the origin of the Athenian *ephebia*',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n. s. 14:49 – 64[repr. in Vidal-Naquet 1986a: 106 – 28]

VIDAL-NAQUET, P. (1986a) *The Black Hunter. Forms of Thought and Forms of Society in the Greek World*, trans. A. Szegedy-Maszak, Baltimore & London

VIDAL-NAQUET, P. (1986b) 'The Black Hunter revisited',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n. s. 32:126 – 44

WEST, M. L. (1993) ed. *Greek Lyric Poetry*, Oxford

ZWEIG, B. (1993) 'The only women to give birth to men: a gynocentric, cross-cultural view of women in ancient Sparta' in M. de Forest ed. *Women's Power, Men's Game: Essay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in honor of Joy King*, Wasconda, IL: 32 – 53

斯巴达国王年表及简介

斯巴达实行非常独特的政治制度，即由来自两个王室的国王同时统治，两支王室的继承互不干扰。两个王室分别是阿基亚德(Agiads)王族和欧里庞提德(Eurypontids)世系。以下从无详细资料可考的神话时代来概述双王制的由来，同时也对部分比较重要且有适当历史文献记载的斯巴达国王作简要介绍。(以时间先后进行介绍，年份如未作特殊说明，皆为公元前；公元前525之前的年份为近似值。)[1]

一　神话时代

斯巴达人，属于多利安人，并非希腊最早的本土居民。他们的神话故事与赫拉克勒斯(Heracles)息息相关，甚至多利安人入侵的另一种叫法就是"赫拉克勒斯的归来"(Return of the Heracleidae)。

作为有一半宙斯血统的人神混血，宙斯原本打算让这个大力神主管拉西代梦(Lacedaemon)、阿尔戈斯(Argos)和美塞尼亚(Messenian)地区，但天后赫拉从中作梗，于是这一地区的统治权被交给了迈锡尼国王欧律斯透斯(Eurystheus)。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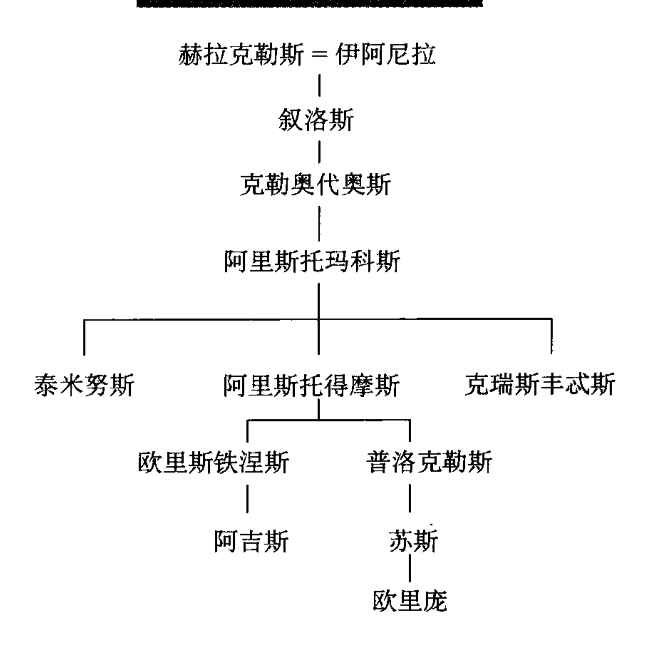
[1] 本文并不包含在英文原著中，为译者根据多种材料汇编而成，并非译者原创，目的只在于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以便于全书的阅读。——译注

赫拉克勒斯死后,他的后代逃到雅典寻求庇护。迈锡尼国王欧律斯透斯向雅典索要这些赫拉克勒斯的后代遭拒,于是发兵攻打雅典,但可惜兵败身死。赫拉克勒斯与得伊阿尼拉(Deianira)之子叙洛斯与他的兄弟们趁这个机会入侵了伯罗奔尼撒。不过很快,他们遭遇瘟疫,不得不撤退出来。

叙洛斯兄弟们撤退到了帖萨利,寻找他们父亲的一位老朋友的协助——帖萨利国王埃吉弥奥斯(Aegimius,传说中此人也是多利安人的祖先)。因为埃吉弥奥斯曾在一次抵抗外敌的战争中得到赫拉克勒斯的鼎力相助,于是此时就热情地收留了叙洛斯等人,并认叙洛斯为养子,给了他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后来帖萨利国王埃吉弥奥斯病逝,他的两个儿子自愿服从叙洛斯,叙洛斯成为了多利安人之主。急于得到父亲的"应许之地"的叙洛斯向德尔斐神庙请求神谕。德尔斐的神谕告诉他,他应该等到"第三个果实","由一个狭窄的通路从海上"进入伯罗奔尼撒。

于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叙洛斯等了"三年",然后发兵从"柯林斯地峡"攻入伯罗奔尼撒,但却在一场战斗中被铁该亚(Tegea)国王所杀。随后,赫拉克勒斯的孙子克勒奥代奥斯(Cleodaeus)领导了第三次入侵,曾孙阿里斯托玛科斯(Aristomachus)领导了第四次入侵,结果全以失败告终。最后,赫拉克勒斯的玄孙们泰米努斯(Temenus)、克瑞斯丰忒斯(Cresphontes)以及阿里斯托得摩斯(Aristodemus,皆为阿里斯托玛科斯之子)愤怒了,他们抱怨说那些所谓神谕只会给其追随者们带来毁灭。不过有人为他们解释了神谕的真正含义:第三个果实代表的是第三代人,狭窄的通路并不是柯林斯地峡,而是瑞昂海峡(Rhuim,伯罗奔尼撒北部,分隔埃托利亚和阿卡狄亚的海峡)。得到明确的指示后,阿里斯托得摩斯等人在埃托利亚的诺帕克图斯(Naupactus)集结了一支军队,准备横渡海峡。

但这支军队被神箭手阿波罗所摧毁。原因很简单,三兄弟中有一人杀死了一名阿卡狄亚的占卜者(阿波罗是占卜者之神),因而得罪了阿波



（此谱系树只包括神话时代重要的斯巴达先祖）

罗。为了赎罪，杀了人的泰米努斯被流放十年，同时神谕告诉他必须寻找一名“三只眼”的人做他们的向导。十年过去了，就在泰米努斯返回诺帕克图斯的路上，他发现了一名瞎了一只眼的埃托利亚人奥克叙洛斯(Oxylus)正骑在马上。人、马这不刚好是三只眼吗？泰米努斯马上把这人带回了诺帕克图斯的军营中。

这次，大军在奥克叙洛斯的指引下顺利渡过了瑞昂海峡，并一路取得胜利。赫拉克勒斯的子孙们终于得到了祖先应得的那份土地。按照希腊人兄弟均分遗产的原则，这些土地被分给了兄弟三人。泰米努斯得到了阿尔戈斯，克瑞斯丰忒斯得到了美塞尼亚，一只眼的向导奥克叙洛斯也得到了富饶的埃利斯(Elis)作为奖赏。阿里斯托得摩斯此时已死，于是他的一对双胞胎儿子欧里斯铁涅斯(Eurysthenes)和普洛克勒斯(Procles)得到了拉西代梦，共同作为这片土地的统治者。当时，拉希代梦人想按照常理立两人中的较大的一个为国王，但却无法区分他们到底谁更大一些。

于是他们跑去问这对双胞胎的母亲。但这个母亲十分圆滑地回答说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想因此逼迫拉希代梦人把两人都立为国王。拉希代梦人不得已只好请求神谕。神谕告诉他们去观察孩子的母亲，在喂养和洗的时候最先照顾的孩子就是长子。于是在一番观察后，拉希代梦人把欧里斯铁涅斯立为了长子。欧里斯铁涅斯家族在两个国王家族中享有更高贵的地位。

二 历 史

从普洛克勒斯的孙子欧里庞（Eurypon）以及欧里斯铁涅斯之子阿吉斯（Agis）开始，斯巴达国王的世系慢慢开始离开神话的迷雾，进入了历史的范畴。斯巴达双王属于两个不同的家族，即阿基亚德家族（Agiad House）和欧里庞提德家族（Eurypontid House），同一家族中，如不另加说明，大部分可认为是父子相传。众所周知，斯巴达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书写文字的文化中心，因此我们很难得到斯巴达人自己关于国王们的什么记录。斯巴达缺少文学家，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有价值的记载，遗留下的文字大部分是一些政府公文。因此有很多国王是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考证的。

阿吉斯一世 （Agis I，公元前 930—前 900?）：他的名字被用来为这一支斯巴达国王的家族谱系——阿基亚德命名，但关于他并没有太多相关资料，是一个介乎神话与历史之间的人物。传闻他征服了拉科尼亚（Laconia）南部的希洛城（Helos），将其公民收为奴隶，即著名的希洛人（Helots）。

欧里庞 （Eurypon，公元前 895—前 865?）：欧里庞提德家族即以其命名。普卢塔克称其为“第一个放松自己的统治及分散过度集权以求得民心和众望的国王”。有的古典作家认为他领导了一些在门丁尼亚（Mantineia）和阿卡狄亚的战争。

埃凯司特拉托司 （Echestratus，公元前 900—前 870?）：在位期间，以清除山贼为理由，把军队开进了阿尔戈斯和拉科尼亚的边境。当地的基努里亚人（Cynuria）奋起反抗，但被斯巴达人征服。

普律塔尼斯 （Prytanis，公元前 865—前 835?）：由于其父亲欧里庞削弱了国王的权力，因此“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法无天与骚动混乱遍布斯巴达”。因此普律塔尼斯“正要去驱散一伙暴徒时，被人用屠刀戳死了”。普卢塔克称此人为吕库古的父亲。

列奥博塔斯 （Leobotas，公元前 870—前 840?）：阿基亚德家族第三位国王，无相关记载。

波律戴克铁斯 （Polydectes，公元前 835—前 805?）：普律塔尼斯国王的长子。按照普卢塔克的说法是吕库古的兄长。

多律索斯 （Doryssus，公元前 840—前 815?）：阿基亚德家族，无相关记载。

埃乌诺莫斯 （Eunomus，公元前 805—前 775?）：记载较为混乱，普卢塔克认为他是波律戴克铁斯的父亲，但希罗多德在追述世系时认为他是波律戴克铁斯的后裔。

阿吉西劳斯一世 （Agesilaus I，公元前 815—前 785?）：阿基亚德家族，无相关记载。

卡里拉斯 （Charillus，公元前 775—前 750）：按普卢塔克的说法是前一国王的遗腹子。他的名声远远比不上他的摄政者吕库古。他在位时期斯巴达人侵了阿尔戈斯，同时，斯巴达与铁该亚的长期战争关系也被认为始于这一阶段。

阿尔克劳斯 （Archelaus，公元前 785—前 760）：阿基亚德家族，无相关记载。

尼坎德 （Nicander，公元前 750—前 720）：欧里庞提德家族，无相关记载。

铁列克洛司 （Teleclus，公元前 760—前 740）：据认为在他统治的年

代，斯巴达人征服了阿密克利（Amyclae）、斐瑞斯（Pharis）和吉拉安特伊（Geranthrae）等地区，这里的居民后来就成为了“边民”（Perioeci，也称庇利西阿人）。在一次阿耳特弥斯（月神与狩猎女神）神的节日中，铁列克洛司在尼恩那提斯（Limnatis）湖附近的神庙遭到美塞尼亚人的伏击而丧命。由此，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爆发。

泰奥彭波斯 （Theopompus，公元前720—前675）：传说这位国王曾遭到自己妻子的责骂，说他传给自己子孙的权力比他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权力小了。这位国王回答道：“不是小了，是更大了，而且将保留得更加久远。”他掌权时爆发了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斯巴达人取得了胜利。提尔泰奥斯（Tyrtaeus，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哀歌体诗人）就曾经做诗赞美他的功绩。

阿尔卡美涅斯 （Alcamenes，公元前740—前700）：阿基亚德家族，无相关记载。

阿那克桑德里戴斯一世 （Anaxandridas I，公元前675—前660）：诗人帕萨尼亚斯（Pausanias）认为泰奥彭波斯的继承者是他的孙子杰乌克西达马斯（Zeuxidamas）或者曾孙安那克西达玛斯（Anaxidamus）。而希罗多德的记载中则是这位阿那克桑德里戴斯。

波吕多洛斯 （Polydorus，公元前700—前665）：在他和阿那克桑德里戴斯两位国王在位期间，爆发了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的失败，使美塞尼亚人只得凭险据守，死守海拔八百多米的伊托美山（Ithome）山口。第二次战争爆发时，斯巴达人大军压境。传说此时美塞尼亚准备大量礼物去请求神谕，请求神指引一条生路，得到的指示是必须向冥王祭献一名出身高贵的少女。但人人都心痛自己的女儿，很久都无人愿意。美塞尼亚的英雄人物阿里斯托得摩斯得知后，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当场拔剑刺死了自己的女儿。神奇的是，美塞尼亚军自此士气高涨，击败了斯巴达人。阿里斯托得摩斯被人民推举为国王。但不久，此人想起自己手染女儿的鲜血，很快也自杀了。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以斯巴

达人的胜利告终，伊托美山被斯巴达占领。

注：前两次美塞尼亚战争的具体时间依然有争论，第一次大概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发生于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

阿基达马斯一世 （Archidamus I，公元前660—前645）：在他统治的年代发生了铁该亚战争。

欧里克拉铁斯 （Eurycrates，公元前665—前640）阿基亚德家族，无相关记载。有人认为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是在他统治的时期结束。

阿那克西拉斯 （Anaxilas，公元前645—前625）：欧里庞提德家族，无相关记载。

阿那克桑德尔 （Anaxander，公元前640—前615?）：阿基亚德家族，无相关记载。

列乌杜奇戴斯一世 （Leotychidas I，公元前625—前600?）：欧里庞提德家族，无相关记载。

欧里克拉担达斯 （Eurycratidas，公元前615—前590?）：阿基亚德家族，无相关记载。他统治的年代斯巴达人依然陷于与铁该亚人的苦战当中。

希波克拉提戴斯 （Hippocratidas，公元前600—前575?）：欧里庞提德家族，无相关记载。

列奥 （Leon，公元前590—前560?）：阿基亚德家族，他与阿伽西克列斯（Agasicles）统治时期，“拉西代梦人尽管在所有其他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却接二连三的总是败在铁该亚人手里”。

阿伽西克列斯 （Agasicles，公元前575—前550?）：欧里庞提德家族，无相关记载。

阿那克桑德里戴斯二世 （Anaxandridas II，公元前560—前520?或525?）这位国王娶了自己亲妹妹的女儿，两人却没有子女。斯巴达的五位监察官便对这位国王下了最后通牒：你虽然不关心你自己的利益，但我们却不能让阿基亚德家族绝后，你赶快把这个女人赶走再另娶一个吧。

但国王拒绝了。于是五位监察官只得作出妥协，给国王另找了一个妻子。于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二世成为了斯巴达历史上第一个有两个老婆两个家庭的人。他的第二个妻子最先帮他生下后代克列欧美涅斯(Cleomenes)，紧接着，国王的大老婆也生下了列奥尼达(Leonidas)。

阿里斯通 (Ariston，公元前550—前515?)：一位声誉极高的国王，名字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最好的"。经历了两次婚姻却都没有生下男性继承人。甚至全体斯巴达人民都公开地为他祈求。第三次婚姻时，通过计谋，他夺得一位朋友的妻子。在不到十个月后，这个女人为他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戴玛拉托斯(Demaratus)，意思为"人民祈求的"。阿里斯通听到产子的消息后曾失口说出："这不是我的孩子。"不过后来改变了态度，对孩子愈发宠爱。

克列欧美涅斯一世 (Cleomenes I，公元前520—前490)：这位国王十分热衷攻城掠地，特别是对伯罗奔尼撒以外的土地，这在斯巴达国王中是比较少见的。也许由此被人传闻他的举止"疯疯颠颠"，精神异常。他虽然是由国王的第二个老婆所生，出身比不上他的弟弟们高贵，但毕竟是长子，所以最终取得了继承权。公元前510年，被流放的雅典爱克蒙尼德(Alcmaeonidae)家族在克莱斯铁涅斯(Cleisthenes)的带领下跑到斯巴达寻求协助，希望借斯巴达之力推翻雅典僭主希庇亚斯(Hippias)。在德尔斐神谕的指使下，克列欧美涅斯率军攻入雅典，并把希庇亚斯一族围困在一座堡垒内。由于希庇亚斯的许多亲戚被斯巴达人所抓获，希庇亚斯不得不投降出逃。后来克莱斯铁涅斯与贵族派的伊撒哥拉斯(Isagoras)争权，伊撒哥拉斯又跑去向斯巴达人求援。这个伊撒哥拉斯的妻子据传与克列欧美涅斯有暧昧关系。克列欧美涅斯率大军再次攻入雅典，流放了爱克蒙尼德一族，试图强行解散了议会，把伊撒哥拉斯推上台。但雅典人奋起反抗，克列欧美涅斯等只得据守雅典卫城。几天后达成和议，克列欧美涅斯率领斯巴达人离开了雅典，其他参与此事的雅典贵族派大多被处死了。由于此次事件，克列欧美涅斯觉得受到了很大的污辱，于是在伯罗

奔尼撒地区纠合大军试图联合进攻雅典。但是大军行军到一半，柯林斯人就率先退出了。之后，与他同期执政的另一位国王戴玛拉托斯也因意见不和率一部分部队回到了斯巴达。这是第一次斯巴达人内部统帅的分裂，从此斯巴达人订立法律，每次出征只能由一位国王率领。希波战争爆发前夕，爱奥尼亚僭主来到希腊本土求援，许诺可以得到富有的小亚细亚。热爱远征的克列欧美涅斯原本十分动心，但女儿戈尔歌提醒他不要相信这个僭主，因此此事不了了之。

在公元前 494 年前后，克列欧美涅斯入侵了阿尔戈斯，并用诡计击败了阿尔戈斯的军队。阿尔戈斯的败军跑到一处圣地内寻求庇护。但克列欧美涅斯诱骗了一部分人出来并杀害了他们，最后甚至还放火烧掉了那片圣地。阿尔戈斯在那次战争中损失了非常多的公民，导致城邦内的奴隶通过暴动夺得了权力，许多年后阿尔戈斯人才恢复了稳定。

希波战争爆发后，埃吉纳城(Aegina)向波斯奉献了水和土。这让克列欧美涅斯十分不满，率军前去讨伐。但埃吉纳城的一位代表却在斯巴达国王戴玛拉托斯的授意下宣称：克列欧美涅斯这次的行动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且还接受了雅典人的贿赂，他无法代表斯巴达人民的意愿，否则的话另一位国王也应该一同到来。

吃了哑巴亏的克列欧美涅斯十分不甘，回国之后开始报复戴玛拉托斯。他串谋欧里庞提德家族的后裔列乌杜奇戴斯，并且贿赂德尔斐神庙的祭司，在戴玛拉托斯的出生问题上做文章，指控他是私生子。戴玛拉托斯于是被废黜了王位。列乌杜奇戴斯则在克列欧美涅斯的帮助下继承了欧里庞提德家族的王位，旋即两人合作解决了埃吉纳问题。

在公元前 490 年前后，克列欧美涅斯在戴玛拉托斯问题上玩弄的那些阴谋败露，克列欧美涅斯害怕遭到处罚逃到了帖萨利，并尽一切可能联合可以联合的力量试图进攻斯巴达。斯巴达人被他的举动震惊了，他们允许他回国并许诺让他重新登基。但他一回来马上就被捉拿下狱。传闻在监狱里他弄到了一把小刀，于是开始从小腿切自己的肉，从腹部以下的

肉都被他切成一条条的，死状惨不忍睹。

戴玛拉托斯 （Demaratus，公元前 515—前 491）：阿里斯通之子，智慧出众，曾在泛希腊竞技会中为斯巴达赢得驷车比赛的冠军，同时也是唯一一位取得竞技会冠军的斯巴达国王。由于克列欧美涅斯的关系，他被斯巴达人放逐，逃亡波斯，受到波斯国王大流士的热情招待，并得到了小亚细亚地区几座城市的统治权。他的子孙一直到公元前 4 世纪早期依然统治着这片土地。后来他曾在公元前 480 年跟随薛西斯入侵希腊。在温泉关战前，曾经提醒波斯国王不要小看了斯巴达人。

列奥尼达一世 （Leonidas I，公元前 490—前 480）：阿那克桑德里戴斯二世之子，"疯王"克列欧美涅斯的同父异母弟弟，名字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狮子之子"或"如狮子般的"。他原本在兄弟中排行老三，但他的另一位亲哥哥在克列欧美涅斯登基后没多久就自愿去海外发展殖民地去了，并死在了西西里。克列欧美涅斯同时又没有男性后裔，因此国王的位子就突然落到了列奥尼达的头上。他的妻子就是克列欧美涅斯聪慧的女儿戈尔歌（Gorgo）。他领导了壮烈的温泉关保卫战。

列乌杜奇戴斯二世 （Leotychidas II，公元前 491—前 476）：由克列欧美涅斯扶植起来的国王，也许是阿里斯通国王的堂兄。克列欧美涅斯之死也险些让他遭到牵连。在公元前 479 年春天，他率领海军支持开俄斯和萨摩司对抗波斯人。并在同年秋天在小亚细亚沿岸击败了波斯的陆海两军。公元前 476 年他率军远征帖萨利，不过在对方的贿赂下撤军回国。但在斯巴达这种地方个人是很难藏得住什么钱财的。不久，东窗事发。列乌杜奇戴斯遭流放，他在斯巴达的家也被付之一炬。他的孙子阿基达马斯继承了王位。

普列司塔尔科斯 （Pleistarchus，公元前 480—前 458）：列奥尼达与戈尔歌之子，继位时过于年幼，因此在成年前由堂兄波塞尼亚斯（Pausanias），希波战争中普拉提亚战役的领导者）担任摄政。

阿基达马斯二世 （Archidamus II，公元前 469—前 427）列乌杜奇戴

斯之孙，阿基达马斯的父亲杰乌克西戴莫斯(Zeuxidamus)在他出生没多久后就死去了。然后列乌杜奇戴斯娶了第二个老婆，生下了一个女儿，并把这个女儿许配给自己的孙子阿基达马斯。阿基达马斯以睿智而温和著称，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曾想尽办法阻止或拖延其爆发。他也是伯里克利的朋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早期，他三次率军入侵阿提卡。

普雷斯多安那克斯 (Pleistoanax，公元前 459－前 409)：或许是因为上一任国王没有男性后裔，因此波塞尼亚斯之子普雷斯多安那克斯登上了王位。一般认为他的政策是温和的。早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他就曾率军入侵阿提卡，但没有开展进一步军事行动后就离开了。当时的斯巴达人认为他是受了伯里克利的贿赂，因此在公元前 446 年普雷斯多安那克斯被流放到荒凉的阿卡狄亚山区。不过在公元前 428 年，斯巴达人听从德尔斐神谕，把他接回来复位。但回来后他的政敌不断地把斯巴达遭受的苦难归咎于他。普雷斯多安那克斯因此成为了斯巴达境内最渴望和平之人。尼基阿斯和约(Nicias)的签订与他关系十分密切。

阿吉斯二世 (Agis II，公元前 427—前 401/400)：阿基达马斯的长子。他领导了公元前 425 年入侵阿提卡的伯罗奔尼撒联军。公元前 421 年尼基阿斯和约缔结之后，他统率联军进攻阿尔戈斯。通过巧妙的部署，伯罗奔尼撒联军包围了阿尔戈斯人。在大家一致认为会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时候，阿吉斯突然私下决定与阿尔戈斯人议和，为期四个月。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人民一致谴责他这一行为。甚至决定拆毁他的房屋并课以巨额罚款。阿吉斯恳求人民的宽恕，并许诺以奋勇杀敌作为赎罪。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民制定法律，委任一个 10 人的顾问团给阿吉斯；没有顾问团的批准他领兵出征都属违法。知耻而后勇，阿吉斯王在之后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四个月的和议一过，伯罗奔尼撒人立刻再次出兵阿尔戈斯，据说这次战争的规模之大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在阿吉斯的指挥下，斯巴达人在门丁尼亚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一两年后，他再次率兵入侵阿尔戈斯，毁掉了阿尔戈斯人的城墙。在公元前 413 年，他率军入侵阿提

卡，并在狄凯利亚(Decalea)设防。在最后对雅典的包围战中，阿吉斯也参与了指挥并最终使雅典投降(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他领导了对埃利斯(Elis)的报复性军事行动并获得胜利。在向德尔斐神庙进献了供品后，他病倒了，公元前401年死在了斯巴达。他的葬礼空前隆重。“斯巴达人从不问敌人有多少，只问他们在哪里”就是他的名言。

波塞尼亚斯 (Pausanias，公元前409—前395)：也许是阿基达马斯之子，曾在阿基达马斯被流放期间担任摄政(与普拉提亚战役的胜利者不是一个人，不过两人的下场非常相似)。他与吕山德(Lysander)不合，并导致被流放。波塞尼亚斯逃亡去了波斯，后来回到了斯巴达，被人民乱石砸死。

阿吉西劳斯二世 (Agesilaus II，公元前399—前360)：斯巴达历史上的传奇国王。他是阿吉斯国王同父异母的弟弟。阿吉斯国王虽然有自己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但在他生前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儿子的合法性直到临终才改口。因此在阿吉斯去世后，围绕继承权，这叔侄两人发生的纠纷。阿吉西劳斯的登基与吕山德的努力密不可分。当时，由于争端无法解决，斯巴达人去请求神谕，神谕告诉他们“一个跛足的王权会导致他们的毁灭”。阿吉西劳斯恰好是天生跛足，但吕山德扭转乾坤，对公众发表讲话说，这个跛足的王权并不是指跛足的阿吉西劳斯，而是私生子列乌杜奇戴斯，他玷污赫拉克勒斯家族神圣的血脉，他才是会为斯巴达带来毁灭的人。同时阿吉西劳斯找到证人指认列乌杜奇戴斯是私生子。最终阿吉西劳斯得以成功登位。由于他与吕山德的密切关系，因此谣传吕山德是这个少年的爱人。

由于阿吉西劳斯并不是生来就有继承权，因此他从小接受的教育与一般的斯巴达少年没有不同，他的跛足更让他意志如钢铁般坚强。他在位的时代斯巴达人几乎没有停止过战争。在位没多久，他就发动了针对波斯的远征(约公元前399年，色诺芬所在的万人远征军中残余的很多士兵后来被其收留)。在波斯人煽动起柯林斯战争后返回希腊本土作战。

最终与波斯签订了“大王和约”或“国王和约”后，彻底战胜底比斯同盟，强行解散了彼奥提亚同盟，并在底比斯扶植建立了寡头统治。重新恢复了斯巴达在希腊的霸权。不过十五年后底比斯崛起，在留克特拉战役击败了另一位斯巴达国王统率的军队。斯巴达这座没有城墙的城市在底比斯人的大军面前岌岌可危，正是阿吉西劳斯坐镇稳定了人心，避免了斯巴达的毁灭。不过从此斯巴达的势力一蹶不振。作为天生的战士，阿吉西劳斯王离开了希腊本土，到埃及人那里去做雇佣军。据说当时已经 80 岁高龄，但仍然和战士同甘共苦，人们无法在战士中区分出哪个是国王。后来，在公元前 360 年，阿吉西劳斯国王在埃及的一个港口城市病逝。他的遗体被战友们用蜡封裹，带回斯巴达隆重安葬。色诺芬、普卢塔克等古典作家无不给与他极高评价，认为他是斯巴达中兴之主，真正的“斯巴达人”。

阿吉西波里斯一世 (Agesipolis I，公元前 395—前 380)：波塞尼亚斯之子，无详细记载。

阿基达马斯三世 (Archidamus III，公元前 360—前 338)：阿吉西劳斯之子。在成为国王之前就已曾多次领导军队。留克特拉战役期间他负责率领增援部队，后来在保卫斯巴达的战争中表现出色。登基后，他支持佛吉斯对底比斯发动了神圣战争(Sacred War，公元前 355—前 346)，并参与了在克里特发生的战争。后来，在意大利的斯巴达殖民他林敦(Tarentum)遭到拉科尼亚人(Lucanians)的进攻，阿基达马斯率军扬帆远航来到意大利半岛，但在一次针对曼德瑞阿城(Manduria)的进攻中，阿基达马斯兵败身亡。

克列欧姆布洛托斯一世 (Cleombrotus I，公元前 380—前 371)前任国王阿吉西波里斯的兄弟。关于他本人并没有太多记载。作为在留克特拉兵败身死的斯巴达国王，他成就了底比斯将军伊巴密浓达的一世英名。

阿吉斯三世 (Agis III，公元前 338—前 331)前任国王阿基达马斯之子。他恰巧在克罗尼亚战役(Chaeronea，马其顿人战胜底比斯与雅典人)发生的当天继位。作为唯一没有向马其顿人妥协的城邦，阿吉斯国王

用各种方式不断反抗着马其顿人，给亚历山大的后方制造着麻烦。公元前 331 年，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军队发生了分裂，并被敌军打败，阿吉斯阵亡。

阿吉西波里斯二世 （Agesipolis II，公元前 371—前 370）：阿基亚德家族，无详细资料。

欧达密达斯一世 （Eudamidas I，公元前 331—前 305）欧里庞提德家族，娶了一个富有的老婆（当时斯巴达男性公民大量减少，土地与财富很多集中在女性手中）。在他统治的年代斯巴达获得了和平。但无论是斯巴达还是欧里庞提德家族，这个时候都已开始没落。

克列欧美涅斯二世 （Cleomenes II，公元前 370—前 309）：阿基亚德家族，阿吉西波里斯二世的兄弟，在位长达六十年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更多关于他的信息。

阿基达马斯四世 （Archidamus IV，公元前 305—前 275）：欧里庞提德家族，无详细资料。

阿瑞乌斯一世 （Areus I，公元前 309—前 265）：成功地率斯巴达军民抵御了皮洛斯（Pyrrhus 让罗马人吃尽苦头的伊庇鲁斯国王，“皮洛斯的胜利”一词的来源）的入侵。后在反抗马其顿人的蒙尼迪亚战争（Chremonidean）中阵亡。

欧达密达斯二世 （Eudamidas II，公元前 275—前 245）：欧里庞提德家族，无详细资料。

阿克罗塔图斯 （Acrotatus，公元前 265—前 262）：阿基亚德家族，无详细资料。

阿吉斯四世 （Agis IV，公元前 245—前 241）：他上台时，斯巴达的全权公民不足 700 人，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其中 100 人的手里。他推行改革，取消债务，平分土地。斯巴达贵族反对他的土地政策，于公元前 241 年在他率军远征时推翻了他的统治。阿吉斯回国后躲到一间神庙内寻求庇护，但被人诱骗了出来。很快，阿吉斯连同母亲和祖母一同被扔进了监

狱并在狱中被谋杀。阿吉斯算是斯巴达末期少有的有为之主。普卢塔克对其评价较高,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他的传记单独成篇。

阿瑞乌斯二世 (Areus II,公元前 262—前 254):阿基亚德家族,无详细资料。

欧达密达斯三世 (Eudamidas III,公元前 241—前 228):欧里庞提德家族,无详细资料。

列奥尼达二世 (Leonidas II,公元前 254—前 235):在阿吉斯四世改革期间,作为与他共同执政的国王,列奥尼达强烈反对进行改革。当时支持改革的斯巴达监察官声称看到神灵降下的预兆反对列奥尼达,于是列奥尼达仓皇出逃。其间(公元前 243—前 241 年),由他的女婿担任摄政。公元前 241 年他回国与监察官一起发动政变谋杀了阿吉斯四世。

阿基达马斯五世 (Archidamus V,公元前 228—前 227)阿吉斯四世的兄弟,在阿吉斯遭人谋杀后逃到了美塞尼亚。由于后来欧里庞提德家族没有男性后裔了,当时的斯巴达国王克列欧美涅斯三世(Cleomenes III)招他回国延续欧里庞提德家族的香火。不过,很快他也被人谋杀了。谣传是克列欧美涅斯三世所为。

克列欧美涅斯三世 (Cleomenes III,公元前 235—前 222):继阿吉斯四世后斯巴达的又一位改革家。虽然是阿吉斯四世死敌的儿子,但他继承了阿吉斯的遗志,继续推动改革。阿吉斯的妻子在列奥尼达二世的强迫下嫁给了克列欧美涅斯三世。克列欧美涅斯三世登位后,召回了欧里庞提德家族的阿基达马斯五世,不过他的神秘遇害让欧里庞提德家族的血脉中断了,克列欧美涅斯三世也成为了一位没有共治者的真正国王,但为了维持传统,他任命自己的弟弟作为第二位国王,代替空缺的欧里庞提德家族的王位。

克列欧美涅斯三世开始进行他的改革计划,他的策略是,通过对外战争牵引反对改革者的注意力,同时在国内采取行动。他的第一个机会来自亚加亚同盟的入侵。克列欧美涅斯三世在这次战争中指挥有方又十分

勇猛，从而在国内获得了声望。他继而对亚加亚同盟发动反攻，然而其真实用意却是趁机消灭改革最大的障碍五位监察官。克列欧美涅斯三世设法把所有可能反对他的计划的斯巴达公民带出国外参加对亚加亚同盟的讨伐。在把他们拖得筋疲力尽之后，克列欧美涅斯三世率领一批忠实的支持者离开军队潜回斯巴达。克列欧美涅斯三世返回已成空城的斯巴达之后，就把五位监察官尽行杀死。克列欧美涅斯三世随即发布命令永久取消了监察官制度，并把 80 个主要反对者流放。

克列欧美涅斯三世在铲除了障碍之后，就大张旗鼓地开始实行他的改革计划。他在公民大会上提议将所有财产交归国有，并重新分配土地。为了恢复军队数量，克列欧美涅斯三世允许一部分最强壮的非斯巴达公民自由人获得公民身份。

不过后来在公元前 222 年，他率领 1 万人的军队在铁该亚附近与 2.8 万人的马其顿军决战。虽然奋勇战斗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据普卢塔克说 6000 名拉希代梦人生还者不足两百。战后他逃到亚历山大里亚，寻求托勒密王室的庇护。后来托勒密七世菲拉帕托尔继位，克列欧美涅斯三世被抓起来并控告其煽动叛乱。克列欧美涅斯三世从监狱中逃出来并试图真的发动一场起义。不过失败了，他在狱中度过了余生。他是斯巴达城邦最后的辉煌。

埃乌克雷达斯 （Eucleidas，公元前 227—前 222）：克列欧美涅斯三世的弟弟。

阿吉西波里斯三世 （Agesipolis III，公元前 219—前 215）：克列欧姆布洛托斯二世的孙子。

吕库古 （Lycurgus，公元前 219—前 210）：据称是欧里庞提德家族的血脉，其祖先是阿吉斯二世。

佩洛普斯 （Pelops，公元前 210—前 206）：吕库古之子，实际上是当时斯巴达僭主曼奇尼达斯（Machinidas）所立的尚未成年的傀儡。曼奇尼达斯后死于战争，下一任的僭主纳比斯（Nabis，公元前 207—前 192）自称

是戴玛拉托斯的子孙，并废除了吕库古以取而代之。公元前 192 年，纳比斯遭到谋杀后，斯巴达出现了最后一位自称有王族血统的国王拉科尼卡斯（Laconicus）。不过一般认为，斯巴达王族世系可以克列欧美涅斯三世作为终点。

注：亚加亚联盟在前 192 年吞并了斯巴达。

斯巴达国王的结局

死于谋杀的有：铁列克洛司；波吕多洛斯；克列欧美涅斯一世；阿吉斯四世；阿基达马斯五世；纳比斯。

战死的有：列奥尼达一世；克列欧姆布洛托斯一世；阿基达马斯三世；阿吉斯三世；阿瑞乌斯一世；阿克罗塔图斯。

自杀的有：克列欧美涅斯一世；克列欧美涅斯三世。

曾经被暂时放逐的有：克列欧美涅斯一世；普雷斯多安那克斯；列奥尼达二世。

被废除及流放的有：戴玛拉托斯；列乌杜奇戴斯二世；波塞尼亚斯；克列欧美涅斯三世；阿吉西波里斯三世；佩洛普斯。

索　　引*

* 本索引所注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页码。——译注

M

Z

译后记

如果把翻译比作一次旅行的话，我想翻译《斯巴达人》应该算得上是一次奇异之旅了，一段文字就像一段路程，不经意间，已经从去年的酷夏走到了此时的万紫千红，苏州的春天竟然会是如此的美丽、悠长，令我惊喜。

这本书现在能够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阮炜博士，如果没有他对我的信任和厚爱，我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如此亲近地去阅读陌生的斯巴达。多年来他沉潜于文明研究，从希腊出发进而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诸种文明形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比较，其程度、范围之深之广令人钦佩。景海峰教授是我思想的启蒙者，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都是他的哲学课和思想史课的最忠实的听众，他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与他的学识一起都深深地影响了我。还要感谢赵东明博士，他嗜好书与咖啡，我曾经跟随他学习哲学，听他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至今仍受益匪浅，他的渊博常常让我震惊，他的淡泊常常让我羞愧，他的温厚常常让我感动。张晓红博士和季进教授分别是我硕士生和博士生期间的业师，感谢他们对我的栽培，并为我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条件。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我想，唯有更加的努力才能报答他们对我的无私关爱！

好友章颜为本书翻译了第一章的绝大部分内容，她在自己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学习压力的情况下，仍然非常认真、仔细地坚持翻译，如果没有

她所给予的珍贵帮助，我的工作肯定会更加艰难。本书的其余部分由我负责翻译或编撰，我们在完成此书的初稿之后，曾经对译稿作过多次的校阅，但鉴于译者的水平和经验的欠缺，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梁建东　于苏州独墅湖
2009 年 5 月 30 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
作者=（英）卡特利奇著
页数=311
SS号=12753676
出版日期=2010.08